

1 总序

1 丛书主编视点

一、语文教育现代化

- 1 语文教学需要大大提高效率
——泛论语文教学科学化和进行语文教学
科学研究的问题
- 11 语文学科的现代化问题
- 28 语文教学要同现代化建设接轨
- 35 应进一步探讨如何提高中学语文教学效率
问题

二、传统语文教育反思

- 40 传统语文教学的得失
- 51 我和传统语文教育研究
- 64 对传统语文教学的再认识

三、情系课程改革

- 77 说工具
- 86 有关语文教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 99 关于语文教学改革的问题
- 106 关于改革语文课程、语文教材、语文教学
的一些初步设想
- 129 汉语文教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 142 当前语文教改需要着重探讨的几个问题
——与《语文学习》编者的谈话
- 148 语文教学需要有突破性的改革
- 150 今天的课程和明天的需要
[附录]
- 154 张志公教授主张中学设置文学课
《语文学习》记者

四、语言教育与语文教学

- 155 学好语文的三道关口
- 161 关于语言教育的几个问题
- 173 汉语语法的再研究
- 182 改进中学语法教学
- 191 修辞是一个选择过程
- 197 非常需要一种桥梁性学科
- 204 篇章论(上)
- 211 从语言规范到学做人

五、教学至境

- 214 要重视语文教学法的研究
- 226 关于语文教学中科学性与艺术性问题的
探讨
- 234 谈“启而不发”
- 241 关于精讲

六、研究之研究

- 245 博采兼中外,精研析古今
——张志公先生的现代化和民族化相结合的语文教学观 刘国正 庄文中
- 257 新世纪的语文教育革新之路
——学习张志公先生语文教育思想
顾黄初

七、忆大师

- 269 大酒缸 叶至善
- 272 悼念志公同志 周有光
- 275 伊人宛在 章 熊
——悼志公先生
- 277 深情寄与张先生 王本华
- 286 主要论著索引



总 序

正在进行的课程改革和《语文课程标准》的实验,将要开始的新课程与《语文课程标准》的全面实施,十分迫切需要和课程改革与《语文课程标准》紧密联系的学习资料。

《语文课程标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不仅充分吸取了国外母语教育的先进理念和经验,而且与国内的语文教育理论与实践有着深刻的血缘关系。特别是我国老一辈语文教育家和20多年来的语文教改,为《语文课程标准》的研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和丰富的经验积累,是研制工作的起点和基础。可以说,《语文课程标准》的研制、修订、完善和实验、实施的过程,就是对本国优秀的语文教育理论与实践不断进行反思与整合从而实现超越的过程。当然,这个反思与整合的工作不光是《语文课程标准》的研制者和少数专门家的事,广大语文教师要想真正走进新课程,正确理解和努力实验、实施《语文课程标准》,积极参与《语文课程标准》的修订、完善,也必须重新学习本国优秀的语文教育理论与实践,并对之进行反思与整合,实现超越。编辑这套丛书,就是为了满足广大语文教师学习、研究、实验、实施新课程的需求,也是为了给各级教育研究工作者提供一套精粹而完备的资料。

这套丛书共七本:《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重读叶圣陶·走进新课标》(张定远编)、《什么是语文——重读吕叔湘·走进新课标》(王晨编)、《语文教育现代化——重读张志公·走进新课标》(王本华编)、《近20年语文教改理论与新课程标准》(两册·潘记平、邹元湘编)、《他山之石——国外母语课程改革与新课程标准》(庄文中编)。《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什么

是语文》《语文教育现代化》力求站在今天的高度重读“三老”，发掘“三老”教育思想中与时俱进、常读常新的精粹，选录“三老”论著中最有价值、最富生命力、与《语文课程标准》的根本精神最能与之相通的部分。需要说明的是，三篇“丛书主编视点”，只是丛书主编个人对“三老”语文教育思想的认识，不代表各卷编者的看法。《探索与呼唤》主要从上世纪70年代末至2003年10月公开发表的语文教育论文中精选或有理论深度、或有创新意义、或有直接参考价值、或有史料价值的部分，有少数几篇是约请有关作者改写、新写的，还收录了几篇有一定学术含量的综述文章，以大致反映20多年来语文教育理论的整体面貌。这两卷的编选颇为困难，限于篇幅和识力，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挂一漏万”。《他山之石》从已公开发表、出版的译文译著和介绍性文章中选录，内容包括上个世纪以来国外母语课程改革的背景、趋势、基本观念，对母语教育中一系列重大问题（如课程的性质与目标、训练体系、阅读写作教育、知识与能力）的认识与对策，教材编写和课程评价方面的共同性、倾向性的观点，尽量突出最有特色、最有借鉴意义的部分。

编选之初，我们给这套丛书的特色的定位是：内容精粹，信息密集，新颖实用，服务课改。现在这个目标是否达到，在多大程度上达到，当然只能由读者裁判了。我们期待着来自各方面的批评。

最后，我们要衷心的感谢湖北教育出版社总编袁定坤先生和本书责编徐耀明先生，这套丛书从策划到出版，都得到了他们热情的帮助。

编者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

丛书主编视点

现代思维 超前眼光

——重读张志公

在当代语文教育研究领域,志公先生称得上是老一辈中最具现代意识的领跑者。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面对“相当大的一部分中学毕业生语文没有学通”的现状,面对知识爆炸同传统思维方式本身所固有的相对稳定性的矛盾,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语文教学之所以有那么多问题,和我们在教材工作教学中一切‘率由旧章’不无关系。”准确击中了以传统思维方式为支撑的旧的语文教育思想的要害。他大声疾呼:研究中学语文教学在思维方法上“首先要有开阔的视野”。到九十年代初,他更鲜明地提出:“要跟着时代潮流走,也未尝不可以超前一些。”实际上是提出了转换思维方式、转换价值观念的任务,确立了现代思维方式在探寻语文教学规律上的方法论地位。而他自己,就是一位身体力行者。

语文教学怎样改革?怎样朝前走?他的回答高屋建瓴,一语破的:“语文教学要同现代化建设接上轨,不能坐等,要主动,主动去接轨。”“关键在于:语文教学必须大大提高效率。”思维方式的变革,常常取决于用一个全新的思维框架来看整个

问题的能力。张老就具备了这个能力。上述回答既“入乎其内”,为语文教学把准了脉;又“出乎其外”,让语文教学与时代需求发生共振。这种致思趋向源于开放、多维的现代思维方式。正如张厚感先生所言:“志公先生最少因循思想,总是站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制高点思考语文教学的诸多问题”。于是,语文教学怎样同现代化建设接轨,怎样大大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就成为张老在语文教育研究领域所探索的主要课题。

一、从思维方式的层面,借鉴国外母语教育的有益经验,对传统语文教育中的合理因素进行改造,使之科学化现代化。

张老对中国传统语文教育的研究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深于八十年代,其成果在当代尚无人可及,请看他说的带有总结性的话:

近百年来,传统经验中那一部分既符合汉语语文实际,又符合比较科学的教学论的做法,似乎没有受到重视,得到发扬,随着我们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趋向一致的潮流,把那些做法加以改进以至改造,赋予它以时代精神和新的生命,进而与现代的教育科学、语言科学结合起来,形成一条既是传统的又是非传统的,适应汉语汉文特点的,适合现代需要的,我们自己的语文教学的路子。相反,传统做法中比较差的那一部分,影响似乎反而大一些,有的被原封不动的继续使用着,有的被部分修改甚至只是改头换面的使用着。把这种局面改变一下,扭转一下,真正做到继承传统中的优良部分,使之科学化、现代化,发扬光大,这是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的责任。(1983年)



这是研究传统语文教育的“纲”，一个语文教育大家开阔的学术眼光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跃然纸上！

研究传统如果停留在平面地罗列出几条经验几条局限，然后说说“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便万事大吉，那只是学术研究上的“例行公事”。张老的深刻独到之处，就在于他能够把研究的视角投向在传统语文教育背后发生支撑作用的传统思维方式，从思维方式的层面去辨析传统。他说：“语文是个民族性很强的学科，它不仅受一个民族语言文字特点的制约，而且还受这个民族文化传统以及心理特点的影响。”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语言文字是该民族思维方式最内在的根据，语文教育的民族性与民族的思维方式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正因此，张老对传统语文教育思想在今天的消极影响有深切的认识：“传统实在太深厚了，举人、进士们和‘迁客骚人’们的幽灵依旧不时的出现，在我们的周围游荡着，影响着我们的精神，甚至左右我们的思考。”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语文教学缺乏科学性”，“把提高语文能力看作一种相当神秘的事，看作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或者‘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事，看作一种只能听其自然，任其沉浮的事”，否认语文教学有一般的规律可循。在这神秘化的背后，正是重经验、重直觉的内倾、封闭的传统思维方式。张老认为，传统语文教育的非科学因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轻视语文知识的教育：“始终没建立起适用于语文教学的知识体系。语文教学始终处于一种自发而非自觉的、凭朦胧的感觉和经验办事的状态，靠老师耳提面命，靠孩子们自己去体会、摸索”；二是轻视教学方法：“满足于对活动方式的初级概括”，“一方面否定方法，不相信方法，一方面有了

方法就定型搞程式化。”这两大积弊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思想根源,“同我们长期停滞的,建立在小生产基础之上的封建社会,同与之相适应的那些思想、意识、习惯等”,有着必然内在的联系。这两大积弊制约着语文教学效率的提高,而我们长期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缺乏自觉性。所以,张老急切呼吁:“实在需要从传统加于我们的忽视以至否定语言知识这个桎梏中解脱解脱了!”他主张借鉴外国教育的经验,看看“外国在训练学生掌握本国语文方面采取了哪些有效的办法”,比如他们近一、二十年有过不少研究和试验,证明不仅仅对青年,就是对少年儿童也可以介绍一些理性知识,建立一些抽象概念,这对发展智力、培养能力是有益处的。当然,这里说的知识系统是指实际应用语言的知识系统,而不是纯粹的语言理论知识系统,“不能把语文课搞成一门纯粹的知识课,而是以知识为先导以实践为主体并以实践能力的养成为依归的课”。张老还对方法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方法制约着效果。只有科学的、新鲜活泼的教学方法,才能培养出一代具有活跃智力的,有进取精神,有效率感,有敏锐的现实感,有责任感的新人”,“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是探讨规律,根据探讨所得,寻求正当的方法,形成若干有用的、有效的模式,进而活用这些方法,活用这些模式,坚决反对、抛弃程式化”。

批判不等于简单地否定、抛弃,而是划清界限,划清新旧语文教育,新旧思维方式的界限,在这个基础上对传统语文教育的“合理内核”进行改造、实现语文教学的创新。比如如何对待多读多练,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记诵,模仿这条经验?张老首先肯定:“要提高学生的语言水平,重要的一条是实践。传统的经验多读、多练、是可以的”。但必须认识到,它是由传统语



文教学的性质和目的决定的,是为封建科举考试服务的。而就经验本身来说,“不能说没一点科学性”。但是,要读哪些东西呢?要读多少才管用呢?怎样读法呢?又是各人有各人的选法、算法、教法,各行其是,随意性很大。所以张老又明确指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客观规律还需研究”,那就是这种方法“往往说不出多少道理,没有在理论上加以认真的分析概括和总结,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学习者自己去摸索,只能心领神会,而不能言传,不能用言辞明确的概括和描述出来,于是它不能突破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影响了知识、技能广泛和持续的传播交流,从而也就影响了它的发展。”从思维方式的层面揭露了“多读、多练”这条经验只重感性、经验而轻理性、分析的局限性。遗憾的是,我们的语文教学在借鉴这一经验时没有分析它的来源、性质和思维方式上的局限,忘记了“今天的和十几二十几年后的年轻人所需要的语文能力和当年的秀才们、举人们、进士们、状元们所需要的语文能力大不相同了!这是我们探讨语文教学改革的时候必须时刻在念的!”张老尖锐指出,盲目提倡多读、多写这种“粗放经营”,使传统语文教学脱离社会需要的弊端直到今天还在严重影响着我们的语文教学。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具体表现为“不重视逻辑思维训练,不重视培养切合日用的语言能力……要学生发一些不切实际的议论,抒写一些不真实的感情,用一些自己也弄不清楚的词语,这对训练学生概念清楚,判断准确,推理合乎逻辑,不起作用,甚至起相反的作用。”因此,对这种传统的经验,必须要“加以改造,使之符合科学化的要求。语文教育只有采用科学的方法,才能提高效率,事半功倍。”怎样改造使之成为科学的方法呢?张老主张:“配合着读和练适当提供一点必要的科学知识,并且考究

一下读和练的科学方法 ,从而提高读和练的效率……把传统经验和现代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结合起来 ,达到事半功倍。”也即“对读和练进行一些研究 ,使之多带一些条理性 ,尽量减少其盲目性。”此外 ,古代训练表达能力也还是有序”的 ,八股文的写作模式就部分地反映了议论文结构上的某些特点(提出问题 ,论述问题 ,得出结论) ,是对某些方面规律性的一种概括 ,是有用的。这种模式就是古人说的“大体则有 ,定体则无”的“大体”。今天的写作教学要借鉴它 ,那就要“取模式之长 ,废程式化之病 ,把这个‘大体’比前人更科学地概括出来 ,用更合理的方法引导学生较快的入门 ,免除他们摸索之苦。”在这方面 ,我们很多语文教育研究工作者和一线的教师作了不少的努力 ,并且取得了成效。实践证明 ,在继承和创新的问题上 ,用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取代经验的思维方式是正确的选择。

一谈到语文教学的科学性 ,有些论者就只想到教材的“序列化” ,训练的“模式化” ,考试的“标准化” ,把“应试教育”下语文教学的弊端统统归咎于对语文教学现代化科学化的追求。这是不公正的。其实 ,张老说得再清楚明白不过了 :“语文教学的科学性 ,指的是教学实践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教学语文的规律。”而“语文教学的规律源于语言的规律 ,教学的规律 ,学生心理发展的规律。”显然 ,这是针对过去的语文教学中的随意性、散漫性即非科学性提出来的 ,并非轻视语文教学的人文性。他在 1996 年曾正面回答过这个问题 :“加强语文教学中的人文因素 ,我不反对 ,但把它与科学性对立起来 ,就走向了极端。过去 ,我们是人文性与科学性都谈不上 ,我称之为四不像。把多年来语文教学没搞好的原因归结为强调了工具性 ,搞多了科学性 ,就离谱了。科学性和人文性都得加强 !”事实是不是



这样呢？另外，张老主张的语文教学科学性并不像某些论者理解得那么绝对，把一切都序列化、模式化、标准化，走向了科学主义。他说：“既要探索几条大节节目的规律性的东西，也得容许教师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教学方法。教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就是指的这种情况，既不能没有一个基本准则，又不能列出一个非此不可的公式。”既不能散漫无“序”，又不能让“序”束缚手脚，把探寻规律变成杜撰公式。我们反对语文教学中的科学主义和科学主义看问题的方法，但不反对语文教学中的科学性和科学看问题的方法。科学主义是科学思维方式不断扩展，最终走向绝对化的产物，是科学性的异化。二者有联系更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在张老关于语文教学科学性的论述中，个别具体意见有可能模糊了科学性和科学主义之间的界限，但从总体来看，方向是对的，其探索在理论和实践上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二、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语文课程的改革，对语言和语文能力进行现代阐释，科学地认识和处理语文教学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

为了探索语文教学的规律，张老不仅以批判的眼光深入系统地研究传统语文教育，而且以开放的心态吸收国外课程改革特别是母语课改的经验，在融会中外母语课改精华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进行语文课改的思路和设想。他认为，“课程——包括课程的设置、结构、内容等……的发展，从来是和社会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的。……社会形态制约着或者改变着课程，课程影响着（阻滞和推动）社会的发展。”因此，服务于社会发展的课程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进行必要的改革。语文教学要大

大地提高效率,同现代化建设接轨,进行课程改革就是必然的选择。这是历史唯物论的观点。

怎样进行语文课改呢?在张老看来,首先要对语文这个学科的本体——语言进行现代的阐释。作为著名的语言学家,张老并不固守传统的语言观,而主张对语言的现代理解,表现出可贵的与时俱进的现代意识。他认为,“随着科学的发展,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语言学领域的一些基本概念也随之须得更新,一些基本法则也要重新估计。”比如语言的本质和功能,他不同意原封不动地照搬“语言是交际工具”这个传统的定义,而应渗入“有现代意义的更具体的理解”。语言的交际功能原来局限在人与人之间的原始功能,而现在人可以和海底交际,可以和太空交际,还可以同机器交际;语言不仅可以转换为文字,还可以转换成数码和公式等等。因此,人们对语言的功能、语言的定义须作一番新的界定,那就是:“语言是表达感觉的工具,是进行思维的工具,是人类交流信息的工具,是教育和接受教育的工具,是发展生产力的工具。”所以我们要用一种新的视野来看待语言教育,使“教给下一代掌握的语言必须是全国通用的、在国际上通用的、规范化的标准语言。”张老还吸收了文化语言学的某些要素,从文化的层面和语文教学的角度进一步揭示了语言的特性:“语言是人类知识结构中最低的,也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层次,中层和高层都是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它不同于生产工具,本身“总是带着好些东西在里边的”,诸如知识的传授、思想的陶冶、思维的训练等等,因而我们“在教语言、学语言的同时,也就教了、学了语言里所带着的那些东西。……忽视了语言教育,不仅仅是忽视了语言本身,而实际上是忽视了许多东西。”他从这里看到了语言能力的重要性:



“也正是由于语言的这种特性，一个人的语言能力如何、语言趣味如何……往往成为一个人文化教养高低、思维能力强弱的标志。”

有了对语言的现代阐释，必然会以开放的、多维的视界来确定语文教学的目标。张老是主张立足现在，更面向未来的。他说：“教育是为未来培养人才的，设些什么课程，每门课程中讲些什么内容，用些什么方式，都要为未来的需要考虑。”“当然不能脱离今天的实际，但是脑子里不能没有个未来，——未来的生活，未来的世界，未来的需要。”就语文学科而言，要从今天的社会需要出发，顾及当前的实际来考虑今天语文课程的处理。”“今天的语文教学要考虑到七八年，十几年后的人需要什么样的语文能力”。他在1984年曾预测过20世纪末、21世纪初人们生活和工作所需要的语文能力：“处理生活和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的敏捷准确的高效率的口头和书面语文能力，将成为每个人的需要，能用尽可能经济的语言材料传递尽可能多的信息，达到尽可能高的准确性和可理解性，收到尽可能强的表达效果，将被认为是写作的高手。”显然，他是从语文的功利价值层面，从发挥语文的基础工具性能和作用来进行预测的。以此来衡量，我们不能不钦佩他那与现代思维方式相联系的超前的眼光。他提出的语文教学同现代化建设接轨，即同学制改革接轨，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接轨，同信息社会、信息交流接轨，则更全面更深刻地体现了这种“看到今天，想到未来”的现代眼光。

对语文本体和社会所需语文能力的现代阐释，这只是我们进行语文课改的一个理论前提。为了适应今天和今后的社会需要，语文教学必须进行大幅度的改革。语文课改的主要任

务,应该是以一种系统思维来认识和处理语文教学的外部关系和内部关系。对这个问题,张老确立了最基本的思路 and 原则。他认为,要处理好语文课程的外部关系,“必须从这门课的课程结构入手”,在纵向上,“把高等教育前这一阶段的语文教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也就是说,从儿童的早期语文教育到高中、中专、中技阶段的语文教育是一个大系统,里面包括学前、幼教、高中等几个子系统,它们像一根完整的链条,每个环节都不可缺少,而又环环相扣、互为条件、螺旋式上升;在横向上,要研究“语文课与其他课程的关系”,正如吕老说过的:“教学改革是一个整体,语文教学的改革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尽管改革是从这里开始的。”处理语文课程外部关系的基本原则,张老形象地概括为既要“瞻前顾后”,又要“左顾右盼”。语文课程的内部关系,指的是对学生进行语言教育,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同知识传授、思想陶冶、思维训练等任务、功能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语文教学的首要的、专门的任务是学习使用语言文字。文不通,语不顺,说话结结巴巴,就什么也谈不上。”这是“主”,其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另方面,语文教学还应该也能够承担知识传授、思想陶冶、思维训练等任务,这是语言特别是汉语汉文的特点决定的,否则“也是不符合实际,不完全妥善的”。这是“宾”,其位置也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任何时候也不要超越。处理语文课程内部关系的基本原则,张老也作了形象的概括:“不可喧宾夺主,也不可唯主独尊。”这些论述都触及到了语文课改的本质和规律,充满了唯物辩证法。

在论及如何认识和处理语文课程的内部关系时,张老不仅仅是提出了基本思路 and 原则,而且对其中的一些焦点、难点问



题(如文学教育)也进行了具体而独到的分析。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还把文学教育作为语文教学的一项任务,到八九十年代,他则反复强调语文教学同文学教育要分开进行(语言、文学分科),不赞成把文学教育的任务归并到语文课中,它们不应是从属关系。那样做的结果是“两不像,两不沾,两败俱伤”。因为文学课的任务是进行文学教育,语文课的任务是进行听说读写训练,培养语文能力。在传统语文教育中,“语文能力”和“文学素养”的界限比较朦胧、模糊,分不清,形成一种大语文教育。到近代,随着时代的发展,“语文能力”的实用功能被强调,二者的分野日益明朗、确定,再也很难“共处”。这种认识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也可以找到根据,可以进一步研究,让进一步的实践来检验。不管分歧有多大,中学生需要文学教育,需要文学素养(对文学的理解、欣赏、鉴别能力),却是不争的共识。张老的独到之处在于,他认为文学教育除了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更重要的是文学可以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文学最足以唤起人们的联想、想像,进而诱发创造性思维。”他说,为什么古往今来的大政治家、军事家、大科学家那么喜欢文学,爱好文学常常是他们光辉人格的组成部分。他们的思想境界犹如天马行空,极富有创造性,而文学也是海阔天空的创造性思维,二者思维的路子合拍了,易于产生共鸣。文学使他们的思想更活跃,更富于创造性。张老关于文学功能的见解抓住了中学文学教育的一个根本特点,对我们今天的语文课改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的确,把文学教育的作用仅仅归结为提高鉴赏能力,固然是降低了它的功能,而升华到漫无边际的人文精神的培养,也嫌过于宽泛,在实践中易流于空疏。

三、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创建汉语辞章学 把汉语语言的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同语言的实际运用实实在在地结合起来,为提高语文教学效率开拓了一条新路。

语言学的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同以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为目的的语文教学脱节,彼此挂不上,是一直困扰语言学界和中语界的主要难题之一。经过长期的艰苦探索,张老以创建汉语辞章学为标志,成为尝试解开这个难题的第一人。仅从《汉语辞章学论集》的内容来看,虽然展现在我们眼前的这门“桥梁性学科”还只是勾画出了主要轮廓,但堪称当代语文教育理论研究中学术含量最高,最具实践意义的重大成果之一。虽然这门学科的内在价值尚未得到人们足够的认识,张老的探索也还未得到众多的响应,但汉语辞章学会按照学科自身应有的规律发展下去,它对语言学特别是中学语文教学的深刻影响必将日益清晰地显现出来。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张老的《汉语辞章学论集》有三个特点:

第一,内容建构按“从大到小又回到整体”的思路安排,以动态的即从大到小的研究为主,把静态的即从小到大的研究融会其中,鲜明体现了语言应用的基本规律。

汉语辞章学为什么从篇章开始,然后才是句读—语汇—字?张老解释说:在语言实际运用中,特别是在书面交际中,总是以篇为对象,用篇作单位的,不论是阅读还是写作,首先总是着眼于全篇,立足于整体的,“都是从篇入手,从大向小的活动。”这一序列因符合读写规律而显出了它的科学性。但同时,从小到大的静态研究,从字到词语到句、段、篇,找出层层组



合的一些规律、规则和规范,并从中见出汉语的特点,也十分必要。“二者可以互相验证、互相补充、相互制约又相辅相成”。比如连贯性、一致性、协调性、艺术性是组织段或篇的基本要求,“起、承、转、合”则是“提出问题,从不同角度论述问题,得出结论”这个模式的概括,是篇章结构的基本规律。又如语汇论讲汉语的词,从辞章学来看,汉语词的运用从语义的角度、从表达作用的角度考虑的余地特别大。从语义的角度考虑,有些词的运用虽不合语法,但只要合乎事理,合乎语言习惯也会得到认可。从表达作用、表达效果的角度考虑,要新颖、给人新鲜感,要有深层含义、耐人寻味。而这又取决于语境,同一个词,此语境是老生常谈,彼语境可能就新颖得体。张老把语言学研究成果中与语言应用关系密切而直接的一些规律性的内容纳入辞章学,对学习运用汉语确实会有实际的帮助。

第二、把传统的辞章学同现代的语言科学结合起来,使语言知识,语言理论既是科学的又是民族的,符合且突出汉语的特点。

辞章学和语言的民族性关系十分密切。“辞章学既是语言艺术之学,必然和语言特点,包括语音的、语汇的、语法的特点有密切的关系。汉语的语言艺术敏锐而深刻地反映着汉语多方面的特点。”所以汉语辞章学能够提供有助于揭示汉语的某些方面特别是语法方面某些特点的一些线索。我们知道,西方语文有重逻辑、重语法的特点,而中国传统语文从来 not 注重发展语言的逻辑功能和形式化特征。“五四”以后,以《马氏文通》为开端,中国现代语言学完全否定传统的语言研究,走了一条“全盘西化”的道路。正如张老所说:“我们整个的语法间架,从马建忠引进西洋语法一直到今天,就不适合于汉语。”

(1990年)因为印欧语是形态语,汉语是非形态语,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语言体系,以印欧语系的语言为基础而产生的语法框架和语言学理论,从根本上同汉语不相适应。同时,“认为古人不讲语法、逻辑,也是一种误会”,只是从现代科学观点来看,古人不善于总结经验,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严密的逻辑分析和明晰的概念表达。针对这种状况,张老振臂一呼:“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明白无误地确认汉语‘非形态’这一事实,从而有勇气打破印欧语的语法框架,探索和建立汉语自己的语法体系。”他把自己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按语文教学的需要纳入了辞章学。

在汉语辞章学中,符合汉语本身特点的汉语语法是什么呢?那就是:汉语的语法是最标准的组合法,即如何的把小的语言成分一步一步组合成大的语言成分;汉语自身的语法规则,实际上就是汉语各级语言单位的组合法则,而不是把大单位切割成小单位。任何语言的语法都是组合法,但不同的语言各有不同的特点,不同的宗教、文化、思想等背景,故语言的组合规律也不尽相同。汉语的组合有三个特征:(1)汉民族喜欢对称、整齐,组合以二合为主。(2)组合不靠形态变化,故强制性的规则较少,选择性的规则多,各级语言单位之间只要符合语义、逻辑事理,符合汉民族的语言习惯就能组合到一起。所以组合简便、容易,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可选择性。如何选择,虽不一定涉及正误的问题,却有优劣、巧拙、高下之分。“汉语的灵活、丰富、准确、多变的特点都表现在这里。这是使用汉语时的要点和难点,也是研究汉语时的要点和难点”。(3)组合方式和组合关系具有一致性。汉语语法的这些特点,尤其是组合的灵活性、简易性与辞章学密不可分。



汉语辞章学符合、突出汉语的特点,表现在学科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不仅仅是汉语语法。如词汇论中把成语摆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就因为“成语充分利用了或者说充分反映了汉语的全部特点。”“它的结构那么复杂、多样,表达作用那么强,并且产生了一种很显著的属于汉语特点的作用,就是它能够使得表达精练而蕴含丰富,能用较少的语言材料表达较多的思想感情,或者说传达较大的信息量,达到较高的可理解性、趣味性,收到较高的表达效果。”又如体裁论中讲诗歌,就不同于文艺学、美学,而着意强调指出中国诗歌非常发达的一个很重要的客观原因是由于汉语本身的特点——“非形态、语素和词短,非常便于诗歌语言的运用。”这样的语言知识、语言理论既运用了现代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又紧紧抓住了汉语的特点,完全符合张老自己提出的“精要、好懂、有用”的原则,对学生学习母语大有益处。

第三,根据现代社会对辞章学的要求和人们学习、运用汉语的需要,对语言知识、语言理论和逻辑、修辞等知识、理论中的相关要素进行有机综合,使之构成具有桥梁性的知识系统。

张老认为,为了改变长期以来中学语文教学不科学、无定序、缺章法的状态,建构一个实际运用语言的知识系统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在他看来,语言运用的技巧和效果“是有规律性的,是有整套的操作程序的,掌握了这些规律和程序,就能解决一定的实际问题”。(当然,“那规律不像语法那么抽象,不能列出像数学公式一样的东西”。)这是由汉语在运用中综合性强的特点决定的。人们“在实际运用语言的时候,决不是孤立地一时考虑遣词造句的规律,一时考虑作品的特点,而是综合地应用多个有关方面的原则、规律、方法、技巧

的。”辞章学同语言学一样,是多科融合性的学科。义理和修辞都不是语法,但对于汉语,义理、修辞和语法实在不可分家,讲汉语语法时,要回避和绕开逻辑与修辞是不必要的,也是办不到的。因此,完全可以根据现代社会对辞章的要求和中学语文教学的需要,运用现代思维的系统整体观把语法、修辞、逻辑与语言运用有关的这几个学科贯通、综合起来。“把有关语言、语文方面的基础知识,包括我们常常讲的语音知识、文字知识、语汇知识、语法知识,乃至逻辑知识等融合起来;……把运用语言的各种能力,包括口头上的听、读和书面上的读写融合起来”、“把语言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同语文教学挂起钩来”,以改变“知识自知识、应用自应用的互不相干的情况”。传统的“对课”就把这些基础知识讲活用活了,可惜后人没沿着那条路继续探索下去,赋予它更科学的处理,而是走向了反面,或弄成艰深繁琐的、桎梏人们思想的东西,或干脆放弃,不搞这类训练了。又如习惯语,它量多,构成复杂,像成语一样反映了汉语在语音、语汇、语法、修辞等种种方面的特点,在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运用中起的作用也非常大。从习惯语的构成、特点和使用可以看出,它把语言文化知识和语言的运用很自然地结合、统一起来了。他还提醒我们,词不等于概念,句子不等于判断,语、修、逻三者毕竟是不同的东西,综合不等于将它们简单叠加,而是要处理好分合关系,“当分者分,当合者合,可以分中有合,合中有分”、“把有关系的东西融为一体”,才能发挥系统的功能。

由于汉语辞章学所要建构的知识系统是指实际运用语言的知识系统,而不是纯粹的语言理论的知识系统,在对相关知识进行选择 and 阐释的时候,张老非常注意突出辞章学的特点,



突出其桥梁性的功能。比如体裁,不仅讲述之于情的诗歌、散文、小说、戏曲,还讲述之于理的各类应用性的体裁,包括哲学的、社会科学的、自然科学的、应用科学的。讲文学体裁,不仅讲文学学论及的一般特点,而且要着重从辞章学的角度“把各种体裁运用语言及其辅助手段来表达综合考虑在内,要了解某种语言如何理解、如何运用、运用时有什么要求、有什么共同原则、有什么不同情况,等等”。讲应用体裁,不仅讲其分类的复杂性,还要突出根据特定对象、特定目的来运用不同特点的语言。又如风格,同文学、美学讲的也不同,主要讲言语表达的风格,而这又是凭借语言运用表现的,所以要着重讲哪些语言的运用足以表现出某一种风格。再如“比”,辞章学不同于修辞学,不主张把比喻分得很细,只要是“以此喻彼”的形式,都属于“比”的研究范围。因此,主要讲“比”的心理基础、语言基础、美学意义和文学效果,讲“比”和说理、如何用“比”、“比”与文风等等。这样建构的知识系统,从根本上区别于过去那种脱离语文教学实际需要的繁琐叠加、散乱无序或“结而不合”的语文知识,而形成了汉语辞章学的三个特点:经济、准确、讲效率。张老说,这也是“现代社会对辞章提出的新要求”。

在新一轮课改的文化语境下,重温张老的语文教育论著,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归根到底或许还不是那些对具体问题的真知灼见,也不是那些对教改方案的设计设想,而是深埋在它们背后发生支撑作用的那个“认识框架”——立足现实、高瞻未来、容纳新潮、脱离旧套的科学的辩证思维方式。作为人类实践活动方式的内化与积淀,作为文化体系最深层最关键的因素,思维方式是时代的精神标志。要完成课程改革的任务,构

建现代中国的语文教育体系 ,就必须从思维方式上和在其深层的价值观念上来一个根本转变 ,告别“率由旧章” ,从传统转向现代。没有这个转变 ,任何美好的改革都只是镜花水月 ,沙上建塔。当然 ,现代思维方式并非万能 ,它不能保证你探索的真理性 ,但可以引领你与时俱进 ,引领你面向真理 ,面向现实 ,面向未来。

这就是志公先生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

邹贤敏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

一、语文教育现代化

语文教学需要大大提高效率

——泛论语文教学科学化和进行 语文教学科学研究的问题

多年来,语文教学的效率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从小学到中学的12年或10年之间,语文课所用的教学时间占全部教学时间的 $\frac{1}{3}$ 左右,居各门课程的首位。然而,相当大的一部分中学毕业生,语文没有学通。

这种现象,不应当再继续下去了。语文是学政治、学科学、做一切工作的基础工具,普通教育阶段必须让学生充分掌握,能够正确、熟练地运用。儿童、少年、青年,时间和精力是极端宝贵的,不能容许这样浪费——为一门功课耗去了总学习时间的近 $\frac{1}{3}$ 而收效不大。在争时间、抢速度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今天,年轻人要学的东西很多,要做的事情很多,不应当把那么多的力量花费在搞基础工具上。汉语、汉文并不难学。从进小学起到中学毕业,把语文学好,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关键在于:语文教学必须大大提高效率。

要提高效率,就得研究一下,效率为什么不高,症结在哪里。

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不同的特殊原因,比如前几年“四人帮”横行时期对语文教学的严重干扰和破坏。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多年来一直存在的,那就是:语文教学缺乏科学性。

这是有历史渊源的。清末“废科举,兴新学”,到20世纪20年代初,逐步形成了一套“国文”教学的做法。语文是民族性很强的一种东西。就汉语文而论,有方块汉字问题、汉语的特点和悠久的语言传统问题、文言文问题等,这些,都是我国有而别国没有的独特性的问题。因此,当时的“国文”教学无法像其他课程那样,从别国照搬人家的做法,而是改头换面地承袭了传统的一些观念和做法。不过,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那段时期的教育改革,是以抄袭日本、欧美为事的,“国文”教学也多多少少从外国搬来了一点东西,虽然远不如别的课程搬得那么多。从传统做法中承袭下来的并不都是其中合理的部分,还有不少糟粕;从外国搬来的东西,很多是生吞活剥、未经消化的。“国文”教学的做法,基本上是这样两部分东西的杂糅,其特点就是不科学。其后,几十年来,从“国文”到“语文”,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有所改变。特别是建国以来,语文教学内容有很大的变化,教学方法也有所改革,只是改革的步子不够大。

从旧传统承袭下来一个很不科学的做法是:语文教学限于书面,忽视口头语言的训练。

在长久的封建社会里,读书人读的是文言,写的是文言,而文言早已和口语分了家,于是在教学中自然而然地只重“目治”,不管口耳之事。唐、宋以后的念过书的大和尚们,宋、元以后的理学家们,有些人用口语记载他们的师傅谈禅或讲学时说的话,即所谓“语录”,多半是些半文不白、似通不通的东西;



宋、元以下,有些人用白话写小说,专就语言规范而论,写得好的也屈指可数。《三国演义》、《西游记》是文白夹杂的。这些都是属于优秀作品之列,等而下之的就不用说了。像《红楼梦》语言那么好的实在是“凤毛麟角”。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写得很不错,可是同《文木山房诗文集》比较一下,不难发现,他运用文言的能力似乎比白话强一些。可见,封建文人用白话作文的能力不怎么高明。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读文言,写文言,因为文言和白话是两码事。只要能写文言,就能考秀才、举人、进士,就可以做官;白话只能用来写小说什么的,写得好坏,无关紧要。重“目治”,无视口耳训练,这个传统有1000多年的历史,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国文”教学承袭了它,“语文”教学仍旧没有打破它。

文言文时代,不重视口头语言的训练,是错误的。人们是用语言进行思维的,就连封建文人,他们平日想事情,必然也是用他们时代的活语言,不会使用和现实生活脱节的文言。语言是思维的物质承担者。我们进行语言训练的同时,也就是在训练思维;反过来看,不重视语言训练,实际上也就影响了思维训练。这中间的关系,封建教育者们不理解。他们只看到要读文言,写文言,于是就在书面上下功夫,完全不理睬口头语言的训练,其结果,“十年寒窗”,背熟了大量文章,终于还是写不通文章的,大有人在。

到了白话文时代,仍旧不重视口语训练,就更说不过去了。如果说,语言训练和思维的关系不十分容易察觉,那么,说的能力和写的能力密切相关,却是显而易见的。一个人口头上词句妥帖,干净利落,写下来就不会残缺错乱,拖沓累赘;口头上有条有理,细致严密,写下来就不会颠三倒四,矛盾百出。基本上

照着口头上说的去写,写出来当然还需要加工润饰,然而并不费力。相反,说话支离破碎,语无伦次,到了提起笔来才去选词造句,调理思路,作文便成了苦事,写出来再去修改也十分艰巨。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实例是很多的。

也许有人会说,有的人平常被认为是很能说的,可是写出文章来不怎么高明;也有的人文章写得挺好,可是日常生活中,讷讷于应对,说起话来好像很吃力,这该怎么解释呢?这种例子的确不少,然而都不足以证明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是互不相干的两件事。倘若把这些人口头上说的和笔下写的拿来对照分析一下,我们将会发现,每个人说的和写的反映了同一个水平的基本语言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换句话说,每个人(已经掌握了常用汉字的人)口头上表现的基本语言能力和书面上表现的基本语言能力,是相应的。至于口齿是否“伶俐”,说话是否“风趣”“动听”,那些差别反映的不是基本的语言能力,而是别的因素,例如性格、心理、生活环境和工作需要造成的习惯等等。有些人口头表达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似乎不很一致,这种现象恰好提醒我们,在语文教学中,口头训练和书面训练不可偏废,应当密切结合,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使“出口成章”和“下笔成文”真正统一起来。

继续对“语”和“文”采取分而治之,厚此薄彼的办法,很不利于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但是改变这种状况不是一句话就能做到的,有待研究解决的问题很多。在小学前期,怎样处理好识字教学和语言训练的关系;在小学后期和初中,怎样处理好语言训练、阅读训练、书面作文训练的相互关系;怎样从小学起就把实实在在的语法训练和逻辑思维训练(是实实在在的训练,不是空讲知识)的因素融合在语言训练之中。这些,以



及别的一些有关语言训练的理论问题和具体方法问题,亟待深入探讨,实地试验。

把提高语文能力看作一种相当神秘的事,看作一种“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或者“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事,看作一种只能听其自然、任其沉浮的事,是语文教学缺乏科学性的又一表现。

试向语文教学工作者提个问题:“什么是提高语文能力最有效的方法?”回答多半是:“多读多练。”再问“读些什么,读多少,怎么读?练些什么,怎么练?”大概十个人会提出十种不同的答案,“言人人殊”,或者,干脆哑口无言,提不出答案。

“多读多练”,这是个传统的经验,古人谈论这个问题的很多,随便翻翻古书,不难抄出几十条上百条来。这是个行之有效的好经验。这个经验是应当吸取的。但是,话不能到这里为止,还得继续说下去,也就是要有根有据地、成套地回答好上边提的第二个问题。

读和练需要指导和方法。循着正确的路径,按照合理安排的计划,采取恰当有效的方法,一步一步地读下去,练下去,才能快一些收到好的效果,按照预定的计划,在一定的时间完成一定的任务,达到一定的目标。否则,如果路子不对头,没有合理的计划和步骤,没有恰当的方法,至少是见效慢,成效差,甚至比这更坏一些。

有人认为,学语文不是 $3 + 2 = 5$ 的事,不可能那么科学。当然,学语文和学数、理、化不一样。但是,不论学什么,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学画,学唱,学弹琴,学舞蹈,都不是 $3 + 2 = 5$ 的事,都各有它的路径、步骤和方法,为什么独独学语文不能有呢?“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很对,然而,瞎打乱唱是练不

出功夫的。教拳、教曲的师傅都有成套的教法,教一个成一个,为什么教语文就办不到呢?

有人认为,曹雪芹没受过什么科学的语文训练,不也成为曹雪芹吗?是啊,李时珍没进过医科大学的药学系,不也成为李时珍吗?“神农尝百草”的时代早已过去了!我们不能再满足于在多少年内、在多少人中冒出一个曹雪芹。我们需要的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让尽可能多的人都把语文学好,够用,够搞四个现代化用。样样工作都要求“多快好省”,语文教学不应例外。讲科学,讲方法,是达到“多快好省”的一个必要条件。

一篇文章,选在某个年级的教材里,甲说“深了,不好教,不好学”,乙说“不深,太浅,教着没意思,学着没味道”。甲、乙两位各凭什么说的呢?是根据生词、难句的多少说的吗?是根据涉及的知识多寡说的吗?是根据事理难易说的吗?仿佛是,又仿佛不是,说不清楚,没有数据,也没有明确的标准。说“深”说“浅”,基本上是凭感觉,至多是凭经验,好像吃菜,是咸是淡只能凭嘴尝,自然就要“一人一个口味”了。学生的一篇文章,拿给十位老师看,大概会批给十个不同的分数,差距可以大到十几分,二十几分,甚至三十分。老师是凭什么判分的呢?也说不太清楚,基本上也是“一人一个口味”。吃菜可以“一人一个口味”,文艺欣赏也还可以“一人一个口味”,教学生,搞训练,不行,要有规格,有标准。规格和标准不是凭“口味”定的,是根据任务定的,根据儿童、少年、青年语文能力发展、提高的一般规律定的,虽然不是 $3+2=5$,总也得“八九不离十”。

不能继续把提高语文能力这件事神秘化而听其自然,要力



求做到语文教学科学化。当然,语文教学,包括编教材和教学学生,也是一种艺术。甲、乙两位编辑或教师,思想水平、业务能力相当,根据的原理、采取的方法相同,而编出的教材有差距,或是教学效果有高低,这种情形,在哪一门学科都有。所以,教学工作要讲艺术,这也是一门学问。但是,教学工作者首先要讲科学。无论说话、听话、识字、读书、作文能力怎样一步一步地提高,应该有一般的规律可循。摸清楚这些规律,运用它,设计出训练的途径、步骤、规格和方法,就能大大减少教学上的盲目性,提高效率。这就是科学化。当然,语文是一种社会现象。影响语文能力的因素是很复杂的。学自然科学,同一班毕业生的成绩都会有差异,学语文,差异自然更不可免。教育无法“机械化”,培养人不能像机器生产那样,产品一模一样,毫厘不差。然而,科学化总是可以提高效率的。科学种田,长出来的苗也不一样高,可是科学种田总比非科学种田的效率 high 得多。

要语文教学科学化,就必须对语文教学进行科学研究。这项工作,如果不说还是一个空白,至少,还没有系统深入地进行过。这是摆在语文教学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语文教学领域,需要进行科学研究的问题很多。上文提到的语言训练问题,识字问题,阅读训练问题,书面作文训练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就都是一些很大的研究题目,每个题目都包含着不小的一组更具体的题目。此外,本文还提到过汉语的特点和语文传统问题,文言问题,语文训练和逻辑思维训练的关系问题,这些,也都是一些很大的研究题目。本文只是笼统地提到了这么一些问题,不可能一个一个地展开论述。

上边列举的这些 ,还只是语文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进行语文训练 ,提高语文能力这个方面。

全面研究语文教学 ,还有几个更大的问题。首先是 ,语文教学中的语文训练和政治思想教育的关系问题 ,语文教学如何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问题。这个问题 ,建国以来就受到了重视 ,但是一直没有处理得很好 ,还有待继续深入进行研究。

此外 ,还有一个文学教育问题。20 世纪 50 年代中 ,试行过一段文学、汉语分科教学 ,随即停止。从那以后 ,语文教学中不大再提文学了。如果提 ,就是从消极方面提 ,比如 :“不能把语文课教成文学课。”什么是“文学课” ? 这个概念是不清楚的。鲁迅的《孔乙己》 ,是一篇文学作品。这篇作品 ,在中学的语文课里应当怎么教法 ? 在中学的“文学课”里又应当怎么教法 ? 区别在哪里 ? 能够说得清楚吗 ? 如果说 ,教这样一篇作品 ,大讲“作者生平”、“时代背景” ,而把作品放在一边 ,不念 ,也不管学生懂不懂 ,大讲其“主题思想”、“人物形象”、“文学技巧” ,反复“分析” ,总共要讲到五六课时 ,甚至七八课时 ,所谓“教成文学课”就是指的这种教法 ,那么 ,这种教法的确应当反对。然而 ,这说不上是“教成了文学课” ,不知道这该算什么课 ,也许 ,比较恰当的名称是“浪费时间课”。直到今日 ,这种教法并未绝迹。看来 ,需要的是从积极方面研究 ,在中学的语文课里 ,应当怎样对待文学作品 ,怎样在进行语文训练的同时 ,也进行一点必要的文学教育。文学 ,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个重要部门。大概可以说 ,没有任何一个人一辈子不和文学打交道 ,连不识字的人也还要看戏、看电影嘛。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切部门 ,包括哲学在内 ,普通教育阶段都有一门功课管一管它 ,为什么独独文学没有一门功课管一管呢 ? 事实上 ,语文课从来



都管的。翻开任何一本语文教材,里边都有比例不小的文学作品。一个重要的东西,客观存在着,硬装作看不见,不去理会,那是不行的,需要研究积极的办法。这个问题,当然可以包括在前边说的“读什么,读多少,怎么读”那个题目里去研究。不过由于它有点特殊性和复杂性,所以也还需要提出来着重研究一下。

还有,语文教学与知识教育的关系问题,也是很值得探讨,而过去一直被忽视了的。这个问题在小学阶段格外突出,在中学阶段也还有。在普通教育阶段,各门功课分工而不合作的现象,不能认为是合理的。尤其是语文,它和每门功课都有关系,一无例外,为什么不应当、不可以做一些“统筹办理”的考虑呢?

要使语文教学科学化,就要全面研究语文教学中的一系列问题,要从大量的艰苦的调查工作开始。要向从事语文研究的专家调查,向语文教学工作者调查,向社会调查,向工农兵群众调查,向各行各业的同志调查,向从事教育学、心理学研究的同志调查,向小学生调查。要了解语文教学的历史和现状,了解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对语文教学的要求,总结语文教学改革的好经验,发现存在的问题。我们的调查不仅限于国内,还要向国外调查。外国在训练学生掌握本国语文方面采取的那些科学的有效的方法,也是可以借鉴的。只有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各种问题分门别类作大量的分析研究工作,才有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语文教学的科学研究问题,不仅是中小学语文教师的事,而且应该是从事高等师范教育的教授、教师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个工作不是可有可无的,要对亿万中小学生负责。迅速

提高青少年一代的语文水平,使他们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掌握好语文这个工具,这对他们向科学文化的高峰进军是至关重要的。语文教学的科学化,实在是关系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关系提高我们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事情。

除了从事语文教学的同志外,我们还要呼吁研究语言、文学、逻辑、教育学、心理学等各方面的专业工作者、专家们,都来关心和积极支持语文教学的研究工作,出主意,想办法,提要求。希望有关的报刊杂志经常刊载语文教学研究的成果,开展广泛的讨论,以期引起社会上的重视,共同努力,把这件事办好。

(1978年5月)

(本文是著者与田小琳、黄成稳二同志联名发表的。)



语文学科的现代化问题

什么是语文学科的现代化呢？

首先是语文学科的要求要现代化。要考虑现代文化科学教育的发展和现代社会的各项工作，对于每个受过一定教育的人在语文能力方面有哪些要求。这些要求有的可能是古今中外共同的；有的可能是过去就有而现在格外突出了；有的可能是现代社会提出的新的要求。编选教材和进行教学，都必须从这些要求出发设计方案，决定内容，采取措施。古今中外共同一致的那些要求大家都会注意到，而后两种要求却往往被忽视。研究语文学科的现代化问题，要着重考虑这两种要求。

例如，教育工作者从来是考虑到如何发展学习者的智力的。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就是培养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就是培养智力。他要求学习者能够“举一反三”，能够“温故而知新”，用现代术语来说，大体上是和所谓知识的迁移相通的，也是一种发展智力的要求。然而，到现代社会，对智力的要求格外突出了。具有高的智力，不再是所谓神童才子所特有的，而成为对年轻一代的普遍的要求。原因是，如我们大家都已经知道的，知识的增长和发展越来越快，许多统计数字表明，文化科学各个领域之内的知识量，几年就要翻上一番，今

天学到的新的知识 ,过不了太久就会过时 ,就会老化 ,需要更新。在这种形势之下 ,人们必须具备足够的智力 ,才能跟上这样的发展形势 ,不断的吸取新的知识 ,改造旧的知识 ,来适应新的需要。免得在奔腾前进的知识潮流中落伍下来。因此 ,发展智力 ,培养能力 ,成为当代教育工作的一项突出任务。那么 ,语文教育也必须在它的领域之内把这项任务很好的分担起来。古人就说过“记诵之学不足为人师”。死记硬背 ,学一些死的知识是不够的。今天 ,这个问题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比如 ,在语文教学中 ,常常要学生做一些改错、填空之类的练习。一个有毛病的句子 ,甲学生只会一种改法 ,乙学生知道两种改法 ,填一个空白 ,甲学生只知道填某一个词 ,乙学生知道可以填两个词或三个词 ,并且知道填这个词或那个词在表达上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别。乙学生显然比甲学生的智力发达。如果在指导作这类练习时 ,不仅允许学生一题多解 ,像演算数学题一样 ,并且有意识的引导学生 ,使他们善于思考 ,对于一个病句能够想出不同的改法 ,以至想出在不同的上下文里哪一种改法更好 ,这样做比刻板地要求学生只按一种答案来改 ,对于发展学生的智力更有益处。又比如 ,同一个作文题目 ,写学校所在的地方 ,假定是苏州 ,可以启发学生采取不同的写法。不仅可以写大家最容易想到的苏州园林之美 ,也可以经过查考资料、访问当地居民写一写这个地方的历史沿革、发展 ,还可以根据学生实际所知道的以及参观访问之所得 ,写一写苏州有名的工业 ,如刺绣之类。即使写园林景物也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写法 ,可以专门写寒山寺 ,既写它现在的景象 ,又考据它的来历 ;或者专门写沧浪亭、虎丘塔等等。这样 ,把学生的思路打开 ,把他们的视野放宽 ,帮助他们实地去观察 ,找人去访问请教 ,查阅文献



资料,这对于发展学生的智力会有很大的作用。再比如,指导学生读一篇文章,除了把这篇文章读懂,并且知道写作上的特点之外,再和另一篇写法不同的文章作一些比较,使他们理解到两篇文章为什么分别用不同的写法,不同的写法产生什么样的不同的效果,这样对于提高学生理解文章的能力也会有更多的帮助。总之,在知识的教学、写作和阅读训练的各个方面,都有训练培养学生观察能力、分辨能力、思考能力等等的余地。在这许多方面突破一些旧的框框,从发展智力、培养能力的角度着眼,设计办法,反映在教材和教学里,是完全可能的。

又例如,现代文化科学的发展速度非常快,新的知识、新的技术层出不穷,各种形式的出版物成倍的增加,现在世界上每一年的出版物几乎抵得上过去几千年出版物的总和。同每个人研究范围、工作性质有关系的新出版物非常多,这些出版物当然不可能都读,但是总需要尽可能的多读一些,至少要知道和自己有关系的这一门学科的动向、动态、重要的新的理论、新的学说、新的作法等等。这种客观现实的需要,要求每一个人具备尽可能快的阅读能力。过去传说某某神童、某某才子能够“一目十行,过目成诵”,现在具备一目十行、过目成诵的能力已经不再是神童才子的事,而是每个人应该具备的阅读能力。中国和外国过去也并非完全不重视阅读的广度和速度,我们中国的古人说,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意思无非是见闻要广。又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无非是说读的东西多,头脑里积累的知识、素材丰富,才有东西可写,才写得好。要“读书破万卷”,自然非读得快不可。所以我们既讲精读,讲“熟读精思”,也讲浏览涉猎。英国的培根说过:Some books are to be tasted, others to be swallowed, and some few to be chewed and

digested。这几句话直译是：有些书只需要尝一尝，另外有些书要吞下去，少数的书需要咀嚼，消化。所谓“尝一尝”，不过是翻一翻，知其大意而已。所谓“吞下去”，大体上就是我们常说的粗读，全文读，但并不逐字逐句仔细的推敲揣摩。这两种读法和我们说的浏览涉猎意思差不多。其所以提倡这一类读法，无非是要读得快一点，多一点。庄子说过：“人之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庄子的时代已经感觉到知识是没有穷尽的，而人可以用来求知的时间是有限的，这中间存在着矛盾。那么今天，这个矛盾显然尖锐得多了，因为知识比庄子的时代不知增加了若干百倍、千倍，而每个人可以用于求知的时间并没有增加。所以必须找到有效的途径、有效的办法来克服这个矛盾，其中非常重要的办法就是提高阅读能力，特别是速读的能力。这在许多科学技术先进的国家已经引起重视，已经有国际性的阅读协会在研究阅读教学面临的各種新问题。我们今后的语文教学不能不从新的角度来研究处理阅读教学问题。以往在阅读教学方面，我们重视理解和记忆。表现在教给学生读的东西要反复细致的分析，以至达到“满堂灌”的程度。用意无非是帮助学生把所读的东西理解得尽可能透彻一些。另外要求学生把读的东西记住，以至于能够背诵。但是，对于训练学生具备快速阅读的能力，重视是不够的，基本上是听之任之。学生能够读得快一些固然好，读得不快，也不去管它。总之，并不设计出有效的办法培养学生这方面的能力。理解和记忆当然是不能忽视的，但是如上边说的，速度问题不能不提到日程上来了，而这三个方面又是互相有关的。要读得快，同时就要求理解得快，并且理解得准确，能够很快的从所读的东西中得到所需要的主要的东西，而没有重要的遗漏，没有错解或者理解



得太不够的地方。读得快,也要求记得快,要在几秒钟、几分钟总之很短的时间之内,把理解了的需要东西输入到脑子里去。因此,快速阅读的能力包含着快速理解和快速记忆的能力。快容许略,不容许粗,更不容许错。快速阅读的能力不是一个孤立的能力,理解、记忆、速度三个方面构成阅读能力的整体。阅读教学必须从这样的角度考虑,设计办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满堂灌、死记硬背都不仅仅是方法上不得当的问题,而是不能适应今天和今后需要的问题。阅读的材料必须增加,阅读的速度必须加快。把很少的阅读材料慢慢的嚼得稀烂,吞进去,记住了,即使材料再好,是古今中外文章的精华,也是不够用的。

从以上谈到的两个方面,即注意发展学生的智力、注意培养学生快速阅读的能力,必然引出来一个问题,那就是教学和教材既要符合学生的能力基础,也就是过去常说的“量力性原则”,又要有一定的量,一定的难度。这两个方面必须很好的统一起来。不适应学生原有的能力基础,不量力而行,过度的加重学生的负担,这样做不仅不能提高学生的能力,不能增加学生学习的兴趣,反而于学生有害。但是,给学生的材料分量不足,对学生的要求偏低,表面上看是减轻了学生的负担,实际上减少了他学习的兴趣,使他得不到经过努力而有所得的愉快,得不到在一定的力所能胜的困难之中经受锻炼、提高能力的愉快,其结果是阻碍了他智力的发展,降低了他的水平,使他在新知识、新技能面前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是加重了他在精神上的负担。所以合乎时代要求的教学和教材,必须非常慎重的处理分量和难度的问题,包括读的分量、读的难度,写的分量、写的难度,知识的分量、知识的

难度。各个方面都需要从新的角度作全面的考虑、安排。

二

语文学科现代化的第二个方面是内容 ,也就是为适应现代化的要求 ,教学内容要现代化。

首先 ,要对“语言是交际工具”这个话有现代意义的更具体的理解。所谓交际 ,指的已经不是个人与个人之间 ,小集体与小集体之间的交际 ,而是指全国范围的以至世界范围的交际。我们的语言是国际通用语言之一。在国际事务中 ,在国际的文化科学交流之中 ,我们的语言是重要的交际工具。另一方面 ,语言已经不仅仅是人同人之间的交际工具 ,已经开始成为人和机器的“交际”工具。从这两个意义上说 ,教给下一代掌握的语言 ,必须是全国通用的、在国际上通用的、规范化的标准语言 ,笼统一点说 ,就是我们所说的普通话。特别是在现代社会 ,运用口头语言的机会越来越多 ,对口头语言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要求学生充分熟练的掌握普通话 ,已经远远不是为了个人之间交往的便利 ,而是一个时代的要求 ,现代化的要求。那么 ,提供给学生听和读的材料 ,要求学生说和写的 ,都应当是普通话 ,或者有助于学生很好的掌握普通话的。在现代 ,无论是口头上说 ,或者书面上写 ,必须是能够让所有听或读的人很快很容易理解的。只能让少数人顺利的理解 ,或者诘屈聱牙 ,不普通 ,不流畅 ,让多数人理解有困难的 ,这样的话 ,这样的文章都不仅仅是风格不够好的问题 ,而且是不符合时代要求的。语文课的教学内容要严肃的考虑到这个问题。

在现代社会 ,所有受过教育的有文化的人都离不开写 ,要靠写来办事 ,要写各种各样的文体。比如 ,公事往来常常要写



各种公文 ;工作中常常需要记载一些事 ,需要写笔记 ,写报告、写总结 ,搞技术工作 ,新机器、新工艺使用情况需要记载 ,采取新的办法进行试验要写试验报告 ,试验成功 ,产品向外推广要写说明或者广告 ,做研究工作、宣传工作的更是离不开写。总之 ,写是为社会中的各行各业所需要的。语文教学中训练学生具备写的能力 ,这是时代的要求。就我国的传统来看 ,若干世纪以来要求写的不是上述那些东西 ,而是写八股文 ,后来虽然不写八股了 ,但是八股的影响仍旧存在 ,常常是让学生写一些不着边际的东西 ,写一些在实际生活、工作中很少用到的东西 ,比如抒情散文之类。这种传统的影响还是很深的。并不是不可以写抒情散文一类的文章 ,但是 ,训练写的能力不能不从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着眼。目前 ,中学毕业生乃至大学毕业生在实际工作中不会写所需要写的东西 ,这种情况很普遍。尽管小学、中学、大学作过不少作文 ,但是一动笔仍然感到困难 ,这困难还不是轻而易举就能解决的。当医生的写不好病历 ,或是繁简不当 ,或是不准确 ,实验室的实验员写不好实验报告 ,做机关工作的不会起草公文 ,写不了调查报告 ,等等。学会写现代社会中常常用到的各种文体 ,是要经过训练的。学生在学校里就应该接受这种训练。从未受到这种训练 ,到了工作中才去从头摸索 ,这在时间上是一种浪费。因而 ,语文教学要教给学生写什么 ,是很值得考虑的。

语文课中进行文学教育 ,运用文学材料进行语言训练 ,这都是必要的。可是 ,在进行文学教育和运用文学材料进行语言训练的时候 ,要联系前面说到的两个问题作全面的考虑 ,并采取适当的处理办法。教材中所选的文学作品 ,一般地说 ,语言是优美、精当的。也有的作品由于某些原因 ,个别地方语言不

够规范,或者运用方言过多,这在教学中就要作适当的处理。到底文学作品读哪些比较合适,读的量应该是多少,读多了不行,读少了也不行,这个问题从现代化的角度考虑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语文知识在我国的历史上是曾经被忽视的。人们认为不用语文知识,靠读写实践就成了。后来在我国和别国又曾经有过教学语文知识分量过多,讲法不当,采用学院式经院式的讲法,教学效果不好的情况。这种情况也助长了忽视以至于否定知识教学的倾向。这种倾向,目前在有些学校、有些教师同志之间有所滋长。从现代化角度考虑,这是不适当的。别的国家近一二十年有过不少研究和试验,证明不仅仅对青年,就是对少年儿童也可以介绍一些理性知识。建立一些抽象概念,具备一定的理性知识,这对发展智力、培养能力是有益处的。我们应该借鉴别国成功的经验,总结自己国家多年来的经验,对知识教学的安排作全面的考虑,而不应轻易加以否定。人类若干万年以来天天吃饭,并不讲营养学,发展到了今天,人口越来越多,难道我们因此就要否定营养学的研究吗?具备了营养学的知识,也不一定就身强力壮起来,难道因此就否定营养学吗?难道因为古代的工匠没学建筑学、水力学、桥梁工程学而修筑了万里长城、都江堰、赵州桥,我们就可以否定现代的建筑学吗?难道因为现代的大学建筑系毕业生不一定能设计出虎丘塔、岳阳楼,我们就否定现代的建筑学吗?人们并不否定营养学和现代建筑科学等等,为什么以不学语文知识也会说话,也能写出《红楼梦》等等伟大作品为理由在语文教学中否定知识教学的必要呢?这里既有传统经验的影响,又加上过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于是使人产生错觉,认为知识教学没有用,这种想



法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毕竟是错觉 ,是不对的。今后 ,我们应从现代化的要求出发 ,处理好知识教学的问题。不是简单的肯定 ,大量的教 ;也不是简单的否定 ,不教。知识的分量、广度、深度都要处理得当 ,同发展智力、培养能力联系起来考虑。

三

讲到语文教学的现代化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教学方法的现代化。这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涉及到语言学、文学、教育学、心理学等方面 ,这里着重谈以下三个问题。

(一)

在我们教学法的历史上 ,一直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在学习某种本领时 ,提倡直接模仿和大量实践 ,提倡学习者自己揣摩领会。这种运用起来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不讲究方法 ;一种是很容易把方法定型化 ,程式化。

我们所熟知的林黛玉教香菱学做诗的方法 ,就是多读些好诗 ,自己去“揣摩透熟” ,自己多做。这不是虚构的林黛玉一个人的方法 ,而是曹雪芹概括的教诗者和学诗者共同使用的方法。学做文章也一样 ,主要是靠大量的阅读和背诵 ,靠“熟读精思” ,加上大量的以模仿为主的习作。看起来 ,我们的古人是着实不喜欢在方法上多费心思 ,他们常常说“文无成法”“文无定法”。实际上他们的方法运用得很高明 ,已经到了出神入化 ,到了“从心所欲 ,不逾矩”的地步 ,到了已经不感到是在依照某种方法为文的地步 ,好像书法家笔走龙蛇的时候已经不感到自己是在依照什么“体” ,什么规定去写字一样。不但学语文如此 ,学其他本领几乎都差不多。学字 ,学画 ,第一步总是临

摹,仿作,或学颜,或学柳,或学马远,或学夏圭,弟子看着师傅怎样运笔,怎样用墨,怎样着色,怎样皴染,老师指点指点,不讲多少道理。学一般的本领是这样,连打仗也是这样。能征善战的岳飞对他的部将讲,“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意思是靠各人自己去揣摩,讲不出什么道理来。模仿,揣摩,大量实践,这些就是我们历史上常用的方法。你说它没有一点科学性,不对。这种方法沿用了千百年,确实造就出了一些人才,它总是有符合客观规律的地方。能力要在活动中去形成,强调活动,强调实践,这是正确的。你要说这种方法在哪些方面,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客观规律,还需要研究。其次,这种方法往往说不出多少道理,没有在理论上加以认真的分析概括和总结,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学习者自己去摸索,只能心领神会而不能言传,不能用言辞明确的概括描述出来,于是它不能突破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影响了知识、技能广泛和持续的传播交流,从而也就影响了它的发展。

本来,对某种活动方式的概括,也就是对方法的认识,总是从感性到理性,从低级到高级的。人不能总是凭直觉的常识或经验去办事,不能仅仅满足于对活动方式的初级概括。但在我们的传统中,却常常满足于一种初级的概括,像前面所说的那样。这是一方面。

我们传统的另一面就是,在好些事情上,一旦摸索出一套方法,很快就固定下来,凝固起来,成为一种程式化的东西。比如说,大致在宋代前后,文人们摸索出一套为文的方法,叫作“起承转合”,结果不论写任何文章,连做诗,都是这个写法。林黛玉就对香菱说过:“什么难事,也值得去学?不过是起、承、转、合,当中承转,是两付对子……”至于八股文,那就完全



程式化了。

一方面是程式化,一方面是不讲方法,这看起来是矛盾的,其实根源恐怕是相通的。不费气力的套用现成的程式,而不管它是否符合千变万化的实际情况,这不还是不讲究方法么?再往深处想,这种情况同我们长期停滞的、建立在小生产基础之上的封建社会,同与之相适应的那些思想、意识、习惯等,难道没有联系吗?

从近代、现代来看,这个轻视方法的传统继续起着作用。人们看到许多这样的事实:学习了比较科学的道理,能够说得出一套方法的,在实际操作中不一定比不讲方法而在实践中掌握了一套本领的强些。于是这就构成了有些人否定方法的根据。在语文教学方面,有人就说过:一个是综合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一个是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两人都去教语文,后者不一定比前者教得更好。你看,学教学方法有什么用呢?很明显,这样论证问题是缺乏逻辑力量的。书教得好不好,因素是很多的,无论如何不能因为学了方法而教不好书,就得出结论说方法是毫无作用的。这原因很简单。方法是让人来运用的,运用的人的知识水平、智力水平怎么样才是根本的。如果知识、经验、技能、能力不足,方法懂得再多,也不可能收到好的教学效果。另一方面,假如说,两个人教同一种东西,对所教东西具备同样的知识、技能和能力,具有同样多的实践经验,那就可以断言,有一套科学的方法,比没有一套方法的效果要好。

不重视方法有一条客观原因。凡谈论教学问题的人都是成年人。对这些人来说,无论他们自己学点什么,方法确实处于比较次要的地位,因为他们的知识、能力可以弥补不良方法的缺陷。因此,这些人更加不易觉察到方法的重要性。最能觉

察到的是孩子。越小的孩子 ,在学习中 ,教他的人的方法起的作用越大。对同样的孩子 ,这样教学得快 ,那样教学得慢 ,妈妈教就会 ,爸爸教就不会 ,等等。这样的经验哪个家庭没有呢 ?孩子干渴的心田需要浇灌 ,不能及时给他们水分就会贻误“农时”。不良方法就像条蹩脚的渠道那样阻碍着水源源不绝地流向干渴的土地。不讲究方法是会戕害小孩子的 ,是会使孩子和成年人吃些苦头的。

不重视方法的另一方面 ,是一旦有了方法 ,很快就定型化 ,程式化。比如 ,说谈话法好 ,就谈话 ,不论大学还是中学 ,不论教这样的课或者教那样的课 ,都采用谈话法。搞这种程式化 ,自然就会产生无效劳动 ,这又成了一些人否定方法的理由 :搞那些花哨点子干嘛 ,还是老老实实的念书、揣摩靠得住。

一方面否定方法 ,不相信方法 ;一方面有了方法就定型 ,搞程式化。一直到今天 ,仍旧存在着这两种十分有害的倾向。

(二)

一个教师在教学时 ,自觉地 ,不是混混沌沌地选择某种方法 ,这种选择取决于他对这门学科教学规律性的认识。教学语文 ,我们在研究采取什么样的教学方法时 ,就要首先研究语文教学的规律。语文教学的规律源于语言的规律 ,教学的规律 ,学生心理发展的规律。拿语言规律来说 ,怎么形成词 ,词同词怎么组合 ,这种最基本的组合又是怎样复杂化的 ,怎样表达各式各样的复杂的思想感情 ,都有规律可循。字有字的规律 ,汉字有汉字的规律 ,整段的说话和写文章也有规律。教语文不能不考虑这些。又如 ,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 ,他们的思维发展情况和语言发展的情况是不同的 ,教语文同样要考虑这些 ,如此



等等。我们应当把对教学方法的研究放在一个科学的基础之上,使方法合乎客观规律。凡合乎规律的方法就有效,按照这种方法去教学,足以提高教学效率;不能自觉地采用合乎规律的方法,或者所用的方法不合乎规律,就会降低教学效率。比如,现在的学生学习古汉语,采用传统的方法,一篇一篇的学下去,费时多,见效慢。王力先生后来主张,学习古汉语要采用学外语的办法,要讲常用词,讲语法,要学文章。这么一来,方法一改变,效率大大提高。

谈到方法,就需要谈谈目前在语文教学研究中常常提到的“模式”。模式这个词是个外来词。在哲学、逻辑学中使用它,特别是现代在心理学、教育学中开始广泛使用。这个词在他们那里的解释是不尽相同的。我们要谈的是语文教学的模式问题。

有同志把“时代背景、作者介绍……”那个“五大块”叫做模式,有同志把有计划地进行写作训练的格式叫做模式。“模式”在这里的意思,是一种概括了的一般的讲课内容和步骤,或者说是内容结构。它可以供教师仿用。需要说明的是,模式本身并不要求你在将它具体化时(即讲每篇课文时)毫厘不爽的照搬无误。它本身并不排斥实事求是的原则。高明的人运用模式时往往不拘于模式。比如填词,可以说它是有模式的,词律就是它的模式。不过大词人常常不囿于模式。像辛弃疾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突破了宋词文义依词调分片的模式,上阕末句“沙场秋点兵”以下,文义应断不断,直至最后一句“可怜白发生”,文义才有了转折。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有个格,也是模式,但它还可以有变化,如省略的三段论。模式要活用。如果教师在运用模式时生搬硬套,影响了教学效

果,这账是不能算在“模式”的头上的,应当算在程式化的头上。模式和程式化是不同的。

语文教学中的模式(比如说那个“五大块”)是怎么形成的?它是对一种活动的概括,这种概括,反映了人对客观事物规律性的认识。一篇文章,尤其是文学作品,它的产生和内容同它所处的时代有关,同它的作者有关。一般来说,学习一篇文章,首先应当了解这些。其次,文章有它的内容,中心,写作方法,当它作为语文课的教材供学生学习时,自然应当让学生知道这些。于是,人们对教学一篇文章的内容结构加以概括,提出了这个“五大块”。这反映了他们对教学一篇文章这一事物内在规律的认识。又如,前边谈到的传统的文章作法讲究“起承转合”,这也是一种模式。这种模式不是谁从脑子里凭空臆想出来的,而是从许许多多文章里总结出来的,它是写文章的一般规律的一种反映。所谓写文章,一般来说,总不外乎先提出个话题,发挥这个话题,从正面发挥了,又从反面发挥,从这边发挥了,再从那边发挥,发挥充分了,结束这段话。“起承转合”那种模式,实际上是来源于对写作的这种普遍规律的认识。

谈方法往往离不开模式。模式是供人仿用的、对活动方式偏于结构的一种概括,像“五大块”,像八股文,还有近来有人提出的有步骤的进行写作训练的模式。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在主张课课书要讲“五大块”,更不是主张我们去写八股文。

模式同我们原有的“程式”这个词意义相近,只是由于“程式化”这个词用得较多,它又有贬义色彩,“程式”大概受到点“株连”,于是人们宁可用“模式”而不用“程式”了。

好的模式同科学方法有联系,它体现着一定的规律性。我



们要善于运用模式 ,这就是既要掌握模式的基本精神 ,又不拘于模式 ,根据教材和学生的实际活用模式 ,使得模式有助于教师讲清楚事物的规律 ,使学生通过模式能够理解所学的这样东西的一般规律 ,并运用这种模式去进一步探求新的知识 ,获得新的技能 ,发展自己的能力。可以看到 ,在对语文教学改革的探索中 ,一些新的模式正在形成。比如 ,一次多篇 ,让学生先提出问题 ,还有“卡片法”等等。各种做法有它的基本步骤 ,基本结构 ,都未始不可以认为这是一些新的模式。

模式和程式化是不同的。如果我们让模式凝固起来 ,把它变成僵死的条条框框 ,不考虑各种具体情况而生搬硬套 ,那就陷于程式化了。程式化是形式主义的表现 ,它同科学化现代化无缘。

要科学方法 ,要模式 ,但不要程式化 ,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三)

从教的人来说 ,不讲求方法好办。不管它什么规律不规律 ,方法不方法 ,我想怎么讲就怎么讲 ,我要学生怎么办他就得怎么办 ,学生不听就扣分。不去研究学生为什么该理解的没理解 ,该记住的没记住 ,该会用的不会用 ,不去摸摸教育学、教育心理学、应用语言学这些东西 ,甚至连一般语言学、语法修辞学、逻辑学也不去碰一碰 ,不去从自己的方法上找问题 ,不去研究方法 ,改进方法 ,这当然是最省力的办法。

程式化也好办。从哪本教育学里边 ,从哪本教学论里边 ,或者从哪位专家的口里 ,从哪位名教师的教学中取得一种方法和模式 ,拿来照用 ,不管是教给谁 ,不管教什么 ,我就照用这套方法 ,反正有根有据 ,不是我自己杜撰的 ,这当然也很省力。

方法制约着效果。只有科学的、新鲜活泼的教学方法,才能培养出一代具有活跃智力的,有进取精神,有效率感,有敏锐的现实感,有责任感的新人。至于僵死的或落后的教学方法能造就出什么样的人,那是历史早已作出了回答的。对此,封建时代的有识之士,直至“五四”运动时新文化运动的骁将,都进行过有力的抨击,这里不再赘述。当然,在僵死的教法统治之下,也会冒出一些卓然超群的人才,但这决不是那种教法的功劳,恰恰相反,这些人首先是这种教法、教义的“逆子贰臣”。再进一步说,僵死的教法不仅会戕害孩子的心智,而且有可能毁了孩子。调皮的孩子对于这种方法会以种种方式提出抗议,不听,不学,不照老师的要求办,甚至于怀疑学习,反对学习。轻视方法,不仅仅影响教学效果,甚至于影响到下一代的面貌。所以,我们决不能轻视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由于前面说的历史很久的传统,加上我们对于这种传统没有进行认真分析,以至形成了对于方法问题的不正确的理解和不正确的对待,至今这种倾向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妨碍着我们前进。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是探讨规律,根据探讨所得,寻求正当的方法,形成若干有用的、有效的模式,进而活用这些方法,活用这些模式,坚决反对、抛弃程式化。

有的同志可能觉得:调查报告反映出的中学生的现有语文水平存在那么多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已经很不容易,哪里顾得上研究什么“现代化”!这不是当务之急,现在提出“现代化”是不切实际的。

我不这样看。假如我们认真探讨探讨本文提出的这些问题,采取一些措施,恐怕对于解决调查报告中反映出的各种问题是有益的,有相当效果的。语文教学之所以有那么多问题和



我们在教材工作、教学工作中一切“率由旧章”不无关系。

本文提到的有关语文学科现代化的几个问题(当然提得还很不全面,很不深刻),并不难解决。这里没有全然脱离现实的想像。例如在语文学科中如何发展智力,如何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如何结合实际需要训练写作,等等,都是很容易做到的。做到这些,不仅使语文学科带有较多的现代气息,有利于今后的发展,同时也正是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的途径。回顾昨天,看着今天,想到明天,这里边存在着统一性。

(本文系节选,载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编的《中学语文教学现状和设想》一书,写于1981年2月。该书于1982年2月第1次印刷。)

语文教学要同现代化建设接轨

我来看望老师们 ,向老师们学习。我是学外语、教外语的 ,没教过一天语文课 ,没专门学过 ,又缺乏实践 ,怎么能编语文教材 ,研究语文教学问题呢 ?办法只有一条 :学习。从工作中学 ,向老师们学。除西藏、台湾外 ,我足迹遍全国 ,目的就是四海为师 ,同教师们交朋友。今天 ,正是借这个研讨会的机会 ,向老师求教。

吕先生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会上大家都讲了 ,讲得很实在 ,很好 ,我讲几句虚的。

中外古今 ,有贡献的思想家、科学家 ,都同时间、空间有关。有的跟上时代潮流 ;有的总结过去 ,能够超前提出问题、理论 ;有的总结得很好 ,全面、深刻、科学 ,他的思想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孔孟的观点是跟时代走的 ,有的是超前的 ,例如 ,“君君 ,臣臣 ,父父 ,子子” ,君错了 ,臣不能说 ,臣为君讳也 ,父错了 ,子也不能说 ,子为父隐也。那个时代要求他这样做。有的却是超越时空的 ,如“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封建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 ,都成立 ;同外国人打交道 ,也成立。这句话成为后世的交友之道。“人不知而不愠 ,不亦君子乎 ?” ,“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 ,“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 ,则不复也” ,这些观点都是超越时空的。

我们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社徽 ,是两只手捧着绿色的幼苗的



图案 ,大家都说好 ,这是刚才魏书生同志所说的教育思想 ,不要把学生当作零件 ,老师作机械加工 ,而要把学生当做幼苗 ,扶植他自己成长、发展。

吕叔湘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 ,是跟着时代走的 ,有的是超前的。“新书一本 ,先生讲 ,学生听。”吕先生反对这样的做法。吕先生在《汉语文的特点和当前的语文问题》一文中说 :“‘三个面向’ ,第一个是面向现代化。什么是现代化 ?简单点说就是高效率。”“第二个面向是面向世界。面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语言文字要有利于中外文化交流。”“第三个面向是面向未来。面向未来意味着什么呢 ?按照我的理解 ,面向未来就是要更进一步现代化 ,更进一步国际化 ,而决不是相反。”这些话是在 1985 年说的 ,有超前思想。他的语文教学思想 ,如不要把学生当作加工对象 ,而让学生主动学 ,培养能力 ,交给学生钥匙 ,让学生掌握学法 ;“语文的使用是一种技能 ,一种习惯 ,只有通过正确的模仿和反复的实践才能养成”(这几句是在 1963 年说的)。这些观点都是超越时空局限的 ,长时间可用。吕先生如果年轻一些 ,身体好一点 ,一定会发表更多启发我们的言论 ,超越时空的理论、思想。

大家都关心语文教学怎样改革 ?怎样朝前走 ?我说不好 ,只觉得要跟着时代潮流走 ,也未尝不可以超前一些。从这里想到几点 ,说说 ,供老师们参考 ,请老师们指数。

语文教学要同现代化建设接轨。

第一 ,语文教学要同学制改革接轨。 现在 ,实行九年义务教育 ,从小学到初中 ,以后 ,开始分流 ,分为三股 :一大股流向中等技术学校 ,一小股流向普通高中 ,一小股流向就业。语文教学改革要同学制改革接轨 ,就要考虑怎样适应分流学生的不

同需要,首先要考虑那一大股,就是中技、中专语文怎样教,怎样适应毕业后立即投入建设工作的需要。

第二,语文教学要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接轨。这个问题以前没有,因为没搞市场经济。现在,各方面工作包括语文教学工作都要考虑市场经济的需要,同市场经济接起轨来。市场经济需要怎样的人才?需要人们具有怎么样的语文素质?语文教学怎样去适应这种需要?必须研究。学生毕业出来,应用文写不了。医案、广告、产品说明、新闻报道写不了,公文写不了,设计说明写不了,实验报告写不了,企业盈亏情况写不了,市场需求的调查报告写不了,合作经营的协议书写不了,请示写不了,合同写不了,如此等等,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吗?当然,不要求样样都能写,而要求在工作中学一学就能写,写有关二三种,要求不高吧。现在,学生最习惯于写抒情散文,别的不会。市场经济讲竞争,合法竞争。以前不敢讲竞争,现在要讲合法竞争,非常必要。抽烟,烟有假的,喝酒,酒有假的,都是不合法竞争的现象,读点写点批评造假的文章,行不行?讲合法经营、讲合理竞争、讲法制知识,自然不是语文课的任务。但是,讲点故事——合法经营、合法竞争使企业得到发展的故事,反之者则倒霉的故事,行不行?竞争意识本来是人人都有的,小孩子有,我白头发老头也有啊。下棋,要赢你,非赢不可;你也要赢我啊,也非赢不可。从小到老都有竞争意识。要提倡合法竞争意识,这在语文课里是不是可以起些作用呢?语文教材的选材恐怕得改革改革。怎样改革呢?要研究。

第三,语文教学要跟信息社会、信息交流接轨。过去,讲到计算机,我说我是机盲,堂而皇之地说,现在不行了,再说这样的话就羞羞答答的了。搞语言,不懂电脑,不行了。编码设



计,语言合成,人机对话,等等,多少要懂点了。所以才提倡微机教学。电脑已经进入办公室,正在进入家庭。现在进入信息社会,语文怎么教学,怎样利于信息交流,要加紧研究。这关系到国家盛衰。信息,特别重要;没有信息,做生意就要亏本,没有信息,搞科技就要落后。信息,与语文有密切关系。语文教学改革,要考虑有利于信息社会的需要。

这几种轨要接。总之,语文教学要同现代化建设接上轨,不能坐等,要主动,主动去接轨。

吕先生把语文教学的目的是任务讲得很明确,就是要学生学习和使用语言文字,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吕先生的书中专门讲过文学教学、思维教学、思想教育没有?没有。难道吕先生反对那些教学吗?不,他一点都不反对,却常常慨叹那些方面做得都不够。然而语文教学的首要的、专门的任务是学习、使用语言文字。文不通理不顺,说话结结巴巴,就什么也谈不上。包子铺卖包子,切面铺卖切面,各有专司,不能一个铺子什么都卖,捎带着卖点别的,未尝不可,不能卖的样数太多。换个比方,一个工作人员负一项责任,这件事归他管,他就得管好,管到家。行有余力,兼管点别的也好,可是不能不论什么差使,一古脑儿都堆在他头上。这样,把他累坏了且不说,逼得他一样事情都做不好。要是让语文课背的包袱太重了,它什么都搞不好,还谈什么接这轨,接那轨啊!上海讨论语文教学改革,有不同意见。有的说任务要单纯,有的说要负几项任务,要我写文章,发表意见。我说,不可喧宾夺主,也不可惟主独尊,也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有老师一定要问:你说语文教学要同现代化建设接轨。怎么个接法呢?

很具体的方案我拿不出。有一个很笼统的想法,姑且说说。这个想法不是今天才有的,不过今天多少有了点新内容而已。

我很重视文学教育。不是要求学生们人人成为文学家,但是人人要接受文学教育。文学教育,当然要培养学生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这是不在话下的。更重要的是文学可以发展学生思维能力,这一点时常被忽略。思维,一般说来可以分为形象思维、逻辑思维。文学培养形象思维。不过,不要绝对化。文学作品,不论诗歌、散文、小说、戏曲,也各有各的逻辑结构,同样有培养逻辑思维能力的作用。只不过文学作品之所以感人,首先是靠形象,而不是靠逻辑推理。文学最足以唤起人们的联想、想像,进而诱发创造性思维。我常想,文学为什么有那么大的魅力?列宁爱读托尔斯泰、杰克·伦敦的作品,他评托尔斯泰,比文学评论家还出色。拿破仑出征,骑在马上还要读歌德的诗歌。爱因斯坦喜欢文学。毛泽东爱读书,他说《红楼梦》不读五遍没有发言权,他本人是伟大的诗人。为什么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那么喜爱文学?我以为,这些伟人的思想境界犹如天马行空,极富创造性,文学也是海阔天空的创造性思维。思维的路子合拍了,发生共鸣了,促使他们思想更活跃了。教育家乌申斯基说:很难说牛顿、莎士比亚谁需要的想像力更多一些。苹果掉在地上,引起了牛顿海阔天空的想像,产生了地心吸力、万有引力的学说;史蒂文森看到开水壶喷汽,也海阔天空,发明了蒸汽机。文学能发展人们的想像力和创造性思维,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动植物的某些活动和形态促使人们创造了一门极有用的科学——仿生学,这是人所共知的。所谓现代化,首先要科学,要科学化,而科学研究、科学工作、科学发



明,不仅要有逻辑头脑,更要有创造性思维能力。文学教育与科学化即现代化,在这里接上轨了。至于文学教育还有其他各项教育功能,如思想品德教育等等,大家都知道,都时常研讨,我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怎样进行文学教育呢?目前我们倾向于减少课程,不倾向于增加,那么可以暂时不单独开设文学课。语文课可以编两种读本。一本《文学读本》,多点拨学生认真读,少“析”(赏析、浅析、试析等)。如果一定要个名目,我还是赞成“导读”,老师导一导,学生自己去读,不要总是老师析来析去的。多着眼于思维训练,少发挥“微言大义”,让学生自己在读之中去“悟”出来,那样“微言大义”才能起更大的作用,老师析多了,发挥多了,反而会削弱其作用。选材面不妨突破很狭义的“文学”框框。严复《译天演论自序》《郑成功传》《林则徐传》《寇準罢宴》(从史传中摘编)等等都可以酌选;《桃花源记》《阿房宫赋》《醉翁亭记》之类可有,不妨少些。以读为主,当然不绝对排除写,可不作硬性要求,尤其不要只写抒情散文,要鼓励学生多写点切实的东西,如“廉政议”“买鞋记”“我家比小李家和睦”“多看电视有利有弊论”“我不能成为华罗庚第二吗?”等等。

另一本就叫作《语文读本》吧。里边讲点简要的语言、文字知识,多作些练习。可以作《语法修辞讲话》式的练习,也可以把方向倒过来,作正面的积极性的练习。前者以改错为主,“匡谬正俗”;后者以选优为主,“正本清源”。也可以选些文章,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多种语体的实用文,如公文书、契约、合同、通知、照会、诉状、判词等等;一种是像吕叔湘先生《语文常谈》《未晚斋语文漫谈》中那些短文,还有像周有光先生讲语文

现代化的论文,还有像各种《语文趣谈》那些书里的文章。总之,这一本就是讲语文应用的。

以上两本读本轮流上课,如果每周四节语文课,各用两节,只要老师少析一些,少灌一些,多导一导,足够了。语文课一本《语文读本》,一本《文学读本》,双管齐下,各有任务,又不混杂,语文教学就会从空中楼阁式的教学中解脱出来,同现代化建设对语文的需要端端正正的接上轨了。

(本文是在“吕叔湘先生语文教育思想研讨会上的讲话。庄文中记录整理。刊《中学语文教学》1994年第12期。)



应进一步探讨如何提高 中学语文教学效率问题

这次年会要着重研究如何进一步提高语文教学效率的问题,我完全赞成。目前,我正住在医院里治疗,不能出席会议,请大家原谅。

我也来谈谈效率问题。

当今世界上,人们在国际交往中非常讲究效率,这是人所共知的。广东深圳人有一句很有名的口号,那就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关于时间是金钱的说法,我们的古人早就说过,其中最有名的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讲时间过得快,要爱惜时间的格言谚语极多,如“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光阴如“白驹过隙”“弹指一挥间”,等等。时间重要,大家都知道,似乎很明白,但实际上并不爱惜,不把时间当作一回事,这是非常不应该的。

效率是生命,这是新概念。过去讲“慢工出细活”,慢慢来,就是不讲效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和我们是一个农业国有关系,和小农经济、粗放经营有关系。人们重农业,轻工业,而所讲的工业也是小手工业,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讲效率也高不到哪儿去。在欧洲,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在文艺复兴以前很落后,效率也不高,文艺复兴之后不同了,人家就赶上来了,而且超过了我们。尤其是英国产业革命以后,人家搞工

业化,搞现代化,各方面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时期我们在搞什么呢?我们在搞八股文,我们落后了。究其原因,除了政治因素外,恐怕重要原因是不讲效率,办事效率低。当然,在历史上我们也不是没有成就,相反,有很多、很大的成就。我们有过不少科学家、理论家。但是,我们今天讲数学方面的成就不能只讲祖冲之,讲医学方面的成就不能只讲张仲景、李时珍,讲文学方面的成就不能只讲曹雪芹的《红楼梦》了。这些人物是杰出的,他们的著述是优秀的,是全世界的瑰宝。但是,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才出了这么一些伟大人物和光辉著作,这和我国的悠久文明比起来,和各国各国的科技进步比起来,我们的成就似乎还是少了些,我们不能老是拿这些家底来支撑门面,我们需要大量的人才,需要大量的科学家,需要高精尖的科研成果。

今天,我们在各个领域虽然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在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尖端科学等许多方面还是落后的。落后的重要原因仍然是效率低。这些年我们搞改革开放,引进了不少东西,我认为最值得引进的是效率。我在美国、日本参观过一些大图书馆,偌大一个图书馆几个人就管理起来了。人家不仅有先进的电脑检索等现代化的手段,更主要的是工作效率高。看来我们迫切需要引进效率。

讲效率,它的内涵无非是这几个字:一是多,二是快,三是好。为什么说效率是生命呢?打个比方来说,过去一个人十天完成五个零件,现在他五天完成十个,这就是多,这就等于延长了生命,这样下去,他等于多活了几十年。但仅有数量还不行,不能粗制滥造,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在管着,那就是“好”。质量不好的产品,制造出来的越多,对国家的损失就越大。



教育也要讲多、快、好、省。对资金、物资要节约,不能浪费,对于人才的培养,不仅要多,要快,而且要好,要尽快培养出德才兼备的有用人才,为四化建设服务。

把范围缩小一点说,现代的人才要见多识广,要有较高的交际能力,要懂得很多东西,一定要有效率观。

把范围再缩小一点说,一个现代人一定要多读书,当然要有选择地读。有的书要精读,有的书要粗读,有的书可以略读。培根说,有的书粗略地看一遍就行了,有的书要有选择地看,只有少量的书要反复咀嚼,消化它。现在的青年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见不多,识不广,见识太少。刚刚举办过的“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活动,可以问一下青年学生:什么是慕尼黑协定?什么是马关条约?马关在哪儿?下关在哪儿?有几个人知道吉鸿昌、邓世昌?大概对林则徐知道的人多一些,但林则徐是被什么人排挤走的?林则徐到新疆后又干了什么对人民有益的事?说实在的,他们对这些事知道得太少了,对清王朝同帝国主义列强订立的许多不平等条约知道得太少了。他们不大知道帝国主义是怎样打我们的,不知道共产党、广大人民和爱国志士是怎样同他们斗争的。在这种情况下,爱国主义怎么讲?光喊“中国伟大”“我爱中国”是不行的。一定要让学生知道,我们伟大的祖国究竟可爱在什么地方。这一点实在太重要了。

现在经常有人说学生的负担重,要减轻学生过重的负担。我认为这种说法缺乏具体分析。现在的问题是,该加重的负担没有加重,不该加重的负担却加重了。我不赞成把不该加重的负担强加给学生,在教学中不要加重不该加重的负担。但是选些好书让学生看,这怎么能说是加重学生负担呢?这是乐趣,

决不是负担。大家试想,这样好的精神食粮过去没有让学生品尝,现在他们品尝到了,这是多大的幸福,多么有益、有趣啊!说真的,现在的青年学生书读得太少了,许多该读的好书没有读,这是很大的损失和缺憾!我想在座的大多是有权有识之士,要想想办法让学生补上这一课。

现在我们的留学生最差的是阅读能力。外国学生三天可以读完一本书,可留学生一周也读不完。反之也是这样。来我们国家留学的外国学生,他们读中文书的速度比我国大学生要慢得多。但总的来看,大中学生普遍缺乏的是速读能力。所以我主张培养学生速读的能力,要让学生多读一些书。古人说的“一目十行”无非是读得快;“过目成诵”是说既读得快,又吸收得好。现在的青年学生需要“一目十行,过目成诵”的能力。

下面谈谈教师问题。吕先生的书面讲话我看了,专门讲教师的进修和提高问题。我完全同意。我认为教师应当具有扎实的基本功,要有广博的学识,要见多识广,要掌握科学的教学方法。尤其重要的是,要把书的大仓库门上的钥匙交给学生,让学生自己打开这扇大门,走进这座书的仓库,走进书的海洋,在书的海洋里当一名弄潮儿。

在教学中,不能教给学生三篇课文,学生就只会这三篇课文;而是教给学生三篇课文,学生就能学会三百篇。我们真希望青年学生胜过我们。荀子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些话很有道理。要把学生教得胜过我们,这是我们的追求。

要想当一名好老师,就要下功夫学习。要懂得心理学、教育学、哲学,这样就有可能提高语文教学效率和质量。

最后,我认为这次会议可以叫做专题研讨会,专门研究如



何提高语文教学效率的会。希望大家深入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什么是效率？如何取得必须有的效率？大家在这方面要切实切实下些功夫。通过研究，用一个时髦的字眼叫取得共识。当然一次研究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把解决问题的方向搞清楚也是一个不小的成就。再说一句，我坚决支持大家进一步研究如何提高中学语文教学效率的问题，直到取得较为满意的结果，永不停步，连续研讨，再向前进。

（本文是在中语会第六届年会上的书面讲话。刊《课程、教材、教法》1996年第2期。张定远根据记录整理。）

二、传统语文教育反思

传统语文教学的得失

—

这里说的传统语文教学指的是汉唐以后 ,特别是宋代以后直到 19 世纪末叶的语文教学(当然那时并没有“语文教学”这个名称 ,但是这类工作是一直在进行的 ,这里姑以今名称之)。自从宋代王安石在科考中实行“经义”“策问”的办法之后 ,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方法逐渐定型。元明以下顺着这个路子产生了八股文。当时先生教写八股文 ,学生学写八股文 ,这方面的教学成了科举考试的附庸 ,不是一般的语文教学。这里只谈一般的语文教学 ,不谈八股文的教学。不过八股文这种科举考试方法实行了几个世纪 ,而那个时期许多读书人都巴望着能参加科举考试 ,所以八股文那一套对一般的语文教学不可能不产生影响。这影响是非常恶劣的 ,深厚的 ,甚至直到今天它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消失。只有在特别需要说到八股文对语文教学的恶劣影响的时候 ,本文才会偶尔提到它。

下边分两部分来谈。一部分谈谈传统语文教学的主要经验 ;一部分谈谈传统语文教学有哪些明显的缺点 ,今天应当怎



样对待。

二

传统语文教学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是 ,教学从汉语汉文的实际出发 ,并且充分运用汉语汉文的特点来提高教学的效率。

汉语汉文的特点很多。这里从教学的角度着眼 ,主要注意到以下四点。

1. 语素(morpheme)以单音节的为主。在古代汉语里 ,这些单音节语素中 ,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没有统计 ,估计该在 $2/3$ 以上)是自由的 ,就是说 ,每一个这样的语素都可以单独构成一个词 ,虽然它也能同另一些单音节语素合起来构成另外一些词。半自由的语素(单独构成一个词的能力小 ,而同其他语素合成词的能力和自由语素一样)比较少一些。不自由的语素(没有组合能力 ,只能单独作为语法成分使用 ,或者组合能力很小 ,而组合的时候有固定的位置)更少。总起来看 ,汉语语素在语言里的活动能量很大 ,组合能力很强。说汉语的人 ,掌握的语素够不够 ,运用得熟不熟练 ,是语言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

2. 汉语是声调语言。每个音节的主要元音都有一个声调。现代汉语普通话有四个声调 ,即高平调、中升调、降升调、高降调。古代汉语的声调还要复杂些。一个单音节语素都有一个声调。声调有区别语素意义的作用。

3. 汉语是一种非形态语言。它没有或者说极少有严格意义的形态。它不靠词的形态变化表示语法关系 ,不靠形态变化作为把词组合成更大的语言片段的手段 ,而是靠语序和辅助词。

4. 汉字和这样的汉语相适应。一个汉字表示一个单音节语素 ,就是说 ,它有一个固定的形体 ,读成一个带调的音节 ,表示一个最小的语义单位。汉语无需用字来表示形态 ,因为它基本上没有形态 ,而用字来表示辅助词 ,这是汉字能够胜任的。

传统的语文教学注意到 ,并且充分运用了这些特点。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①由于大多数语素是单音节的 ,很多的词是单音节的 ,一部分词是双音节的(中古以下双音节词逐渐增多 ,半自由语素逐渐增多 ,但是除了极少数音译外来词之外 ,没有多于两个音节的词) ,而词又没有形态变化 ,因此 ,非常容易形成一连串整齐的(即音节数相等的)结构 ,也非常容易押韵。又由于汉字与这样的语言相适应 ,所以从古代直到清末民初所有的识字教材几乎无一例外是整齐押韵的。这种整齐押韵的教材 ,容易诵读 ,容易记忆。一本《三字经》 ,包括了最基本最常用的两千来个字 ,全部是三字一顿 ,整整齐齐 ,全部是押韵的 ,并且 ,这六百多个三字(即三语素)结构 ,几乎包罗了汉语全部最基本的语素组合方式和最基本的语法结构。只从初期语言训练的角度看(我们这里不谈它的思想和知识内容) ,这本启蒙教材可以认为是传统语文入门教学的经验总结。此外还有大量以四字为单位的整齐押韵的识字教材 ,各有特点 ,这里从略。

②基于同样的理由 ,传统语文教学采用了一种符合汉语语文特点的、有一定科学性的、综合的语文基础训练——属对。属对 ,俗称对对子。比如 ,先生说“天” ,学生说“地”与“天”相对。从一字对开始 ,然后二字对 ,三字对 ,一直练到七字对 ,八字对 ,十字对 ,甚至更多。这是一种高度综合的语言基础训练。用“绿叶”对“红花” ,意味着用一个形名结构对一个形名结构 ;



“红花”是两个平声，“绿叶”是两个仄声；“红”与“绿”是同一类同一等级的概念，“花”与“叶”也是。“卧牛”和“奔马”可以相对；“飞禽”和“走兽”可以相对。道理相同。但是“卧牛”不能和“走兽”相对，虽然都是动名结构，动与名之间都是修饰关系，因为“牛”与“兽”不是同一等级的概念。由此可见，这种练习是把词类、词组、声调、逻辑几种因素综合在一起的一种训练。三字对以上，就更复杂了。然而，只要用之得当，这种练习非常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既训练他们的头脑要清楚，能够辨别词性、结构、声调、概念的异同，又训练他们的思维要敏捷。属对，古已有之，到了近体诗（律诗、绝句）时期，成了一种格律，诗里的某两句必须成对。属对这种语文教学方法的形成，显然和近体诗有渊源关系，然而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作诗的范围，发展成一种教学手段了。明朝以下出现了一批专为教学用的属对教材。

③还是由于汉语的特点，传统语文教学从来特别重视语序和辅助词。因为汉语是靠这两种手段来表示语法关系、语义关系以及语气情态的，所以一向被作为教学重点来对待。这一点容易理解，不必多说。这里要着重说一说的是，汉语由于基本上没有形态变化，词与词的组合以至更大的语言片段的组合少了一层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说，组合要容易一些，自如一些，因而从语义配合的角度以及从语言艺术的角度考虑的余地就大一些。王安石的脍炙人口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其所以被人赞赏就是由于那个“绿”字。据传说，他的手稿上首先用的是“到”，然后改为“入”，又改为“满”，经过几次修改，最后才改定为“绿”。他完全不需要考虑这里应当用形容词还是动词，不需要考虑应当用什么“词尾”，不需要考虑“江南岸”应当

用什么“格”的形式,他所考虑的是在这个语言环境里用个什么词表现的语义色彩最好,用了哪个词所形成的这个语言片段的表层形式可以含蓄更多的或者更足以引起人联想或想像的深层意义。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在这里王安石所作的是语义学的考虑,而不是语法学的考虑。孟浩然的名句“微云淡河汉”,其所以有名也正是由于那个“淡”字。就连确实是起语法作用的、作为语法手段的语序和辅助词,也同样可以从语义或语言艺术的角度去考虑。这些,都不仅仅是诗人、作家的事情,也是语文教学的事情。指导学生阅读,要帮助他们在这些地方“涵咏”、“玩味”;指导学生写作,要帮助他们在这些地方“字斟句酌”。如果认为语义学的研究和运用在中国有比较久远的历史,这种看法不是没有根据的。

以上这些传统语文教学的经验,都是从汉语汉文的特点中产生的。

三

传统语文教学的另一条重要经验是,教学要从语文的工具性这个特点着眼。不论他们是否明白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实际的做法是这样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 语文这个工具,要掌握得好,运用得好,首先必须手中握有丰富的材料。贫乏,是语文能力的致命伤。古人一直强调多读。他们认为,只有多读,才能善写。他们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他们不主张狭窄,主张广博。要求学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要求“穷经通史”,通晓“诸子百家言”;他们也并不都主张“两耳不闻窗外事”,有识之士是主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行万里路”是比况的说法,无



非是说要接触社会而已。因《出师表》而知名的诸葛亮,显然是个学问家。据《三国志》记载,当刘备三顾草庐访问他的时候,他侃侃而谈,纵论天下大势,使刘备为之心折。“两耳不闻窗外事”是做不到这一点的。然而,他们毕竟认为多读书是根本。

2. 凡工具,必须操作熟练,运用自如,才能发挥效力。尤其是唐宋以下,一直还在教学离开他们实际使用中的活语言越来越远的以先秦两汉语言为基础形成的逐渐定型化了的书面语言——“文言”(这是传统语文教学有所缺失的一面),要学生多获取语言材料,就不仅要靠多读,还必须要求熟读以至背诵,背得“烂熟”,这些材料才能真正为他所有,因为这种材料主要是从书面上得到,不是从生活里得到的。要把这些从书面上吸取来的语言材料做到能够运用自如,仍旧要在书面上下功夫——多写多作。

于是“多读多写”就成了传统语文教学经验中很重要的一条。如果说他们是“以多取胜”,大概是符合实际的。古人强调多读多写是与他们一直坚持使用文言有关联的,这个关联中有毛病。然而掌握语文工具要靠积蓄丰富的语言材料,要靠纯熟地驾驭这些材料,这条原则是正确的。即使他们早已重视了口头语言,也仍旧是应当这样做的,只是读什么、写什么会有所不同而已。

四

传统语文教学的另一条极易被人们忽视的经验是重视启发学生独立思考,使他们自己能不断的增长读书作文的能力。

由于我们现在老一代的人所经历过或见到过或听说过的

传统语文教学已经是封建社会到了腐朽没落趋于灭亡的最后年代的做法,那时候的教育的确是纯然把学生当作完全无能为力的被动接受的机器,听凭老师灌注一些他们所不能理解或者不愿意接受的僵死的东西,从而使他们经常处于朦胧迷惘的状态,使他们的头脑趋于僵化,于是我们就很容易认为全部的传统语文教学从来就是这样的,于是就教与学的关系这一点上对传统语文教学作出全盘否定的判断。其实,上边说的那种做法纯属封建社会末期教育工作中的糟粕,不足以称为经验。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在许多方面都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的,当然不可能都是精华,然而也决不可能都是糟粕。如果都是糟粕,何来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教育,语文教学,亦然。

这里,我们不仅想起了先秦的诸子百家争鸣,专从教育的角度考虑,我们想到了教育家孔子说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主张“学而思”;他说过“启予者,商也。”他称赞过子贡对他讲《诗》有所发挥。前边举过《中庸》里的八个字中,除“博学”外,还有“审问,慎思,明辨”。我们想到了古人说的“教学相长”,提倡学生和老师互相“问题”。我们想到了在语文教学中老师不多讲,给予指点,要学生自己去“体会”“玩索”,“悟”出文中的道理来,达到“一旦豁然贯通焉”。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给予启发,让学生自己去思考,自己去理解,自己去发现问题,最后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这样来增长学生的真实的本领。我们还想到了古人说的“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历史上,直到明清之际,有识之士无一不是反对“学究”(书呆子)的,反对“泥古不化”的。连宋代理学家朱熹都反对只用“哀而不伤,乐而不淫,思无邪”那几句教条去讲《诗》。这



些才是我们传统语文教学的经验,是传统中的精华。倘若十二世纪之后的教育家能够沿着这样的路子走下去,倘若语文教学不受到八股文的严重污染,我们的教学论本来是可以更早地达到先进境界的。

全盘肯定前人,认为不可及,或者全盘否定前人,认为不足道,都是最容易的事。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作出分析,真正做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是要下一番功夫的。笔者曾经研究过传统语文教育,写过这方面的书,今天看来,其中有些论述未尽允当。现在提出上边这些看法,带有自我鞭策之意。

五

传统语文教学有一些明显的缺点和问题。除了前边有两处已经稍稍涉及之外,这里再提出下边主要的四点。

1. 传统语文教学全部以书面训练(读、写)为内容,完全忽视口头语言的训练。读诗,要求吟咏;读文,要求朗诵、属对,有时口头行之。然而,这并不是口语训练,而是书面训练的辅助方式。可见的结果有三点。第一,戏剧文学发达很晚,从语言上说,半文半白,不够规范。第二,小说发达也晚,从语言上说,情形更差,除了明清之际很少的几部章回小说之外,语言大都是不好的,甚至是不通的。以上两点,当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有关,不能完全归之于语文教学。第三,影响所及,直到今天,我们的知识分子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口语能力仍是不足的。更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上对于口语能力薄弱不以为意,还没有看到口语能力和书面能力之间的关系,没有看到口语能力不足对于现代化生活、现代化工作的不良影响。

2. 与前者有关,长期坚持“文言”,使人们对文言产生了错

觉,甚至产生了迷信,似乎学了文言就一定能够提高语文能力,不学文言就不可能提高语文能力。事实完全不是这样。读一些古典作品对于认识古代社会,对于认识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对于提高某方面的文学修养,都是有益的,对于提高语文能力也有某些积极作用。然而,依靠文言来全面地有效地提高现代所需要的语文能力,是不可能的,并且越来越不可能。一代一代离开文言越来越远,决不是越来越近。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里不可能对这个问题深入讨论,只好说到这里为止。

3. 我们的前人似乎很不善于总结经验。尽管有如上所述的那么多很宝贵的经验,可是两三千年来一直没有一部系统的论述语文教学的著作,没有形成一套语文教学的理论,据此产生出一套或几套可以广泛使用的方法。于是教学成果完全取决于教师。“名师出高徒”,如果碰不上一位高明的“名师”,那就只好倒霉了。直到晚清才有了如唐彪的《读书作文谱》,王筠的《教童子法》等几部书,里边虽然不无很精到的见解,可惜都已经不同程度的受到八股文的污染,大大削弱了它们的科学性。

4. 宋代的吕祖谦编了一本《古文关键》,谢枋得编了一本《文章轨范》。用名家名作的文章选本进行语文教学,大概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此后,陆续有了《唐宋八大家文选》《古文观止》《古文释义》等等许多文章选本,用作语文教材。类乎此的办法行至今日而未衰。这种办法有可取的一面,就是在广泛阅读之中,选择少数佳作精讲细读,作为示范,以收举一反三之效。但是,它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一,脱离实际应用。文章的语言既是与实际使用的语言相差很远的文言,而体裁又大都是抒情散文、论文、游记、杂记之属,间或有少数章奏、书



信、祭文之类,日常生活和一般工作中常常用到的文体极少,科学技术性的(如医书、药书、农书等等)完全没有。第二,从语言教育的角度看,没有系统,反映不出语言训练的计划和步骤,碰上什么算什么,因此实际效率很低,又没有一个用来检查教学效果的标准,对学生没有明确的要求。再加上不教系统的语文知识,且不说历史上还没有现代的语法学之类,就是传统的文字、训诂、声韵之学,也只是极少数学问家的研究对象,而其研究成果又决不有计划有选择有步骤地教给学生。其结果是语文教学长期停留在松散的“粗放经营”的状态,陈陈相因,代代相传,没有大的突破。选本教学的办法,一直影响到现在,无非在旧的基础上加上些新的内容,所谓旧瓶装新酒而已。至于作文训练,即命题作文的办法,受到八股文的污染尤甚,这需要专题探讨,这里就不谈了。

六

以上对传统语文教学作了一个很简略的回顾。看起来,去粗取精、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研究工作还需要大力进行。令人遗憾的是,近百年来,传统经验中那一部分既符合汉语汉文实际,又符合比较科学的教学论的做法,似乎没有受到重视,得到发扬。随着我们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趋向一致的潮流,我们应该把那些做法加以改进以至改造,赋予它以时代精神和新的生命,进而与现代的教育科学、语言科学结合起来,形成一条既是传统的又是非传统的,适应汉语汉文特点的,适合现代需要的,我们自己的语文教学的路子。相反,传统做法中比较差的那一部分,影响似乎反而大一些,有的被原封不动的继续使用着,有的被部分修改甚至只是改头换面的使用着。把这种局面

改变一下 ,扭转一下 ,真正做到继承传统中的优良部分 ,使之科学化 ,现代化 ,发扬而光大之 ,这是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的责任。笔者对于我们能够很好的完成这个责任是抱有希望并且充满信心的。

(原载香港《中英语文教学》1983 年第 1 期)



我和传统语文教育研究

一、对传统语文教育的研究是怎样开始的

我本来是学外语的,先是学外国文学,随后转向外国语言和语言学,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又转而研究汉语,主要是汉语语法修辞。我对传统语文教育的研究感到兴趣,差不多是和我从事汉语文教学工作同时开始的。

1954年我正式参与了汉语文教学工作。首先是从教材工作开始的。既搞教材,就不可能不接触课程、教学、教法这几个方面的问题,所以总称之为汉语文教学工作(加个“汉”字,区别于“外语”)。从那以后,至今整整30年,和汉语文教学工作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

从一接触汉语文教学工作,我就感到研究传统语文教育的必要性。

清末废科举兴新学,各大小书院改为学堂,参照外国的办法实行分科教学。当时,像博物、物理、化学、算学这些课程,都可以直接搬用外国的教材,甚至连历史、地理也可以部分搬用。只有一科没法照搬,连部分搬用都不可能,这就是语文,当时称“国文”。于是,很自然的做法就是基本上率由旧章。内容、教法,一切照旧,只不过形式上分成几册,每年或每学期一册,每册分成若干课,如此而已。虽然从1903年的《奏定中学堂章

程》和 1916 年的《教育部公布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①中可以看到,语文教育领域多少吹进了一些现代社会的空气,但是,面对这个上千年的古老的教育传统,这么点新鲜空气显得太微弱了。嗣后,又经不少有识之士的奋斗,语文课教材的内容有了比较大的变化。比如,白话文进入语文教材就不是一件小事。但是,总的来看,传统的影响是很大的,在语文教学中随处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长期封建社会中形成的传统,肯定会有封建主义的坏东西,但是也决不可能一点可取的经验都没有。一个关心今天的语言教育的人,不应当对这个深深影响着今天语言教育的体系——传统语文教育漠然置之,不加研究。

这样的认识和考虑,可以说是我从事传统语文教育研究的主要原因。

此外,还有一个更直接的促使我加快这种研究的原因。

前边说 1954 年我正式参与了语文教学工作。那指的是,中央决定要在全中国试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组织力量着手准备编写教材。开始吕叔湘先生和我同被委托,随后于第二年(1955 年)我被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担任汉语编辑室主任,在吕叔湘先生指导下主编汉语教科书(吕先生同时被借调到出版社兼任副总编辑)。1955 年秋季,在少数学校对新编的汉语和文学两种教材进行试教。一年后,举行全国语文教学会议,总结了经验,于 1956 年秋季在全国中学实行了分科教学。到 1958 年,这个实验中断了。之后,恢复了语文课,而这时的语文教材和教学,比分科实验前的更为粗糙,效果也更差。这样就促使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样的语文教学适合我国

^①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舒新城编,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的具体情况。这时,我愈益感到,语文是个民族性很强的学科。它不仅受一个民族语言文字特点的制约,而且还受这个民族文化传统以及心理特点的影响。为了摸索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语文教学的路子,我觉得迫切需要对我国长期的传统语文教育进行认真的研究。

就在这种形势之下,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我花费了一些力气比较系统地研究了一下传统语文教育。研究传统语文教育,资料是一个困难问题。研究性的材料有一点,不多,而历代藏书者和书商对蒙书都不重视,所以保存下来的很少,并且很难搜求。恰巧在这个问题上,我有一点便利。有一段时间我曾有志于研究汉语史,为此,需要搜罗几个方面的资料。蒙书是其中之一,因为历代蒙书的编法很能反映汉语的某些特点。这样我曾在十来年的时间里,陆陆续续搜罗到一批过去的童蒙读本,这给我研究传统语文教育的工作带来了便利条件。

这次研究的成果反映在1962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那本小书《传统语文教育初探——附蒙学书目稿》里。

二、传统语文教育的经验

对传统语文教育,多年来听到的批评性意见居多。我那次研究,虽然主观上要求做到客观,不过向传统找经验的倾向实际上是多一些的。经过对各个时代各种蒙书及有关资料的耙梳整理,我发现,传统语文教育有些做法的确有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

1. 集中识字。传统语文教育非常重视字的教学,采取的办法是集中识字。儿童入学后,用一年左右的时间集中认识两

千多字。宋以后的集中识字课本逐渐形成“三,百,千”那么一套,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三本合起来正好是两千多常用字)。只要求学生会认、会读、能背诵。至于每个字怎样讲,要求很低,怎样用可以说完全不要求。在集中认识这两千多字的过程中或之后,再配合着念点诗,念点韵语知识读物,如《蒙求》《鉴略》之类,念点小故事,如《日记故事》,主要是再多识点字,同时增加点趣味,提供点常识。

这样做,从历史上看,有它的道理。汉字是一种独特的文字体系。就整个的体系而论,它的长短得失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这里不谈。不过有一点是没有疑义的,就是在识字的最初阶段相当困难(识多了以后倒也有它容易的方面),如果要求认一个就掌握一个,做到会认、会读、会讲、会用、会写,那样进度就会很慢。可是不认识相当数量的字,无法读书。而语文教育以至整个的教育又需要学生尽早接触读物,以便通过书本丰富他们的语言,增长他们的知识,提高他们的思想。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矛盾——需要快一点读书,可是字不够用,读不成。集中识字,即在一个较短时间内尽快让学生认识一定量的字,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可行的办法。再者,“三,百,千”音节整齐,押韵,也不太艰涩,便于学童记诵。这的确不失为一个好的经验。正因为如此,集中识字,使用“三,百,千”做教材,这个办法通行了一千年。(《千字文》产生于南北朝时期,不过和《三字经》《百家姓》配合成套,得从南宋算起。)

2. 识字、写字分别进行,互不掣肘。儿童初入蒙馆,在识字课以外另设有写字课。识字、写字分别进行。“三,百,千”中的字并不要求学生会写,写字课另有自己的一套系统。初学写字,写的是“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那些字



包含基本笔画,而又简单,少的两三笔,多的五六笔,很合于写字入门的要求,比一上来就写“人之初,性本善”或“赵钱孙李”容易很多,合理得多。

识字与写字互不影响,也就互不掣肘。会写一个字比识同一个字要难。因为写字属于动作技能,还要牵涉到肌肉、骨骼及相应的神经系统的运动。假如一定要求儿童识一个字要做到几会(会认、会读、会讲、会写、会用),实际上就会使写字拉识字的后腿。我们聪明的古人看到了这一点,让二者分头进行,这对我们今天考虑初入小学的儿童的语文教育很有意义。

此外,当时的写字训练有一定的序列。字是由简到繁,由易到难;方法是由有依傍(即描红、影写、临摹)到无依傍。字的大小是先写中楷,后写小楷。这种方法比我们现在一上来就让孩子把不论好写还是不好写的字装进一个很小的格子里要高明得多。

3. 句的训练——属对。属对是同句读之学密切相关的一种基础课程。人们通常认为,对对子是学做近体诗的一种准备,这实际上是把它的作用看小了。练习属对,方法是所对字数由少而多。先一字对,然后二字对,三字对以至多字对。如先是“天”对“地”,“雨”对“风”,而后是“风止”对“雨停”,再后是“水清石见”对“云散月明”。这是练什么?是在练字(词)的组合,练组词,练造句。同时,由于组合时有声韵、词性、类别的限制,所以又是在进行音韵、语法、逻辑的综合训练。如:“风止”是名+动,就必须用另一个名+动比如“雨停”来对。除了词性和组合关系的条件之外,还有声调的条件:平声对仄声,仄声对平声。“风止”是平仄,“雨停”是仄平,所以能够相对。还不止此,“鸟鸣”也是名+动,也是仄平,却不能和

“风起”相对,至少这不是个好对子,因为“风”与“鸟”,“起”与“鸣”是些不相关的概念。由此看来,属对实质上是相当全面、相当严格的句子训练,是学生由识字到作文中间必经的一环。所以清人崔学古把它叫做“通文理捷径”。如果认为传统语文教育中识了字就要练写文章,训练表达能力没有什么“序”,那是一种误会,认为古人不讲究语法、逻辑,也是一种误会。

4. 作文训练。封建社会很重视写文章。传统语文教育到了元明以后,作文训练就以训练做八股文为主了。这是历来受到批评最严厉的一点。总的说,八股文无疑是应当反对的东西。内容上,它是“假”“大”“空”的鼻祖;写法上,它是程式化的典型;在当时起的作用,对后世产生的影响,都很坏。不过,从训练方法上看,多多少少有没有一点可资借鉴之处呢?

从宋朝开始就有人把一篇文章分析为由几个部分组成的,叫作“起、承、转、合”,随后又有人分析成五个部分,叫作“冒、原、讲、证、结”。训练作文就让学生依着这个模式去练。练习一般是分步骤进行的,先练习写第一个部分,练熟了,再练习写第二个部分,然后第三、第四、第五,最后练习写全篇。

以后,从这四部分或五部分发展成为八股文。八股文是议论文。就议论文而言,总不外提出问题,论述问题,得出结论。八股文的模式,是否部分的反映了议论文结构上的这一特点呢?模式是某些方面规律性的一种概括,它是有用的。模式与程式化不同。把模式搞成僵死的东西,就成了程式化,那当然是要反对的。就写文章而言,我们通常说,“大体则有,定体则无”。这个“大体”就是一种模式。我们今天应当有能力取模式之长,废程式化之病,把这个“大体”比前人更科学地概括出来,用更合理的方法引导学生较快地入门,免除他们摸索之苦。



一整套语文教育的做法在我们这个辽阔的国土上通行上千年,其中总会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供我们批判地继承。比如,他们的一些方法适合汉语汉文的特点,而且有的方面的训练也注意了有序列地进行,并非如我们想的一概那么盲目。这些都给我们以启发。我自己就从对传统语文教育的初步研究中得益不少。(1978年后,我提出的语文教育科学化的主张以及小学生借助汉语拼音从语言训练入手,把阅读、识字、写字稍有先后的分头进行,互不牵制的看法,就与对传统经验的探索不无渊源关系。)

《传统语文教育初探》那本小书出版后,受到出乎意料的欢迎。这表明,语文教学思想向传统探求经验的,大有人在。那次研究归结出的几条传统经验,集中识字这一条起了一定的实际作用。有的地方原已试行集中识字,我的研究成果发表后给予实验以历史根据。有的地方则是在我的书文发表后开始实行的,并且参照书里的介绍编出了新的《三字经》《四字文》《儿童学诗》等等几种教材。

三、传统语文教育的积弊

1978、1979年之后,拨乱反正,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这时,在教育界,语文教学质量不高成了一个非常突出的、全社会都很关心的问题。语文教学界的同志纷纷起而研究改进之道。语文教学为什么这么难办呢?其症结何在呢?为了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我重新想起了传统语文教育的悠久历史和巨大影响,使我第二次投入对传统做法的研究。这一次我对传统语文教育的研究,实质上是对它的再认识。

如果说,过去我对传统语文教育的研究比较注意总结其中

的经验,那么,这一次则比较注意它对今天语文教学的消极影响。这样做也有一个思想文化的背景。这些年,我们从十年动乱中的许多问题上看见了封建主义的阴影,对封建主义有了一些新认识,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语文教学中的封建主义遗迹同样不少。在这种对于历史传统进行再认识的情况下,从1976年以后,我逐渐多接触了一些国外的应用语言学和新的教学论一类的东西,使思路有所开阔。更重要的一点是,现代化建设成为我们的工作重点,我们的头脑无可避免地会随着这个大的形势来活动。简言之,在我们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之下,语文教学的低效率问题必须解决。为此,必须对它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再研究,再认识。

近年来,通过对传统语文教育的再认识,有些问题逐渐看得更清楚了。比如,传统语文教学的特点是整个教学为科举考试服务。几乎可以这么说,就培养目标而论,它是封建社会官吏制度的附庸。它面向选吏,而不是面向社会实际需要。读经——写八股文——科考,这是它的基本路子。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就是这么回事。于是,在语文教学的具体做法上,千百年来一直是两大重点。首先是花很大的工夫去对付字,解决字的问题是第一大关。识了字好去读古文,读经。其次是再花很大的工夫去对付文章,念文章,背文章,模拟着前人写文章,最终练成熟练的写八股文的能力,这是第二大关。学会了作八股好去应科考,做官。所谓语文教育,实际上就是对付这两个东西:字、文章(八股)。有一出京戏叫《二进宫》,主要人物之一杨波有一句唱词很生动地描绘了封建教育的本色,他唱:“十载寒窗,七篇文章,落一个兵部侍郎。”妙极了。20世纪60年代初我写过一篇谈语文教学的文章,里边提出了



“过三关”：字关、句关、篇章关。那篇文章先是登在报纸上，接着好些有关刊物纷纷转载，很产生了一些影响。说穿了，那正是受到传统影响的产物。

全力对付字和八股文的结果是什么？第一，完全脱离了实际语言——只管书面，不管口头，并且管的是与实际语言相距很远的文言。第二，完全脱离了实际应用——八股文是彻底没有用处的东西。

那么，今天，传统语文教育脱离实际语言、脱离社会需要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呢？没有。

首先，忽视口语的问题一直存在。我们现在常常讲，语文能力包括听说读写四方面的能力，要培养学生这四种能力。而实际上，我们所重视的仍是“读写”，仍是书面语言。学校的教学是围绕着读写来进行的，不少口号也都是围绕着“读写”而产生的。自然，书面语言是区别文明人和野蛮人的标志，它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巨大作用毋庸赘言，重视它是应该的。但是假如重视到不适当的程度，以至完全忽视口头语言，那就不仅是失于片面了。忽视口头语言必然会回过头来削弱书面语言能力，其结果是两败俱伤，全面降低了语言能力。

自从两汉以后，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产生了距离，在教育中忽视口语的问题就存在了，而且越发展越严重。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生产水平低下，交通不发达，社会经济的基本结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交往、产品交换都不发达，所以，忽视口语训练的弊害还显示不出来。但是到了今天，大规模的机器生产改变了人们几千年来的生活方式，人们从事生产、交换、科学文化活动要协同行动，而且现代交通发达，交往频繁，通信技术高度发展，千万里之外可以通话，用说话来处理紧急的、重

要的工作,口头语言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重要。过去,“口讷不能言”曾经被认为是一种美德;现在,这将成为适应现代生活的一种障碍。在当代我们要发展智能机器人,并且将不是用程序语言而是用自然语言发出指令。口头语言能力低下,将无法适应这种已经存在并将日益迅速发展的新形势。假如在这种社会需要之下,我们的语文教学仍然一味钻在读写象牙之塔中,不去管口头语言的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传统语文教育留给今天的一种严重的弊病。

此外,由于社会生活的发展,我们的学生毕业后不仅不再需要写八股文,连写那些无目的、无对象的什么什么“论”,什么什么“记”之类的需要也不多了。他们应当会写实验报告、病历、调查报告、研究论文、总结、产品说明,等等,可是我们的作文教学并不注意教学生练习这些。曾经有一段时间,爱让学生写《雾》《路》《窗外》《晨》这类非诗非文,既够不上文学习作,又不切合实用的文章。近几年情况有所改变,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结果,社会上到处反映:中学毕业生连封信都写不成,医学院毕业生写不好病历,工科大学毕业生写不好实验报告,文科大学毕业生写不好公文,写不好调查报告。我们的作文教学不理睬现实需要的情况还不严重吗?

例子还不止这些。可以看出,传统语文教育脱离社会需要的积弊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我们的语文教学。

可是,我们对此常常难以觉察。为什么?“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接受的是这份历史遗产,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种习惯势力之中,于是习焉而不察。这是可以理解的。

其实,许多有识之士早就看到了这种痼疾,多次批评过这



种弊病。比如,叶圣陶先生在这方面就发表了很多深刻的见解。值得深思的是,叶老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许多切中肯綮的批评,直到现在我们读起来还觉得切中时弊,很有针对性。这就说明,他在几十年前批评的东西今天依然存在,说明传统语文教育的积弊之深,势力的顽固,也说明了我们对付它的软弱无力或者还处在朦胧之中,认识不到。

以上可以说是我第二次研究传统语文教育的一些新认识。它是对前一次研究的重要补充。当然,我并不因这次的补充就全盘否定传统经验。经验还是经验。道理就无需多说了。

四、怎么办

现在,迅速革除上边说的那种积弊已经是刻不容缓了。我认为需要抓紧以下几点:

1. 开展对传统语文教育的深入研究,实事求是地、全面地评价其长短得失,并把理论工作者的研究和普及宣传工作结合起来,使广大语文教师像过去知道“举一能反三”,“教学可以相长”那样,清楚地了解传统长在哪里,短在哪里。进行必要的语文教育理论的普及宣传。

2. 主管部门要发挥行政系统的力量,把理论研究的成果运用到教学大纲、教材系统中去。不要坐等理论十分成熟了,十分完善了才进行这一工作,不要以“不够成熟、没有把握”作为陈陈相因、不敢改革、不敢实验的理由。教育的周期长,教育进展落后于社会需要的现象更应注意尽早避免。时间拖不得。只要看准了,就办。要尽快组织各方面力量,构成一个专门的班子,考虑改革我们的教学大纲、教材体系,力求新的大纲、教材能反映现代科学的成果和社会生活的需要。

3. 光就语文教育论语文教育不行。教育既然是个社会现象,解决它的问题,就不能关起门来只在教育的圈子里进行。首先,要有相应的评价系统。比如,社会上的招聘、各级学校的考试、高考办法都要改革。要立足于考察学生实际的语文能力,有条件的地方要进行口试。——不要以为这个工作量大得惊人。高考制度改革后,这问题并不像想像的那么困难。这个评价系统非常重要。它会迅速改变人们的价值观。而价值观的改变是人们指导思想改变的标志。

五、方法论问题

现在回到传统语文教育研究这个问题上来。在研究的方法上,我以为,首先要有开阔的视野。不能把眼光死死地盯在被研究的事物本身上。要有些全局观点,或者说要把语文教学放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中去考察,又或者,用个时髦点的说法,要有点“宏观”的眼光。评价传统语文教育的得失长短,光知道它本身的情况不够。要知道这种情况据以产生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同时,要了解我们当今的情况——当然不止是语文教育的情况,要了解当今社会生活的情况,了解它对语文教育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此外,还要了解国外语文教育发展的情况。比如,日本的语文教育就注意面向社会需要。他们的教学大纲对说话能力有明确的要求,他们向全国推荐的光村图书公司的语文教材以及其他出版社出版的教材中,都有写作教材,里面除了让学生学会观察、思考、总结自己想法的练习而外,还让学生练习各种实际需要的文体,如讨论记录、笔记、书信、日记、实验报告、调查报告、研究报告等等。知道些左邻右舍的情况很重要,它有助于考虑我们自己的问题。



此外,研究的方法要科学化。很遗憾,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我自己的研究是偏于分析性的,没能做必要的科学实验,取得翔实可靠的事实论据和最富说服力的数据。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今后,我愿和有志于此道的同志一起,在传统语文教育研究方法的科学化方面作出努力,以期进一步提高研究的水平。

(载《我和语文教学》一书,写于1984年6月。)

对传统语文教学的再认识

从1977年起,在搁置了十来年之后重新接触语文教学的问题。六七年以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形势的鼓舞之下,在全国范围内空前高涨的学术研究空气的推动之下,我重新回顾了语文教学的过去,也回顾了自己以往研究这个问题走过的路程,深深感到,自己的认识需要前进,不能停留在十几二十年前的境地止步不动。逐渐,对于语文这门课程,对于语文教材,对于语文课的教学,产生了一些想法。思路大致是这样的:经过大家的努力,语文教学很有些改进,但是无可讳言,仍旧有不少的问题存在,普通教育阶段仍旧没能把学生的语文能力培养到应有的水平。这是什么道理呢?语文教学这件事为什么这么难呢?于是重新回顾传统的语文教学,重新认识它的得失利弊,拿近几十年来的语文教学和传统的做法进行比较,看看现代的语文教学从传统那里继承了些什么,对它改革了些什么,在原有的基础上开创了些什么,还遗留下一些什么重要问题没解决,不断发展的形势又提出了一些什么新的有待解决的问题。这样,对于当前语文教学的成效不够理想的症结所在似乎看得清楚一些了,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怎样从根本上、较大幅度地改革语文教学的构想。



1. 为什么需要再认识

20 世纪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初,我用了点工夫探索了一下传统的语文教学,写成一本小书《传统语文教育初探》(附蒙学书目稿)^①。那次,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把传统语文教学的有关资料广为收集,进行了初步的整理,作为研究这个问题的基础,编写成那个“书目稿”。尽管还是个“稿”,并且是作为那本书的附录的,但我个人并不看轻它。要研究问题就必须先在资料方面下点工夫,既是为自己的需要,也可给别人研究服务。二是从传统语文教学的做法中探求到几点经验。首先是关于汉字的教学,包括集中识字教学的做法和写字教学的做法。其次是关于阅读训练和作文训练的一些做法。随后又写了一些文章发挥探索之所得,例如在《漫谈语文教学》^②中提出学好语文要“过三关”(“字关”、“句关”、“篇章关”)的说法,就是从传统经验中来的。那次探索形成了我自己对传统的认识,并且由于写了书,写了文章,在多处讲过,也就和社会上研究传统之风多少起了一些配合作用。例如,集中识字教学实验的开展,有些学校在作文教学中运用“初探”介绍的宋人谢枋得提出的所谓“大胆文”、“小心文”的观念;“初探”着力介绍的欧阳修、朱熹、程端礼、唐彪、王筠诸人的教学语文的观点引起一些同志的兴趣和重视,以至出现了集中介绍前人对教学语

① 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 年 10 月初版,1964 年 8 月第二版,1980 年 6 月重版。

② 《光明日报》1963 年 10 月 10 日第四版。

文的论述的书^①等等,就是几件比较明显的事实。

我至今认为,对传统经验进行整理、总结、分析、介绍,这项工作还是应当做的。前次的探索,还是很初步的,今后需要继续做,已经拟定了一个计划,准备对“初探”进行较大幅度的修订和补充。

但是,近几年逐渐感觉到两个问题。第一,前次的探索有个明白的意图,就是向传统寻求经验,讨办法。因此,对于传统做法的消极影响这一面,注意很不够。曾经提到传统的语文教学忽视口头语言这个问题,然而只是在“初探”的“后记”里附带一笔,没有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认真讨论。从那以后,在不同场合也曾零零星星谈到传统教学的某些弊端,然而没有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探讨,认识是很不深刻的。第二,就是总结出来的某些正面经验,例如集中识字,尽管在历史上确实起过好的作用,今天也仍旧有参考价值,然而随着时代的进展,随着文化、科学、教育出现了新的形势,提出了新的要求,旧经验拿到今天来,它所能起的作用就和历史上的情况不同了。我们不能拿今天的观点要求前人,但是应当根据今天的需要来考虑怎样正确对待前人的经验。李时珍是伟大的,可敬的,他留给我们的遗产是珍贵的,然而毕竟不能指望李时珍来解决我们今天的药物科学了。由于以上两点,我深切感到,需要对传统语文教学进行再认识。

1977年以来,全社会的头脑清醒一些的人们几乎共同认识到,由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特别长,并且是两三千年连绵

^① 如196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论学习语文》后半本全部是前人谈学习语文的言论的摘录。



不绝 ,中间没有割断过 ,没有受到大的冲击(辛亥革命的冲击是微弱的 ,五四运动的冲击强烈些 ,然而在整个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流风的笼罩下 ,所起的作用也还是有限的) ,封建社会的观念形态渗透到全社会的各个领域 ,各个阶层 ,源远流长 ,根深蒂固 ,直到今天还从许多方面反映出来。为什么人治的习惯势力那么大而法治那么难?为什么生产上、经营管理上 ,那么习惯于松散的、粗放的方式?为什么重男轻女的观念 ,种种封建迷信的观念 ,还有那么广阔的市场?等等 ,从涉及政治、经济等大的问题到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问题 ,许许多多都能从长期的封建社会找到根源。新宪法征求意见稿在总纲部分提到“反对……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经过上上下下反复多次的讨论 ,在定稿时终于把“残余”改成为“腐朽”。人们认为 ,不是零零星星的一点“残余” ,还很不少 ,还在好些方面起着不小的作用 ,要清除它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不懈的努力 ,不是轻而易举的。

那么 ,封建社会的观念形态在教育领域有没有遗留 ,有没有影响呢?要说一点都没有 ,那恐怕是很奇怪的事情。教育真的是个“清水衙门” ,唯我独清 ,唯我独醒 ,唯我早就和封建社会的的东西彻底“划清界限”了吗?且不说 19 世纪末办新学堂的时候还是半封建社会 ,今天 ,离开那个半封建社会也才 30 多年啊!

如果有 ,反映在教育领域的哪些地方呢?

这里不可能讨论教育的整体。让我们把讨论收缩在大中小学各门学科里 ,收缩在语文学科里。

19 世纪末开始办新学堂 ,从学制、课程设置到教科书 ,大都是从东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搬来的。像我这样年岁的人就

已赶上,初中高中六年,数学、物理、化学三科的教科书用的统统是外国来的英文课本,原封不动,照用照学。那些课程,中国封建社会的观念形态是不大有的。独有语文(当时称国文)这一科,无法从外国搬。内容无法搬。而内容,一头联系着教学目的,一头制约着教学方法。因而,这门课从目的,到内容,到方法,基本上是土生土长的,最富于民族风格,只不过形式上分成一册一册的,一册里边分成一课一课的(中学连这个形式也不大用,还是一篇一篇的,这一篇用两课,另一篇可以用五课,某大学教一年级国文的一位教授,一学期只教了一篇庄子的《秋水篇》)。

既然率由旧章,无疑在语文这门课里就留下来丰富的传统教学的东西。咱们如果要研究传统教育,从数、理、化、生、体育、美术这些课程里是很难找到材料的,但是从语文课里却会找到许多,至少会看到不少传统的影子。

语文这门学问主要是语言文字之学,而语言文字是一种客观存在,所以多年的传统教学肯定会摸索出符合客观存在的语言文字以及学习它的某些规律的经验。这些经验是可贵的。然而教育和教学又是属于观念形态范畴的事。渊源于封建社会的教学传统无疑又会贯穿着封建社会某些观念形态的东西在内。这些东西是陈腐落后的,不符合时代需要的,妨碍教学工作前进的。传统语文教学就是这两种东西的杂糅,既有某些好的经验,又有不少落后因素。两种东西融合为一体,泥沙俱下,难解难分。

传统的力量是很强固的。世代相传,年深日久,人们早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觉得事情就应当是这样的,无可议论。特别因为里边确实还有些好东西,就更不容易看到它还杂有很不



好的东西。色呈金黄,而且闪光,不经过化学分解,怎么能知道它不是纯金而是杂有别的成分的合金呢?“熟读精思”,“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多读多写”,这些经验,谁能说它不对呢?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自己就曾钻进传统语文教学这个庐山中去。我发现,庐山中人是很不少的。因此感到需要跳出庐山,站到外边来,前后左右仔细端详端详——客观一些,对传统语文教学进行一次再认识。

2. 怎样认识

仔细一端详,传统语文教学头绪很简单,一点都不复杂。一共干两件事,一是花大力气对付汉字,一是花大力气对付文章。目的是:应付科举考试,简要地概括一下:识字+作文章=语文教学;语文教学的目的要求→达到考中举人、进士的水平;考中的效果→做官。说穿了,就是这么一回事。

单就教学而论,花大力气对付汉字有符合实际的一面。第一,汉字这种文字体系有它的特点,有它的优越性,但是相当难学,尤其是在初学阶段。第二,历史上特别重视书面工夫,必须把文字学好。第三,读的写的是文言,文言与实际使用的口语有很大的距离,读写文言全靠文字工夫。有此三点,所以汉字必须花大力气去对付。

由于长时期花大力气去对付,逐渐摸到了汉字和学习汉字的一些规律,积累了不少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我们研究汉语汉文有用处,对于我们教学汉语和汉字也有可参考的价值。

我国历史上从来就重视文章。早在三国时代的曹丕就说:“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此后,历代统治者都是以文章取士。朝廷通过考试选拔他们需要的人才,而考试就是考作文章。“念书人”竟逐功名利禄,只有在文章上下工夫。识

了字就读文章,读古圣先贤的经典,读历代的名篇佳作,要读得通透,背得烂熟。读文章是为了写文章,要揣摩,要涵咏体味,得其精髓,以便于模仿得形近神似。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一般的“念书人”为考举人考进士作准备,倒也无需读那么多。直到没有多久以前不是还有人说过“肚子里装上三百篇好文章就行了”吗?什么“行”了?写文章“行”了。写文章为的什么呢?不是为了致用,而是为了去应考。宋代以下,文章选本层出不穷,多种多样:有按作家依次编选的,有按文章体裁分类编选的,有按时代先后顺序编选的。选文有多达几百篇上千篇的,有二三百篇的,也有少到几十篇的;有详批详注的,也有精评简注的。所有这些都是准备作课本用,供老师教,学生读、背、模仿的。古文选本之外,明清两代又出了一种更直接为应考服务的时文选本,或称闾墨。经典,古文,时文,这是读的主要内容,也是学写的主要范本。

能读能写了,然后去应考。

京剧有一出戏《二进宫》。三个主要人物之一杨波,有两句很形象的唱词:“十载寒窗,七篇文章,才落得个兵部侍郎……”概括描绘得真好!“念书人”十载寒窗,辛辛苦苦,就是学作文章,学成之后,省试,会试,殿试,几篇文章(为什么是七篇,算不清楚,戏词不必深究)过了关,于是金榜题名,功名到手。

也由于长时期在文章上下了这么多的工夫,我国历史上文章之学的发达,在全世界恐怕堪称独步。前边提到的曹丕的《典论论文》,接着有陆机的《文赋》,都是论文的鸿篇,刘勰的《文心雕龙》更是文章之学的巨制。唐宋以后,论文的著作越多,蔚为大观。文章也出了许多卓有特色的风格流派。唐



宋八大家,各有特点,此后公安、竟陵、阳湖、桐城,都是荦荦大者,至于小家小派,更是不可胜数。文章之学是我国文化传统中颇有光彩的一大宗遗产,尚待整理,总结。

汉字之学,文章之学,历史上积累了经验,给我们留下了值得珍视的遗产,我们感谢前人,决不轻易抛弃,并且要总结,继承,发扬光大,为我们以及后人所用。

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作为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传统的那种做法有十分严重的流弊。根本的一点是:传统的语文教学已经完全沦为为封建统治服务的科举考试的附庸,并且是个并不高明的附庸。那么狭隘的一切为了考试,老师为考试而教,生员为考试而学,不仅培养不出我们今天观念中的人才,也培养不出足以强化封建统治的人才。发展到封建社会后期,语文教学越来越僵化,越来越无生气,不仅培养不出人才,简直成了培养人才的障碍。封建社会的观念形态制约了教育,使之不能健康的发展,被制约衰败了的教育又促进了封建社会的加速腐朽,就这样成了恶性循环。

二

对传统语文教学再认识的结果,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

经验方面主要有三点。一是建立了成套的、行之有效的汉字教学体系。一是建立了成套的文章之学的教学体系。一是建立了以大量的读、写实践为主的语文教学法体系。

问题方面主要也是三点。首先是语文教学的性质和目的——语文教学是科举考试的附庸,目的在于使受教育者获得参加科举考试的写作能力。这样的性质和目的决定了教学内容——识字加读古文加作古文(一般古文和八股文)。这样的

性质和目的,这样的内容,决定了学语文的主要手段——记诵和模仿。

具有这样一些问题的语文教学,无可避免的产生了许多弊端,概括起来主要是下述四点。

1. 脱离语言实际。 语文教学只管书面上的训练——识字、写字、读书、作文章,完全抛弃了口头上的训练——听话的能力和说话的能力。古代本来很重视语言能力。流传下来的先秦诸子百家之书,大量的的是诸子演讲、论辩的实录或者非常接近实际的演讲、论辩的书面记载,无论如何,不是完全离开口头说话硬作出来的文章。直到两汉的史书里还记载了不少官吏们和学人们互相辩难的对话。《世说新语》里写了好些有捷辩之才的人物以至少年、儿童。封建社会中后期以下,越来越不理睬口语能力了。对于儿童,多少进行一点“洒扫应对”的教育。所谓“应对”,属于伦理教育的性质,教的是长幼尊卑的称谓以及对尊长唯唯诺诺那类言词,如果也算是语言教育,那只是极偏狭的一点。至于书面上读的,写的,却是以先秦两汉语言为基础逐渐形成的文言,与生活中实际使用的活语言距离很大,而且越离越远,以至完全脱节。彻底脱离语言实际的语文教学是一种畸形的语文教学,对于发展语言能力和思维能力是很不利的。然而这种弊害不容易察觉,人们往往以为能读点古书,写篇古文,就很不错了,想不到这样会脱离现实,引导年轻人只向后看,把古人作为学习的楷模,把古文作为学习的最高境界,古人和古文不仅是不可逾越的,并且是不可企及的,无形中制约了人们的思维想像能力和创新进取的精神。我们中华民族本来在世界上遥遥领先的文化、科学,到了封建社会后期逐渐停滞下来,落后下来,这和科举八股有很密切的关系。



2. 脱离实际应用。 语文教学只管读、写 ,而读的写的都与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实际应用的东西无关。唐朝的诗人白居易还知道诗、文都应当“为时”、“为事”而作 ,反对“嘲风雪、弄花草”那种无用的游戏笔墨 ;北宋的欧阳修自己动手写过不少判词 ,被人收在他的文集里 ;苏东坡写过医书药书 ,更是实际应用的文字 ;王安石的不少文章就是处理政务作的应用文。到了元明以后 ,念书人穷年累月 ,花费很多的时间精力学写八股文 ,而八股文则是全然无用的东西。语文教学主要围着科举考试的“指挥棒”转 ,不切实际 ,不务实用 ,这方面的弊病显而易见 ,不待多说。

3. 忽视文学教育。 学塾、蒙馆多少教小孩子念点短诗 ,为的是易于上口 ,背诵 ,开讲四书、五经之后 ,不再把诗列为教学内容。词曲小说更不要说 ,不仅不教 ,甚至禁读。《红楼梦》就写了贾政认为宝玉喜欢读诗是不务正业 ,大观园里谁看看戏曲都是见不得人的坏事。语文教学中教孩子们读古文 ,其中有些其实是文艺性的散文 ,可是并不当作文学来教 ,而是作为写文章的范例 ,也只是用来讲“起、承、转、合”那一套。至于要求写的什么“论”、“说”之类 ,尤其是八股文 ,既不是实际应用的东西 ,也不是文学习作。文学教育很重要。孔夫子很重视学诗 ,唐朝也把诗列为教学内容 ,元明以后衰落了。至于后起的戏曲小说当然更被排斥于语文教学之外。关于文学教育问题 ,后边还要说到 ,这里暂不申论。

4. 忽视知识教育。 这里说的知识 ,只指与语文教学直接有关的语文知识。我国本来有起源很早的很发达的文字、训诂之学 ,稍后有声韵之学。然而在基础教育中并不教文字、训诂、声韵的知识。教字 ,教文章 ,也不运用这些知识。治文字、

训诂、声韵之学的是极少数“专家”，和一般的语文教学无关。语文教学中有一个项目叫做“属对”或“对课”，就是教孩子们学“对对子”。这本来是很好的一种语文训练，其中包含着语义、语法、声韵以至逻辑训练的内容，可惜只是教孩子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记诵虚实，平仄和韵部，不教给他们有关的系统的知识——实际上，塾师们多半也不懂那些知识。明、清两代出过一点叫做《字学举隅》《文字辨伪》《声律启蒙》一类通俗的知识性读物，本身的条理性、系统性就很差，而印得又很少，流行也不广，始终没建立起适用于语文教学的知识体系。语文教学始终处于一种自发的而非自觉的、凭朦胧的感觉和经验办事的状态，靠老师耳提面命，靠孩子们自己去体会、摸索。我们本来有很发达的文章之学，可是始终没整理出一个条理来，没形成一套知识系统。好容易总结出一个“起、承、转、合”带有点规律性的模式，很快又变成了一种僵化的程式，发展成为八股文。一些有识之士反对八股，可又没能提出一种有用的系统知识，于是只得用“文无成法”去抵制它。就这样，传统语文教学十分重视的读写能力的培养和提高，一直是一件“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事。不讲知识，甚至反对讲知识，成了传统语文教学的特点之一。

以上这四大弊端，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前边说过，清末废科举，兴新学，“国文”一科基本上是率由旧章，那么传统的积弊继续存在，自然不在话下。

20世纪20年代前后，“五四”运动给传统的语文教学以相当大的冲击。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大量的“五四”新文学作品的产生；西方不同流派的教育学说的引进；这些，对语文教学都有或大或小的影响。小学阶段语文课不再叫



“国文”改称“国语”，使用白话文了；使用注音符号给汉字注音，不再单靠以字注字的所谓“直音”了；有些学校，有些教师把新文学作品搬进课堂了；有些学校，有些教师，多少教一点语法、修辞知识了；《康熙字典》以外，陆陆续续出来一些新的工具书了，等等。语文教学从内容到方法，起了一些变化。新中国成立后，语文教学在内容上有了更大的变化。不仅在小学，就是在中学，古文退居到次要地位了，并且只要求读一些，完全不要求写古文了。教学方法也有了比较大的改变，并且进行过一些新的实验，取得了一些成绩。

然而，把60年来的语文教学全面的考查一下，和传统的作法对照一下，我们不难发现，传统语文教学的基本路子改变不大，积弊的影响很深。没有科举考试了，但是有了其他形式的考试。语文教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服从于考试的需要。教学内容，万变不离其宗，还是识字加读文章加写文章。仍旧相当程度的脱离，至少是忽视语言实际。只是在最近一段时间，才有比例不大的部分学校、部分教师开始注意一些口语训练，而在社会上，对于这一点还是有不同意见，不同态度的。写“错别字”是大家共同关心的大事，而念白字、说方言大家不以为意。书面上不大通顺的句子叫作“病句”，要治，说话支离破碎，语无伦次，不叫“病语”，似乎无需纠正。仍旧相当程度的脱离应用实际。作文，大体上还是写什么“论”，什么“说”，什么“记”之类，生活中用的，学习研究中用的，工作中用的文体，不受重视；中学毕业了，甚至大学毕业了，不会写公文，不会写商品说明，不会写实验报告，不会写病历等等各种实际应用的东西，这种情况在毕业生中占的比例很不小。仍旧相当程度的忽视文学教育。20世纪50年代中试验过一次汉语、文学分科

教学,只进行了一年多就草草收场,从那以后甚至有过一个口号“不要把语文课教成文学课”。仍旧相当程度的忽视知识教育。社会上流行着种种论证不需要教语法、修辞等等基础语文知识的说法,甚至有人说中学生语文水平差就是由于学了语法、修辞知识的缘故。在教学方面,正如吕叔湘先生在一次会议上说的一样,“新书一本,先生讲,学生听”(早期某套国文课本的第一课),仍旧是流行最广的教学方法。

90 高龄的叶圣陶先生从 20 世纪 20 年代起就从事语文教学工作,制定课程标准,在小学、中学、大学教语文,主持编辑语文教科书。前几年,他说:60 年来,语文教学没有什么改变。说 60 年来如何,叶老是最有发言权的了。前边说的那些变化,他当然都清楚。他说没有什么改变显然指的不是那些,而是指的刚刚说过的那基本的路子和那源远流长、既深且厚的积弊。叶老的话是发人深思、值得我们好好想想的。

(本文是著者于 1984 年 7 月间在课程教材研究所召开的语文教学改革座谈会上的讲话。这里选录的是该文中纪录的一、二部分的摘要。标题是编者加的。原载《课程·教材·教法》1984 年第 6 期,1985 年第 1 期。)

三、情系课程改革

说 工 具

语文是个工具 ,进行思维和交流思想的工具 ,因而是学习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工具 ,是进行各项工作的工具。

对于语文的这种性质 ,大家多半同意 ,看法上没有什么出入。但是 ,语文教学应当怎么办才算是符合语文的这种性质 ? 语文课本的文章应当怎样教法才能使学生正确地、充分地掌握语文这个工具 ? 在这些方面还不是完全没有问题。近来我时常被问到这件事 ,也听到一些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 ,看到一些情况 ,因而有些零零星星的不成熟的感想。这里就把这些感想说一说 ,向关心语文教学的同志们请教。

先讲一件与此有关的事情。

请看哪一个讲法好些 ?

事有凑巧 ,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方 ,我听说过三位教师讲“破釜沉舟”这个成语。

有一位教师大致是这样讲的 :“‘破釜沉舟’表示坚决的意思。做事一定要坚决。无论做什么 ,只要是正当的、应该做的事 ,就必须抱定只许前进、不许后退 ,只许胜利、不许失败的决

心。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成功。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工作还没开始就准备下失败的退路,那样一定不会成功,碰到一点困难就向后转了。当然,前进的目的必须正确。在这一点上,古人不能跟我们相提并论。由于时代的局限,古人,尤其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人,做事的目的在今天看来很多是成问题的,下定决心做好事是应当的,如果坚决做坏事,那就不应当了。”

有一位教师是另一种讲法,他说“‘釜’就是锅,‘舟’就是船。‘破’和‘沉’都是动词。‘破釜’是‘使釜破’的意思,也就是把锅砸碎;‘沉舟’是‘使舟沉’的意思,也就是把船凿沉。这样用法的动词叫做‘使动词’。同是作饭的家具,古代叫‘釜’,现代叫‘锅’;同是水上运输工具,古代叫‘舟’,现代叫‘船’。这是古今词汇的演变。像古代叫‘冠’,现代叫‘帽子’,古代叫‘履’,现代叫‘鞋’,都是这种情形。曹植《七步诗》里有‘豆在釜中泣’的句子,柳宗元《江雪》里有‘孤舟蓑笠翁’的句子,这里的‘釜’和‘舟’跟‘破釜沉舟’里的‘釜’和‘舟’意思相同。”

另一位教师讲得比较简单,话说得比较少。他这样讲:“项羽渡河进攻秦国的军队,渡河之后,把造饭的锅砸碎,把船凿沉,断了自己的退路,以示有进无退的决心,终于把秦军打败了。后来大家就用‘破釜沉舟’这个话表示下定最大的决心,不顾任何牺牲的意思。”

请想一下,这三个讲法哪个好些?在我看来,三位老师的修养都很好,讲的都对,第一位讲的那番道理,第二位讲的那些知识,于学生都是有用的。不过,要是处处都像第一位那样,只说些大道理,不讲字句本身的意思,恐怕不太好;要是像第二位那样,只讲字句的知识,不管这些字句合在一起表达一种怎样的思想感情,用在什么场合,效果怕也有问题;要是把两种讲法



加在一起,每句话都这样讲起来,费时过多且不说它,恐怕对于学生的理解掌握也不见得有好处。因此,我觉得,一般说来,第三位讲法可能好一些,话说得比较少,可是把知识、道理结合在一起了。我找了一些学生测验了一下,证明这个想法大体上符合实际。这三位老师对这个成语的不同讲法,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语文是一个什么工具,怎样掌握它?

语文这个工具和生产上用的一些工具,比如除草用的锄头,平整木料用的刨子等等,有同有异。同在都是工具。各种工具总有某些共同的特点,否则它们就不会叫做工具。异在它们的作用。语文有语文的用处,生产工具有生产工具的用处。必须看到那个同,也必须看到那个异,才能比较全面地理解语文的性质,才能比较准确地找到掌握它的办法。

先说同。从大处来说,工具的本身没有阶级性,掌握在谁的手里就为谁服务。在这一点上,语文和其他工具是一样的。封建统治阶级运用语文工具宣扬封建主义的思想意识,资产阶级运用语文工具宣扬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无产阶级则运用语文工具宣传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跟一切反动的思想意识作斗争。无产阶级必须充分地、高度准确地掌握语文这个工具,让它很好地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服务。

凡属工具,最重要的是准确地操纵它,熟练地运用它,只有这样,它才能好好地为我们服务。在这一点上,语文跟别的工具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拿着个锄头,不会用,只会说些“锄头可以帮助我们除草,帮助我们生产粮食,而生产粮食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工作”之类的大道理,或者只会说些“锄头

的柄是木头做的,也可以用竹子做,头是用铁做的,头和柄应该成多少度角”之类的知识,就是不会拿上一把锄头去锄地,那是不行的。道理是重要的,知识也是有用的,因而有些人专门研究那些道理和知识;可是无论如何,不会用总不行。不会用,它就不会为我们服务,说了半天也生产不出粮食来。语文也一样,要紧的是能听,能说,能读,能写。要是看见个字不认识,有个什么意思写不出来,大道理讲得再多,知识记得再熟,即使道理和知识都不错,也还是没有掌握语文这个工具,它还是不肯好好地为我们服务。

那么,怎样才能达到准确地操纵和熟练地运用,也就是达到充分地掌握呢?凡属工具,要掌握它就要到使用它的现场里去学。在这一点上,语文和其他的工具也没有两样。要会用锄头,就得拿把锄头到地里去学;要会用刨子,就得拿个刨子到木作案子上去学。要是坐在屋里拿把锄头或者刨子讲一通使用的方法,就是不到现场去比试比试,即使讲得都对,还是掌握不了。掌握语文这个工具也一样,也得到使用语文工具的现场去学习。使用语文工具的现场在哪里呢?这就涉及到语文工具和其他工具异的方面了。

再说异。生产上用的各种工具,都是生产物质资料的。语文这个工具不生产物质资料,它不是生产工具,而是人们用来思维和交流思想的工具,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进行工作的工具。这就是说,语文这个工具和各种生产工具的作用不同。

锄头是除草的,而锄头和草是两码事,锄头和草并不长在一起。语文是交流思想的,语文和思想显然也是两码事,可是由于语文是交流思想的工具,而思想是抽象的,它要依靠语文这个物质外壳而存在,所以语文和思想老是长在一起,分不开。



这是语文工具跟其它工具不相同的一点。“地球是圆的。”你不可能只学“地球”“是”“圆”“的”这些词，“主语+谓语”这个句子的结构，而不同时学了地球是圆的这条知识。“劳动创造世界。”你也不可能只学“劳动”“创造”“世界”这三个词，“主语+谓语+宾语”这个句子结构，而不同时学了劳动创造世界这个观点。换言之，不学会那些词、那些句子，就懂不了那些意思，如果还没懂那些意思，实际上也就还没有真正学会那些词、那些句子。这就意味着，学习语文这个工具的时候，学习怎样用语文来交流思想的技能，跟学习语文所表达的思想本身，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

语言现象涉及三种事物：人，语言，思想。人要掌握语言这个工具，同掌握其他工具一样，得练；语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但由于思想和语言有着不解的姻缘，同草和锄头的关系不大一样。所以在进行语文教育时就离不开语言材料所包含的思想内容。语文这个工具跟其他工具有相同的一面，这就决定了语文教学必须教学生切切实实地在训练中学会操纵和使用语文工具，也就是着眼于掌握字、词、句和篇章的运用能力，不容许离开这种训练去空讲大道理，空讲理论知识，它跟其他工具又有相异的一面，这又决定了语文教学必须把训练学生运用字、词、句、篇章的能力和训练学生理解语言所表达的思想的能力结合起来，不容许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这样看来，语文教学强调基本功，强调多读多练，强调“文道统一”，这正是由语文这个工具的性质决定的。

前文所讲的“破釜沉舟”的第一种讲法，着重于讲语言所表达的思想，而且发挥得有点过分，不注意语言这个物质外壳本身，第二种讲法，只注意了语言这个物质外壳。忘掉了它所

负载的思想内容。这两种讲法从不同的方面都忽略了语文这个工具的性质。第三种之所以比较可取,正是由于那种讲法大体上是符合语文这个工具性质的。当然,专从对一个成语的解释来说明这个问题不可能十分确切,不过大致还可以作为参考就是了。

文 道 统 一

教学生掌握语文工具,也就是掌握足够的字和词,掌握句子的构造和用法,掌握谋篇布局的道理和技能,这是语文教学的目的。那么,在语文课里,教学生读一篇一篇的文章的时候,目的是不是就仅仅在于要学生学会文章里的某些字和词,某些句子和谋篇布局的某些方法呢?

我想,教一篇文章的目的和整个语文教学的目的是统一的,又是有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

语文课本的课文有的是讲自然现象的,有的是讲地理、历史知识的,有的是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作品,有的是论述政治思想的议论文章。所有这一切,都是作为学习语文的材料,要学生从这些材料中学到读书、作文的能力的。语文教学的目的主要不在于教给学生有关自然的或者有关社会的知识,因为那是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历史那些学科的工作;语文教学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教给学生太多的文学理论知识或者文学创作技能,因为中学毕业生需要的是一般的读书、作文能力,就是阅读各种各类的书籍,写各种各类的文章的能力,而不是只要阅读文学书籍、必须创作文学作品的能力;语文教学的主要目的也不在于教给学生很多政治思想的知识或理论修养,因为那是政治课的工作。如果把介绍各种科学知识,训练文学修养,



解决政治思想问题等等，统统作为语文教学的主要目的，这个语文教学该怎样进行法？它哪里有这么大的能力？教学生掌握语文工具的目的又将如何实现？可是，又必须看到，凡是文章，总是记载知识、表达思想的。学生读什么样的文章就会从中吸取什么样的知识，受到什么样的思想感情的感染。因此，语文教学总是在向学生进行语文训练的同时产生一定的思想教育的作用。所以，语文教学就不能不注意这件事，就不能不运用这个向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非常方便而有效的阵地。古今中外，没有哪个时代、哪个阶级的语文教学不是带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点的阶级性的，《三字经》《千字文》在封建社会里只是启蒙的识字教材，封建主义的色彩就已经那么鲜明，至于再高一级的语文教学，就更不用说了。就连只是单字的堆积，并无任何思想内容的《百家姓》，宋朝人编的要用“赵”字打头，明朝的统治阶级就不容许这一点，把它改成用“朱”字打头的《千家姓》，而清朝的统治者既不许“赵”字打头，也不许“朱”字打头，要另外编一种新的“御制”《百家姓》。资产阶级的语文教学搞些什么名堂，更是大家所熟知的，这里就不去说它了。今天，我们的任务是要把学生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难道可以不重视、不占领语文教学这个思想阵地吗？当然是绝不可以的。然则，怎样重视、怎样占领呢？首要的问题在于让学生读些什么，也就是在于课本的选材。所以中学语文教学大纲里规定，语文课本要选“具有积极的思想内容”的文章，要选“有助于培养坚强的革命后代”的文章。同样重要的是教学。必须要求学生把这些文章透彻地读懂，一字一句地、整段整篇地都理解得确切，这样才能在学习语文的知识和技能的同时也领悟、进而吸取文章里那些积极有益的思想。语文教学里

的“文道统一”就表现在教材和教学这两个方面。因此,就整个的语文教学来说,还是不能不把教学生掌握语文工具这个目的明确地、突出地提出来。学生学不好字、词、句、篇,他就掌握不了语文工具,这样,他怎么能读懂有积极的思想内容的文章?读不懂那些文章,怎么能从文章里受到教育?

语文教学的目的既然如此,是不是教每篇文章的时候,只要把文章的一些生字、生词、成语、谋篇布局的方法抽出来讲一讲,让学生明白了、记住了就算教好这篇文章了呢?是不是这样教一篇一篇的文章,把初高中12册课本的文章都教完,就可以达到语文教学的目的了呢?我想,不是的。如果这样,那就可以不用语文课本,教学生读一本字典、一本成语词典、一本文章作法、或者再加上一本语法修辞书就行了。古往今来,没有这样的语文教学,我想,今后也不会有。

语言既是工具,要琢磨它在表达思想时的工具作用发挥得怎么样,就先得弄清它要表达的思想。就是说,教学生读一篇文章,必须把它作为一整篇文章让学生读懂。如果这篇文章是介绍某种知识的,要使学生充分理解这种知识;如果是讲某种道理的,要使学生透彻地懂得这种道理;如果是写人物的,要使学生真正认识这个人物。只有这样,学生才能确确实实地理解和掌握那些记述知识、阐释道理、描绘人物的字、词、句和谋篇布局的方法,他所学到的有关字、词、句、篇的知识才是活的、有用的知识,才具有把知识化为技能的条件。这就是前边说的必须在使用工具的现场里学习才能真正掌握工具的道理。不讲字、词、句、篇,不带着学生好好地读课文,把课文里的思想抽出来,用老师自己的话去讲,不行;不把课文作为一个整体,不启发学生好好地领略课文的思想内容,把课文里的字、词、句和谋



篇布局的方法抽出来 ,用老师自己的话去讲 ,也不行。

教一篇文章 ,必须让学生透彻理解全篇思想内容 ,并且从中得到思想上的教益 ,知识上的启迪 ,感情上的陶冶 ,不这样是不对的 ,可是办法必须是带领着学生好好地读这篇文章 ,一字、一词、一句、一段地都读懂 ,把文章的安排组织都搞清楚 ,让文章的本身去教育学生 ,教一篇文章 ,必须让学生从中学到有用的字、词、句和谋篇布局的方法 ,从而丰富他的语言知识 ,提高他的语言技能 ,不这样是不对的 ,可是办法必须是指导学生充分理解文章的内容——明了文章所讲的知识或道理 ,体会文章表达的思想感情 ,在这过程中学到一些字、词、句、篇的运用。这样 ,12 册课本教完 ,大概能达到语文教学教学生掌握语文工具的目的 ,同时也收到了思想教育的效果。不这样 ,学生也是不答应的。如果每教一篇文章 ,总是只讲大道理 ,只说些抽象笼统的话 ,学生感觉不到他的读书作文能力有什么长进 ,听来听去他会腻烦 ,他会用“思想开小差”来表示异议 ;反之 ,如果老是孤立地讲字义 ,讲词义 ,讲成语 ,讲句子结构 ,学生感觉不到从文章里得到某些启发教育的享受 ,听来听去他也要厌倦 ,也会用“思想开小差”来表示拒绝。总之 ,注意了思想内容而忽视或者降低了语文工具本身的重要性 ,其结果非但完成不了教学生掌握语文工具的目的 ,更将“事与愿违” ,连自己所重视的思想教育也会受到妨害 ;反之 ,把语言文字同文章的思想内容割裂开来 ,孤立地去搞字、词、句、篇 ,非但放弃了进行思想教育的很大的可能性 ,反而连自己所重视的掌握语文工具的目的也达不到 ,一句话 :文道统一 !

(1963 年 10 月)

有关语文教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近两年多以来,特别是1978年3月吕叔湘先生提出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以来,对于语文教学,社会各方面,当然首先是语文教育工作者非常重视。从那以后,就语文教学各方面的问题展开了广泛热烈的讨论,几乎可以说,讨论涉及到语文教学的每个方面,从教学的目的任务到教材、教法等等,都进行了相当充分的讨论。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大都进行了交流、探讨以至于辩论。经过这一次广泛深入的讨论,已经收到很多的成果。有些问题比较地明确了;有些问题虽然还不够明确,但问题之所在比较地清楚了。不少地方、不少学校、不少教师进行了各种试验,进行了调查研究,这对于语文教学的改进起了很好的作用。

现在,进一步讨论研究改进语文教学,似乎应该在过去这一段所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前进一步,提高一步。怎么前进,怎么提高,我没有很成熟的意见,只想到几个问题,提出来跟大家商量,向大家请教。

第一、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

要前进,不能不回顾一下过去,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以便更好地继续往前走。我所说的过去,既指近的去,也就是建国后的30年;也指比较远的过去,那就是从清末废科举、办学校到解放前的这一段;也指更远的过去,那就是两千年的封建



社会。

我认为,回顾过去,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对过去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认为过去的一切都好,无疵可指,可以拿来照用;或者认为过去的一切都非常坏,一无是处,这两种态度都是不适当的。咱们过去也有过这类的教训,吃过这样做的亏,大家都明白,不需要我多说。但是,现在是不是对过去的回顾已经足够地实事求是了呢,分析研究做得足够深入了呢?恐怕还不是。

比如,说到近的过去,建国后的30年。是不是30年来,我们的语文教学一点成绩都没有,一点可吸取的经验都没有,今天讲提高效率,讲科学化,是“白手起家”“平地起楼台”呢?我认为不是的。30年有不少的成就,积累了很多经验。倘若没有“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们的成就还要大得多,经验还要多得多。

姑且举几个例子说一说。像小学的识字问题,这是2000年来一直试图解决而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因为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字数多,要一个一个地学,笔画复杂,造字法不太容易掌握,所以小孩子在开始学习阶段困难很大,汉字成了进一步学习语文的障碍。前人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一些办法,积累了一些经验,但始终没有根本解决问题。30年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至少已有说得出的三种经验。一种是所谓集中识字法,就是说在小学开始阶段,让小学生比较短的时间里多认些字,以便进一步开展说话、阅读、写作训练。现在的集中识字法和历史上的“三百千”那种集中识字法是很有区别的。它运用了历史上的经验,又根据汉字的某些规律、学习的某些规律,使集中识字比较地科学了一些,不是像“三百千”那样不够科学地硬

集中。另一种经验叫做分散识字法,这与清末办学校以后的那种分散识字也有所不同,表现在所谓分散是有计划、有步骤的,而不是全然放任自流,碰见什么算什么的那种分散识字。第三种经验叫集中与分散相结合,或者叫做小集中,试图把集中识字和分散识字两方面的长处结合起来。识字问题不是个小问题,取得的这些经验是非常重要的,这是30年来的一项不可忽视的成就。虽然这些经验还不够完善,有待进一步实验研究。

又比如,我们现在一致认识到,在语文教学中忽视语言教育那一类的做法是不行的,完全不理睬语文教学所应该、所能够承担的其他任务也是不符合实际,不完全妥善的,虽然究竟怎么样把语言教育同其它方面的教育很好地结合起来还有待于探讨研究,但至少我们有了这个共同的认识。建立起这样一个认识不是很简单的事,应该看作是30年来在这个问题上经过了不少曲折反复之后取得的很可贵的经验。

再比如,我们在语文教学中进行过大幅度改革的试验——汉语、文学分科。尽管做法本身有缺点,同时由于试行的时间很短,今天难于作出全面的总结,然而它在某些方面对我们今天的教学还在起着作用,不少人把那次分科的做法作为研究今后改革语文教学、教材的参考。这也不能不说是30年中学语文教学的一件大事。

再往大处说一点,虽然不完全是语文教学问题,但与语文教学关系密切,就是推广普通话的工作。许多有远见的语文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从五四前后就发起了所谓国语运动,但是搞了30来年,取得的成效不大。而我们从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推广普通话,很快就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自然,由于当中有一段放松了这件事,特别是被“四人帮”干扰破坏了一通,现在



的情况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然而普通话在全国被接受为全民的共同语,在社会上流行相当广泛,在语文教学中成为教学的内容、要求之一,在社会生活中起了很大作用,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事。在这一点上,几乎可以说,我们走在现代世界先进国家的前边。不少国家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开始重视所谓标准语问题,而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方言十分复杂的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这项工作,并且取得了成就。

还有,我们国家的各兄弟民族既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字,又学习口头的和书面的汉语普通话,这更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这对于全国各民族的大团结,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起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在这个问题上,“四人帮”造成的破坏非常严重。然而,即使如此,像今天全国各民族的语文教学这样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发展,各民族语言这样广泛地交流,呈现出一片民族团结的景象,仍旧应当说是30年来一个重大成就。这项工作的基础是有了的,去年成立了全国性的民族院校汉语教学研究会,现在许多民族地区在加强本民族的语文教学和汉语语文教学方面,进行了研究以至于采取了措施,有的地区出版了刊物,这项工作正在蓬勃开展起来。

要举例还可以举一些。就从这几点上,我们应该看到,30年来,语文教学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在全国语文工作者和语文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有些时期是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奋斗下,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就,不看到这一点是不对的。

另一方面,30年来,在语文教学工作中,也确实有些值得记取的教训。例如,在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对于语文教学中的

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具体做法上都是不够恰当的。我始终认为,语文教学可能并且也应该重视思想教育。问题在于:什么叫思想教育,语文教学中应该和可以进行哪些思想教育,这种教育应当怎样进行,怎样和语文教学所必须完成的绝不能推脱的责任——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正确地结合起来。这些问题必须处理好,而在过去的30年之中,相当多的时候没有处理好。

再比如,语文教学工作和其它各科教学工作一样,有涉及到政治问题和政策问题的部分,而更多的是学术性问题。过去在不少时间里,没有把政治问题、政策问题和学术问题正确地分开,往往把属于学术性问题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当成了政治问题来对待。这种做法有时候影响了语文教学的实验工作,有时候甚至伤害了人,挫伤了不少人的积极性。

又比如,语文教学工作,也像其他各科教学工作一样,需要进行不断的研究、实验和改进。可是,语文教学中为数并不很多的带有试验性的做法,几乎都是只进行了极短的时间,在没有取得经验,还得出不了结论的情况下就被废止了。这使我们今天在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时遇到了困难。

如果再说到远一些或者更远的过去,我们的前人做过不少工作,取得过不少可贵的经验,但是由于那是旧时代,那些经验无疑具有或大或小的局限性。正确地分析那些经验和教训,取其可取,弃其当弃,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前若干年曾经有过、近两年似乎又来了一股风——仿佛过去的一切做法、包括像死记硬背等等,统统是好的,今天拿来照用就可以解决问题。这种态度同历史的虚无主义,也就是否定历史上的一切经验,同样是不可取的。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这里先简单提一下。



要研究进一步的改进,当然不能仅仅回顾过去,很重要的是要立足于现在,——立足于现在的实际,包括我们经济发展的实际,科学技术发展的实际,教材水平的实际,教师水平的实际,学生水平的实际,等等。脱离了这些实际,或者对这些实际的认识很模糊,就不可能找出切实有效的改进办法。离开历史的发展,脱离当前的实际,提出一些这样那样的设想,这种设想的用意也许很好,道理也许说得过去,然而往往会成为或者接近于美好的“空想”。要充分掌握实际,必须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

做教育工作的,立足于现在还不够。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能不着眼于未来。教育工作不像种庄稼,可以春种秋收,当年见效。教育工作是为未来培养人才的。而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了电子时代,发展变化之快,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在远古时代,几万年几千年不过进步那么一点,以后,几百年至少几十年才进步那么一点。现在可是大大不同了。我们有一句古老的成语,叫做“日新月异”。这个成语本来带有修辞上的所谓夸张手法的意味。今天,如果说它还有某些夸张成分的话,至少这个成分已经降低得很多很多了。没多少年以前,我们能够想像得出比如彩色电视机吗?我们能够想像得出人能够和机器对话吗?一只保险柜,不用钥匙,只要我对它说“开开”,它就开开了;我说“关上”,它就关上了。但是,它只听我的,你说它就不听。我在这里讲话,几千里以外,不仅可以听见,而且可以排出版来,印出来,几年以前我们能够想像吗?这些,由于我们目前科学技术落后,也许听起来还有些像科学幻想小说,然而这已不是小说,是现实了。我们做教育工作,不能不想到今天还坐在我们教室里的学生,至少说要三年五年之

后,或者十年八年之后,甚至十几二十年之后,才到社会上去起作用。他们将要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世界,什么样的科学技术情况呢?那时,对于他们,在语文方面会提出什么要求呢?具备什么样的语文能力才能应付那时的生活和工作需要呢?当然,存在决定意识,生活在今天的现实中,不可能准确地想像遥远的未来。然而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之后的情况,我们还不是不能想像的。如果连想都不去想,那将是很可悲的,将会对不起下一代。做教育工作的,不论是订计划,还是编教材,还是搞教学工作,脑子里不能没有个“未来”。如果眼睛只看见当前,只看见我们的周围——短暂的时间、狭小的天地,那是远远不够的。

我的粗浅的认识是,要进一步改进语文教学,应该正确地回顾过去,立足于现在,着眼于未来。

第二,关于知识和技能

语文课要培养语文技能,即听说读写的技能,并不仅仅是教学生知道一些关于语文的知识。知识不等于技能。这个理解我认为是正确的。大家都明白,我不多说了。

那么,技能和知识有没有关系呢?回答是肯定的。具备某种知识,只要我们对这些知识的多少、深浅以及提供这些知识的时机等等处理得当,对于培养技能并且加快培养技能是大有益处的。

再进一步说,知识与技能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简单的。有些知识一旦知道了,就可以立刻或者很快转化为技能,运用起来;有些知识就没有那么快,需要和其它有关的知识互相作用起来(比如数可以分成有理数、无理数,动植物可以分成若干部、门、纲、目、科、属、种,词可以分成动词、名词等若干类;在同



一次分类中要用同一个标准,这一类和那一类之间往往既有明确的区别又有某些交错的情况;每一次分类之后,还可以再往下分,从而形成若干不同等级的类等等。这些有关分类的知识,在学习者的头脑里互相作用,每一项知识就会变得更清晰,更活,更有用),并且与有关的实践互相作用起来,经过相当一段时间才能逐步转化为技能,从不熟练到比较熟练,到很熟练;有些知识甚至于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见不出与技能发生什么直接联系,知识就是知识。然而这种知识是必要的,具备不具备这种知识对人的头脑影响很大。我在别处曾经举过一个例子,这里不妨再重复一遍。当年哥白尼指出,地球围绕太阳转,不是太阳围绕地球转,这在当时不仅仅是一种知识吗?它能和什么技能联系起来呢?然而,为了这种知识的建立,当时坚持真理的科学家牺牲过生命;当时的教会为扼杀这种知识不惜烧死人。这个事实本身就告诉我们知识的重要性,否则,何需乎为了这么一种知识进行那么残酷的斗争呢?一个人有没有、相信不相信这种知识,表明这个人头脑中科学的因素和迷信的因素在数量上和力量上的对比。就两个人来说,有没有、相信不相信这种知识,表明这两个人的脑袋相差了几个世纪。能说这样的知识是无用的吗?因此,过分简单地要求学到一些知识必须立即化为技能,否则这些知识就是不需要的,这种理解是有片面性的。现在,据我所知,否定语文知识,片面强调技能,把知识和技能分割开来甚至对立起来之风好像又盛行起来了。时至今日,仍旧有不少人请出曹雪芹来,说曹雪芹没有学过语法、修辞、逻辑,能写出不仅内容上而且语言上也那么好的小说,从而否定语言知识的必要性。这实在已经不再有说服力了。因为,照这样推论下去,根据我们古代工匠建造起来那么

精美的建筑物 ,再加上大学土建系毕业生也未必能设计出赵州桥或虎丘塔这些事实 ,可以得出结论说 ,应当取消现代的建筑学 ;根据李时珍写出了《本草纲目》,而医学院药学系毕业生未必能写出一部中国药典这些事实 ,可以得出结论说 ,应当取消今天医学院的药学系 ,应当取消药理学。大家能接受这样的逻辑推理吗?忽视我们的祖先凭着他们在艰苦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所取得的惊人成就 ,认为我们处处不如人 ,人家样样都比我们强 ,这是数典忘祖 ,自暴自弃。然而吃我们祖先的这些老本 ,请他们出来否定现代科学的必要性 ,显然也是不对的。轻视甚至否定语文知识的作用是片面的。造成这种认识的原因 ,也许是由于我们的语言科学还幼稚 ,不完备 ,没能解决实际问题 ,因而引起了一种近于“因噎废食”的想法 ;也许是积习很深 ,一时扭转不过来 ;也许是未经深思。倘若不是这几种情况 ,那么 ,这反映了一种怎样的思想状态 ,是应当认真思考一下的。

在哪一个教学阶段应该教哪些知识 ,这些知识应该怎样教法 ,这种种问题我们研究得很不够 ,还说不清楚。应该看到 ,这是语文教学不能更快改进 ,不能现代化、科学化的一个原因。我们要努力地做到这一点 ,把知识和技能的关系处理好 ,这是研究改进语文教学的重要课题之一。

第三 关于理论和实践

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脱离实践的理论 ,或者没有理论指导的盲目的实践 ,都是不可取的。回顾过去 ,我们为理论而理论 ,脱离实践 ,这样的情况有过 ,我们应该引以为殷鉴 ,决不能重复。然而 ,忽视理论 ,特别是在语文教学之中 ,认为学语文、教语文没有什么理论可言 ,说就是了 ,读就是了 ,写就是了 ,这种



时候恐怕是更多一些。大家知道,近一二十年或者二三十年以来,在世界上不少国家里,已经出了几种影响很大,并且实践也证明有相当效果的教学论。大家知道,所谓“应用语言学”,在世界许多国家是新起的、深受重视的一门“边缘科学”,而应用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语言教育之学。相当系统的、有些新内容的教学论和应用语言学,在咱们这里,几乎还是一个空白。甚至连布鲁诺、皮亚杰、赞可夫等几个人的名字,咱们大多数人也才知道了不久,而人家的研究、实验已经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了。直到今天,如果谈几条语文教学的带理论性、原则性的经验或者做法,我们能够举出几条呢?还是得请我们的祖先来:“书读百遍(或千遍),其义自见”,“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为文有三多”,“熟读精思”,“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多读多写”,等等。除了我们祖先留下的这几条之外,我们自己拿得出多少新的理论呢?这些条都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经验,实践也曾经证明,这些确实是有效果的。但是,到今天还仅仅拿出这几条,来对付四个现代化对咱们教学工作提出的要求,够吗?我们现在的小学生、中学生,有那么多时间把一篇文章读百遍、千遍吗?我们的学生读书也要“破万卷”,但是,仅仅是唐宋八大家,仅仅是唐诗、宋词、元曲吗?不是,他们要读的书多了,要做的事情多了。“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骑在驴背上,想起一句诗,赶紧记下投进口袋里,诸如此类,作为轶事来讲,鼓励学生们勤于思考,都是很好的材料。但是就凭这些来从事今天的语文教学,使它以快速的步伐赶上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迫切要求,行吗?远远不够了。我们的任务应该是:对于现状取得充分的了解,对于过去作出恰当的分析研究,对于别人的经验、做法进行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判断,

经过讨论、研究、实验 ,形成我们自己的 ,适合我们国家 ,适合我们中国的学生学习自己的语文的整套的或者不止一套两套的理论 ,用实践来检验这些理论 ,找出对我国最适用、最有效的途径来。

第四 ,关于智力发展与学习成绩

过去曾经有过这样的说法 :“ 分、分、分 ,学生的命根。”那是当做笑话来说的 ,是讽刺性的。不幸 ,在今天 ,实际情况比那个笑话有过之而无不及。实际上 ,分数不仅在某种情况下并不足以反映学生的学习成绩 ,更重要的是 ,分数在不少情形下 ,不足以反映一个学生的智力水平。我举唱歌、唱戏做例子。两个人分别独唱一支歌 ,一般人听起来 ,觉得甲唱得好 ,乙不如甲。可是内行的人有时却认为乙大有培养前途 ,而甲不过如此而已 ,前途有限。唱戏也是这样。什么缘故呢 ?就是乙虽然在这次唱的时候表现不够好 ,或者反映出他所受的训练还不够 ,但是他有这方面的素质 ,有这方面的能力 ,他的前进潜力很大。而甲仅仅是模拟别人的唱法 ,刻板地唱出来 ,他不能利用自己的智力来发展他唱的能力。我们现在总是满足于学生能够对付我出的题目 ,能够背诵我教给他的知识 ,如果他没有做到 ,他就“ 不及格 ”。我丝毫没有否定测验、考试的作用的意思 ,也决不完全否定分数能一定程度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成绩和智力。但是如果只注意到分数 ,从教学工作来说 ,恐怕是很不够的。在语文教学中 ,这个问题相当突出 ,两个学生同样写了别字 ,扣同样多的分 ,其实 ,这个别字和另一个别字反映的实质并不完全相同。两个学生同样念错一个字 ,反映的实质也不完全一样。一个学生知道带草字头的字都与花草有关 ,带木字旁的字都与树木有关 ,带禾字旁的字都与农业或农作物有关。他根据



这种知识来推断一些字的字义,有时会推错了;而另一个学生根本不会运用这种知识去推断新接触的字,或者只是由于没记住老师怎么教的而写错、念错了。这两个孩子的智力没有区别吗?只要根据他们写了或者念了同样的错字,就扣同样多的分数吗?我们常常说作文不好评分。为什么不好评分呢?原因是阅卷者的好恶不同,标准要求不同。但是这个标准里边没有包含从学生作文中看他的智力这个因素,也就是看他的头脑这个因素。假如把这个因素加进去,并且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而把个人好恶这个因素尽量降低,作文的评分实际上不应该那么难。我在一个地方举过一个例子:孔融小的时候去看他的一个长辈,在座的还有另外一个老头。谈了几句之后,他去拜访的那个长辈夸奖他善于对答,讲话很有条理。另外一个老头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孔融立刻回答了一句:“想公小时,必定了了。”这当然只是一个传说故事,还可能夹杂着吹嘘孔融聪明的意思。咱们不从别的角度考虑,只就智力这一点看,孔融小时候头脑是敏捷的,他会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逻辑辩论方法,他的智力是高的。如果写这个故事的人是为孔融吹嘘,这个人懂得点什叫做智力。我们很需要从这一类故事中得到一些启发:要训练孩子什么,鼓励孩子什么,要求孩子什么。假如说,一个人思想品质如何,知识能力如何,他的家庭、社会、生活经历等等各方面对此产生影响的因素很多,因而一生的变化也很多,那么,就智力发展这一点来说,儿童时期、小学教育时期所起的作用,那可就大得多了。如果从小用刻板的、僵死的方式把小孩的头脑填得满满的,只要求他死记、死背一些东西,不让他那种虽然幼稚,但是富有生机的思维能力、想像能力去充分发展,使他的心智从小受到戕害,正如把一只小

鸟关在笼子里,不让它飞,只喂它良好的食物一样,这样一段时间下来,它的肌肉要萎缩,机能要退化,再把它放出笼子去,它飞不动了。对少年、青年怎么教,怎么要求,怎么测验,怎么考试,是一门大学问。只为了考好分,能升级,能升学,而不重视培养、发展他们的智力,这是短视的做法,是对教育的前途、对下一代的成长极端不利的。语文教学中需要认真研究这个问题。

上面说的四点是互相有联系的,总的一个意思是:在我们今天已有的可喜的基础上,研究语文教学的改进问题需要深入一步,提高一步。反反复复谈了多次的那些老问题,什么“文道关系”、“精讲多练”等等,不是说不需要继续考虑,继续讨论,而是说,只在那个水平上,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转来转去,在一些字面上下工夫,不够了。我所提的几点,仅仅是我自己听了许多同志的讲话,看了许多老师的教学,并在许多老师的经验交流的启发之下想到的。我只是作为问题提出来。如果的确还是几个值得考虑的问题,答案要靠大家提出来。提这样几个问题,一则供进一步研究语文教学问题时参考,再则向关心语文教学的同志们请教。

(1980年3月)



关于语文教学改革的问题

我得首先声明 ,我今天谈有关语文教学改革问题 ,是和高考指挥棒无关的。在座谈会上 ,不少语文教师都提到高考指挥棒的问题 ,还提出种种不同的看法和意见。高考指挥棒很厉害 ,一直影响到高中、初中、小学的各科教学。我不赞成围绕着这根指挥棒团团转。因为 ,第一 ,办教育不是为了考试 ;第二 ,高考的方式内容年年变动 ,要跟要追也无济于事。我们应当端正教育思想 ,按教育规律来进行教学。叶圣陶先生曾经发表《我呼吁》,他不赞成片面追求升学率。语文教学和其他各个学科一样 ,要改革也得首先从明确教育思想入手。教育是上层建筑 ,它的目的、内容、教法都受社会性的制约。换句话说 ,教材教法是一定社会制度的社会需要和思想方法的反映。因此 ,我今天着重谈两个方面的问题 : (一)教学改革要从明确教育思想入手 ; (二)有关语文教学的几个具体问题。

一、教学改革要从明确教育思想入手

谈到教育思想 ,不妨回顾一下人们走过的历程。

在欧洲来说 ,他们也经历过封建社会 ,虽然时间比我国短 ,但封建等级观念、封建思想意识在有些方面比我国封建社会还来得严重。我国刘邦、朱元璋是平民出身的 ,也可以做皇帝 ,欧洲国家就不行。我国古时对孔夫子的学说 ,有过各种不同的解

释,在欧洲,《圣经》教义是不能妄加解释的,违背了当然更不行。哥白尼、伽利略等人的学说,就曾受到宗教的打击。那时候,即所谓“中世纪”,他们的教育自然是封建主义的、经院式的。不过,欧洲经历封建社会的时间比我国短得多,他们很快就进入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时期,并逐步转入资本主义社会,强调个性解放、自由竞争。教育方面,也开始重视研究教育对象——学生的问题。洛克、夸美纽斯、卢梭、孟德斯鸠等,许多教育人才辈出,他们的一些主张在维新运动前后也陆续影响到中国。接着又产生了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杜威的教育思想以及另一完全不同的支派凯洛夫的教育思想才受到了冲击。这就是我们近来时常说的布鲁诺、皮亚杰、赞可夫、苏霍姆林斯基等人的新起的教育思想,这些都和今天科学技术越来越发展、知识结构越来越复杂有关。

我国经历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在世界上是少见的。鸦片战争以后,又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封建思想意识在我国是根深蒂固的。我国文化教育当然有不少精华,但不能讳言,糟粕的东西也大量存在。在教育领域来说,也有先进和落后的两种思想。孔子的教育思想和学说,也有合理的部分,例如他提倡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举一反三,因材施教等,今天也值得借鉴。特别是他说过:“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见《中庸》)有一定科学性,相当高明。蔡元培当北京大学校长时,就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作为校训。唐代韩愈也说过:“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见《师说》)这个见解也可取。然而,这些好的见解、好的思想在历代教育中并不占



主导的地位,落后的、糟粕的东西,却反而占了主导的地位,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是师生关系被纳入封建伦理范畴,学生始终是处于被管教的地位。“天地君亲师”就是一种封建思想意识的代表。

第二是埋头死读书、读死书。孔子还设立礼、乐、射、御、书、数,后来连乐、射、御也都不要了,念书人的身体健康很差。韩愈曾说:“吾年甫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见《祭十二郎文》)那时的知识分子一到中年就老气横秋,身体衰弱得不成样子了。

第三是到了封建社会中期以下,因为开科取士,教育方面出现了为考试而教,为考试而学,教育沦为科举考试的附庸。学写八股文,只是为了应试,此外毫无用处,就是读些古文,也不过是为了寻章摘句,目的还是为了考试。

第四,长期以来的教学方法就是一个“灌”字,不管懂不懂硬给灌下去,要学生背下来。学生只是个听者,受者,完全没有主动学习的余地。一直到民国以后,小学课本第一篇还是这样写着:“新书一本,先生讲,学生听。”

从上述几个方面来考察,可见我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教育基本上是继承了封建主义教育的糟粕部分。今天的片面追求升学率或者是为高考而教,当然和历史上人们追求考取人、考进士不同,然而一切为了考,这一点是一样的。德智体发展不均衡,教学中以灌为主。今与古有这么多相似之处,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在我们的社会上没有肃清,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那么,它在教育思想中能够完全没有反映吗?当我谈到教育思想的时候,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再思、三思。

建国以后,我们又照抄苏联的一套。凯洛夫的教育学,也有一些可取的东西,但是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就是绝对化,“一刀切”的东西多了一些。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我们的教育要有一个根本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解放以来,广大教育工作者一直从事艰苦工作,坚守岗位,经过不少探索、实验、改革,取得不少成绩。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还要继续努力,这就是“坚持两分法,更上一层楼”。

我们的教育方针就是要培养千千万万的革命接班人。这一点,既不同于西方国家,也不同于封建时代。教育工作的各个部门,教学的各个学科都要朝着让学生在德、智、体几方面得到全面发展而努力。我们要给学生系统的、必要的知识,但还要引导学生去发挥自己的潜在能力,去积累更多的知识。所谓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从高中到大学,这是表明从一个成熟阶段进入另一个起步的阶段。教学是一个整体,各个学科都要尽最大的努力,各个部门都要互相配合。以错别字为例,各科都要重视,不能只靠语文科来包。以体育卫生来说,只有体育老师重视还不行,各科教师也得重视。说到重理轻文,或者是重文轻理,都不对。数理化的思维逻辑的训练,对作文有关系,语文水平提高,对学习理科也有帮助。各科要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教育、教学工作要多一点辩证法,不要搞绝对化、片面性。我们要多一点求实精神,少一点形式主义。

二、有关语文教学的几个问题

语文教学牵涉到的问题很多,这里我只谈三个具体问题。

第一是口语训练问题。先秦时代,人们很重视学口语。孔子设四科,其一就是“言语科”。他说:“不学诗,无以言。”孟子



也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他就曾和许行作过辩论。庄子与惠施也经常辩论，有过不少故事。晏子使楚，唐雎不辱使命，也显示出非凡的口才。孔融在少年时，就能对答如流，难倒对方。诸葛亮舌战群儒，是《三国演义》里有名的故事。封建中期以后，就越来越不重视口语训练，一味十年寒窗写八股文了。人们反而用孔子说过的“刚毅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矣仁”来作为辩护。其实孔子这两句话是指人的品质而言，并没有反对语言的学习。

“言为心声”。语言是一个人的思维表达，也反映了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日本教育目标中有一个项目，就是要求学生有当众表达自己意见的勇气。说和写，似乎是两回事，但基本上是一致的。能说不能写，能写不能说，这些情况是有的，但毕竟是少数，而且是个缺陷。能说又能写，这不是更好吗？

说的能力，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比写还困难。因为写可以起稿，可以多想，可以构思，可以修改。说话就缺乏这些条件，说出来就得比较准确。俗语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表明说话的重要。处于现代化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更频繁，通讯设备越来越发达，用说话办事的机会就更多，因此语文教学要重视口语的训练。在这里附带说说推广普通话，这也十分重要。我们的新宪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一个国家要有一种统一的标准语言，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公民要懂得普通话。这是国家文化教育发达程度的标志之一。爱家乡，爱家乡的山山水水，也爱家乡的语言，这是美德；爱家乡和爱祖国是相通的。然而拒绝普通话，歧视外乡人，却是落后的表现了。讲普通话不是天生的，而是要学习和锻炼的。讲得不好怎么办？不要紧。我认为，只要敢于“张口讲”，

就给六十分。敢讲、多讲,就会进步。

第二是阅读问题。世界各国的教育,一般都重视阅读能力的培养。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顾炎武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都阐明多读的重要。要提高学生的阅读分析能力,要有一定的阅读量才行。有些中学教师反映,认为现行语文课本选入课文太多了。如果从阅读量来说,是不算多的。现在很多国家都出版大量读物给青少年儿童看,连封面、纸张、印刷都很讲究。我们对学生的估计不宜过低。凯洛夫有量力性的原则,赞可夫有高难度的原则,把两者对立统一起来就全面了。阅读也要照顾到学生的量力性,但也要对他们的接受能力估计高一点。上海育才中学的经验,是从抓教育思想入手,又创造出“读读、议议、讲讲、练练”的教学方法,是取得了效果的。我曾经去听课,学生在议议时确实能够开动脑筋,很多问题都由自己解决。我在贵阳看过两所中学,有一所中学的实验班搞得不错,我问他们是不是学育才中学的,他们说不是。可见经验、办法是人创造出来的。

第三是写作问题。重要的问题是首先解决为什么要学写作。答复是“需要”。如果是为作文而作文,那是不对的,不行的。因此,学习写作一定要学用得着的东西,管用的东西。

写作有两大类,一类是应用性的(广义的,并不是指所谓“应用文”),一类是文学性的。第一类是人人都要学、都要用的,但目前的作文教学却十分忽视。文学性的文章不是人人都需要写的,但是文学素养,就是对文学的理解能力、欣赏能力、鉴别能力,是人人需要的。药品的说明书,有很多写得不通顺、不明了,有的写得言过其实,让人不敢相信。有一次我去看病,医生在诊断书上写着:“(1)好转期;(2)继续药物治疗;(3)一



个月后复查。”只有三句话 ,十来个字 ,就写得明确 ,解决问题。我赞成中学生学习写作 ,首先要管用 ,文学写作可以学一点。“假、大、空”的文风要不得 ,老八股、洋八股、、党八股、帮八股都要反对。培养学生写作 ,不一定篇篇都是长篇大论 ,写一段也可以嘛。需要训练什么就写什么 ,要实际 ,要有用。

(本文是著者 1983 年 4 月 25 日在广州市向中学语文教师作的《关于语文教学改革的问题》报告的摘要。)

关于改革语文课程、语文教材、 语文教学的一些初步设想

三、需要先明确几个问题

传统的积弊既深且厚,一直影响到今天。为了适应今天和今后的社会需要,语文教学必须进行大幅度的改革。要改革语文教学,必须从这门课的课程结构入手。只有课程结构合理了,才谈得到教材和教学的改革,因为教材和教学都是受课程结构制约的。

研究课程结构,必须把高等教育前这一阶段的语文教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从学前教育直到中等教育结束,包括普通中等教育和中等职业(专业)教育在内,不能一段一段的分段治理,既不瞻前也不顾后。此外,还得横向的考虑到语文课与其他课程的关系,不能孤立起来只管自己,既不左顾也不右盼。“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研究任何一门学科的课程结构都应如此,作为基础课程的语文学科更不能例外。

在探讨语文学科的课程结构之前,需要先明确几个问题。

1. 下一代需要什么样的语文能力

学校里设置语文课,目的是为了培养下一代,使他们在成年之后具备生活和工作在语文方面对他们提出的要求,也就是说,使他们具备生活和工作所需要的足够的语文能力。是什么



样的语文能力呢？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现代化的一个核心内容是科学化。一切方面都要科学化。语文教学要科学化，运用语言文字也要科学化。语言文字和科学的发展，和新的技术革命，首先是信息技术革命，发生了直接的联系；人们已经能够在千万里之外用自然的口头语言进行交际，处理工作，已经部分的能够用自然语言指挥机器，用自然语言对电子计算机发出指令已经不是遥远的事情；人类知识的增长越来越快，信息的传播越来越多，加上出版技术的迅速改进，相应的，各类书籍报刊的出版也将越来越快，越来越多，使人目不暇接，“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已经不是夸张说法了；无论传声技术、信息技术发展多么快，口头语言始终不可能取书面语言而代之，相反，对书面语言能力和效率的要求将会越来越高。在这里我们不妨想一下“面向未来”这个问题。如果说，太远的未来是怎么个样子我们没有能力预见预想的话，那么20世纪末、21世纪初，也就是距今15至20年的这个近未来，我们多少是能够预见预想一些的。只用一个标志来说吧：那时候第五代电子计算机肯定会出世了，而第五代计算机的特点之一就是自然语言而非程序语言来指挥，就是在我们这个国家，电子计算机肯定会成为工农业生产部门、管理部门的日用工具了，甚至会进入不少人的日常生活领域了。生活、工作，一切活动的节奏都很快，一切都要求高速度、高效率。今天进小学一年级的学生，那时候正好大学毕业；今天进初中一年级的孩子，那时候已接近30岁；今天进高中一年级的青年，那时候正是30岁出头，成为各项事业的生力军和骨干力量了。他们，这些大学毕业生，30岁上下的社会中坚，将需要什么样的语文能力呢？

他们普遍需要的将是如历史上描写智力超常的“才子”们那种“出口成章”的能力,因为他们要用自然的口头语言处理工作,指挥机器干活,那种“一目十行,过目成诵”的阅读能力,因为他们需要读的东西太多了,那种“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写作能力,因为他们的时间很珍贵,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写出他们生活和工作中需要写的东西。那时候社会上还需要有“低吟长啸”的诗人,“斟酌词句,反复推敲”的作家,或“婉约”或“豪放”或“典雅”或“诙谐”的语言大师,人们还需要文学。不过,处理生活和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的敏捷准确的高效率的口头和书面语言能力,将成为每个人的需要。能用尽可能经济的语言材料传递尽可能多的信息,达到尽可能高的准确性和可理解性,收到尽可能强的表达效果,将被认为是写作的高手。

多少个世纪以来,地球上的各部落,各民族,各国家是在既互相竞争(以至争斗)又互相学习之中走过来,走到今天的。没有互相竞争,人类不会有今天的文明,没有互相学习,人类更不会有今天的文明。科学使得地球越变越小了,各民族、各国家的人们接触越来越多了,锁国主义成为历史陈迹了,既互相竞争又互相学习这种有趣的关系越来越发展了。下一代必须成为一个个了解世界的国际性的人,既有跟人家竞争的能力,又有向人家学习的能力。无论竞争或学习,语文都是不可少的工具,掌握运用语文的能力越高,竞争、学习的能力越强。从这个意义上说,单单掌握母语是不够的,还需要会些外语(当然,母语是基础)。

以上是对下一代需要什么样的语文能力的一个粗线条的描述。今天考虑语文教学,考虑语文的课程结构,不能不从这个摆在面前或者就要摆在面前的需要出发。教育的周期是长



的,是为未来服务的。搞教学工作不能不往前看。当然不能脱离今天的实际,但是脑子里不能没有个未来——未来的生活,未来的社会,未来的世界,未来的需要。无论如何,有一条是肯定无疑的:今天的和十几二十年后的年轻人所需要的语文能力和当年的秀才们、举人们、进士们、状元们所需要的语文能力大大不同了!这是我们探讨语文教学改革的时候必须时刻在念的!时至20世纪80年代,这句话似乎不需要说甚至不该再说了,然而又不能不说,因为传统实在太深厚了,举人、进士们和“迁客骚人”们的幽灵依旧不时地出现,在我们的周围游荡着,影响着我们的精神,甚至左右我们的思考。

2. 在语文学科内,知识和实践的关系应当是怎样的

在古代(不是说很古,只是说在19世纪末废科举兴新学之前,至多再往前推个把世纪,推到所谓“西学东渐”之前),各行各业的人,无论是种田的,作工的,驾车的,行船的,开矿的,炼铁的,行医的,画画儿的,唱戏的,作诗为文的,等等,能力都是主要凭经验获得的,即使拜师受业,也主要是从旁看着,学师傅的样儿,模仿,揣摩,体会,亦步亦趋,师傅耳提面命,稍加指点,然后由徒弟自己去摸索,实践。就凭着那套办法,各行各业都出了不少人才,有的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只是,速度慢,效率低,出人才出成就的数量少。到了现代,情况大大改变了。

儿童从生活里接触了“数”这个东西,时常要用。“家里有3口人”,“喂了10只鸡,死了两只,剩下8只了”,“过节包饺子,每人20个,3口人得60个”,如此等等。在这样一些实践的基础上,一入学就有了一门课,开始教给孩子们有关“数”的系统的

知识 加、减、乘、除、整数、小数、分数、乘方、开方、比例、正比、反比等等,都够抽象的啊!孩子们学着并不多么难,因为多多少少有过些实践的基础,并且一边学着一边继续实践,算距离,算面积,算体积,算重量,算速度,等等,随即和别的学科结合起来,知识越学越多,实践的方面越来越广,能力越来越高,循环往复,不断前进。别的学科莫不如此。且不说物理、化学、植物、动物那些学科。就连画画儿,在孩子们从生活中东看看西看看,涂涂抹抹的实践基础上,很快就教给他们静物写生,什么光线、亮度、阴影、远近、大小、透视等等基本知识,于是慢慢知道了怎样就有了立体感,画出个苹果来不再是平面的了,怎样就有了质感,不再都是光溜溜的了。唱歌、体操,也不例外。总之,方方面面都在遵循着一个路子:从知其然不知所以然的盲目实践取得一点感性知识,取得一些经验,在此基础上,通过适当途径,经过努力,达到理性知识,以之指导实践,提高实践的自觉性、准确性和质量水平,然后再认识,再实践,不断前进,不断提高。

唯独语文教育,走的不是这样一条道路。幼儿从两周岁左右口头语言就能听能说,并且相当完整了。经过四五年,没有一天不听许多话,说许多话,有了大量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备了充分的感性知识,比对数理化生哪样的实践都多,感性知识都多,可是进了小学,进了中学,始终不向孩子们提供系统的语言知识,始终走着模仿、体会、摸索的道路,直到中学毕业,怎么说,怎么读,怎么写,还是全凭经验办事,说不出个所以然。这是为什么呢?是语言这个客观事物没有规律可言,没有系统的知识可讲,还是它的规律太玄,不好认识,关于它的知识太难,无法学习?恐怕都不是,而是前边说的传统忽视知识教



育的积弊在作怪。前边说过,连画画儿、唱歌儿那些艺术活动都有规律和知识可讲,讲了就有指导实践的作用嘛,为什么独独语言不行?实在需要从传统加于我们的忽视以至否定语言知识这个桎梏中解脱解脱了!要加紧研究有关说话、读书、写文章的科学的知识系统,科学地把教学这些知识和指导运用这些知识与听说读写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如果说,我们对这些知识研究得还不透彻,教学知识还不得法,那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否定知识,认为提高语文能力根本不需要科学知识,甚至根本就没有科学知识可言,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对于提高下一代所需要的语文能力是不利的,应当彻底改变。

3. 要不要学文学

任何人都不能没有一点文学生活(连盲人也听音乐,听评书,聋子也要看戏)。从教育的角度说,文学教育的意义,大家多半是有所认识的。例如,好的文学作品能够陶冶人的性情,潜移默化,培养美好的情操,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这都是大家常说的,也都相信的。其实还不止这些。如果说,人们的思维活动大体上可以区分为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话,那么,文学,无论创作或欣赏,主要是诉之于形象思维的,需要联想力或想像力,需要一种源于生活实际而又超脱于生活现实的创造性的思维能力(事实上,决不是只有文学家才有,才需要这种能力,政治家、科学家同样有,同样需要,正像文学家也不能不进行逻辑思维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教育对于儿童和青少年的智力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似乎不止一位思想家和教育家说过这样的话:“很难说,莎士比亚和牛顿谁需要的想像力更多一些。”的确,莎士比亚塑造那些人物形象固然需要丰富的想像力,难道牛顿没有足够的想像力就能够发

现万有引力吗？切不可认为学数学只需要逻辑思维。“0”，“ ”，等等，许多数学观念是十分抽象、要求活跃的想像力才能理解的。人们已经在研究最高倍数的望远镜也看不到的宏观世界，最高倍数的显微镜也看不到的微观世界，没有足够的推理与想像高度结合的能力行吗？优秀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让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读得入迷（这类故事很多很多），绝不是这些“家”们向文学作品寻求消遣，而是文学作品里那些活跃的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因素，跟这些“家”们的头脑息息相通。从教育的角度考虑，文学教育的意义和作用太重大了。

传统的语文教学严重忽视真正意义的文学教育这种积弊同样一直影响到现在。目前的语文教材里有比例很不小的文学作品，但并不是用来进行文学教育，而是用来进行“读写训练”的，连古典文学作品也不例外。这样的语文教学、语文教材，实际上是一种互相掣肘，两败俱伤的做法。它既没有能力培养上文说的现在和未来的年轻一代所需要的那种说话、读书、写作的能力，因为它用的大部分材料是文学的，包括相当比例古典的，又不讲现代的科学语言知识，内容制约着方法，只能还是传统的那种低效率的摸索前进的路子，它也没有能力进行真正意义的文学教育，因为交给它的任务是培养“读写能力”，“不能把语文课教成文学课！”

应当向儿童、少年、青年进行文学教育。并不要求人人，也不要求很多人成为文学作家，但是应当要求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能理解文学，欣赏文学，具有文学的鉴别能力，接受优秀文学作品在道德情操方面以及敏锐深入地观察社会生活的能力和丰富活跃的想像能力方面的感染、熏陶和启迪，也就是说，具备



必要的文学素养。

文学教育的任务和前边说的那种语文教育的任务,能够“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谐和地结合在一起吗?当“语文能力”和“文学素养”这两个概念都比较的朦胧、模糊的时候,结合是可能的,甚至是很容易的;当时代的进展、教育的方向使它们越来越明朗、确切的时候,结合的困难恐怕就越来越大了。

4. 怎样处理我国语文教学中两个特有的问题——汉字问题和文言文问题

我在多处多次讲过(口头上讲,书面上写),汉字这种文字体系有它的优越性,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是不能废除,也废除不了的,因此必须教,必须教好(现在很不够好)。既在多处有文字的东西发表,这里就不再重复论证了。但是仅从教育的角度讲(撇开信息处理和国际文化交流那些问题不谈),初学阶段难,是一个不可小视的大问题。所谓“初学阶段”,我指的是学会1000字以内。在这个阶段内,认识不易,理解记忆不易,书写更是十分困难,所以教学进度很慢。1000是个约数,不是绝对数。把界线定在这里的一个重要理由是,用1000个左右的字所能组成的书面语言还是极简单的,极贫乏的,和五六周岁或六七周岁的儿童的口头语言能力差距很大。这种简单贫乏的书面语言所能提供的内容,远远低于儿童的口语能力、思维能力和求知愿望,远远不能满足儿童的需要。这对儿童的早期教育是极为不利的。而另一方面,汉字在学习上的有利因素,至少要到学会1000个字以上才能逐步发挥出来,真正学会、学好2000多个字,有利因素才会充分的得到发挥。这2000字以内,特别是1000字以内的这个初学阶段怎么办,是若干世纪以来,直到今天,所有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殚思竭虑寻求解决办法

的一个“老大难”问题。

1984年11月,我和一位年轻同志齐林在北京的一所小学和上海的两所小学作过一次测试。测试有两三项内容,这里只说主要的一项。我们从小学四年级用的“地理常识”课本中选出一课《首都北京》,从四年级“自然常识”课本中选出一课《水》,用汉语拼音写出来,拿给小学一年级和二年的孩子们读(他们学过汉语拼音,但是没学过按词连写,所以我们也是按字拼音的)。给他们一刻钟左右的时间准备,然后指定学生读,他们都能读出来,只是流利程度有差别。然后提出问题要他们回答,都能答出来,并且很有兴趣,很活跃,表明他们读懂了,理解了,而且喜欢读。(测试是完全在“突然袭击”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只先打招呼说,要到学校去,没说去干什么。到了学校之后才说明来意,把测试材料拿出来,请学校领导指定一个班,把任课老师请来,说明测试办法,并且就请任课教师去做,像平日做个小练习一样。这三所小学,只有一所是进行类似黑龙江“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的。另外两所,一所是重点小学,一所是非重点小学,都是按常规进行教学,没做任何特殊实验)作为抽样调查,抽样太少,测试方法也过于简单,记录更不详细,所以不足据以得出什么有力的结论。不过,至少提出了一个问题:目前的小学教育是不是把二年级的孩子能理解、能接受而且有兴趣的东西推迟了两年左右才教呢?如果的确有所推迟,是什么原因?是应当推迟,还是对孩子的能力估计不准?还是由于文字障碍?上边说过,我们不能根据这么一次测试得出什么结论。不过,联系一向所了解的有关情况,我们越发相信,汉字初学阶段的问题必须解决,能够解决,大有解决的余地。



必须在学龄初期从汉字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让孩子们接受更好的早期教育,更快地成长,同时又必须把汉字学好。处理、解决这个矛盾是语文教学改革义不容辞的责任,并且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

关于文言文,近来《中学语文教学》月刊上展开了辩论。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这么个大问题,不论证清楚就那么朦朦胧胧、率由旧章地搞下去,实在不是办法。

我个人的意见是:文言文是客观存在,并且是大量的,是还有用处的遗产,不能抛掉,下一代不能全不接触,全不读。但是,必须把教学文言文的目的,也就是我们指望文言文为我们的下一代解决什么问题,它能够解决什么问题,进一步搞清楚。这里同样要看到今天,想到未来。文言文的处理,要有更合理的办法。关于这个问题,留在下一部分再谈。

四、一个初步设想的粗线条的轮廓

以上一、二两部分(编者未编进文集)对以往的语文教学,包括封建社会中后期以后的传统语文教学和废除科举、八股,兴办新学堂以后的现代语文教学,作了一个粗略的回顾,试图找出成效一直不大的积弊所在。三、四两部分打算试着在一、二的基础上向前看一看,探求一下改革之道。为此,前一期的三,先谈了谈进行改革必须先明确的几个问题,这一期的四,也就是全文的最后一部分,“图穷匕首见”,“丑媳妇终于要见公婆”,不得不把一个极不成熟的、非常粗糙的设想“端出来”,交付“审阅鉴定”了。肯定不会“及格”的。不过,只要多少引起点注意,在春意盎然的池水中吹起小小的几圈皱纹,招来一些指谬正误的批评,我也将引为荣幸。特别因为我近年又重新分

管外语方面的工作,同时在两所学校兼教点研究课,交了这份卷子之后,相当时间之内无暇参与语文教学方面的事了。这份东西就算我学习语文教学二年级(1979至今)的期末考卷吧。以后等什么时候如果又进了三年级再说。

1. 要统筹规划

从基础教育阶段开始——幼儿教育,到小学教育,初中教育,再到普通高中教育和职业高中教育阶段,语文教学的全程应当统筹规划,有计划地一步紧接着一步地往前走。小学不知道幼儿园干了些什么,初中不知道小学干了些什么,高中不知道初中干了些什么;反过来说,幼儿园不知道小学要干什么,要求幼儿园做好什么准备,小学不知道初中要干什么,要求小学做好什么准备,初中不知道高中要干什么,要求初中做好什么准备。这种“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情况是不能许可的。同时,横向的关系也在统筹兼顾的范围之内。随便举例来说,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开始学平面几何了,那是运用推理、论证等逻辑思维形式最集中的一门课。几何课的开始无疑对语文课的某些方面有重要的助益,同时几何课也需要语文课给予配合。开始学植物学的形态分类无疑与语文课里学习语法之类的知识有许多共同处,配合得好可以收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功效。至于语文课与外语课,语文课与历史课等等,需要和可能沟通,更加明显,无庸论述。“邻居高打墙”,关起门来各干各的,决非好办法。各科知识互相渗透、互相作用,不仅仅是科学知识高级阶段的事,基础阶段就是如此,就教育工作而论,就应当统筹全局,采取合理有益的措施。

各个不同教学阶段的语文教学工作的规划要打通,同一教学阶段的各科教学工作的规划要打通。各种方式的分工是必



要的,而多方面的协作是更加需要的。教育、教学都是有机的整体,纵横割裂成互不相干的许多小块块,不好。统筹规划主要是教育,教学领导部门的事,是课程、教材、教学研究、设计者的事。不过,作为任何一个教学阶段的任何一门课程的教师,也需要具备这样的了解,并且努力使自己具备上下左右都能打通考虑所必需的准备。

本文是谈语文教学的。不过,笔者认为,打破“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风气,做到上下左右统筹规划,是教育教学改革应当包括的重要内容之一。所以先把以上这个意思说了说,下边再集中谈语文。

2. 关于幼儿语言训练

幼教阶段,语言训练可以说是中心环节。不仅是语言本身的训练,连思维训练、知识教育、思想教育,都在其中。可以有专设的语言训练课,也可以同时还把语言训练和唱游课结合起来,寓语言训练于游戏之中。语言训练要与幼儿的思维能力相适应,同时又要通过语言训练来发展他的思维能力。例如,对幼儿来说,时间概念比空间概念难理解,难建立。“门后边”,“门外边”好懂;“昨天”,“明天”难些,“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孩子似乎能够理解,能够想像,虽然他想到的“很远”还不够远,他更不会有“无限远”这个概念,但是“很久很久以前”,幼儿就很难理解,很难想像。抽象事物的概念不一定都难,实体事物的概念不一定都易。简单的类推、归纳、演绎这些思维形式,不大的幼儿就会使用(虽然有时候发生错误),他们同样运用这些思维形式学习语言,语言训练又会掉转头来提高他们正确使用这些思维形式的能力。心理语言学的知识对于进行幼儿语言训练是非常有用的。语言是人类知识结构中最低的,也

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层次,中层和高层都是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在智力发展的过程中,语言同样是最基本的工具和媒介,语言发展和智力发展的关系,在越低的教学阶段,关系越密切,在幼教阶段几乎是不可分的。似乎不必忙于教幼儿识字。教幼儿识些字并不十分困难。多花点力量,教他们多识些也是办得到的。然而,当他们所识的字和他们的语言还联系不起来的时候,和他们的生活知识还联系不起来的时候,并且也只能识还不能写的时候,用处是不大的。而识字要用相当多的时间、精力,势必分散对语言训练的注意,挤掉相当大的一部分进行语言训练的时间,其结果是于思维能力、智力的发展不利。用分散对语言训练的注意、挤掉一部分语言训练的时间为代价来换取识一批字这用处不大的成果,恐怕是得不偿失的。在识字的当时以及其后的一两年、两三年内,很可能看到早识字的“可喜”的成果,可是,如果进行更长、更细致一点的“跟踪考察”,得不偿失的后果也许会更明显的反映出来。(这里一直说的是汉字,如果适时的学学汉语拼音,那不在这里所谈的范围之内。)

从1979年以来,我跑过不少地方,每到一处,但凡时间许可,总要访问一两所幼儿园,主要了解幼儿的语言活动和语言训练情况。在我家里以及左邻右舍,也常常留意幼儿的语言活动。就这样得到一鳞半爪的纯感性的印象,没有一点实践经验,更没有一点研究。凭这点感性接触,粗浅地认识到幼儿语言训练的极大的重要性。同时也感到,对幼儿语言训练问题,从理论到实际措施的设计、方案,如果不能说是个空白,至少可以说是个相当薄弱的环节。在这个问题上,从工作上讲,教育领导部门的忽视要负主要责任。从学术上讲,语言学界也有责



任。本来,幼儿语言训练问题涉及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几个方面,需要大家通力合作,协同研究。近些年来,教育工作者、心理学工作者,还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也进行了一些研究,虽然人不多,做得还不够,而语言学界则绝少有人过问这个“算不上学术研究”的“小儿科”。

本文既谈语文教学改革的,就不得不大声疾呼:加强幼儿语言训练的研究并采取实际措施,这是改革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我提不出具体方案,因为我缺少研究。前边说过,在今后相当时间内,我将不再过问语文教学的事。作为语言学工作者,我将在时间精力许可的限度内,从语言学(主要是心理语言学)的角度做一点学习研究工作,希望能间接地为幼儿语言研究多少尽点力,不知能否如愿。

3. “分进合击”的小学语文教学实验方案及其他

关于小学语文教学的改革,我有过一个设想的实验方案,在多处讲过,也写过,有兴趣的同志请参看收在拙著《语文教学论集》(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今年秋季将出修订版)里的《需要加紧开展语文教学研究工作》(原载《语文学习丛刊》第二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77年版^①)和《普通话与语文教学》(原载1980年《第五次全国推广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文件汇编》)。这里不再重复详讲,只扼要说说轮廓,补充说一点那些文章里没说到的问题。

设想的实验方案的基本意图是两条:第一,要让学龄儿童

^① 标题上“分进合击”四个字,是吕叔湘先生在本文的《后记》中为我设想的方案取的名称。他表示,这个方案可以试一试,说它是一种“分进合击”的办法。

受到与他们的实际语言能力相当的,与他们的思维能力、智力水平以及求知愿望相适应的语文教育,不能落后于以上各项能力、水平和愿望太远,从而大大削弱早期教育。否则,不仅降低了儿童的学习兴趣,而且严重压抑、妨害了儿童智力的成长和发展。第二,要使儿童从初学汉字的困难中解脱出来,不让它成为语文教育以及其他各科教育及时前进的障碍,同时又要要把汉字学好,学够数,学扎实,写好。

办法是,小学语文课(课仍是一门)分三条线先后开始,分头前进,最后合拢。第一条线:从入学开始就利用汉语拼音提供与上述各项能力、水平、愿望相当的阅读材料(不再是从三几个字到十几个字、几十个字那种内容十分贫乏,远远落后于儿童实际的课文)。用这样的材料进行有计划的语言训练,阅读训练,写作训练。这条线从一年级上学期开始,直到四年级结束,贯彻始终。第二条线:从第二学期开始,进行识字教学,完全按照汉字的识字规律独立进行,不与第一条线结合。过早的结合,结果是互相制约,互相牵制,一起放慢速度,降低质量——为了迁就字不够用,只能提供短、浅、内容贫乏的课文;为了迁就课文内容的需要,学字不能按识字的规律进行。不去勉强“结合”,两条线却会自然地逐渐靠近,合拢,终至会合——识了若干字,其中有一些必然会与第一条线的材料中某些词重合,稍加指点就代进去了,识字日渐增多,重合的也愈多,于是自然而然地日渐靠拢、会合,谁也没有牵制谁,两不相伤。稍晚于第二条线开辟第三条线:写字教学。它不去理会第二条线,完全按照写字的规律进行,先练基本笔画点、横、撇、捺等,然后是简单的单体字,较复杂的单体字,简单的合体字,繁杂的合体字。同理,三、二两条线如果过早“结合”,也要互相



制约,互相牵制,不去勉强“结合”,反而会自然地逐渐靠近,合拢,终至会合,谁也不干涉谁,两不相伤(古人教识“赵、钱、孙、李”,教写“上大人,孔乙己”的办法,大体上就是这种道理)。这样到了四年级,三条线总会师(三条线“分进”,实际上是包围“合击”),那时,阅读水平、写作水平、总的语言水平达到了多么高的高度,是不难想像的(大致可达相当于目前正常的初中一年级的程度),而字,识得够用了,并且写好了,肯定比现在大多数小学毕业生写得好,因为是按照写字的规律,扎扎实实,一步一步的练出来的。

需要设计一种比传统的毛笔制作、使用都简便,又比铅笔更适合书写汉字的特点的书写工具(现在使用炭精墨水的那种笔已经接近于这种需要,稍加改进即可)。根据书写汉字的特点和新的书写工具的特点,设计出一整套写字训练的程序。(古人先教中楷,后教大楷、小楷,从描红入手,然后影写,用“米字格”纸仿写等,是使用毛笔的很合理的程序,可在那个基础上加以改进,革新。)

必须说明,如果小学语文教学在很少数学校试行这个实验方案,那么,语文以外各学科,如算术、音乐、美术、自然常识等等,要同步前进。这样,儿童唱歌就不必再硬记歌词,而是用汉语拼音读熟歌词,算术的应用题、自然常识等等都可以用汉语拼音提前到与儿童智力发展相适应的学期或年级,不必再为语文课所牵制,慢步前进了。前边第三部分介绍过我与齐林同志在北京、上海两处进行的测试,初步证实,上述同步前进是可行的。这样同步进行的结果,小学用四年可以基本完成基础教育前段的任务。

小学仍用5年,最后一年全面整理,巩固,提高。小学毕业

的质量水平将比现在高得多。

还需要说明 :小学一年级阅读材料的起点应当与幼教语言训练的成果相衔接。由于以往幼教极不普及 ,对幼教语言训练缺少研究 ,现在对小学一年级(6 周岁至 7 周岁)儿童的实际语言能力还只能是根据经验估计的 ,提不出经过科学实验分析所得的一个比较精确的、有幅度的、足为依据的标准。这正是我们亟待进行的一个科研课题。

4. 从初中起 ,增设“文学”课

首先要指出 ,是“增设” ,不是如 20 世纪 50 年代试行过的“文学”“汉语”分科 ,“语文”课还是语文课。

文学教育的重要性 ,前文第三部分论述过 ,不再重复。文学教育从小学就要通过语文课并且与音乐课、美术课配合进行 ,但还不需要单设文学课。语言文字教育直到小学毕业是基本的。

初中一年级开始增设的文学课 ,任务是指导学生阅读丰富的、优秀的文学作品 ,获得必要的文学知识 ,培养和提高文学素养 ,同时寓思想教育于其中 ,培养远大的理想抱负 ,高尚的趣味情操 ,并寓智力开发的目标于其中 ,培养活跃的逻辑思维能力 and 联想、想像等思维能力以至创造思维的能力。

文学阅读的量要相对的大一些 ,课内课外相结合。比如 ,一部《西游记》 ,课内介绍介绍这部小说 ,讲它一两回 ,其余让学生课外自由阅读 ,到适当时候可以组织集体述评、讨论、评议的文学欣赏活动。

阅读的范围要广 ,古今中外的主要的优秀作品都要适当涉猎。

这里要说到文言文。历来选入语文教材的文言文 ,绝大多



数是文学作品或者是取其具有文学性而入选的其他作品。《桃花源记》《醉翁亭记》《滕王阁序》《岳阳楼记》等等是不折不扣的文艺散文。我国古代从来是“文史不分”的，《史记》《汉书》《三国志》等的“列传”以及一些战争记述等都富有形象性，长于塑造人物形象。介绍哪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是历史课的特定任务，不是语文课的特定任务，语文教材用《鸿门宴》《赤壁之战》等作为课文是取其文学性而入选的，从历史教学的角度考虑，鸿门宴这个插曲也许并不是很必要的历史知识。《答司马谏议书》是所谓“应用文”的一种——书信。然而选入语文教材并不是用它教给学生怎样写信，当然也不是用它来介绍“变法”之争，表示我们赞成王安石而反对司马光。选用王安石批驳司马光的信，只是由于王安石的信写得富有很强的感染力，“拗相公”的形象跃然纸上。《活板》不是科学论文或科普文章，它本来就是从《梦溪笔谈》这部“笔记小说”里选出来的。所有上述几类课文，用来解决前文第三部分所说的今天和今后青年们普遍需要的语文能力，它们的用处是不大的，甚至是无能为力的，然而作为文学作品，却都是我们文化遗产中的瑰宝，青年们应当读，应当读得比语文教材中现在已经大大增加了的分量还要多些。至于诗、词、戏曲、早期白话小说，其为文学作品更不待言，也需要读得多一些。就凭现在所谓占语文课文40%的文言文（包括诗）就要培养阅读浅近文言文的能力，接受我国辉煌的文化遗产，说句不大好听的话，多少有点“花小钱，说大话”的味道。这些应当统统编入增设的“文学”课教材中，并适当增加。

文学课的任务如上述。不要再加给它什么“培养读书能力”之类的任务。文学课的任务是进行文学教育、不是进行听

说读写训练的。把这两种任务并列,只能使这门课两不像,两不沾,两败俱伤。写到什么“大纲”、“规定”之类里很容易,看着好像也挺顺眼,但是实际上只是说说而已,做不到。这类只供“阅读欣赏”的“文章”最好少作。

至于说,读了不少好的文学作品,于提高读写能力有助益,那是不在话下的。多读些好的文学作品,是以开阔思路,活跃思想,丰富蓄积的语言材料,接触多样的、高明的运用语言的方式和技巧,当然于读写有益。但是,不要当作一个特定任务交给它。一交,这助益反而会降低。事物往往有诸如此类的辩证关系。其实,读数、理、化教材,读史、地教材,连学习外语,何尝于提高读写能力没有助益?不把提高读写能力作为任务交给这些课程,大家是从来没有异议的。各科之间要有横向的统筹规划,前边着重谈过。笔者不仅不否认,而且主张重视各学科之间互相渗透,互相作用的关系。然而这与规定各学科的特定任务是两回事,不可混为一谈。各自的任务要明确,不可模模糊糊,相互之间的关系要心中有数,不可绝对的“自扫门前雪”。

5. 按照知识与实践的合理关系组织语文课

语文课的任务是培养前文第三部分提出的下一代所需要的语文能力,简言之,即“处理生活和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的敏捷准确的高效率的口头和书面语言能力。”

根据以上两点,提出这样一个设想:经过了幼教和小学的语言训练和语文教学,12岁左右的孩子们对语言已经具备了丰富的感性知识和足够的实践活动,进入初中之后,应当并且完全可以像其他各门学科一样,以系统的理性知识为先导,并以知识系统为序,组织全部语文课。这样就可以打破若干世纪



以来语文教学不科学、无定序、目标不明的杂乱无章的状态,使之有个章法。这章法是面向实际应用的,以科学知识为系统的,循序渐进最终切实完成本门学科所负担的任务的。

需要明确三点。

第一,不能把语文课搞成一门纯粹的知识课,而是以知识为先导以实践为主体并以实践能力的培养为依归的课。

第二,这里说的知识系统是指实际应用语言的知识系统,而不是纯粹的语言理论的知识系统。这一点需要稍稍加以申说。语言理论的知识系统是从小到大的:语素—词—词组—句子—句组—篇章,而实际应用语言却恰恰相反,是从大到小再回到整体的。例如,读一篇文章,是先通读全篇,得其大要,再逐段分解细读,然后揣摩推敲一些特别重要的、突出的,用法、提法新颖的词句,最后再通篇领略一番。绝对不会拿起一篇文章就一个语素一个语素的,一个词一个词的抠起来,接着再抠句子,一句一句的作语法分析,然后才念一段,马上又把这一段分析一番,如此等等,没有人这样读文章。构思一篇讲话或者为一篇文章打腹稿,也是从大到小然后再回过头来考虑考虑全篇。语文教学的知识系统既是实际应用语言的知识系统,就应当是从大到小再回到整体的这种系统。

第三,这里说的实践是把听、说、读、写融会在一起的,丰富多样的,面向实际应用、密切结合生活、学习、工作实际的,因而是生动的,饶有兴趣的,而不是指呆读死记以及无对象、无目的,搜索枯肠,硬“做”文章等等那类“实践”。

以上述各点为基础,得出如下的设想。

把基础教育的初中阶段和普通高中阶段联系起来考虑,可能是6年或者7年(依学制而定)。把这6年或7年划分为4

个大的段落 ,每个段落一年半左右 ,用 I、II、III、IV 表示。每个大段落划分为三个小段落 ,每个小段落大致是一个学期左右 ,分别用(一)(二)(三) ,〔一〕〔二〕〔三〕 ,〔1〕〔2〕〔3〕 ,〔1〕〔2〕〔3〕表示。全部课程的组织安排如下 :

I —(一)讲授篇章知识 ,包括主题、思路、条理、层次、前后照应、首尾一贯等等这些有关篇章的比较系统的知识。主要从积极方面讲应当如何 ,也从消极方面讲要避免什么。讲授知识要举实例 ,结合实际。实例既有口头的 ,也有书面的 ,书面的之中也要包括演讲词、辩护词等等。实例可举典范的、知名的 ,也可举一般的以至学生自己的。教师讲授为主 ,穿插学生的讨论、评议。

I —(二)(三)篇章实习 ,包括听、说、读、写四种活动。例如 ,教师朗读一篇文章 ,或者作一篇有准备的讲话 ,或者请别科教师或校外的人来作一次半小时左右的演讲 ,要求学生记下要点 ,然后要学生复述所记的要点 ,提交给全班讨论、评议。在班内举行课外读书(以文章为主 ,不以整本书为主)的口头汇报。就班上发生的、校内外发生的或报纸上报道的重要事件 ,要学生作有准备的演讲或无准备的即席讲话 ,举行辩论会。教师就班上或校内某事件命题 ,要求学生拟出叙述性或评论性的作文提纲。写结合实际的 ,有对象有目的的作文。——方式可以很多 ,例如教师节写信给本班某老师 ,写信给班主任建议本班举行什么活动 ,就社会上的某种风气或个别事件写文章给报社发表意见 ,等等。

对所有这些实习活动 ,着眼点主要都在篇章 ,在整体 ,至于遣词造句等 ,不属于重点要求。

II —〔一〕讲授段的知识 ,包括 :段在篇章中的地位 ,段的



形成和要求,如统一性、完整性、逻辑性等。顺序可考虑以说明性段落领先,因为这种段是最基本、最集中、最典型的。一般地说,一个说明性段落就是一篇文章的具体而微,它要有个中心意思,要用发挥这个中心意思的各种手段,如描摹、举例、比较、列举数据、引用有权威性的论断或评议,等等,要有结论。其次是记叙、描写性的段落,又其次是论证性段落。

讲授段的知识时要把 I 的篇章知识拉过来,从篇章中提出段来讲,避免总是孤立地讲段。

II—〔二〕〔三〕段的实习

〔一〕的知识讲授应注意之点以及实习方式等,可参照 I 的讲授和实习要领来设计,不具列。

III—(1)词组和句子的知识

—(2)(3)词组和句子实习

要把 II 的知识拉过来,甚至把 I 也拉过来一些,要在段中讲词组和句子,避免孤立讲授、实习,流于枯燥,并且脱离实际应用。

其余参照 I、II 的要领处理,不具列。

IV—〔1〕词和语义,语体和风格的知识

—〔2〕〔3〕实习

〔1〕可考虑延长一些,〔2〕〔3〕适当压缩一些。到了词和语义,已经细致入微了,知识的难度和实习的要求都比前三部分提高了。这时就可飞跃一步,提到语体、风格上来,再回到整体了。到了这一步,听、说、读、写的实际能力已经具备了进入高等教育所应具备的完整的基础,同时也具备了关于语言的系统知识。所有的知识都落实到实践中,而实践是在知识的先导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的。

从幼教到高中毕业,语文教学如果能这样一步一步进行下来,其成效可能会有比较显著的变化。

职业高中是十分重要的一翼,语文教学有其特点,但是职业教育还在新的成长之中,经验很少而情况相当复杂,本文没有来得及考虑这个侧面。这是个不得已的缺陷,留待他日另行探讨。

(本文选自张志公先生 1984 年 7 月间在课程教材研究所召开的语文教学改革座谈会上的讲话。这里选录的是该文中纪录的三、四部分。原载《课程·教材·教法》1985 年第 3、5 期。)



汉语文教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前 言

1. 这篇论文的意图在于回顾汉语文教学过去和现在一些主要做法的得失利弊。

2. 这里所谓“过去”,指的是20世纪20年代五四运动之后,当时的国民政府公布《新学制课程标准》之后,直至1949年那段时间。“现在”指的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期间的不正常情况不考虑在内。

3. 对过去和现在汉语文教学情况的概述和评价,对今后前进中应当着重考虑的问题和应当重视的趋向,完全是本文作者个人的观点,不反映任何政府部门、任何学校、任何学术团体的意见。在那些地方,可能有人完全或者部分同意我的观点,也可能有人很不同意或者不完全同意我的观点。

4. 谈汉语文教学本来应当包括国内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文,也就是国内的双语教学问题,以及外国人学习汉语文,也就是把汉语文作为外国语文的教学问题。但是限于篇幅,本文不涉及这两个方面。

一、20 世纪 20 年代之后

1. 19 世纪末,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开办新式学堂。办新学堂,从学制到课程设置,以至各级各科教材,大都是从东西方几个国家引进的。只有“国文”(即汉语文课)教材无法从别的国家引进。因而这门课从内容到教学方法可以说是率由旧章,只不过形式上变一变,教材编成一本一本的,每个学期一本,每本里边分成若干课,如此而已。真正有所改革,是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的事。

2. 20 世纪 20 年代之后,进行了哪些改革。

①五四运动提倡白话文,提倡“国语”(即现在说的“普通话”,在台湾仍称“国语”,推行的成绩很好,香港不少人也习惯于称为国语),发起国语运动。经过了相当时间的努力,终于取得胜利,白话文合法化了;与此同时,教育界人士认为小学语文教科书应当以白话文为主,因为这才符合儿童的语言实际。此后,国民政府公布《新学制课程标准》,规定小学改称“国语”(中学仍称“国文”,以文言文为主)。虽然当时的白话文也还只是比较接近实际口头语言的一种新的书面语言,但毕竟不是与实际口头语言完全脱节的文言了。虽然在全部普通教育阶段(小学至中学毕业)学生仍旧是以读文言文、写文言文为主,但是毕竟可以读一部分白话文,至少小学阶段可以写白话文了。打破以往从启蒙开始一直完全读文言、写文言的状况,这不能不说是一项重要的改革。

②1898 年马建忠发表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著作《马氏文通》,他的意图是作为教材使用,给传统的语文教学注入一点科学因素,以提高教学效率,但是他的尝试没有成功,就是



几年后全面废除科举考试和八股文,开办新学堂之后,也没有把语法教学纳入国文课之内。直到1924年黎锦熙发表《新著国语文法》,才陆续有了一些学校在国文课之内照黎氏著作多少讲一点语法。另外,与此先后,唐钺发表了《修辞格》,张弓发表了《修辞学讲义》,到30年代,陈望道发表了《修辞学发凡》,陆续有少数学校也教一点修辞学知识。还有,叶圣陶(当时用名叶绍钧)、夏丏尊等发表了《文章例话》《文心》等著作,讲作文的知识,有些学校也教一些。虽然并不普遍,教的也不多,大都不成系统,但是,毕竟打破了国文课内完全不教有关语文的科学知识那种局面。

③汉字注音是一个困难问题。传统的办法有两种,一是用甲字注乙字,一般叫作“直音”或“读若”。这种办法当然不准确。另一种稍后起的是“反切”,这种办法比较麻烦,有时候也并不准确。到了近代,逐渐有人设计各种不同系统的字母,但是都没能通行。20世纪20年代之后,随着国语运动的进展,陆续产生了两种比较科学的注音办法,一种是“注音符号”,在一段时期内曾被广泛采用(目前台湾仍在使用),另一种是“国语罗马字”,没有通行(但是在美国有一些教汉语文的一直在使用它。最近了解到,台湾教育行政部门公布了经过修订的国语罗马字——修订的主要点是不再用字母表示声调,而改用注音符号的那四种符号,也就是汉语拼音方案所用的四种符号标调,把它作为国语注音第二式,与第一式——即注音符号——同样合法使用。本文作者赞赏这个决定)。为教汉语文而采用一种新的注音工具,也应当看作一项很有意义的改革。

④从19世纪末叶开始,直到20世纪初、中叶,逐渐有些人把欧洲,后来加上美国的教育学、心理学的若干不同流派的学

说引进我国 ,首先是通过翻译某些重要论著 ,然后在有的高等师范学校开设课程 ,还有少数学者进行了一些专题研究 ,其中有的与汉语文教学有直接关系 ,例如陈鹤琴研究幼儿教育 ,第一个作出了基本常用汉字的统计 ,艾伟研究识字心理学 ,等等。这些侧重理论的探讨研究 ,尽管所起的实质性作用并不大 ,但是对于传统的汉语文教学或多或少是有所冲击的。

3. 积弊未除。

传统的汉语文教学实行了若干世纪 ,积累了不少好的经验。作者曾经就此进行过一些探索、整理和研究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写了一本小书《传统语文教育初探》。当时由于种种原因 ,对那些经验研究得不够深透 ,还计划做进一步的工作 ,对那本小书进行增订补充。传统经验是历史存在 ,不容否认 ,并且其中有些部分对于我们今天和今后的工作仍旧很有参考价值。

然而 ,毋庸讳言 ,实行了若干世纪的以封建主义为基础的汉语文教学 ,必然也会有不少弊端 ,正因为时间久 ,传统深 ,那些弊端逐步形成了相当固执的难以动摇的力量 ,甚至使人们习焉而不察 ,视为理所当然 ,于是代代相传 ,积累得越来越厚 ,成为一种“积弊”。

20 世纪 20 年代之后虽然有了如上所说的几项重要改革 ,对传统语文教学有所冲击 ,但是改革的时间不长 ,范围不广 ,冲击的力量不大。传统的积弊依然存在 ,并未消除 ,至少 ,改变是微乎其微的。

①传统的积弊 ,最突出的是只重书面 ,严重忽视语言实际。一个客观原因是 ,汉字是一种独特的文字系统 ,学习运用 ,尤其是在初学阶段 ,困难相当大 ,因而人们在语文教学中首先把注



意力集中在识字、写字上,从而投入很大的力气去突破这个难关。社会的原因是,政府提倡熟读古代经典,并且以文取士。于是,全部语文教学的内容就是识字,写字,读古文,写古文。人们没有感觉到学习当代实际语言和训练口头语言能力有什么必要性;没有觉察到口头语言能力和书面语言能力之间有什么重要的联系;没有体会到有目的有计划的口头语言活动对于活跃学习生活,形成孩子们的性格,发展孩子们的智力有什么重要意义。其结果是,古文未必学通,因为它与实际的活的语言没有联系,从而也就与实际生活甚少联系,而运用实际语言,特别是口头上运用的能力很差,元明清几代的早期白话作品的语言大量不通,可以证明。

②另一项突出的积弊是严重忽视应用实际。教给学生读的是古圣先贤的经典和历史的各家名著,要求学生写的是模仿前人的用字造语、布局谋篇等并不切合当世当代实际应用的文章,以至写完全程式化的,没有实际内容的,毫无实用意义,只备参加科举考试用的八股文。其结果是,语文教学和生活、工作、科学技术研究完全脱节,或至少在极大程度上脱了节。

③再一项突出的积弊是严重忽视语文知识的教学。我国本来有历史很久的,很发达的文字、训诂之学和声韵之学,但是在语文教学之中并不教给学生这些知识,也极少运用这些知识去处理文字教学和文章教学,尤其是稍后起的已经比较接近近代语言科学的声韵之学更被视为一种艰深奥秘的东西,不教给学生(事实上多数教师也不懂),至多,只有习诗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了解一下韵部,知道某字属某部而已。

④还有一项也应归之为积弊的是相当严重地忽视文学教育。我国本来有历史悠久,内容十分丰富,数量很大的文学遗

产(其中自然也有比较薄弱的方面),但是在语文教学之中完全不予重视,诗,已经不属于语文教学的正当内容(只有在启蒙教育阶段,为了便于背诵,教儿童读很少量的短诗),习诗者大都是自学的或者另行单独拜师学习的,不是在语文教学中作为正常课业学来的。至于戏曲、小说则完全视为邪门歪道的东西,不仅不教,甚至禁止孩子们阅读。属于教学内容的名家名篇中有不少是文艺散文性质的,然而并不把这些作为文学作品来教,而是作为文章范例,供背诵模仿之用。

4. 20 世纪 20 年代之后,上述各项传统积弊不能说丝毫未受触动,然而由于传统力量强大,触动很小。识字加作文章就是语文教学,这个观念牢固的植根于人们的思想中和语文教学的实践之中。

二、1949 年以来

1.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即将满 35 年,其中 1966 至 1976 经历了一场十年动乱,除去这十年,只有 25 年是正常工作时间,而这当中,1966 年之前也已有某些失误,1976 年之后不免有一段恢复时间,所以完全正常工作的时间实际上是很有限的。在这很有限的时间里,汉语文教学有了相当可观的发展和改革,尤其是进行了一些很有意义的探索、研究和实验,并且目前正在更加积极的进行中。

2. 1949 年以来,汉语文教学有过哪些进展、变革和实验。

①学校里汉文学科的名称问题,看起来不是什么大事,却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人们对这门学科的观点和认识。前边说过,最初称“国文”,以后小学称“国语”,中学称“国文”。1949 年之后,小学、中学一律都称“语文”。“语文”的“文”指



什么,人们有不同的理解,但“语”是“语言”,这一点,大家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意味着,在全部普通教育阶段都应当进行语言教育,这个观点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了。在那么悠久的以文为主的传统语文教学之后,经历了几十年的往复激荡,终于建立起来语言教育这个观念,这是十分值得重视的。尽管在做法上还有不少问题(下文将会谈到),单说建立起这个认识的本身,已足可以认为是一件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

②1949年之前,中学仍以读文言为主。在绝大多数学校,作文必须写文言;中学以上所有的考试,作文必须用文言。1949年之后,中学虽然还读一些文言,但是退居次要地位了。作文,都用白话,不要求写文言了;中学以上的所有考试,作文也不要求写文言了(在社会上,政府公文,报纸期刊,文件文献,科学论著,统统使用白话,不用文言了)。这个变化的意义,也是十分值得重视的。

③20世纪50年代中期,经过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反复研究、讨论,最后由政府公布了简化汉字方案,汉语拼音方案,并且决定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通话。这些决定立即实施,在短短的三几年时间内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语文教学不仅实施了这些决定,并且成为推广实施这些决定的首要阵地,起了很好的作用。

④也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进行了一次变革相当大的实验,把中学的语文科分为文学和汉语两科,分别编出文学和汉语两套教科书。初中文学教科书以中国近代现代文学为主,加入少量外国文学作品的现代汉语译文,按照文学体裁编排;高中前两年是中国文学,按照文学史的顺序由古至今编排,第三年是外国文学。汉语课只在初中开设,教科书按照语音、文

字、词汇、语法、修辞的知识系统编排。1954 年作出决定 ,随即着手准备 ,1955 年在少数学校试教 ,1956 年在全国所有中学推行。但是实验进行了不到两年就废止了 ,停用了两种教科书 ,恢复了语文课 ,重新编写了初中和高中的语文教科书。由于实验是半途而废 ,一直总结不出那次实验的得失利弊。但是 ,毕竟实验是以失败的面目而告终的 ,因而产生了两种十分明显的副作用。一是比以前更加不谈文学教育了 ,一是比以前更加不谈系统的语言知识教育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近两年来 ,作者个人逐渐认识到那次实验真正的缺失所在。

⑤20 世纪 60 年代初 ,有几处学校参考传统教学的经验 ,试行在小学前两年进行集中识字教学 ,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其中比较突出的是辽宁省黑山县的北关小学和北京的景山学校。他们都能够小学一、二年级 ,不影响其他功课的正常进行 ,不加重孩子们的学习负担 ,使孩子们学会 2500 个以上的字 ,为小学后期开展大量阅读和作文训练打好基础。他们的这种实验 ,和本文作者当时探索传统经验 ,提倡集中识字有关 ,尤其是景山学校 ,曾为此聘请作者担任该校顾问。他们这两所学校至今仍在实行集中识字的做法 ,另外还有些学校也在实行近似的做法。当然 ,并不是所有学校 ,所有研究这个问题的教师和学者都赞同集中识字教学法 ,有的甚至很不赞成。

⑥从 1982 年开始 ,东北黑龙江省在三个县市的共六所小学中(每所小学用两个班)进行一种称为“注音识字 ,提前读写”的实验。试行两年的成绩表明 ,效果是良好的 ,小学二年级的孩子们的阅读量大大超过了非实验班的同龄学生 ,作文的能力也远远超过了他们。有些报纸期刊报道了他们实验的情况和取得的成绩。现在 ,上海、广州等地已经有学校开始参照



他们的经验进行实验或者准备进行实验。这种实验的特点在于充分利用汉语拼音来推动识字和读写,以提高效率,加快进度。这是“注音识字,提前读写”与“集中识字”两种实验的主要区别。本文作者和这种实验也有关系,是以吕叔湘先生为首的实验小组的成员之一。

⑦1979年以来,随着各项事业的发展,在汉语文教学领域,研究实验之风大盛,有关的学术团体纷纷建立,前不久还设立了专门机构“课程教材研究所”,工作范围当然包括对汉语文教学的研究。探索、研究、实验,涉及汉语教学的各方面,尤其是阅读教学和作文教学,研究成果更多。口头语言训练开始受到部分教师的重视。有些人在探讨如何把教学论几种新的流派的理论有选择地运用于汉语文教学。如何分担开发学生智力的任务也被很多语文教师纳入自己探索研究的范围之内。汉语文教学正在朝着提高效率的现代化、科学化的方向前进。

3. 传统教学积弊的影响尚在,有待进一步研究改革之道。对于语文教学,人们还是习惯地把更大的注意力放在字和文章两件事情上。不是说字和文章不需要重视,绝对不是。重视读和写的能力的培养是完全必要的。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出版物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多到使人目不暇接,必须具备更科学更快捷的阅读能力才能应付。自然语言永远不能取代书面语言。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必须会写。无论通讯技术和信息技术多么发达,也很难想像人类可以回到没有文字,没有书籍文献的原始生活中去。然而让字和文章过多地减弱了对语言实际和应用实际的重视是不可取的。现代通讯技术以至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对于人们运用自然语言的能力的

要求越来越高,“讷讷不能言”已经决不再是应当提倡的美德,而是急需克服的缺陷了。现代技术使得人们可以用自然语言迅速地处理工作,用自然语言指挥机器。会说,说得好,越来越成为生活、工作、生产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一点,在传统积弊很深的汉语文教学界是很难被理解、重视得足够的,或者虽然理解了,重视了,然而在教学实践中是很难做得足够的。为作文而作文,为考试而学作文,不是为实际应用而学作文,这个传统积弊的影响很大。本文作者从几个地方的二十几所中学收集了近年来教师出的几千个作文题目,绝大多数是介乎诗文之间的抒情散文性的,很少数是没有实际目的的议论性的,绝少切合生活工作实际需要的说明性的。就连试行文学、汉语分科教学的那个短时期,今天回顾一下,作者认为那次实验的真正缺点也在于忽视了语言实际和应用实际。识字,读文章,作文章,这就是语文教学,这一点不能说毫无改变,然而改变确实仍旧不大。90 高龄的作家叶圣陶先生从 20 世纪 20 年代起就从事国文课程标准的制定,从事国文、国语、语文教科书的编审,近年曾慨叹地说:“60 年来的语文教学没有什么改变。”他是语文教学的老前辈,在这条路上走过了 60 个年头,他是最有发言权的,他的慨叹发人深思——促使人们去认真地深入钻研,寻找出语文教学历经多年多种变化而效果至今不能令人满意的症结所在,进而寻求改革前进的道路。

三、今后改革的趋向

1. 要进行改革,应当先弄清楚有哪几个必须解决而一直没有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够好的重要问题。

①首先是汉字问题。汉字这种文字系统和汉语这种语言



的特点是相适应的 ;在历史上 ,汉字有过很大的功绩 ;在应用上 ,它有许多优越性。然而 ,对于五或六或七周岁初入小学的儿童来说 ,是他们急于要求开展阅读的拦路虎。他们已经从生活中学会了丰富的语言 ,他们的智力发展已经到了相当的水平 ,他们已经有了强烈的求知的愿望和兴趣 ,他们也迫切需要接受更有条理的语言训练 ,然而汉字这种文字系统在认识 500 个之前只能读简单的句子 ,至少要 1000 个才能读内容极简单的 ,落后于他们的语言、智力和求知兴趣很远的小文 ,必须有 2000 多个字才能大体和他们的需要逐步适应起来。照一般常规进行 ,学会 2000 个字需要相当艰巨的努力和相当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 ,字不够用简直成了他们成长提高的障碍以至成了对他们的压抑。汉字有用 ,今后还要用下去 ,所以必须学 ,并且必须学好 ,可是在开始阶段却对于儿童如此不利。这是一个极大的矛盾。古人摸索出一套集中识字的办法是为了解决这个矛盾 ;黑山北关小学、景山学校实行经过改造的集中识字 ,乃至最新的黑龙江的“ 注音识字 ” ,也都是为了解决这个矛盾。矛盾是否已经很好的解决了呢 ? 汉语文教学究竟是如千百年的传统那样从字出发呢 ,还是应当从语言出发 ? 有没有办法使初入学的儿童从字那个紧箍咒中解脱出来而最终又能把汉字学好呢 ? (现在 ,字学得不好 ,真正学会的不多 ,写得很差) 这是一个有待研究的带根本性的问题。

② 文言 ,是又一个我国特有的问题。文言文负载着我们丰富的文化遗产 ,丢弃不得。像许多珍贵的文物一样 ,文言必须保护好 ,不容许抛弃。然而它和现在的实际语言已经离得那么远 ,它很难学 ;它不能解决我们的孩子们今天和今后所需要的语文能力的问题。由于文言这个障碍 ,我们的年轻人对祖国的

文化遗产知道得越来越少了。难道能让他们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学更多的文言吗？不，又怎么办呢？这是又一个有待认真研究的困难问题。

③口头语言能力（听和说），书面语言能力（读和写），都需要，都重要，训练起来各有各的困难处，它们相互为用，相互促进，没有孰难孰易、孰轻孰重的问题，更没有谁可以取代谁的问题。怎样把二者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呢？如果说，前两个问题是汉语文教学所特有的，那么，这个问题应当说是各种语文教学所共有的。但是，也正由于有了前两个问题，这个问题在与别种语文教学的共性之中也有了它一定的特殊性。

④知识、能力、应用，是汉语文教学中一直没有解决好的一项重大问题。人们不能对于日夕不可离的，并且在工作和生产中越来越重要的语言继续处于朦胧混沌的状态之中了。应当对它有科学的认识，具备必要的科学知识，然而语文是一种能力，不应当为知识而知识，要学以致用。语文的应用范围是非常广泛的。现在，且不说中学毕业，就是大学毕业，做财贸工作的写不好商品说明，做医务工作的写不好病历，做行政工作的写不好公文的，比比皆是。可是360行，行行有他们实际应用的东西，语文教学显然不可能样样都教到。那么，如何找出有助于实际应用的共性的东西作为语文教学的基本内容，就成了语文教学必须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语法修辞等等知识的教学，说话作文等等训练，应当把帮助学生学好规范化的语言，能够用最经济的语言传递最大的信息量，取得最大的表达效能作为自己必须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同前一个问题一样，原则上说，这是汉语文教学和别种语文教学共同的，然而汉语文有汉语文的特点，共性之中又有它的特性。



⑤这里又不得不说到文学。文学教育是一种精神教育,思想教育,美学教育。同时它又是一种非常有利于智力开发的教育。学文学有助于发展联想能力,想像能力,创造性的思维能力。文学和科学绝非没有关系的。作者很同意这句名言:“很难说牛顿和莎士比亚谁需要的想像力更多一点。”在普通教育阶段,文学教育是绝对不应忽视的。不需要每个受过普通教育的人都成为文学作家,然而非常需要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具备一定的文学素养——文学的理解力,欣赏力,鉴别力以及联想力和想像力。鉴于我国的历史特别长,文学遗产特别多,鉴于我国的文学遗产中有大量的文言作品,又鉴于我国历史上从来是把文学和非文学并合在一门学科里进行教学这个传统(除了那不成功的文学和汉语分科教学的两年实验期之外),从而也就把文言和白话杂糅在一起进行教学,带来了一些明显的困难和不可避免的副作用,那么,今后的汉语文教学应当怎样处理这个问题,也是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一个并不简单的课题。

2. 作者认为,今后汉语文教学改革的趋向,主要是在研究解决上述那些问题的基础上形成一整套从小学到中学到高等学校,特别是高等师范学校的课程和教材的合理方案。方案可以有一套,也可以有几套,但是必须成为整套的,不能只管一点或者一段,必须能解决上述那一串问题,不能只解决其中某一个问题的。

本文作者构拟了一套方案。由于还不是很成熟很细致的,也由于本文篇幅所限,这里只把这个总的趋向的设想提出来,至于方案本身,留待适当时机另文专论。

(1984年8月,香港中文大学召开“应用语言学研讨会”,这是作者提交给会议的论文。)

当前语文教改需要着重探讨的几个问题

——与《语文学习》编者的谈话

近几年来,我们探讨教学问题的风气很盛,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真正切合实际、切实可行的路子就是靠大家探讨,才能出来。目前,双百方针可以说真正得到了贯彻,大家既有探讨问题的愿望,又有探讨问题的条件,在有些问题上已经产生了成果,这是非常好的。现在我们面临的教育工作的任务很重。最近以来,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几项重大决定都要求我们加倍努力,加快探讨一些问题。我们现在的目标,从教育工作来讲是培养跨世纪的人才,就是培养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一代人。形势逼人,眼看不改革、不大步走是不行了。香港今年中考出了一个作文题:《龟兔第二次赛跑》。连小孩子都写出了,现代兔子不睡觉了,跑得很快,所以,第二次赛跑,乌龟不但不能取胜,而且被远远地甩在后面,要赶也赶不上去,拼了老命也赶不上。因为现在进步得太快了,日新月异呀!形势确实是这样,要求很紧迫,但是,又不能性急。因此,在研究一些很具体的问题的时候,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就需要来研究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不是说那些老问题、具体的问题都解决了,恰恰相反,还需要继续探讨。但是这些问题怎样才能解决呢?恐怕现在到了从根本问题上进行探讨的时候了。在这个方面花些力量,来促进我们的改革,使其更有理论性,更有科学性,更有可行性。不然的话,总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来回转,谁也说



服不了谁。

有的同志说,我教了三十多年书了,现在是越来越不会教了。左一个说法,右一个说法,这个一套,那个一套,新名词一大堆,闹得我无所适从。总之,提出一些批评意见的很多,真正开药方出来的不多。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可喜的现象,而且是事物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过程。

有一个意思,我时常说到过的,即从清末废科举开办学堂以来,我们新学堂的办法,都是从东西方先进国家引进的。引进是好事,不是坏事,应当说引进晚了一点。人类发展到现在,就是在既互相学习又互相竞争这样一种对立统一状态中过来的。如果不互相竞争,不互相学习,今天我们很可能还处于原始时代。引进是很必要的。

可是有几门功课不能引进。头一门就是国文。外国人没有谁为我们编国文课本,也没有人研究中国人学中国语要用什么教学法。没有教材,没有理论,只有靠我们自己。而我们自己这七八十年间干了些什么呢?只要回顾一下历史,便可知道,实在是没有给我们研究问题的时间、机会和条件。只有个别的有识之士、有志之士,个别地方、个别学校,有一点研究实验,但影响是很微弱的,所以,还有一些很带根本性的问题,我们还未接触。如果希望我们的教学改革再前进一步,取得突破性的成果,那么已经到了必须在这些根本问题上用力气的时候了。否则,我们就会继续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转来转去,这些根本性的问题是什么呢?我想到的有三个问题。

一、关于用什么样的思想方法指导我们的探讨

指导我们探讨问题的思想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

法的基本条条,我们都会背一些。可是,我们是否按这几条办事了呢?比如: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我们曾翻来覆去闹过多次。一会儿要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那样,还要语文课干嘛?一会儿又说语文就是语文,是工具课嘛,不能把语文课教成政治课。总是对立而不统一。总之,我们相信并遵循唯物辩证法,但是从很小的事到相当大的事,我们常常没有按唯物辩证法去办事。

我们曾经批判过胡适的“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有点这样的说法?谁一谈什么主义,就说人家是空谈,说空话。“我们要实在的:作文怎么教?出什么题?这一课书几课时讲完?哪些地方要分析?什么叫启发式?你不要再谈这‘主义’那‘主义’了。”这种倾向偏了,光说空话当然很不好,但是不能没有指导思想。探讨并且明确一下指导思想是很有必要的,这和说空话是不相干的两回事。如果要算账的话,这个责任不在我们任何一位同志,主要算在“四人帮”头上。因为是他们把政治乱搞一气,拿一些伪东西出来骗人,因而使大家厌弃了。我们现在所缺的恰恰是政治。我们许多具体问题得不到解决,正是由于我们没有学好用好唯物辩证法。现在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这个东西。如果说我们要与那些不睡觉的兔子竞争的话,这是我们的一个强有力的武器。如果我们真正遵循唯物辩证法办事,我们赶不睡觉的兔子不是很难的事。

唯物辩证法,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用唯物辩证法看我们的前人,他们不是一无是处,不是什么都不懂。非历史主义的一味否定,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我们的前人是不是没有一点唯物论,或者辩证法呢?不然。有的,并不在少。



比如说：孔老夫子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不是对立统一吗？他既说：“辞达而已矣”，说话写文章明白就行了。又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说话写文章要有一点文采。这不就有那么一点朴素的辩证法观点么？有时候又把旧东西一律认为很好，甚至连死记硬背也是好的。颇有那么一股复古风，至今在不少领域中漂游未散。

有许多具体问题，如果我们不用辩证唯物主义去观察、思考、分析、处理和解决，就只能在原地踏步，或者在一个层面上打转，或者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谁也说服不了谁。比如凯洛夫的量力性原则和赞可夫的高难度原则。量力性要有个力度，高难度要有个难度，在一定度的范围之内，既要量力，又要有难度。这里就有一个对立统一的问题。多与少也是矛盾的，也有一个度的问题。太少了反而增加难度，如《千字文》，最少，但学起来并不容易。总之，任何事物一绝对化就不行了。只有用唯物辩证法解决这些具体问题，才会有适合我国教育实际的一套东西出来。

我们要进一步研究教改，首先要在思想方法上下功夫，用这个武器去考虑、研究许多具体问题，那些问题才会有所解决、有所突破。

二、关于封闭型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内容

在全国工作会议上，讨论教育体制问题时，万里副总理在讲话中提到，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内容必须改变。如果不改变，体制改革是要落空的。他概括封闭型的教育思想为两个“唯”，一个叫唯书，一个叫唯上。我以为，封闭型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内容产生于源远流长的封建社

会。它的特点是什么呢？从目的性，也就是教育观来看，就是培养官僚。这种封建教育观决定了教育内容：一个是经典，另一个就是古往今来的名著。经典是为了传“道”，学名著以便于模仿，以至于抄袭，都是为了考试，以达到做官的目的。方法呢，一是灌输之，二是强制惩罚之，三是利诱之。它鼓励死记硬背，模仿抄袭，它反对独立思考，创新发展。

封闭型的教育思想影响是很大的，不仅影响今天的语文教学，乃至影响其他学科。读书是为了考，考是为了做官，还是以私利为终极目的。为考试而教，为考试而学。不考的不教不学。从来高考不考口头语言，因此就彻底忽视以至于彻底否定口头语言了。完全不理解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关系，完全不理解口头语言敏捷、准确、得体的训练足以发展学生的智力。总的一条，教学目的在于考试，不在于用。学生不学将来要用的东西，搞贸易的不会写广告，当医生的不会写病历，当干部的不会写公文，搞科研的不会写论文。总而言之，他所需要写的，不会写。尽管又是大作文又是小作文，当面批改，精批细改，详批，略批，转来转去，不解决问题，因为始终未把实用作为教育目的，没有考虑今天和今后的年轻人需要什么，怎么指导他们学好所需要的东西。

语文教学就是要达到使学生具备现代需要的听、说、读、写能力。但是能力没有知识为基础是不行的，知识教学的目的是为了使达到具备某种能力的目的，知识教学是重要的。只是我们应该把培养学生的能力作为教育的终极目的。知识与能力，何者在前，何者在后，并不是都一样的。有的知识可以立即转化为能力，有的知识多少天、多少个月、多少年才能化为能力，而且有的知识可以化为能力，有的好像不能转化，不能一概



而论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不能把知识和能力对立起来。

封闭型教育思想 ,在现代教学中还大量存在 ,而且因为我们身在其中 ,往往并不自觉。

三、必须重视关于教育理论的研究

教育理论包括的内容非常广 ,有的在我们这里还非常薄弱 ,有的甚至是空白点。我们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 ,曾取消了关于教育理论的研究。现在已经是信息社会 ,是信息技术革命的时代 ,语文教学如果没有理论建设是不行的。教育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学习心理学 ,还有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等等。所有这些“学” ,都是随着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而产生的 ,是多学科性的、互相渗透的而不是孤立的。没有这些“学” ,想探讨语文教学改革是很困难的 ,也是不可能有突破性的改革的。

为了探讨语文教学改革 ,我们必须遵循唯物辩证法 ,提倡真正科学的科学研究。所谓真正科学的科学研究 ,就是要真正地实实在在地调查客观实际 ,要运用调查的材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分析研究这些问题要有数据 ,不能凭经验、感想、直觉。当然数据也不能绝对化 ,不能完全否定经验 ,这里面也有一个对立统一的问题。

(刊《语文学学习》1987 年第 3 期。培永根据讲话录音整理。)

语文教学需要有突破性的改革

今天,我们开这个盛会,非常重要。这是因为我们是在一个新时期的开始举行这次会的。我本来非常愿意参加这次会,由于有别的任务不能来,只好用录音跟大家谈一谈想法。

既然是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必然有许多工作要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调整,或有所改进、改革,以便适应新时期的需要。多年来,我们语文学科,自觉和不自觉的可以说是变动不大,或者说没有实质性的变动,以文选为主讲一些文章,方法有些变化,从就是念、就是背到做一些简要的评点、提示。结果是大学毕业了业,工作所需要的语文能力还是没有。需要写,写不好;说呢,结结巴巴,说不好。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训练过。这种情况,同新时期、新的要求很不适应。教育是为未来培养人才。今天的语文教学要考虑到七八年,十几年后的人需要什么样的语文能力。现在,社会发展快,出版物越来越多,需要极大地提高阅读能力,包括理解能力,也就是提取信息、接受信息的能力,反应要快,接受下来,马上进行工作——对信息进行筛选、分析,做出判断、反应。要极大的提高效率,这是一。第二,要做到学用兼顾。学以致用,是句自古名言,可是我们在语文课上没有做到。学语文,需要写,就能写;需要说,就能说。简而言之,我们要在两个方面有总突破性的办法,一是在效率上有所突破,二是在致用上有所突破。因此,课程的内容、目的、方法,都需



要有突破性的改进、改革。

现在重视思想政治教育 ,完全应该。要提高效率 ,同样需要学用结合。我们古人开始识字 ,上来就把思孟学派的性善论拿出来。洋人念圣经 ,信佛教的念佛经。在美国 ,我亲眼看到老师让学生背诵美国的《独立宣言》。古今中外 ,都搞思想教育 ,没有哪一家不搞。办事要讲效率 ,讲管用 ,不要只管背条条。要从幼儿园开始进行思想教育 ,教育他们如何做人 ,做个什么样的人 ,给他们讲什么故事 ,有什么小人书 ,都要想出种种办法。

(这是根据 1991 年 7 月在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第五次年会上的录音发言整理而成的 ,载《语文学习》1991 年第 10 期。)

今天的课程和明天的需要

课程——包括课程的设置、结构、内容等——的发展,从来是和社会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即使在一个时间,很近的地点,比如斯巴达和雅典,课程就不同,因为社会特点不同。罗马帝国建立之后,文艺复兴之后,宗教改革之后,牛顿之后,达尔文之后,门德里耶夫之后,亚当·斯密之后,产业革命之后,杜威之后,有了原子弹之后,有了人造地球卫星之后,等等之后,各国的课程有了多么大的变化,而课程的变化又如何影响了社会的发展,这些都是教育工作者常识范围内的事,在这里无需多说。

在座的中国朋友想来不会忘记,很多外国朋友也都知道,中国元明两代以下,科举考试,八股文定型,风行了几个世纪,直到清末,课程自然也依此设置。结果是,把我国原来在世界上遥遥领先的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有李约瑟博士5卷本的《中国的科学与文化》,不需要我来举例了)拖住了腿,除去个别杰出的人物如李时珍等冲破枷锁,在科学上作出杰出贡献之外,科学停滞了,与没落的封建主义相表里,把整个社会拖到十分落后的境地。此后,戊戌变法失败了,辛亥革命的目的没有完全达到,然而科举、八股毕竟被冲垮了,抛弃了。1902年开始办新学堂,课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也在变革,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新中国成立之后,更进一步发展。尽管我们



自己浪费了一些时间,整个社会还是大踏步前进了,虽然还不够理想。社会形态制约着或者改变着课程,课程影响着(阻滞或推进)社会的发展。课程与社会就是这么一种有趣的互相作用的关系。这在这个场合自然也是不必多说的。

这里我要说的是在这个问题上的一点感想。本来,学术论文应当是谈科学事实,讲科学理论的,不是发感慨谈感想的。不过,请谅解,允许我违背一点学术论文的规矩,谈一点我认为带有相当重要性的感想。我感到,自然科学家、应用科学家对于课程与社会的关系大都有明确的认识或者至少有些感觉,而人文科学家似乎略有不同。我是研究语言学和语言教育的,“人文科学”范围太大,我知道的有限,我把话题缩小到我的本行里来——即语言教育,包括母语教育和第二语言教育。即使如此,我也只能提出几个问题向大家请教,我个人回答不好,时间也不容许我全面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大家都知道,教育是为未来培养人才的,设些什么课程,每门课程中讲些什么内容,用些什么方式,都要为未来的需要考虑。当然,首先要充分了解现在与教育有关的实际情况,脱离当前的实际空想未来,往往会成为一种浪漫主义式的畅想,只是富有兴趣和风趣的想一番空热闹一番而已,至多像 H·G·Wells 写 *The Invisible Man* 那样。然而做教育工作脑子里毕竟不能没有个“未来”,这是所从事的教育事业要求的。很远的未来,比如 500 年后、1000 年后是什么样子,我不敢去想,因为我不是“未来学”家,但是十年八年之后,十几年二十年之后的情形,根据近几十年科学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情况,应当能,也一定能推断个差不多或者至少差不太远。那么,到那时候,也就是 20 世纪末、21 世纪初,大概有些什么与语言教育

有关的情况呢？那时候的二十几岁、三十多岁的人，也就是那时的国家建设骨干，需要什么样的母语语文能力呢？需要有什么样的外语能力呢？那时候，在校的小学生大概有多少？中学生有多少？职业学校会有多少种，他们的语文水平，外语水平分别达到什么程度？还有真文盲和功能性文盲吗？有多少？那时候，合格的中学语文教师大概有多少？外语教师有多少？不够，差多少？还是多余了，多余多少？第五代电子计算机应该已出世了。摄像、录像手段和设备应当更高更齐备一些了。能够普遍供应教学使用了吗？如果还不够，最高能达到多少？最低呢？口头通讯设备应当更高了，用口头语言（不用公文等）处理工作的机会一定会更多了，那么相应的，口头语言能力的要求也会更高了，高到什么程度呢？怎样训练呢？同时，书面语言能力的要求也会更高——需要书面记录的科学资料、政治文献、文艺作品会更多了，靠音档之类大概是远远不够的。出版物将会越来越多、越复杂，从而阅读能力的需求也就越来越高。生活节奏、工作节奏大概会更快了，那么，对接受信息，反馈信息和发出信息的敏捷度、准确性等等的要求也会更高了。那时大概更加要求实用性加强些，学了什么就能实际用上，等不及先学了放它几十年再用了。古人的夸张说法，什么“一目十行，过目成诵”“出口成章，下笔成文”“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等等能力，会越来越接近实际的要求，而夸张性越来越小了。各国人民的接触必然越来越频繁，那么，语言是越来越集中。比如，人造的“世界语”普及开来，使用起来，或者某种或某两三种自然语言的使用者越来越多，终于有某种或某一两种语言逐渐演进成世界通用的语言，尽管各国国内还保留着，使用着原来的母语，但是每个人要学习更多的外国语，以便与



多国人民相交往。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 ,邻居这么多 ,语言这么复杂 ,是继续主要开设一种外语 ,多少再增设一两种呢 ,还是应当多开设几种 ,哪怕现在看来是所谓“小语种” ? 如此等等 ,问题很多很多。那么课程怎样与这种种变化互相适应 ? 拿母语语文来说 ,是否仍旧设上一门“语文课” ,每学期读一些古今中外的名作 ,写几篇什么“记叙”“说明”“议论”的段落或文章 ,加上点“语法”“修辞”“语音”“语汇”什么的知识 ? (各国 有各国的独特的做法 ,不过以此为基本形式的 ,也还不少。) 是课程依旧 ,只从内容上考虑怎样改进改进呢 ,还是首先考虑课程的设置应当改变 ,课程所用的时间要处理得更合理 ,更经济一些呢 ? 这是个不小的问题。并非因为我是研究语言教育的就夸大语言教育的重要性。重要是事实 ,语言教育的成败 ,对于人文科学的其他部门 ,对于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发展都有密切的关系。从明天的社会需要出发 ,顾及当前的实际来考虑今天语文课程的处理 ,我个人有一些极初步的构想 ,根据会议规定的时间 ,只能在另外的机会以另外的方式拿出来向诸位请教。谢谢。

(收入《课程发展与社会进步——国际研讨会论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2 年 7 月出版) 。)

[附录]

张志公教授主张中学设置文学课

《语文学习》记者

著名语言学家、教授张志公先生最近在上海会见《语文学习》记者时说,现在中学应设置文学课程。他说,文学是形象反映生活的语言艺术。想像力特别丰富。阅读文学作品不仅有助于认识生活,开拓视野,陶冶情操,而且对人的智力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古往今来,许多大科学家,大军事家,能在马上吟诗,能在案头作文。爱好文学常常是他们光辉人格的组成部分。

张先生说,我不赞成把文学教学任务归并到语文课中。文学课和语文课应该是各有任务的两门课。它们有相联系的一面,例如,都以语言文字为工具,但是,它们不应是从属关系。语文课的任务主要是培养学生具有实用的口头和书面的表达能力。而文学课则是提高文学素养,丰富想像力,培养文学鉴赏能力。张先生说,他访问过美国,了解到美国中学设有文学课,对此,他表示欣赏。

(原载《语文学习》1989年第1期)

四、语言教育与语文教学

学好语文的三道关口

要语文基本上能通、够用 ,我觉得要过以下三个关。

1. 字关

“字”是学好汉语汉文的第一关。这是个大关。过不了这一关 ,提高语文程度很困难 ,过了这一关 ,提高就比较容易。

我们的汉字比较难学 ,数量大 ,得一个一个地去学 ,学一个算一个。要学多少个字才够用 ? 一般估计 ,要 5000 来字。这个数字是有根据的。报社的排字房里 ,放在常用字架上的铅字 ,就有五六千个。当然其中不都是最常用的 ,最常用的大概 3000 多个。就说 3000 多个吧 ,一个个地去学、认、记 ,这已很不简单。每个字又往往有不只一种意义和用法。同一个字在不同的词里表示不同的意思 ,这种例子是举不胜举的。多而难 ,所以说字是一关。考察一下实际情况 ,凡是读书有困难 ,笔下文理不通的 ,十之八九是被这道关口拦住了——认得的字少 ,不够用 ;所认的字没弄清楚 ,不管用。另一方面 ,汉字有它的方便处。比如 ,一年 12 个月 ,从 1 月一直到 12 月 ,只要认识了 1 到 10 的数字 ,认识了“月”字 ,就能一个个地搭配上去 ,全都认识 ,而在西洋语文就不是这样 ,每个月有每个月的名称 ,12

个都是生字。又如,我们认识了个“张”字,就解决好些问题。姓张的张是它,纸张的张也是它,扩张的张还是它,等等。这也就是说,认识了几千个字,同时就解决了上万个词。所以,字这一关一旦过去,就会感到一通百通,左右逢源。古人对字的教育很重视,在这上面花很大力气,不是没有道理的。

要用很大力气来过字关是汉语汉字的特点在语文教学中的反映。这一关过不去,不行,过去了,就有很大好处。

这一关怎么过呢?对字的教学,积极的一面要加强,不能单独依靠消极的纠正。过去,我们在消极方面做得多,老是纠正错别字,消灭错别字。但是,光靠纠正和消灭是不行的。在小学里,只念过“刻苦学习”,没有学过“克”字,不会把“刻苦”错写成“克苦”,等到学了“克服”这个词,又没学好,就会把“刻苦”写成了“克苦”。因此,随着认识的字的增多,写错字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怎样才能消灭错别字呢?只有让学生实实在在地掌握住所学的每个字。错别字不是单纯的写字问题,而是字的教学、词的教学、语言教学不健全的反映。有个高中学生把“一知半解”写成“一知半截”,怎么会产生这样的别字呢?原因就是第一次接触到“一知半解”这个成语时,囫囵吞枣,没有弄懂。可以设想,他对文章里包含这个成语的句子,乃至与此有关的思想内容也没懂。这岂止是一个字的写法问题?

在过字关这个问题上,文(言)白(话)是相通的。文言文如果能学好,对学现代语的字大有帮助。从文字的角度来看,文白古今,继承性特别显著。现代语的许多双音词,里边的字或多或少地保留着古义。如文言文中的“微”字有精细幽深的



意思,①懂得了文言的“微”字,就能更确切地理解现代语中“微妙”、“精微”这些词。又如古文中“存”字有安慰的意思,懂了这一点,就很容易理解现代语还在使用的“温存”。现在的中学生念文言文,往往是整句地囫圇吞下去,对字的理解不够确切。例如,《醉翁亭记》开头第一句是“环滁皆山也”。我叫一个学生解释这句的意思,他说:“滁州周围都是山。”我问他哪一个字的意思是“周围”,为什么“环滁”就是“滁州周围”,他回答不出。我再三启发,他还是说不出“环绕着滁州都是山。”这说明他对“环”字没有理解好,这种情形对于过字关是不利的,应当改变。

要过字关,对于字就不能简单从事,囫圇吞枣。但是也决不能离开课文去讲字。只要课文里必须讲的讲了,就已经足够了。不然,多讲了学生也接受不了。

要尽早地引导学生学着用字典,使他们对字典发生兴趣,养成用字典的习惯。这对于过字关是十分重要的,于学习语文有重大的意义。

2. 句关

这里应该先说一下词汇。就掌握语言来说,词汇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语言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掌握词汇的情况。目前许多中学生对词汇掌握得不够,不好,表现在阅读上是对词的理解不确切,表现在写作上是词不够用,用得不准确。在教学中,词处在字、句之间。前边说的过字关,离不开词的教学(不能丢下词去孤立地讲字);下边要说的过句关,也离不开词的教学(不能丢下词去抽象地讲句)。反过来说,讲

① 《史记·屈原列传》:“其文约,其辞微。”

一个词,一方面不能不讲构成这个词的字的读音、意义和写法,另一方面不能不讲这个词怎样用在句子里。换言之,解决词汇问题,一头要跟过字关统一起来,一头要跟过句关统一起来。因此,这里暂时不单独把词汇作为一关来讨论。

句子是个大关。很多学生读书的时候对句子的理解不清楚,作文的时候句子写不通。过句关,需要抓住重点。谈到句,自然就会联想到语法。事实上,就汉语而论,一个句子通不通,主要是逻辑思维的问题,是想的问题。平常做改病句练习,病句的病在什么地方?主要的病就在于没有想清楚。在一次测验中,有个学生写了这样的句子:“英雄的形象在我心中生根、开花、结果。”照语法讲,这是主谓搭配不当,其实,这是事理不合,主谓搭配不当是其后果,是思想没有搞清楚在语言文字上的表现。

过句关,首先要重视学生的思维条理,从语法方面来讲,主要得注意词的组织配合和虚词的运用。

前人好搞对对子,我们以前总以为那是为了学作诗。实际上,那正是在反反复复地训练字句的组织配合。比如,“红花”对“绿叶”,这两个都是用形容词加名词组成的偏正结构。“水落”对“石出”,是句子对句子。四个字以上的,可以连复句都包括进去。对对子,这里边的毛病很多,但是前人千百年来抓住这个办法不放,不是没有道理的。这里面还有逻辑训练的因素。“飞禽”对“走兽”,两个都是由动词加名词组成的偏正结构,能对。但是,“飞禽”对“奔马”就不行,虽然“奔马”也是动词加名词的偏正结构,但在逻辑上概念的等级不同,对不起来。这里提一提这个古老的办法,并不是要提倡对对子,而是用这个来说明,抓组织配合是多少年来训练学生过句关的老传统,



这一点对我们是有启发作用的。

过句关也应该更多地从积极方面着眼 ,加强训练 ,不能光是靠消极的改病句。讲课文时 ,不能让学生对文章里的句子囫囵吞枣 ,要让学生理解得透彻、确切 ,有点分析能力。

讲句子是否会妨碍讲课文?不会。只要不是讲得过于烦琐 ,不会妨碍讲课文 ,正相反 ,对学生理解课文是大有帮助的。例如 ,毛泽东同志的《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文章 ,第一段讲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过 ,把取得的成就作了概括。第二段一开头说 :“但是我们还是有缺点的 ,而且还有很大的缺点。”从语法上来说 ,这是递进关系的句子。如果引导学生注意一下这个句子的结构 ,跟一般的陈述句(比如“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大缺点的”)比较比较 ,一定能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这篇文章的主题思想。说这是讲句子 ,可以 ,说这是讲文章 ,也可以。

从课文出发讲句子 ,可以把语法、修辞、逻辑联系起来。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 ,有这样几句 :“……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 ,轻捷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有一位教师讲解这句时指出 :黄蜂 ,用“肥胖”来说它的样子 ,用“伏”来说它的动作 ,叫天子 ,用“轻捷”来说它的样子 ,用“窜”来说它的动作——这是形容词和动词的配合 ,这样配合非常好 ,把景象写得准确而生动。我认为这样讲解 ,比分析一大通百草园如何好 ,鲁迅先生如何喜爱百草园 ,甚至从这里再生发出一套大道理来 ,对学生会更有帮助。

3. 篇章关

中学生写文章 ,有时候意思很好 ,就是组织得不好 ,没有条理 ,没有很好地把思想表达出来。有时候又仿佛文思枯竭 ,干巴巴的几条筋 ,铺陈不开。谋篇布局 ,看来也是一道关口。

篇章,无非是思路的反映。思路,无非又是认识事物、思考问题的过程。因此,必须帮助学生学会细致地观察事物,有条理地思考问题。决不能单纯从技巧方面来看篇章问题。

近来,接触了一些教学工作,感到有些教师在技巧上花的工夫太多。他们在初一就大讲方法技巧,而不从帮助学生很好地观察事物入手,不从思路上来引导。有位老师讲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着重地讲文章中的“我”和洋车夫的对比,讲怎样突出人物形象。结果学生在作文中写了这样的事情:一群小学生周末去看电影,看到有个盲人要过马路,他们只觉得很好玩,并没想到怎样去帮助那个盲人。这时忽然有辆汽车疾驰而来,眼看要出事。在这紧急关头,幸好一位工人叔叔奔过去把那盲人搀扶了过来。小学生们感到很惭愧。他们“觉得工人叔叔的背影渐渐高大起来”,他们“带着愉快的脚步来,却带着沉重的脚步走进电影院”。是不是真有这么一回事呢?经了解,事实并不如此,他们当时也感到很着急,并没有“觉得很好玩”。这个学生所以要这样写,说是为了要对比,使工人叔叔的形象突出。这件事除了告诉我们要注意对学生进行写作态度的教育而外,还充分说明,过早过多地讲技巧,没有什么好处。

过篇章关的有效办法是指导学生多读些好文章。讲这些文章的时候,要帮助学生了解作者是怎样观察事物的,是怎样思考问题的,是怎样展开自己的思路的。不要纠缠在写法上,更不要好高骛远,不适当地去讲文艺创作的技巧。

(节选自《漫谈语文教学》1962年10月)



关于语言教育的几个问题

语言在人类的形成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每个人的教育、成长也和他的语言能力的获得和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一个人生下来之后,当他刚刚有一点学习能力的时候,他上的第一课就是语言课——“牙牙学语”。任何一个做父母的,对下一代的教育,第一件事就是教幼儿学话。只是,这种教和学的活动都是自发的,不是自觉的。尽管每个人从一岁左右就开始学语言,并且一直不断地学下去,尽管每个成年男女,只要他生儿育女,就当上了语言教师,尽管这种教学活动在整个社会以至整个人类的进化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具有重大意义,可是人们没有意识到。教的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教,学的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学,彼此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干着十分重要的工作,倘若大家都放弃这项工作,社会将要停止前进,倘若这项工作做得不好,也将影响社会的前进。不仅没有意识到,人们反而把自己实际上十分重视、多年从事的这项工作看得很轻。一谈到语言教育,相当多的人认为这是不急之务,没有什么重要性,也没有什么值得研究探讨的问题。在我国,由于下面将谈到的历史原因,这种现象格外突出。因此,谈谈语言教育的意义和做好语言教育工作的途径这些问题,是很有必要的。

语言教育是综合性的教育。一个幼儿刚刚学说话,大人就不停地教。这在实际上既是教他语言,教给他知识,同时也在教他观察,教他思维。告诉他这个叫“桌子”,那个叫“椅子”,他学了这两个词,同时开始认识这两样东西,逐渐形成概念,尽管还是初级的,基本上属于感性的,比如,“桌子是放东西的”,“椅子是坐的”,等等。下雨了,对他说:“不要出去,出去要淋湿,会生病的。”这在实际上既教给他这句话,又教给他一点生活知识,还包含着一点因果关系——“下雨”和“淋湿”,“淋湿”和“生病”。你会发现,小孩一旦知道了这些词,这些话,他会反复地说,他会反过来告诉你,这个叫“桌子”,那个叫“椅子”;下次再下雨,他也会照着以上的话说一遍。孩子们学语言、学知识的积极性很高,能力很强。平常,我们看见这些现象,只觉得孩子好玩,不去注意这种“好玩”里边包含的重要意义。

我在河南省参观过一个幼儿园的大班,这个班已经教识字。在教“水”字的时候,老师要小孩把有关水的话说说,小孩子一下说了很多,如“喝水”、“用水洗手”等等。后来又说到“水龙头”,老师说:“打开水龙头接过水以后,应该怎样呢?”小孩想了一下说:“要把水龙头拧紧。”老师说:“对了。不拧紧就要漏水,要浪费。”这位老师,既教了语言,也对儿童进行了思想教育。

我愿意就语言教育和思维训练的关系这个问题再谈几句。幼儿一会说话,我们总是首先教给他对人的称谓。学来学去,他不仅学会了这些称谓,同时也逐渐有了很初步的分类和概括



的能力。两岁左右的幼儿一般都能区别开男的、女的、老人、大人、小孩。家里来了客人,如果是男的,有点白头发的,脸上有点皱纹的,他就会叫“爷爷”,女的叫“奶奶”;男孩子,叫“小哥哥”,女孩子,叫“小姐姐”,等等。看见一个穿绿军装的、有五星帽徽和领章的人,他就会叫“解放军叔叔”。他的概念当然是初级的,只就表象形成的,然而两岁左右的幼儿,随着语言能力的发展,就具备了这样的分类、概括的能力,这一点很值得重视。还不仅如此。他很快就会运用逻辑推理这种思维形式。我有一个两岁半的小孙女和我住在一起。有一次她姑姑给她一块糖,逗着她玩,要她把糖给我。她很大方,真的把糖举到我面前来。我说:“爷爷不吃,你吃吧。”她说:“爷爷是大人,不吃糖,爷爷长小了才吃。”说得全家人都笑了。分析一下,她的话包含着复杂的推理过程。首先,她运用了归纳推理。因为家里的糖都是给她吃的,别人不吃,由此,她得出结论:大人不吃糖,小孩才吃糖。又以这个结论作为大前提,进行演绎推理:大人不吃糖,爷爷是大人,所以爷爷不吃糖。她用的是省略形式的三段论。又因为我们常跟她说,你长大了如何如何,于是她就认为既能长大,当然也能长小,因此她说“爷爷长小了才吃”,这里她用了类比推理。当然,她的推理有许多错误,但是,她会运用归纳、演绎、类比这些思维形式,却是事实。这些,也是在学语言的同时逐渐学会的。一提逻辑思维,我们往往认为很难,甚至错误地认为只有到年岁很大才能学会。事实不是这样。逻辑学的许多术语,也许比较抽象难懂,逻辑思维本身并不神秘。有意识地进行良好的语言教育,同时就在进行着思维训练,而思维能力的培养对一个人知识、能力的发展关系很大,这一点是值得重视的。

语言是交际工具。这种工具不同于生产工具。我们使用着的这个交际工具的本身,总是带着好些东西在里边的。因而在教语言、学语言的同时,也就教了、学了语言里所带着的那些东西。我们可以说,忽视了语言教育,不仅仅是忽视了语言本身,而实际上是忽视了许多东西,诸如知识的传授、思想的陶冶、思维的训练等等。也正是由于语言的这种特性,一个人的语言能力如何,语言趣味如何,包括词汇是否丰富,说话有无条理,遣词用语是否平实、朴素、恰当、得体而又优美、动听,等等,往往成为一个人文化教养高低、思维能力强弱的标志。

语言还同现代科学技术有直接的关系。用语言操纵机器,人机对话,都已经不是科学幻想。一个记者或作家,拿着录音机,一边说一边就制成版印出来了。这些,都要求语言教育跟上去。语言、语言教育同现代化科学技术关系日益密切,可以说是现代化的组成部分了。

许多国家都对语言教育很重视。在那些国家里,当教师的要考试,首先就是考语言,要求教师能操合乎规范的标准的话。欧美各国许多人信奉基督教。基督教的《圣经》,过去是根据古拉丁文翻译成各国语言的,一般都译成一种半文不白的话,和现代的标准语不同。从20世纪60年代起,英国已经有了用现代规范化的英语重译的《圣经》了,牧师讲《圣经》,要用规范化的标准语,如果不会讲,就放录音,请牧师在一旁站着。这都说明他们对语言的重视。为什么?因为语言跟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有直接的关系。人机对话,机器不同于人,它不能听懂多种方言,它只能听一种规范化的标准语。推广普通话是十分重要的。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讲方言,可以演方言戏,但是,每个受现代教育的人,都必须学会说规范化的共同使用的语



言,即普通语。这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做到的。诚然,方言不能用行政命令禁止,并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存在,但是,规范化的普通语必须推广,因为直接关系到四个现代化。我们不少人不重视语言和语言教育,正是文化科学落后在思想观念上的一种表现。

搞好语言教育必须解决的一些问题

首先,是提高人们对语言的性质、作用以及语言教育的意义的认识。前面说过,人们对语言教育的意义往往认识不足,这是有历史根源的。我们应当做一些宣传工作。诸如语言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语言教育同四个现代化的关系,忽视语言教育会有什么后果等等都要加以宣传。宣传要恰当,要符合实际,合乎科学。现在听到一些宣传,我觉得是不十分恰当的。比如说,“不学好语文,就学不好数理化;学语文是为学习数理化服务的;有的学生语文水平低,看不懂数理化的习题,有的甚至闹出笑话”。这样的宣传就很不确切,不仅缺乏说服力,而且会导致一些错误的认识。一个学生看不懂数理化习题,有语文程度的问题,但重要的原因还是数理化没有学好。如果数理化本身学好了,看见一道题,里边有一两个词认不准,或者有个句子复杂些,搞不清楚,这并不会使他根本不懂这道题,或者错解了题意。粗知外语的科技人员有时候看点外文资料或者进口机器、药品等的说明,里边很有些生词、难句,但是他基本上看得懂,而且不会出错,因为所讲的内容是他所理解的,顺着上下文揣摩一下就明白了。并不是说语文和数理化没有关系。它们之间很有关系。只是,如果把它们的关系理解得这样狭隘,那就太浅了,对于语文教育和数理化教育都是

不利的。

中小学是普通教育阶段,每门课都是打基础的。中小学生学习不仅从语文课中学习语言,同样也从史地、数理化教学过程中学习语言。要说服务,是相互服务,不仅仅是语文课为其他课服务,其他课也为语文课服务。有些学生,说话不严密,谈科学问题说得不科学,推理论证不对头,这正是他自然科学的课程学得不好的反映。要说语文课有服务对象的话,那对象就是整个的文化科学教育,而不是某一段的某门课程。我们在宣传的时候,要把语言教育的意义、作用提到足够的高度,不要用那些过分狭隘的、似是而非的说法。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要看到,人们对语言教育的意义认识不足,也与语言教育的特点有关。小学以上的语言教育有这样一些特点:培养语言能力是一个加工提高的过程,不像其他课程,基本上是从不知到知,从不会到会的过程。进了小学的学生已经会说很多话,对他们进行语言教育是在他们原有的语言基础上继续加工提高。到了小学高年级、中学,更是如此。因此,语言教育也是最不能立竿见影的。它不像数理化,学生原来不懂一元一次方程,上几课就懂了,原来不知道电解水,听老师讲讲,做一次实验,就会了,立竿见影。历史、地理也比语文见效快,一堂课有一堂课的收获。惟独语言教育不能立竿见影,因为提高加工,不是一两堂课,一两个月的事情,要有一个过程。上述这种情况使人们最不容易感到这门课的必要性,最不容易感到这门课的老师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新学期开始,各科新教材发下来了,如果语文教材编得还不坏,能引起学生兴趣的话,学生们只消两三天就能从头看到尾,而数理化课本不行,老师不讲,学生就看不懂。



第二个要解决的问题是 ,必须积极改进语言教育的工作。各种课程都需要有完善的计划 ,良好的教学方法。由于上面谈到的语言教育的特点 ,语言教育尤其需要。而过去 ,在种种复杂因素的作用之下 ,恰恰是语言教育这一门 ,最缺少计划性 ,教学方法上的问题最多。应该加紧研究 ,迅速改变这种状况。从事语言教育的同志应当有这样的态度 :问题虽然不是我们制造出来的 ,但是我们有责任、也有能力解决它。

改进语言教育工作 ,有两个历史原因造成的不良倾向需要矫正。一个是 ,两千年来 ,人们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书面上 ,忽视口头语言的训练。《汉书·艺文志》说 :“古者八岁入小学 ,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 ,教之六书 ,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 ,造字之本也。汉兴 ,萧何草律 ,亦著其法 ,曰 ,太史试学童 ,能讽书 9000 字以上 ,乃得为史 ,又以六体试之 ,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史民书上正 ,字或不正 ,辄兴劾。”你看 ,自古以来 ,一上小学就把注意力放在书面上。汉朝有了选举考试的办法 ,也是笔试。到了封建社会后期 ,搞八股文 ,程式化 ,更不重视口语训练。这样做 ,有什么结果呢 ?

一个是“读书人”只会作文章 ,口语能力很低。考察一下元明以来的白话小说 ,语言水平一般不高 ,像《红楼梦》有那么高的语言成就的 ,真的凤毛麟角。《三国演义》、《西游记》是文白夹杂 ,有很多不规范的东西。至于其他作品 ,语言更糟糕。有些作家的白话作品远不如他用文言写的好。口语一向被忽视 ,影响一直到今天。忽视口语训练 ,实际上也影响了书面语言的提高。另一个后果是把书面语言神秘化了。人们一坐下来 ,纸铺在桌子上 ,握笔在手 ,精神状态就不同了。比如有的同志写信 ,一开头就是“今天写信不为别事 ,只为……”。试问 ,

我们有没有人到百货公司买把牙刷,一进门就对售货员说,“今天前来不为别事,只为买把牙刷”?生活中没有这种事,语言里没有说这样的东西,为什么要写出来呢?就因为纸一铺,笔一拿,似乎和说话就不是一码事了。这是由于近几百年间搞八股文、程式化、应用文、八行书等造成的。在这中间,咱们的汉字也起了些不好的作用。我在几个地方参观过幼儿园,平日也留意自己身边的和周围的幼儿、儿童的情况,多次发现小孩子在识字以前,思想活跃,语言活泼、丰富,一旦开始学习汉字,语言立刻就不那么活泼了,思想也受到束缚。这个问题很值得深入研究。不论汉字的前途如何,在可见的未来,汉字还将相当长时间地使用下去。既如此,我们必须让下一代很好地掌握汉字。应当比现在掌握得更好。目前,青少年对汉字的掌握,无论是认识、理解还是书写,太不能令人满意了。与此同时,还必须想方设法把学龄儿童从这个开头很难对付的汉字的紧箍咒中解脱出来。怎样做到既让儿童掌握好汉字,又不受它的束缚,这是一个值得花大气力从事的科研项目。除了忽视口头语言的训练,我国历来也不大注意有意识地进行逻辑的训练。先秦诸子的著作中,以及春秋三传的记载中,有很多熟练运用逻辑的例子,那一时期出现了不少善于辩论的思想家和外交人才。我甚至怀疑那时候可能比较重视口头语言的训练和逻辑训练,可惜没有文献资料,无从查考。从那以后,“读书人”似乎越来越多地在文章艺术上下功夫,对于逻辑、论辩越来越不注意了。

逻辑思维,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概念。概念不清,必然导致判断不真实,推理不恰当。在语言里,词是最根本的东西。虽然词和概念不是一一对应的,但词和概念关系很密切。许多病



句都是概念不清造成的,在语言里表现为用词不当。我们在语言教育中要十分重视词汇的教学,把词汇教学和关于概念这种思维形式的训练联系起来。这是最根本的。一个人如果词汇丰富,就是说,知道的词多而且掌握得好,他的语言能力就不会很差。汉语语法比较简单,说汉语语法难,是不符合事实的。汉语没有复杂的形态变化,这就去掉了一个大包袱。我国在《马氏文通》以前,有丰富的文字学、训诂学和音韵学著作,惟独没有语法学。外国的语法学的建立却早得很,在公元前三四世纪就有了。他们不学语法不行。托尔斯泰若不把俄语形态变化记得烂熟,是写不出那几大厚本的著作的,而我们的曹雪芹没学语法,却写出了《红楼梦》。这并不是说汉语没有语法,也不是说搞文学的可以不要学语法,而是说,我们的语法不难。我们在语言教育中应当更重视词汇的教学,重视逻辑思维训练。有人用500个常用词对一部分初中生进行测验,结果,能够正确地读出来、写出来的学生只占41%,最差的学生只得9分。从测验的结果看出,越是生活中常用的词,不会写的越多;相反,一些只见于书面的、词义不容易说清楚的词倒是能写出一些。这说明我们在词汇训练方面,在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关系的处理方面,是有问题的。另外,我看到不少地方给学生出的作文题,绝大部分属于抒情散文题,或者是诗题。要学生发一些不切实际的议论,抒写一些不真实的感情,用一些自己也弄不清楚的词语,这对训练学生概念清楚,判断准确,推理合乎逻辑,不起作用,甚至起相反的作用。这种倾向需要认真对待。有人说,写这种题目能够看出学生的文才,天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文才”!不重视逻辑思维训练,不重视培养切合日用的语言能力,搞一些空洞的抒情和议论,这有很深的历史原因。我

们在研究改进语言教育时,要看到这些历史上造成的不良倾向,设法消除它今天对我们的影响。

改进语言教育必须从学前教育到小学、中学做通盘的考虑,全面的计划。现在,搞语言教育的(编教材的、搞教学的)都像交通警察一样,各管一段,不通声息。幼儿园、小学、中学各段,总的倾向是对学生水平估计偏低,教学中重复浪费现象严重。譬如幼儿园教汉语拼音,小学又教,初中再教,甚至大学的现代汉语课还要教。相当多的一些汉字,也是各个阶段都在重重复复教,基本上是简单重复,并没有逐步提高、加深。我在一个地方恰巧碰上,幼儿园大班、小学一年级、中学一年级都在教“扛”字,教法和要求没有什么区别。

从学前教育开始,到大学教育基础课,语言教育的内容,以及各个阶段应当达到的要求,要有通盘考虑。这是很重要的科研项目。为此,就要开展调查研究。比如天津市有两位同志在一个幼儿园里作了幼儿在口头上会说的词汇调查,统计数字如下:

一岁六个月至一岁九个月,会说 51 个词;

一岁九个月至两岁,139;

两岁至两岁三个月,243;

两岁三个月至两岁六个月,626;

两岁六个月至三岁,926;

三岁至三岁六个月,1231。

这个统计数字告诉我们,幼儿词汇的增长是很快的。当然,各地幼儿情况会有不同。对中小城市的,农村的,平原的,山区的,沿海的,内地的,边疆的,要广泛、深入地调查,这样就可以逐渐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小学、初中、高中,都应当做



调查。不仅是词汇统计,对掌握基本句式的能力,运用各种思维形式的的能力等等,也要做调查。做好调查工作,经过分析、研究,找出规律,语言教育讲求科学性就有了前提,就可望获得较好的效果。就是说,语言教育的研究要同教育科学的研究结合起来。最后,附带说一个问题,要提高学生的语言水平,重要的一条是实践。传统的经验如多读、多练,是可取的,但要加以改造,使之符合科学化的要求。语言教育只有采用科学的方法,才能提高效率,事半功倍。

现在,有这样一种倾向,即为了应付高考,以“实践”为名,以“多练”为名,教师布置大量的、不切实际的练习让学生做。因为去年高考没有命题作文,考了一些语文基本功的测验题,于是大家就拼命抓语文知识练习。有些练习题出得很好,学生做了会有收获,但是也有一些出得不好的,就会劳而无功,徒然增加学生的负担。我们的教学与考试都要服从教育方针。教学与考试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教就怎么考,而不能怎样考就怎样教。考试指挥教学,甚至花上半年到一年时间,做大量的练习应付考试,把正常的教学工作放在一边,这样做,即使一些学生考取了,基础也是不牢靠的,何况还不一定能考取。教学跟着考试后面转,这跟封建科举考试时代差别不大。去年没考作文,今年考不考?有些人在猜,有说不会考的,也有说可能考的。说可能考的人,据说是从朱德熙先生的一篇文章中揣摩出来的。这跟科举时代大比之年打听哪位“大人”当“学台”很相像。那时候应试的人都是根据“学台大人”的爱好去猜题目作文章的。时代不同了,今天我们不能这样做了,考试是为了选拔人才,同时对教学工作也是个检查、督促,看看我们教学的效果怎样,从而有针对性地解决一些问题。如果让考试指挥教

学 ,并产生一些猜题、押宝之类的不正之风 ,那就很不好了。

(1979 年 4 月)



汉语语法的再研究

首先提一个问题：为什么在马建忠以前中国没有系统的语法、语法学、语法著作、语法研究？（这个“语法”，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词类、句子成分、单句、复句等等）古代的希腊、印度，早在纪元前几世纪就有了他们的语法学。而我们中国，人文工艺都曾经领先于世界，为什么独独中国没有产生过这样的语法学？

我想，是因为中国人一直没有感觉到需要，所以就不去研究它，所以就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学科。如果进一步问：为什么我们没有感到这样的需要呢？以下就是我的—些不成熟的看法和推论。我认为语言诸要素当中，无论针对语言事实本身，还是针对语言所体现的交际功能来说，第一位的因素是语汇，而不是语法。语言功能，无非是交流信息，或者说表情达意。这“信息”和“情意”的载体，正是语汇。这种认识和分析，应该适用于任何一种语言。而汉语由于自身的特点，这种认识和分析显得尤为重要。

北京孩子管交际受阻、张不开嘴，叫“没词儿了”。可见有词儿没词儿，比什么都重要。普通话说“你先走”，广东话说“你行先”。语序颠倒，但照样能明白。大街上的广告：“齐洛瓦电冰箱百货大楼有售。”什么叫“有售”？“有”是动词，“售”也是动词，这算什么组合？什么语法关系？这本是广东说法，

但大家都懂、都接受，所以各处都用开了。

大家都把语音、语汇、语法并列为语言的三要素。我对这个提法表示怀疑。我认为这三者并非处于同一平面上。我认为第一个层面是语汇，这是概念、思维的物质基础，是信息的载体。第二个层面是语音和文字。此二者把语言的交际过程现实化，前者形于口语，后者成为书面语言。近年来，研究语言的有忽视文字的倾向。其实文字的创造可以看做人类的第一次信息技术革命，它极大地扩大和加强了语言的表达功能，其效果是难以衡量、计算的。人们对此往往估计不足。语言的第三个层面是语法。有了语汇，总还须要组合，这就要讲组合的法则，这就产生了语法。

由于语汇、文字在语言诸因素中的地位很重要，更由于汉语缺乏通过形态来表现的相当复杂的、外在的语法条例和规则，所以我国古代学者把注意力集中在最迫切需要的方面，搞起了文字训诂之学。我国学者一开始就把注意力集中于语言较深的层面，这是很有眼光的，至今仍然领先于世界。我国古代文字训诂之学形成了独特完整的理论、方法和体系，与希腊、印度一起，形成早期世界语言学的三个中心。两汉以后，由于翻译佛教经典的推动，又搞起了音韵之学。近百年来，才引进了西方的语法学。

“传统的文字、训诂、音韵之学，属于前科学的范畴”，这又是一个流行的观点。我对此历来未敢苟同。历史长河是无尽头的，科学的发展也是无止境的。任何光辉的科学成果总会被后人所超过。“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在无尽止的、不断更新的历史中划定一条鸿沟，并以此划分科学与前科学的界限，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至于语法,我把它放在第三个层面。时至今日,我们对汉语语法的本质,了解得并不清楚。我这里提出对汉语语法要“再认识”,就是说对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探讨。

随着科学的发展、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语言学领域的一些基本概念也随之须得更新,一些基本法则可能也要重新估计。比如我们历来都说,语言是人和人之间互相交际、交流思想、达到相互了解的工具。这里所说的交际功能,是语言的原始功能,指人际的、面对面的交际。而今天,人可以和海底交际,可以和太空交际;人不仅同人,还可以同机器交际;语言不仅可以转换为文字,还可以转换成数码和公式,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语言的功能、语言的定义是否要做一番新的考虑呢?

对待现代汉语语法,就更加需要跟现代科技的进展联系起来,对它进行更加深入的、更为切合汉语实际的研究。例如现在讲语法,讲究搞切分,不断地一分为二,一直切割到最小。但用之于计算机,就不是分得越细碎越好。计算机比较擅长识别和理解大一点的语言单位,而很难分辨碎小的部件。比如专有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单位来处理,只用一个数码代替,就比较好办。如只出现一个“中”,是“中华”的“中”,或是“钟表”的“钟”?机器就难以判断。

再研究,并非蓄意标新立异,而是现实生活提出了需要。再研究,也并不意味着否定前人的一切成果。我们感谢以马建忠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率先引进了西方的语法学体系,我们充分肯定他们巨大的历史功绩。但事情并非到此为止。作为后人,我们有我们要干的事,我们要完成我们的任务。引进之后,

应该进一步消化、改造,创造出适合我们民族特点的,可以算做是我们自己的一套来。

以印欧语系的语言为基础而产生的语法框架和语言学理论,从根本上同汉语不相适应。印欧语都是形态语,所以他们的语法框架照例包括形态学和造句法两大部分,尽管两部分内容有时相互交错。这个框架从根本上说是不适用于汉语的。汉语本身是“非形态语言”。形态语和非形态语是明显不同的两种语言体系,我们应当理直气壮、明白无误地确认汉语“非形态”这一事实,从而有勇气打破印欧语的语法框架,探索和建立汉语自己的语法体系。但摆脱传统观念是困难的。人们的研究工作,似乎总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弥补汉语无形态的“缺憾”,在那里用心良苦地寻找,发现汉语的“广义的形态”,或“不太严格的意义下的形态”。这是否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凡语言必有形态”的观念在作祟呢?难道凡语言必有形态吗?这是从归纳语言事实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吗?至少没有把汉语考虑进去。

从形态语和非形态语对立的角度去观察,就会发现汉语和欧洲语言有许多根本不同的性质和现象。这种观察和思考,有助于我们在汉语语法的研究中别开新的生面,有助于我们对一些传统的、先入为主的观念进行反思。

从历史的观点看,英语的形态已日趋脱落和简化,但英语仍然有形态,因而保持了形态语言的基本特征,因此,汉语和英语词类的语法功能就有很大差别。英语的名词可以很方便地拿来作动词用。例如:“to water the flower”(浇花),名词“水”直接用成动词。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形态。每当变化的时候,它就按动词的规则来变化。如:“She watered the flowers”(她



浇过花了)。有了“ed”，就有了形态标志。就比如花木兰，本是闺中女子，一旦穿上甲冑，她就成了男人、士兵、元帅。这样的例子还很多，例如扔石头去打一个东西，可以说“to stone it”；用电熨斗烫衣服，可以说“Iron the shirt”。一则小故事说，一个孩子老缠着父亲，嘴里不断“爸爸、爸爸”地叫，叫得父亲心烦，于是父亲说：“Don't papa me all day long！”这些说法汉语可以吗？“石头它。”“铁衬衫。”“别爸爸我！”这成什么话呢？

相反的情况是，汉语的动词、形容词可以很方便地放在主语或宾语的位置上，可以当成名词来用。例如我们既可以说“学习语文”，又可以说“语文学习”，两个“学习”有什么不同？又比如，我们可以说“方桌子”，又可以说“木头桌子”，还可以说“折叠桌子”。“方”“木头”“折叠”分别是形容词、名词和动词，但却出现在相同的位置上，充当相同的句子成分。英语里面却不行。因为英语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分别有不同的形态特征。英语要把动词拿过来当名词用，一般就得在原形动词前加个“to”，变成“infinitive”（动词不定式），或者在尾巴上加个“ing”，变成“gerund”（动名词）。例如“折叠桌子”，英语大概就要说“folding table”。

英语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由于各自具备不同的形态特征，所以它们的区分界限一般是很清楚的。就是在“跨类”或“兼类”的情况下，也是履行了“合法程序”，因而是“手续完备”的。汉语却不是这样。汉语的“动词”“名词”“形容词”的界限本来不那么清楚，而且进行英语那样的词类区分，实际意义也是不太大的，因此汉语的词是否有必要按传统的做法那样，分作八大类或九大类，这也是值得重新研究的。

说到这里 ,可以探讨一下所谓汉语自身的语法规则到底是指什么?我认为它既不是通过形态表现出来的语法规范和条例 ,也不是用语序虚词就能包纳罄尽的东西。它实际上就是汉语各级语言单位加以组合和使用时的一些规则。这种规则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强制性的规则。所谓强制性规则是说非这样用不可的规则。这类规则如加以归纳整理 ,可以预见是数量有限 ,不会很多的。第二类规则是选择性规则。有些规则一般来说应当这样用 ,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变通 ,这样就有选择的余地。或者说同时存在着几种相近或相似的表达公式 ,可供选择 ,可以替换。相似与相近之间 ,又存在着微妙而复杂的差异 ,在语法、逻辑、修辞、语气等诸多方面表现出来。如何选择 ,虽不一定涉及正误的问题 ,却有优劣、巧拙、高下之分。这一类规则可以预料是数量很多 ,而且相当复杂的。汉语的灵活、丰富、准确、多变的特点都表现在这里。这是使用汉语时的要点和难点 ,也是研究汉语时的要点和难点。

这就是我对汉语语法的理解 ,它是各级语言单位的组合法则 ,把小单位组合成大单位 ,而不是把大单位切割成小单位。这样理解 ,也并不和形态语言相矛盾。形态语言同样要进行组合 ,不组合就不成其为语言 ,只不过各自的组合手段不同罢了。正如把木料组合成家具 ,可以使用钉子 ,可以使用胶合剂 ,也可以使用镶嵌法。形态语的组合主要靠形态变化 ,汉语则依靠语序和辅助词多一些 ,还有其他一些因素。

约俗就是语法 ,看来似乎没有道理 ,但它就是法则。20 世纪 50 年代曾讨论“恢复疲劳”的说法是否合理 :使疲劳恢复 ,这不正和原意相悖吗?后来北京日报让我写篇文章作为结束。我在文章中曾举例说 ,我们经常说“养花”“养鱼”“养鸟” ,是



越养越大,但我们又经常说“养病”“养伤”,是越养越小,直到完全消失。两者都符合习惯、符合语法。同样,我们一面说“恢复健康”,又一面说“恢复疲劳”,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北方说“喝茶”,长江流域说“吃茶”,广东说“饮茶”,为什么?就是约定俗成。所以约俗就是法则,约俗是最高权威,有时义理都要向它让步。

义理和修辞都不是语法,但对于汉语,义理(逻辑)、修辞和语法实在不可分家。王力、吕叔湘先生都说过同样意思的话:我们讲语法,实在是用语法术语在讲逻辑。所以吕叔湘先生因此而编写《语法修辞讲话》。这都说明我们在讲汉语语法时,要回避和绕开逻辑与修辞是不必要的,也是办不到的。

语言单位内部、语言单位之间的组合方式、组合关系如何呢?首先一个特点是,汉语的各级单位的组合关系,大体上是一以贯之的。各级语言单位,基本上遵循同一套组合方法。这种组合法则归纳起来就是两大类:联合关系的、非联合关系的。再细分,还可分出若干小类。联合关系,表明参加组合的成分在语法上关系平等。联合的成分并非都是两部分,有二合、三合乃至多合。现在有一种受结构主义影响的倾向,用切分的办法分析句子,总是不断地一分为二,好像汉语的结构都是两分的,其实不然。至少有一种到今天并未被大家否定的结构方式,叫“递式”或“递谓式”。这种结构就很难用一分为二的方式切割开。联合关系还有不同情况,有的是正联,如“高大”“雄伟”;有的是负联,如“好歹”“死活”,等等。非联合式的组合,即成分之间有主次、轻重之分。但这是从语法角度看问题。语法上的主次、轻重在义理、逻辑的观点来看,往往不是一回事。非联合关系又可分为两大类:陈述关系和修饰关系。再细

致一点,还可以再分。以上是关于组合关系的轮廓叙述。

组合的结果可产生语组、语句,还可产生更大的单位。各级语言单位中,语组这一级是最核心的,是中坚部分。它是组合起来进行交际的基本单位和材料。我们以语组为原料,才能组合成更大的单位。而语组在一定条件下(放在一定环境中,加上一定的语气),它本身就可以成为交际的单位,完成一定的交际任务。语组当中,数量最大、地位最重要的是词,成语、习惯语等都难以和它相比。语法研究当中,产生问题最多的也是词。

要不要给汉语的词进行分类呢?我认为还是要分的。至于是否还照欧洲语言的模式,分作名、动、形等八类、九类或十类?我看可以研究。我认为现实可分的首先是四大类。

第一类是实体词,即表示事物的实体,或附着于事物的某些功能、性质、状态等。这类词事实上包括了传统所谓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这类词从语法上说,有一些共同的、主要的特点。

第二大类是关系词,它不是实体,但可以表示实体之间的种种关系,如联缀、领属、修饰、补充等种种关系。

第三大类是辅助词。它不仅不是实体,甚至连表示关系的作用也说不上。它们常常依附在词、词组和语句之后,表示一定的附加意义。

第四大类是孤立词。它的特点是不和任何别的成分组合,也不和它们发生什么关系,如叹词。

把词分作这样四大类,对汉语来说是比较有用的,也是比较可行的。如果考虑到各大类内部的一些差别,也不排斥考虑作相对细一点的内部区分。



以上所讲仅是一个轮廓。也许连轮廓也说不上 ,仅是一些
念头和设想。谨以此就教于今天到会的老年和少年的朋友。

181

(1990 年 3 月)

改进中学语法教学

同志们,老师们:

首先表个态:我认为,课题组做了这样一项工作,拟定了“中学语法教学实施意见”,是做了一件大好事。提出的这个“实施意见”,综合了教师、学生等各方面的情况,有根据,有调查,也是基本可行的。

刚才胡明扬先生说:改革的步子不够大,中学语法教学得动大手术。我同意这个意见。如果时间许可,我也想讲讲我的动大手术的设想。问题是:大手术能不能一蹴而就,一步到位;即使一下子就能提出个方案(其实不可能),教师能否承受得了?所以,尽管我同意胡先生的意见,但我仍认为现在这个实施意见是切实可行的,是可取的。

为什么说是可取的呢?

我首先为汉语语法和语法教学诉苦,说说它们走过的坎坷道路和今天的可怜处境。马建忠以前,那么长的历史,我们只有零星的带点语法性的论述,没有系统的语法学,没有语法学专著,没有像《说文》或者更早的《尔雅》、《方言》那样的文字、训诂学专著。文字、训诂之学在我国出现得很早,研究得很深入,在世界上研究文字、训诂之学,也就是语义之学,我们国家可以说是最先进的。为什么独独没有语法学呢?马建忠之前没有,马建忠之后有了,但他的《马氏文通》受到重视了没有



呢？没有。社会上没有多少人重视，洋学校没有几家采用。这以后，变法维新时，主张全盘西化的严复写了一本《英文汉诂》，讲的虽然是英语语法，但对汉语语法的发展影响很大。五四运动前后，出现了一些讲现代汉语语法的书，其中代表性著作是黎锦熙先生的《新著国语文法》。这两种书对汉语语法学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社会上重视了没有呢？没有。只有少数学校讲语法课，多半就用黎先生的《新著国语文法》。这是建国前语法和语法教学被冷落的命运：古人根本不理睬它，马建忠以后少数人理睬了，但仍然没有引起社会上普遍的重视。

20 世纪 50 年代初，发生了两件大事。头一件事，国家号召学语法，学修辞，学逻辑，也就是 1950 年的所谓“6.6”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与此同时，发表吕叔湘、朱德熙两先生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这是国内的一件大事。第二件事，更大了，斯大林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头一件事，具体表现为全社会重视语法了，然而《语法修辞讲话》本身就是语法和修辞合在一起的，而不是独立的语法。这个“修辞”就是陈望道先生提出的所谓“消极修辞”——改错。历史上也有过，像《淳南遗老集》中就有过这样的部分，专门挑古代名著里的毛病。这只是修辞的一个方面，避免一些不妥当的表达方式，如配合不当。但是，所谓配合不当，是什么配合不当呢？不是西方语言的形态不对，而是意义上不搭配。像叶圣陶先生说的“吃饭”之类，是“喝”和“饭”这两样东西在意义上不搭配。这不是语法问题，是语义问题、习惯问题、逻辑事理问题。记得语法学界老前辈王力先生、吕叔湘先生都说过

这样的话 讲汉语语法 ,其实就是用语法的名词术语讲逻辑。不搭配 ,是意义不搭配 ,而不是语法不搭配。因此 ,语法、修辞、逻辑结合在一起 ,比较符合汉语的实际 ,因为这三者不怎么分得开。如果我说“我两圈 ,他三圈” ,两个主谓结构 ,合乎语法 ,但你能懂吗? 这样的语法分析有什么用呢? 但有了上下文的语境(这是修辞问题了)就能懂了 ,比如“我们打了一阵麻将 ,我两圈 ,他三圈” ,或者“我们俩每天围着景山跑步 ,我两圈 ,他三圈” ,这就通了。有了语境才能辨别正误 ,且不要说优劣 ,语法分析还有什么用呢? 洋语法 ,应该是只要合乎语法结构 ,不需要语境就能表达明确的意思。这是国内的一件大事。

另一件大事 ,斯大林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为什么劳斯大林大驾写关于语言的一本小书呢? 那时候有一个马尔语言学派 ,认为语言有阶级性 ,而且成为学阀 ,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还有一个学派 ,叫做“新语言学派” ,也是学阀性的 ,主张不讲语法 ,要取消语法。因为有了学霸式的错误流派 ,所以必须斯大林出来讲 ,讲语言没有阶级性 ,讲学习和研究语法是必要的 ,斯大林讲了不少 ,还给语法下了定义 :语法是词的变化和组词成句的规则的综合。

受这两件大事的影响 ,国内也开始重视语法了。当时社会变革比较大 ,语言的变动也比较大 ,出现了一些不规范的现象。于是《语法修辞讲话》应运而生 ,明确提出要“匡谬正俗” ,讲规范化。这个比较贴近我们汉语的实际 ,贴近当时语言需要的实际 ,所以行得通 ,作用很大。斯大林发表讲话后 ,我们的语法也大大发展 ,系统语法 ,也就是各种体系的语法大大发展 ,如雨后春笋。所谓体系问题 ,无非是名称术语和分析上有分歧。如果说“百家争鸣” ,我们语法界真正做到了 ,不只百家 ,有一本语



法书就有一个语法体系,就是一家。这一来语法受到重视了,而且搞语法研究的人特别多。为什么这么多呢?一是容易出成果,比如给词分类,他分八类,我分十类,还可以有小类,等等,成为不同的流派。二是比较安全,不介入政治问题,被揪辫子、扣帽子、打棍子的机会比其他社会学科少,人文学科更不要说。于是语法研究、语法教学大大抬头,每个学校都教。

被冷落了那么长的时间后,语法和语法教学忽然之间大发展起来。大概重视得过了点,近年来又走下坡路了,不那么重视了,不仅不重视,而且不欢迎了。有的人提出要“淡化语法”,何为“淡化”,就是淡一点,再淡一点,直至取消。不仅如此,甚至引起有的人的怒气,要“扭断语法的脖子”(某位知名作家语)。所以从大大地抬头,到抬过了头,又走回来了。

当前的处境是什么呢?倒没有人说取消算了,因为它是一种知识。那么,不要知识行不行呢?大概不会有人说行。每个人都知道,人类之所以发展到今天,有了今天的文明,就是因为知识在不断积累,而且越积累越快。因此不能否认知识。有的人把知识和能力对立起来,认为能力低,就是因为讲了知识。这话恐怕在逻辑上有些问题:知识有助于培养能力,有助于能力的提高,怎么会掌握了知识反倒抵消了能力呢?不过是什么年龄、什么条件下教什么知识需要好好考虑处理而已,处理不好,用处就不大,而不是抵消的问题。如果照抵消的说法来推论,李时珍没念过医药学却写出了《本草纲目》,医药学知识可以取消了,这显然不行。可是另一方面呢,它又不受欢迎,并且学了它确实没什么大用处。我和几个初三学生闲聊,问:“你们最喜欢什么课呀?”他们说:“那很难说,数学、物理、化学、音乐、体育、美术,哪一样都可能喜欢,每个人喜欢的也不相同。”

又问：“你们最不喜欢哪门课呢？”有个学生说：“有门课我们大家都不喜欢，但都不敢说。”我说：“在学校里、在老师面前不敢说，在我这里可以说吧。”“在您这里我们也不敢说。”那我就大概明白了，我又接着问：“第二不喜欢什么课呢？”有个同学说：“第二不喜欢的我们在学校敢说，在您这里不敢说。”我又明白了，这是说语文。我又问：“语文应该是很有兴趣的，为什么不喜欢呢？”“有两条：一是老师讲得太多，我们都懂了，他还在那没完没了的讲，本来很有兴趣的，讲来讲去，都把我们讲睡着了。二是语法，老是背名称术语，比如‘桌子’，知道它是名词怎么样，不知道又怎么样呢？桌子不还是‘桌子’吗？”问得我瞠目结舌，回答不出。这就道出了我们语法体系的无用。

凡事都要反思，用毛泽东主席的话讲，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辛辛苦苦搞语法，搞了这么多年，搞出来却没有用处呢？为什么当年搞“暂拟系统”，讨论来讨论去，又试教，又听意见，搞来搞去学了却用不上呢？记得试教的时候，有位同志将我的军：“张先生，您认为您现在讲的都是正确的吗？”我说：“是的，我不能把我认为不正确的东西讲给这么多老师听。”“那么，请问您还修改不修改呢？”我说：“改，一定要改。今天发现问题今天改，明天发现明天改，只是个时间长短、改动多少的问题。”这不能不令人反思。

反思一下，最根本的原因：汉语在运用时非常重视作语义的、事理的考虑，因为它是非形态的语言，而我们引进的是形态语言的语法，这在语言上是两个极端，当然许多地方会是格格不入的。比如名词，完整的定义应该是：具备性、数、格的变化（这是语法特征）的表示人或事物的名称的词。性、数、格的变化，在名词是必要的。主格是什么样子，宾格是什么样子，单数



是什么样子,复数是什么样子,等,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变化。因此,有形态的语言,知道是不是名词非常重要。当然,至于性数格有多么重要,还值得商榷。前苏联语言学大家谢尔巴院士说得非常高明:“与其说因为它有格的变化,所以才是名词,毋宁说因为它是个名词,所以才有格的变化。”非常妙。但是,它们在运用时,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上,都是有格的变化的,名词和格总是不可分的。而汉语恰恰没有这些东西。不仅汉语,像英语,这些变化脱落很多了,名词只还保留着数的变化,但是性、格的变化没有了。所以,讲英语语法,像《那氏文法》给名词下的定义是:表示人、地、事物名称的词。性、数、格的变化免了,免了就是意义的定义了。20世纪50年代,我们有一个大辩论,高名凯先生认为词不能分类,理由是:我们说的词都只有意义上的问题而没有语法问题。这是一个根本原因:用形态语言的语法框架讲非形态的汉语,二者是格格不入的,很多地方讲不通。

刚才说过,语法需要动大手术,其中之一就是,名词、动词、形容词未尝不可以不讲。这一划分有什么意义呢?桌子,可以说“长桌子”、“方桌子”,我们假定这是形容词修饰名词;也可以说“木头桌子”、“石头桌子”,假定是名词修饰名词;又来个“折叠桌子”,该怎么假定呢?是动词修饰名词吗?假如用活用说,“木头桌子”、“石头桌子”是名词活用为形容词,“折叠桌子”是动词活用为形容词吗?都可以活用,那名、动、形划分的意义又何在呢?又如“游泳”,“我喜欢游泳”,“我每天游泳一小时”,“游泳教练”,“游泳”到底是什么词呢?我曾经开玩笑,叶斯丕森(我很佩服他)曾讲过:古代语言语法更复杂,形态更多,语言越进步,语法就会越简单,形态脱落越多,所以英语很

高级,汉语更高级。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我不大相信原始人会有那么复杂的形态观念,很可能一块石头叫“石头”,用石头打也叫“石头他一下”,英语就可以说“to stone it”。我认为,语言无所谓高低之分,只要能成为良好的交际工具,就是好的语言。这是词类。词类以外还有句法,刚才已经举过“我两圈,他三圈”的例子。在《语言教学与研究》上有一位先生发表文章,否定汉语有单句复句之分。我觉得这也不无道理。从哪分呢?怎么来分呢?出现以上这些现象,根本原因就在于把两种语言硬用一个框架来对付是对付不了的。

但这不是说否定引进。我们的引进者马建忠、黎锦熙等诸位先生的功绩是巨大的,他们引进的西方语法学框架,对汉语语言学的发展、语法学的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问题在于引进后要消化、吸收,变成我们自己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几乎还不如我们的近邻日本。在古代,他们引进了中国文化,引进后就消化了,变为自己的东西。他们对引进我们的文化是很尊重的,鉴真和尚墓在他们是“特级国宝”。但他们引进后消化了,吸收了。而我们引进便引进,不消化。这是后人的责任,应该消化吸收,拿出一本汉语的汉语语法。但是没拿出来,到现在还在那儿亦步亦趋地赶呢。语法研究如此,汉语语法教学也因此遭遇了难、不易教、无用等情况。我个人接受了一位学语法的青年的教育,感觉到这一点。1956年,由《中国语文》编辑部出面在青岛召开一个语法座谈会,目的是讨论一下各种语法体系能否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尽量减少一些分歧。当时住在青岛饭店二楼。有一天晚上到楼下大厅看报,看到一位年轻服务员正在做语法练习。我凑过去问:“很有意思吧?”他回答说:“诚难哩啊!(山东话:实在难啊!)”我又说:“学什么不难啊!



有用嘛,加把劲,冲过去就好了!”他又说:“用不上啊!”犹如当头一棍,给我极大震动。第二天,以此为题,做了一篇慷慨激昂的发言,这就是《中国语文》1957年第1期上发表的《语法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用意义》。这以后便苦苦思索,第一步想到了六个字——精要、好懂、有用,后来写进语文教学大纲。

想出这六个字干什么呢?刚才说语法、语法教学走过那么坎坷的道路,当前的处境并不妙,那么出路何在呢?第一,要大家共同努力,建立汉语的汉语语法。在这方面我有过设想,今明年也许能拿个简要的提纲出来,抛块砖。我认为,语法是组合法,就是把语言成分组合起来。组合有一定的手段,就像用木头做桌子,可以用钉子钉,可以用胶粘,也可以直接镶嵌。汉语语法大体上属于镶嵌类。句子不一定是六大成分,汉语的句子就并不都是主语、谓语两大部分,等等。总而言之,我们要共同努力,建立汉语的汉语语法。第二,就目前语法研究状况,想些办法改进教学。刚才说我们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汉语的汉语语法,那么能不能等建立起来再教学呢?不能。打个比方,我们现在用吃西餐的餐具吃中餐,总的说不配套,但也未尝不可以凑合着用。再加上适当地改进改进,或西餐中吃,也可以用一用。这样,使得语法教学仍然发挥些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对汉语语法本身进行深入的研究。就是研究汉语语法本身,语文老师也最有发言权。他们会知道哪些讲法很容易讲,比较符合汉语实际,哪些讲法很难讲,甚至只能牵强附会地讲,让学生听起来困难,而且没什么用处。做这种判断,也是一线的语文教师最有发言权。问题是,我们没有给他们充足的条件和时间让他们研究这些东西。研究语法,语文老师责任重大,责无旁贷。另一方面,还是要劳劳专家们的大驾,去听听教师

们的意见、建议 ,争取建立起一个真正符合汉语实际的语法体系。体系还是要的 ,要研究 ,同时把“ 实施意见 ”作为一个治标的办法 ,教下去 ,让语法教学虽然不能产生那么理想的效果 ,至少让它有相当的改进 ,加强一下教语法和学语法的信心 ,不必再过多地淡化它 ,而使语法教学产生一定的实际效用 !

(本文是在 1995 年 1 月召开的北京中学语法教学研讨会(第二次)上的发言。王本华根据录音整理。)



修辞是一个选择过程

什么是修辞？修辞就是在运用语言的时候，根据一定的目的精心地选择语言材料这样一个工作过程。无论说话，还是写文章，就是把语言材料组织起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或者告诉别人一件事，说明一个问题，或者表示一个意见。语言材料很多，在表达的时候，有很大的选择余地。比如说，有个小孩很灵敏，很好玩，我很喜欢他。要把我对他的印象说出来，用什么词儿呢？用“灵”“机灵”“伶俐”“很鬼”“很有心眼儿”？或者用一般常说的“聪明”？这就有个选择，从中选一个最足以表示我对他的印象的说法。说一句话，可以有不同的说法，比如，可以说“这个小孩真聪明”，也可以说“这个小孩真不笨”，这又有所选择。“他心灵手巧，样样都行”，这句话很整齐；“他干什么都很出色，真行”，这句话不像上一句四个字四个字的，不整齐，但是也可以，也不错。我们可以很平实地说出对一个孩子的印象，“他举止动作活泼灵敏”，也可以打个比方，“这小孩真麻利，活像个小猴子”。这是随便举几个例子，从用词到说一句话，一段话，这里边可以选择的方面很多很多。认真细致地选择，并且能很迅速地选出最需要、最适当的说法，就是修辞的能力。上面举的是日常生活中不关重要的话。说重要的话，讲重要的道理，发表重要的意见，也需要选择，越是内容重要，越需要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修辞很重要，应该具有这种能力。

修辞不是把话这么装饰那么装饰,更不是自己制造什么花样翻新的说法,只不过是从现在有的语言材料中精心选择而已。创造性地运用是可以的。所谓创造性,是指在选择运用之中有独到之处。

修辞既是选择的过程,就得有选择标准。怎么选择?根据什么选择?怎么叫选择得好?怎么叫选择得不好?

选择语言材料是为了使我们说的话、写的文章具有准确性,就是能够把客观事物在我们头脑里的反映准确地表达出来。不仅准确,并且富有表现力。准确,富有表现力,这是我们选择语言材料最根本的考虑。就拿上面的例子说,说一个小孩“灵”“机灵”“伶俐”“很鬼”“很有心眼儿”,这些词语并不是毫无差别的,用哪一个能最准确地表达出我对这个小孩的印象呢?选择首先要从这里考虑:哪一种说法最准确。同样都准确,那就要考虑,用哪一个说法表现力更强,能够把我对小孩的很好的印象有力量地表达出来,使听的人,读的人受到更大的影响,能够和我产生共鸣呢?

所谓准确性、表现力,不能单单从自己主观方面考虑。语言是交际工具,有说的一方,有听的一方;有写的一方,有读的一方。说的人、写的人不仅要考虑主观方面的目的,也要考虑客观方面的要求。只有主客观统一,表达效果才会更好。比如,你说一件事,听的人在工作很忙、时间很紧的情况下听,希望你简明扼要地说,这是客观的希望和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左用一个比方,右用一个形容,希望自己说得生动形象,活灵活现。你的主观愿望不能说不好,但是不符合客观的要求,效果就不好。不论你的形象生动的语言选择得多么好,也达不到目的,作用会打折扣。听的人性急,不耐烦,反而可能听



不清楚,同你的主观愿望恰恰相反。所以,选择语言材料,进行修辞工作,既要考虑主观,又要考虑客观,力求主客观的统一。

这就涉及到对象和场合的问题了。如果你对一些孩子们讲一件事,用了一些抽象的、比较难懂的字眼,用了一些复杂的句子,总之,要很费一些思索才能够理解清楚。尽管你所选择的词、句子都不错,话组织得也不错,但是效果并不好,因为不适合对象。相反,如果你是对一些理解能力比较强的青年人、成年人说同一件事,几句话就可以说得清楚,你却反复解释,这样说了那样说,反反复复,效果也不会好,因为不适合对象。同样的一件事,对家里的人随便说说,向熟悉的同志介绍介绍,或者你觉得需要向领导反映一下,汇报汇报,在这些不同的场合,就需要有一定区别的讲法,就是说要得体。对你的家里人和熟悉的同志,很严肃,像煞有介事,或者向领导汇报,嘻嘻哈哈,“谈笑风生”,都不得体。所以,修辞,也就是选择语言材料,组织语言材料,要考虑对象,注意场合。话说得得体是很重要的。所谓得体并不是矫揉造作,更不是虚伪,说些言不由衷的话,那样根本谈不到得体与不得体。所谓得体,就是在这样的场合,同这样有关系的一些人说一件事,怎样说最恰当,合乎这种场合的要求,合乎听话人和说话人相互关系的要求。这可并不是说对于什么样的人说话可以大模大样,对于什么样的人说话要低三下四,不是指这种区别。对任何人说话都不应该大模大样,也不需要低三下四。不过,对象不同,说话总应该有些区别。无论对长者、老者说话,对年轻人或者比自己小得多的人说话,都须要诚实、亲切。对长者、老者,总要多一点尊敬的神态吧,对年轻人或者比自己小得多的人,总要多一点关切爱抚的神态吧,这就是得体的问题。对长者、老者、老师、长辈说话,

缺少应有的尊敬的表示 ;对一个孩子说话 ,缺少应有的关切爱抚的表示 ,那能够说是得体的吗 ?当别人称赞自己的时候 ,总应该有点谦逊的表示 ,但是 ,也得实事求是 ,谦逊过头 ,达到了不合事实的虚假程度 ,也就不得体了。相反 ,不谦逊 ,很不客气 ,哪怕自己确实做了一点有成绩的事情 ,不论对谁 ,表现了不谦逊 ,不客气 ,也是一种不得体。所谓得体 ,就是在真实的、实事求是的前提之下 ,根据具体的场合、具体的对象 ,采取恰当的说法 ,表现出自己一种应有的修养 ,一种比较高尚的思想精神面貌 ,这就是得体。不论口头上说话 ,书面上写文章 ,都应该考虑这个问题。所谓要讲点精神文明 ,要讲点语言美 ,并不是要学点花巧 ,而是要实事求是 ,要真实 ,亲切 ,而又得体。

说到这里 ,就自然要联系到选择语言材料 ,也就是说进行修辞工作的又一个重要的标准。那就是 :修辞有时代性 ,有社会性。语言有一个很长久的历史发展过程 ,从古到今 ,语言是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语言材料有不少是从古到今一直沿用的 ,也有不少是逐渐产生的一些新的材料 ,所以 ,它既有历史的连贯性 ,又有不同时代的时代性。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 ,语言交流思想感情 ,是一种社会活动。那么 ,它不能不受社会发展变革的影响。然而 ,语言又是一个全民性的交际工具 ,它不像社会变革那么剧烈。所以 ,在各个不同的社会里 ,它既有某些共同性的东西 ,又有不同社会的一些不同风气、特点的反映。因此 ,选择语言材料 ,怎么叫做选择得好 ,怎么叫做选择得不够好 ,或者不好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 ,既有要求相同的一面 ,又有不同的一面。学习修辞 ,不能完全没有时代观点 ,不能完全没有社会观点。静止地来讲 ,说某种修辞方法好 ,不考虑时代和社会的因素 ,这种讲法是不够准确的。我们今天的社会对



于语言的运用,首先要求准确性,也就是要求实事求是,要求朴实。当然也要求有表现力。然而,必须明确,表现力是在准确性的基础上存在的,失去了准确性,谈不到表现力。假话、大话、空话不论装饰得多么好,因为它是不准确的,所以它是缺乏表现力的,是我们不仅不提倡,并且反对的。一提到学习修辞,往往引起联想,就是怎样把话说得漂亮一些,怎样把文章写得漂亮一些。我们不反对说话说得漂亮,文章写得漂亮。美,优美,是我们所提倡的。但是,必须首先记住,只有在实事求是、准确、严密的基础上才能谈得到漂亮、优美。假话、大话、空话是最不优美的话,最不漂亮的话。当我们学习修辞的时候,这是首先要明确的。此外,现代化要求一切讲究速度,讲究效率。说话、写文章,也是这样。因此,我们提倡简洁,明快。像“推敲”的故事,像“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这些名句,作为认真仔细、一字不苟的写作态度,说明写作是一种艰苦的脑力劳动,不是马马虎虎就可以取得成就的,讲讲未尝不好。但是,在我们的写作实践中,需要的是既严肃而又敏捷的态度和能力。为一个字琢磨好半天,以至穷年累月地去下修辞的功夫,我们不去过多地提倡。这也可以认为是修辞有时代性的一个方面。

最后要说到,修辞既是一个选择过程,那么,只有我们对于语言知道得多,在我们头脑里有丰富的积累,才有选择的余地。如果头脑里的语言材料很贫乏,总共就知道那么一点点,就会那么一点点,还说得上什么选择呢?要达到基本上准确都很困难,因为语言材料不够用,表现力就更谈不上了。所以,通过广泛阅读优秀的读物,平时从各个渠道留心生活里的那些优美的有用的语言材料,不断地充实自己的语言积累,才能使自己的

头脑里有一个丰富的语言宝库。在这种情况下 ,当我们需要的时候 ,才能从这个宝库中选择出所需要的材料。因此 ,学习修辞 ,先决的条件是要丰富自己的语言 ,不这样 ,谈不到修辞能力。所以 ,仅仅把修辞看成为一种技巧或技术是不够的。丰富语言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 ,它同思想的提高 ,知识的充实 ,生活经验的积累 ,关系非常密切。在这样的基础上 ,语言会逐渐地丰富起来。有了丰富的语言积累 ,同时学习一点修辞知识 ,这时 ,修辞知识才会更好地发挥作用 ,使我们运用语言的能力提高起来。

(选自《修辞和修辞教学》(中国修辞学会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5 年 7 月出版)。)



非常需要一种桥梁性学科

在语言学界和语文教学界,多年来存在着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那就是怎样把汉语语言学的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同培养听说读写的应用能力(也就是语文教学)实实在在地结合起来。这个老大难问题困扰着许多希望语言学的基础知识、基础理论能够为语言应用服务的语言学家,也困扰着许多感到语文教学需要语言学基础理论指导的语文教育家。

认真想一想就不难理解,语言学的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同语言应用的确不容易直接挂起钩来。比如讲语音知识,无论是按传统的声韵学的讲法,还是按现代的语音学的讲法,都与实际的听话和说话关系不大。这里姑且按语音学的讲法吧,讲什么叫语音,什么是音素,什么是音位,什么是元音,什么是辅音,什么是音节,什么是声调,什么是调类,什么是调值,汉语普通话有四个声调加一个轻声,有的方言也是四个声调,但调值不同,不少方言有五、六个以至八、九个声调,等等。这种基础知识还有很多,教起来和学起来都相当吃力,可怎么为培养提高听、说能力服务呢?两三岁的孩子没有学过这些知识,不是照样会听会说吗?再比如,语法的基础知识,讲什么是语素,什么是词,词是怎样构成的,词有多少类,什么是句子,什么是句子成分,句子成分有主语、谓语、宾语等六种,什么是单句,什么是复句,等等,这些知识又怎么为培养提高读、写能力服务呢?要

说完全没用倒也不是,可是用处实在不大。从积极方面说,大概遇见长而复杂的句子可以分解分解;从消极方面说,大概会挑挑毛病(平常叫做改病句)。这点用处同学它的时候所费的力气很不相称,有时候甚至于让人感到它毫无用处。

好些年前就有人论证说:司马迁没学过语法,曹雪芹没学过语法,文章写得都那么漂亮,可是有的人语法讲得头头是道,照样写不好文章。学语法又有什么用呢?直到今天,许多人还是认为语法是难学而无用的。于是有的人忽视它,有的人讨厌它,有的人甚至痛恨它。最近有些人很委婉地说“要淡化语法”,实在的意思就是不要语法。听说有位作家不那么委婉,干脆要“扭断语法的脖子”,表明他对语法恨之入骨。当然,这里边有两种误解。其一,两岁的小孩也好,司马迁、曹雪芹也好,他们都学过语法,是在语言活动中学的,只是没念过语法书而已。其二,文章写得好或者不好,原因是多方面的,懂不懂点语法,只是因素之一。没有任何一本语法书上宣称:“好好学语法,包你的文章写得好。”学了语法不一定写出好文章,的确如此,可也得不出这样的结论:不学语法一定写得出好文章。不过,说实在的,语言学自语言学,语言教学自语言教学,互不相干,互不相谋,这种现象确实存在。那么,教语文的教师用什么方法来培养提高学生的读写能力呢?没有理论指导,只能各行其是:或者全凭个人瞎摸索,凭个人经验;或者是使用“祖传秘方”——多读,多背,自然会写得好,不是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吗?那么,要读哪些东西呢?要读多少才管用呢?怎样读法呢?又是各人有各人的选法,算法,教法,各行其是。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这样的苗头:理论研究有所前进,也越来越深入,但是跟语文教学似乎越来越疏远了。各种理论观



点,各种流派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使语文教师感到目不暇接,可望而不可即。而青少年以至成年的语文工作者之中,有不小的一部分,语文水平有向下倾斜之势。我们不应讳言,而应面对这个现实。

难道这种两头不能直接挂起钩来的问题是个不治之症吗?不是。这里需要运用我们的一句老格言:研究任何问题要能“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既要能对问题本身深入钻研进去,又要能从问题本身跳出来,前后左右张望张望,这样才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子。不能“入乎其内”不行,不能“出乎其外”也不行。经过这样思考,就不难想到像这样一类事实,比如一头是物理学的基础理论科学的一部分——力学,一头是应用科学——建筑,盖房子。力学的基础知识同盖房子怎么挂起钩来呢?我们知道,需要经过一个中间站,比如“材料力学”“结构力学”等。物理学中力学的基础知识与“材料”“结构”结合起来研究,才能把两头拉到一起来。又比如,一头是生理学,解剖学,一头是绘画中的人物画法,两头看来也不搭界。但是有了“艺用人体解剖学”这个中间站,就把基础理论的生理学、解剖学同应用领域的绘画联系起来了。像“材料力学”“结构力学”“艺用人体解剖学”这类学科,我们可以称之为“桥梁性学科”。桥梁是过渡用的,从此岸到达彼岸。没有这个桥梁,就只好望河兴叹了。

从上面说的两个事例,我们发现,原来在基础知识、基础理论这一端与实际应用那一端,需要有也可能有一种桥梁性学科把两端挂起钩来。我们应该从这里得到启发,提出一个问题:在语言学的各种基础知识、基础理论这一端,同培养提高听、说、读、写能力这实际应用的另一端,是不是也需要、而且也有

可能建立一种桥梁性学科呢？答案是：十分需要，也完全可能。我们的前人早就这样做过，也许并不是十分自觉的。我国从很早的年代开始，就有我们的古代语言学，包括训诂学、文字学，以及稍后一点儿出现的声韵学，这是一端；我们自古以来也就有语文教学，虽然没有这样称呼，但实际是在这样做，也就是培养提高听、说、读、写的实际运用能力，这是另一端。只不过，从封建社会中期以下，对听、说越来越忽视，而侧重在读、写。这是有缘故的。一个原因是从秦汉以下，书面语言逐渐定型，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文言”，它同生活实际中使用的不断变化着的口头语言逐渐脱节，并且距离越来越大。而封建社会的当权者要选拔他们所需要的人才，只能通过书面语言，这就是平常说的“以文取士”。“文”就是书面语言，文言既和口头上实际使用的语言差距越来越大，因此，它无法从生活实践中直接学到，只能靠阅读尽可能多的用文言写的作品。这样，随着时代的发展，文言就越来越难学，读写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于是，给了人们这样一种错觉，仿佛口头语言是不需要学、不需要教的，几岁的孩子就能听能说很多的话，甚至连文盲的口头语言也可能是很流畅的，那还学它干什么呢？因此，无论是教的人、学的人统统把注意力集中到书面语言上去。另一个原因，汉字是一种独特的文字系统，学习掌握起来有它的难处，特别是在初学阶段，这也助长了人们忽视口头语言、只重视书面语言的这种想法和做法。恰巧，古代汉语语言学的两个最重要的部门——训诂学和文字学，又都是跟书面语言有密切关系的。后来有了声韵学，声韵学本来和诗歌（包括诗、词、曲）关系密切，也就是比较接近口头语言——诗歌是可以唱的，有些甚至是可以半说半唱的，所以诗歌中往往有口头语言成分，或者很接近口头语



言的成分。但是,如上所述,文言、书面语言力量那么强大,所以除了民歌民谣之类的诗歌形式外,知识分子的诗、词、曲也逐渐书面化了。这样,就全面形成了以读写为主要内容的语文教学——这种情形一直影响到现在,语文教学一直以读写为主,忽视口头语言的训练。

既然我国很早就有自己的古代语言学——训诂学、文字学和声韵学,同时也有我们自己的语文教学——以读、写为主的语文教学,于是就发生了语言学的基础知识、基础理论怎样同应用领域——语文教学的培养提高读、写能力挂起钩来的问题。我们的古人对这个问题显然是感觉到了,并且不断地尝试把这两方面挂起钩来的办法,也就是想出一种桥梁性的、过渡性的办法。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是一部承前启后的桥梁性学科的巨著。它总结前人的经验,开辟其后的道路,把古代语言学的基础知识、基础理论的内容同读和写这种语言应用方面的内容熔于一炉。此后,沿着刘勰所开辟的道路前进的很有一些,例如金元时期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王构的《修辞鉴衡》就都属于这一类。一直到清代唐彪的《读书作文谱》,也应该说是属于这一类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明清两代在启蒙教育阶段设置了一门课——“属对”,或称“对课”,这是非常显著的一种桥梁性学科。由于汉语汉字的特点,自古以来在各种著作中经常运用对偶这种形式,到了骈体文时代,发展到极致,许多文章全篇通通是对偶。这种完全流于形式的文风当然是不可取的,所以不久之后就产生了古文运动,反对那种做法。不过,就是在古文运动时期以及其后,对偶还是被经常使用的一种表达形式,韩愈、柳宗元的文章中都有,至于《滕王阁序》《醉翁亭记》《岳阳楼记》等等,也几乎是句句成对的,只是不那么严格

就是了。特别是在近体诗形成以后,在律诗和绝句里,规定某两句必须是对偶。再加上唐代近体诗非常发达,当权者又极其重视,以至“以诗取士”,经常通过诗歌的写作能力选拔人才,这样,教书的和读书的教学对偶当然也就逐渐多起来了。到了明代,索性把训练对偶列为蒙学阶段的一门必修课,这门课的作用就超越了为作诗做准备的范围,成为一门综合性的语文基础训练课。这种基础训练的性质可以说是典型的桥梁性的,把训诂学、文字学、声韵学等古代语言学的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同读书为文的语言应用训练紧密地挂起钩来了——“对课”既有选字用词的训练,又有声韵的训练,语法的训练以至逻辑的训练。对此有兴趣的同志可参阅拙作《传统语文教育初探》(1962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初版,1980年再版;也收入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张志公文集》第三卷;不久之后,将仍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改定本《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

以上谈了我国古代探讨、尝试在语言学的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同语言应用之间挂起钩来的一些办法,值得我们参考、研究。本文作者曾经倡议建立一门学科——辞章学,从1980年起,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师范学院等处试讲过几次,目前再次试讲,讲完之后也许可能出版一本“辞章学摘要”之类。这门课就是试图在汉语语言学及其各分支学科的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同培养提高听、说、读、写的语言应用能力之间起一些桥梁性作用。前边说的一些事实表明,建立桥梁性学科有必要性,也有可能性,如果这个问题能引起一些同志的兴趣,大家多方尝试、实验,很可能会产生出不止一两种适合于当前实际情况的起桥梁性、过渡性作用的办法。前人的许多做法可以供我们参考,作者本人的尝试只是抛砖引玉而已。



必须说明,这里只是着重指出建立“桥梁性学科”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不是说,语言学及其分支学科的研究和教学不需要了,也不是说语文教学不需要结合教育学、心理学等研究自己的内容、程序、方法等等,只要等待那种“桥梁性学科”来临就行了。架桥需要桥两头的人合力来办。不过在今天这个场合——以理论工作的专家学者为主的学术座谈会上(当然有教师,然而都是大学的教授、副教授们,属于专家之流,和理论工作更接近些),我这个杂而不专、杂而不成家的语文工作者愿意代中小幼教育工作者向在座诸位呼吁,多关心一点儿童的语言教育和对青少年的语文教学吧。我希望,也相信,今后不再会时常听见“这是他们中小学教师的事,不是我们的事”这种说法了。平心而论,架桥工程恐怕主要得靠科学家、理论家来设计、施工,教师们只是提供一些材料,提出某些问题和要求,然后正确使用架起来的桥,并且在使用中检验它,提出如何改进、加固的建议;只有双方共同努力,才能真正架起知识与运用之间的过渡性桥梁。

贸然提出如上一个构想,请多多指教。

(本文是在中国语文研究40年讨论会上的发言,后整理成文收入《中国语文研究四十年纪念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王本华根据录音整理。)

篇章论(上)

前面几讲主要讲了与汉语辞章学有关的几个问题,从这一讲起,我们开始接触汉语辞章学本身。

汉语辞章学本身预计包括八个部分(讲着再看实际情况),无论讲哪一部分,都请记住以下三个要点,也可以说是辞章学的三个特点:1. 经济。现代辞章不是要把一段拉长成一篇,而是要把长篇尽可能地缩短,再缩短,缩短到用一段就能说清楚最好。因为社会发展得太快了,时间太宝贵了。2. 准确。辞章,无论是发出信息还是接收信息,都要以准确为目标。3. 讲效率。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凡事都要讲究速度,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达到一定的目的。以上三点可以说是现代化社会对辞章提出的新要求。我国传统中,由于封建社会历史长,由于封闭的个体小农经济是粗放经营,“慢工出细活”,不讲究速度,不讲究效率,甚至也不讲究科学。虽然也能出成绩,但已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化的要求。我们不是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吗?辞章的运用也应注意到这方面。下面我们本着这样的思路,讲讲篇章。

为什么一接触汉语辞章学本身就开始讲“篇章”呢?为了初步解除这个疑问,不得不先说几句题外的话。

以往讲语言,有两条“规矩”,或者说是“默契”。这两条,你们大概都会知道的,一条是:语法只管到句子为止,句子以上



不归语法管；一条是：语法只管（或主要管）“正、误”问题，不管“优、劣”问题。那么，句子以上和优劣问题归谁管呢？文艺学不管，文章学不管，逻辑学更不管。语文教学想管，但是无所本，怎么管法呢？

逐渐，若干学者对那两条“规矩”发生疑问了。第一，在不少时候，一个句子不够用，传达不了一个让对方能够明晰理解的信息，非得两三个甚至更多的句子连着说不可。比如，“我是北京人。”孤立的这一个句子传达不了多少信息（信息量甚低），听的人一定还等待着接着要说的话。比如，“我是北京人，他是天津人，老李是沈阳人，说话彼此都能懂。”这就好多了，但是听的人也许还指望知道，“那么，谁和谁语言不相通呢？”不能说，这些句子之间没有密切的关系，不仅有意念关系，甚至也不无结构组合的关系。

于是慢慢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课题。名称很多，流行较广的是“话语”——不必抠这个字眼，反正这一路字眼大部分是从外语翻译过来的，这里就不列举那些原词了。比如“话语”，英语称为 discourse，近年有个题目叫做“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颇有些人写这类论文或书。但是，discourse（话语）是什么呢？定义、界说不止一两种，颇有分歧。无论如何，它不是个句子，比句子大得多。我们暂不多谈这些问题。反正，句子的藩篱被突破了。我比较有兴趣的是第二、第三两个问题。第二，一个孤立的句子，时常正、误难分，优、劣尤其难辨。比如，“我两圈，他五圈。”这是什么意思？以“我”为主语，“两圈”为谓语，这是个正确的句子吗？恐怕最宽容的语文老师也要给它打叉或画杠的，至少打个问号。如再加点什么，比如：“我们俩每天早晨围着景山跑步，我两圈，他五圈。”恐怕再严格的老师

也不会打叉,也不会画问号,因为意思明白了。

那么,这种包含不止一个句子的、能够完成一次相对完整的交流思想感情或者交流信息的任务的整体是什么呢?前边说过,有不止一种名称,都是外来的,例如“话语”“超句子统一体”等。其实,咱们传统的辞章学中所说的“篇”“章”“篇章”,所指大体上就是这个东西。

在实际的语言应用中,也就是在以语言为工具进行交流思想感情或交流信息的活动中,从来都是以篇为单位的,篇可长可短,视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或所要发出的信息的内容而定,并且受语言环境、交流对象等因素的制约。就连所谓“文章”也并不都是很长的。历史上有些很短的脍炙人口的名文,如韩愈《杂说四》(“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151字,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117字,刘禹锡《陋室铭》82字,王安石《读孟尝君传》88字。现代白话文也有很短的篇。电报文是短篇文章的突出的例子,最短的只要两三个、三五个字就行。不论多短,必须承认它是一篇文章,因为它足以完成发出一个信息的任务,往往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所以才用电报)。现在又有了传真,可长可短,比电报回旋余地大一些,但一般也力求简短。

倘若在一次表达中必须说清楚的内容比较多,一口气说不下来,那就得分作两气、三气或者更多气来说。于是产生了介乎字句和篇之间的两个以上的片段,平常叫做段或者段落,用传统的说法就是“章”。实际上,一段,一个段落,或者一章,也就是一篇,或者说是一篇的具体而微。

“章”有好几个含义。一、“文章”的意思,例如“章法”就是文章的法则或技法;二、一本著作的组成部分,大体就是“章



回小说”里的那个“章”，借用来翻译英语的 chapter；三、传统辞章学中对段或段落的称呼；四、此外还有些别的含义，如“图章”、“签名盖章”的“章”等等。我们这里讲的是第三义的“章”。

章很重要。前边说过，章介于字句和篇之间。我们知道，越是小的语言片段，多义现象越显著，离开语言环境时歧义也越多。上边说过，像“章”就是多义的，孤立地说出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写出来有了形体，可以区别于“张”，然而还是多义的。所以，几个字、一句话虽然有可能成为一篇，然而对语言环境依赖太大，这种可能性不是无条件的。前边也说过，篇往往一口气说不下来，得分成几截来说。你们看，今天我从开始说话起，说到这里不是已经有好几截了吗？传统辞章学里有时以“章”为主干，向下联，说成“章句”，有时以“篇”为主干，向下联，说成“篇章”。“章”的中间性是很明显的。你们一定知道有这样的说法：“积字成句，积句成篇。”这里没提到“章”。是不是应当补充为“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呢？不必。实际上，积字句而成的是一小篇。根据表达的需要，有时一小篇就够了，有时不够，得用几小篇，成为一大篇。通常就把这一大篇称为篇，不加“大”，于是小篇就被称为“章”，以资区别。如果一小篇就够，当然还称为篇，无需加“小”。这样，“篇”“章”就是一回事了。

我们探讨辞章学从篇入手，而定其名称为“篇章论”，就是基于上边说的这些认识所产生的思路。

我们读一篇文章的时候，总是先把文章通读一遍，得其大要。如果是一篇并不重要的文章，也没有什么新意，读过就算了。如果有重要内容，有些新的、值得揣摩揣摩的观点，我们就

会进一步把它分解分解。看它讲了几层意思,这几层意思是什么关系,怎么组织起来的,再进一步也许要逐层分解分解,终至把一些重要的语句推敲推敲。推敲一番之后,也许回头再把文章从头至尾读一遍,整体地品味品味。写一篇文章,总是先打打腹稿,把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对象明确起来,考虑一下,为此目的需要说几层什么意思,为适应这个目的和对象的需要,写的时候在语言方面应当注意些什么,比如,是宜于通俗一些,多用“大白话”,还是宜于缜密凝练一些,庄严典重一些,以至适当用些专门语词、统计分析等等。这就是通常说的“立意”“谋篇”。主意已定,提笔就写,写出草稿,回头来仔细检点一番,几层意思组织得好不好,遣词造句有没有什么毛病,逐点地修理修理,当增者增,当删者删,当调整处调整调整,当改动处改动改动。总之,无论读或写,都是从篇入手,从大向小的活动。应用语言既是这样一种活动,那么,研究和教学就不能忽视这个实际。另一方面,把业已写成的许多文章拿来作静态的分析——字(或语素)是怎样组合成词语的,词语是怎样配合组织成句的,句是怎样组合成段、成篇的,从而找出层层组合的一些规律、规则和规范,也十分必要。从这种研究中更可以见出汉语这种语言的一些特点,以及和其他语言的异同,是有重要意义的。

静态的研究和动态的研究,从小向大的研究和从大向小的研究,都需要,都很重要。并且,这两种走向的研究可以互相验证,互相补充,相互制约又相辅相成,我们探讨汉语辞章学,重视并倡导这种双向研究,力求把它们融合起来,使静态研究能为动态研究即语言应用的研究服务,生动而有用,使语言应用即动态的研究有理有据。辞章学重视应用,因而相对地讲,比



较侧重动态的即从大向小的研究,同时把另一走向的研究融会于其中。

我国历史上的初、中级语文教育,本来是重视篇章的。从一开始的“人之初、性本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就是最小的篇章。“对课”(对偶)是包含语汇、语法、声韵、逻辑、修辞等多种因素的综合性的篇章训练。读“千家诗”,读“日记故事”,显然也是篇章。接下去读古文选本,如《文章关键》等等,更是篇章了。逐渐也摸索出一些带规律性的成篇的模式,如“起、承、转、合”,无非是“提出问题、从不同角度论述问题、得出结论”这个基本模式的概括。可惜到了封建社会后期,把模式定型化了,弄成僵死的程式了——八股文。篇章之学的发展遭到了阻碍以至破坏,当我们整理语言教育遗产的时候,这是我们一个极大的遗憾之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课”。怎样把语法、修辞、声韵、逻辑这些基础知识讲活用活,很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拙作《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中有较详的论述,请参看,这里从略)。可惜没有沿着那条路继续探索下去,赋予它更科学的处理,而是走向反面,或者弄成过分艰深烦琐的、桎梏人们思想的东西,或者干脆放弃之,不搞这类训练了。

我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有丰富的朴素辩证观点——虚实论。“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实相生。”这个观点也充分运用在篇章组织上,诗文皆然。有实写部分,有虚写部分,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汉民族有一种传统的审美观,它带有辩证性,以方正对称为主,以参差错落为辅,既欣赏如桂林峰岚拔地而起的雄姿,称它“甲天下”,也欣赏苏杭的旖旎风光,称它是地上天堂。这种

审美观的传统也充分运用到篇章组织中去了。

（节选自张志公《汉语辞章学论集》，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6 年）



从语言规范到学做人

每个人的任何行动 ,哪怕是只与自己有关不涉及别人的行动 ,都应该有准则 ,也就是有规范 ,有规矩。比如人的起居生活应该有规矩 ,早起早睡。这是纯粹与自己有关的事 ,碍不着任何人 ,可是不行 ,要有准则 ,有规范。哪怕长到很大了 ,也不应该酗酒 ,一个人在屋里也不应该多抽烟 ,让屋子空气污浊。孔老夫子说 ,人应该慎独 ,就是单独一个人更要谨慎 ,不仅不能胡作非为 ,甚至不能胡思乱想。至于社会活动——人是社会动物 ,经常要过社会生活——就不是自己的事了 ,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别人 ,那就更要有准则 ,有规范。“规范”这个词好像非常郑重 ,很吓人 ,其实用大白话说 ,就是得守规矩。一个人如果不守规矩 ,失去了规范 ,自以为是自己的事 ,实际上妨碍了别人。比如吐痰 ,你的痰中如果有细菌 ,就会蒸发 ,散到空气里 ,传染给别人。所以 ,规范是任何人须臾不可离的 ,百分之百的自由 ,从心所欲的事情是没有的。

语言是一种社会行为 ,只有两个人以上时才用得着语言。社会生活同语言是不可分的 ,有社会就有语言 ,有了语言也才成其为社会 ,才能过社会生活 ,过群体生活。写字是写给别人看的 ,即便是写给自己看的日记 ,说不定哪一天也会公布出去 ,成为一个社会行为。既是社会行为 ,就要有社会规范。如果不守规矩 ,不讲规范 ,你自己可能写得痛快 ,也觉着好看 ,但别人

看起来可能很费事,也不一定觉着好看。假如你是写稿子,准备发表,就要想到一份稿子要经过多少人看,编辑要看,设计要看,校对要看,制版人员要看,你如果不守规矩,要浪费多少人的多少精力,并且可能会出错。出了错问题就更大了,会影响到全社会,只要看了你的书的人就会有影响。做人有一条很基本的准则,就是不能只想到自己,要想到别人。你发一封信,如果地址写得不清楚,收信人姓名写得不清楚,这要浪费邮局工作人员、投递员多少时间。所以,写字要遵守字的规范。这不是一件小事情,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事情,这是心目中有没有别人的问题,是有没有公德心的问题。

这本字典叫《小学生规范字典》,从这个名称我就很喜欢它。字典讲规范,从笔画、笔顺、结构讲起,这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字才能写好,基本功也才能练好。小时候把基本功练好了,字写好了,写得端端正正,清清楚楚,以后,要写书法,写艺术字,要写什么都可以写好。基本功打不好,写什么都写不了,也写不好。凡属基本功都要从小练起。小时候不练基本功,长大了才感到基本功不够,再练就来不及了。有些坏习惯早养成了,习惯成自然,改起来非常困难。看书法展览,看见一些大书法家,尤其是一些古代书法家,写得真是龙飞凤舞,气势磅礴。写什么体的都有,写行书,行书不止一种写法,写草书,草书不止一种写法,写隶书,隶书也不止一种写法,都写得那么好,原因就是小时候基本功练得好。现在,我们有一些可爱的孩子,天赋高,从小就会写行书,有的甚至于写草书、篆书,有时他的父母很得意,孩子自己也很得意,于是也拿去展览,让人看。我喜欢看书画展览,但很少看见小孩子写楷书写得好的。这种现象我不赞成。如果有这个功夫让他把楷书基本功练好,



他的发展前途要比现在写的那个好得多,可能会成为大书法家。现在你看他写得不错,但到此为止,前途有限,因为他的基本功不够。任何活动都一样。练打球要先练跑,先练跳,跑得快,弹跳好,而且会摔跟斗,摔不坏,他才有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运动员。没有这个基本功,看上去也能打两下子,但发展有限。这还不仅仅是写字的问题,要从小养成做任何事情有准则、守规矩、守规范的习惯。有了这样的基础,他才具备了学习高深的科学技术、做重要工作的能力。从小做任何事情都不守规矩、规范,长大以后,最低限度是做任何事情都做不好,甚至于走到邪路上去,干坏事,因为他头脑里没有规矩,没有规范。社会上那些做坏事的人,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是个坏人,就是因为他在他小时候,在他成长的时候,没有给他养成严肃、认真、守规矩、守规范的习惯,长大了,有本事了,不往正地方用,却用他那点聪明、那点能力干坏事。所以,这本《小学生规范字典》,它的意义是非常大的,不仅教给孩子们正确地掌握字的写法,写正确的字,而且教他怎么做人,教他做一个守规矩、守规范的人,成为社会上一个有用的人。即使他能力低一点,但最低限度他不会做坏事,如果才气、能力高一点,他很可能会做出轰轰烈烈的大事。为此,我祝贺这本字典完成,推荐这本《小学生规范字典》,希望每个可爱的小朋友都把这本字典当做自己学做人的基础,也希望每位老师用这本字典去教给他的学生做一个守规矩、守规范、有希望、有前途的、国家所需要的栋梁之材。

(1995年5月)

五、教学至境

要重视语文教学法的研究

教师同志们很重视语文课的性质和目的、任务这些问题。这些问题 ,各地讨论得很多 ,我在有的场合也谈过与此有关的想法 ,一时还没有形成深入一步的、值得谈谈的意见 ,这里暂时不再谈这个问题。

我觉得 ,方法问题也是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问题 ,虽然已经进行了一些讨论 ,似乎还有进一步探讨、研究的余地。本来 ,一门课的教学方法是受这门课的性质、目的任务以及它们所决定的内容制约的。但是 ,方法又能反作用于它的制约者。教学得法或者比较得法 ,能够圆满地或者比较好地达到教学目的 ;反之 ,教学不得法或者不甚得法 ,就会达不到目的 ,或者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我们都同意 ,语文这门课的效率至今还不够理想 ,我们都感到 ,这门课还没有受到学生们普遍的重视 (除了要举行统考或者升学考试的时候 ,不得不想法应付应付它之外)。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 ,我在别的场合讲过 ,这里不再重复。我认为语文教育工作者需要向自己所用的教学方法中去找找原因。

方法是允许有并且应当有独创性的 ,不能拿上一种被认为



不错的方法,依样画葫芦地到处使用。有独到之处的方式方法,就是咱们平常说的“有艺术性”。战斗在教学第一线的老师们能够也应当共同去开发这个教学艺术的领域。不过,所谓“有独创性”的,“有独到之处”的方式方法,并不是异想天开的产物。能够在前人走过的道路上前进一步,在他人经验的基础上提高一步,这就是非常可贵的独创性,就有了独到的地方。因此,为了探索改进教学方法的路子,有分析有批判地回顾一下前人的做法,参考一下外人的做法,既不是无选择地照搬照用,也不是一股脑儿地拒绝抛弃,这种态度很必要。在这种问题上,全面肯定或者全盘否定,“妄自菲薄”或者“盲目自大”,恐怕都是不可取的。

传统的语文教学(以前不叫“语文”,不管它叫什么吧,反正是性质、目的任务很相近的一门功课)方法之中,颇有一些好的经验,但是今天看来,对其中有的经验,考虑、运用得似乎不够全面、恰当,对另外一些经验,又似乎有所忽视,这中间很有值得探讨之处。举几个例子来说。

传统的教学是以“多”取胜的。“书读千遍,其义自见。”“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为文有三多:看多,作多,商量多。”“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这种提倡“多”的名言、格言、谚语,多着了!大家把这条经验概括为四个字,叫做“多读多练”。这条经验概括得对,概括得好。语文是一种技能,培养技能要靠实践,并且要有足够的量。“多读多练”是一条被无数事实证明了、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应当继承发扬。那种不肯多下硬功夫,只想学点语文知识,甚至找点窍门就把语文学好的态度是不对的。但是到了今天,单纯靠“多”这一条经验显然不够了。我们现在的青少年学生,要学的东西很

多,要做的事情很多,要读的书很多,而且我们需要很多人把很多的时间、精力用到搞现代化科学技术上去,不能老是坐在屋里吟诗作文章。因此,在吸取“多读多练”这条传统经验的时候,要做两件事。其一是要配合着读和练适当提供一点必要的科学知识,并且考究一下读和练的科学方法,从而提高读和练的效率,每读一读就有读的收获,每练一练就有练的长进。其二是要对读和练进行一些研究,使之多带一些条理性,尽量减少其盲目性。哪些需要多读,哪些需要多练,哪些不需要那么多,需要多的,分别多到什么程度,最好有一个具有一定幅度的数量要求,先(读、练)什么,次什么,后什么,哪些应当有计划地多反复几次,哪些无需,或者只要反复一两次,最好都能做到心中有数。总之,“多读多练”是一条好经验,要坚持,只是笼统的两个“多”字不够了,要在这个基础上提高一步,前进一步。“人一能之,吾十之”,这是鼓励人艰苦学习的话。在“多读多练”这个问题上,不知可不可以说“前人十能之,吾五之”,就是说,把传统经验和现代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结合起来,达到事半功倍,用较少的时间,收到同样好的以至更好的效果。从前有个笑话,说某甲家里多臭虫,向人请教怎样治一治,那人开了一个药方,用纸包起来,交给某甲,说:回去照此办理就行了。某甲拿回家去,打开纸包一看,药方上写着两个字:“勤捉”。咱们现在有了六六六粉之类,何不适当配合使用之,何苦只靠“勤捉”呢?特别是在谈论“消灭错别字”“改病句”之类练习的时候,这个比喻大概还不算离题。问题这样看法,不知对不对,如果可以,前边提出的两个问题怎样从实践中、从科学研究和实验中找出解决的途径,都是有待探讨的课题。

再比如背诵。这也是传统的、行之有效的经验。以前说:



肚子里头装上 300 篇文章 ,就有办法了。我们现在还要不要背?我看还要背。外国人也讲究背。英国学生也背点拜伦、雪莱、史蒂文森什么的 ,前苏联的小孩子也背点普希金什么的。不过 ,对背诵的意义和作用 ,必须搞清楚 ,然后才能自觉地、更恰当地使用这个方法。我们学文言文 ,必须背诵 ,背诵起很大的作用。为什么?因为文言文那种语言材料和语言习惯 ,是我们从实际生活里学不到的。背熟了若干篇文章 ,就纯熟地积累起了若干有用的文言的语言材料 ,形成了某些基本的文言文的语言习惯 ,这样才能初步掌握文言。不这样的话 ,我们没有文言的习惯 ,提起笔来写文章 ,脑子里总得经过一道翻译过程 ,比如说 ,脑袋里想的是“××大哥” ,得翻译成“××仁兄大人阁下” ,那效率不是太低了吗?积累足够的语言材料也很重要。比如古代的“冠” ,我们今天叫“帽子” ;“虬髯”这个词在现代语言里没有 ,我们现在不管胡子是什么样的 ,统统都称“胡子”。这些词在生活里学不到 ,不从所读的文章里背下来怎么行呢?所以要多背 ,背得越多越有效。还有两点值得注意的现象。一点是大家熟知的 ,即韵文比散文容易背。几岁的孩子背一些浅近短小的旧体诗词 ,不是件难事 ,背文章就要晚一些。再一点 ,可能是大家不太注意的 ,那就是 ,正因为文言与实际的口头语言有较大的距离 ,白话与实际口头语言距离很小 ,文言反而比白话容易背诵一些。我从高小到初中念过不少文言文 ,也念过一些白话文 ,都要求背 ,当时就感到文言文容易背 ,白话文难背 ,到现在 ,当年背下来的白话文统统忘光了 ,除去极少数的几句 ,而文言文却大多数都还背得很熟。不知各位有没有类似的经验。

现在 ,我们大量地学习白话文 ,大量地学习散文 ,背诵应当

怎么处理呢？我看，背诵还是需要的。白话文虽然和实际口语比较接近，毕竟还有点距离。写在文章里的语言是经过加工、提炼的，合乎规范的，运用得比较高明的，背诵若干这样的文章，对于形成良好的语言习惯，提高运用语言的能力，会有不小的帮助。然而，正如前面说过的，背诵白话文与背诵文言文，意义和作用有很大的区别，难易程度也很不相同。因而，在以白话文为主体的语文课里，究竟应当怎样运用背诵这条传统经验？彻底抛弃是不对的，像学文言文时那么大量运用恐怕也是不必要的。背多少，背哪些，怎样要求，学前期、小学低年级和高年级、初中和高中，分别怎样处理，都是有待探讨的问题。

总之，背诵这个传统的经验我们要继承，但是要有分析，有研究，要运用得当。

从背诵文言文，很自然地就会想到串讲，因为串讲的办法也是伴随着教文言应运而兴的。在旧中国（更不用说再早的科举时代了），中学以上念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是文言文。老师的任务就是逐字逐句地把原来的文言用白话解说一遍，此之谓串讲。直到现在，语文课里凡遇文言文，大体上还是用串讲的办法，因而一篇不长的文言文，动辄要用五六课时以至七八课时，其中很有些浪费。白话文，照说是不必串讲的。绝大多数的字、词、句子，学生都懂得，何需再串讲一遍呢？可是也有个别或者少数老师，由于受了文言串讲的影响，总觉得一篇课文不串一遍就不大好办似的，于是也要大体上串一串。我觉得，不要说白话文，就连文言文，也并不是篇篇、处处都需要串讲的。在传统经验之中，串讲大概是一个比较笨的、劳而少功的办法，有时候又是一个比较懒的、不用多少心思的办法，虽然也不是一无足取，但是相对地讲，可取之处不多。不知道这个看



法大家是否同意。

特别值得提一提,而近年来大家很少提起的一条传统经验叫作“点”,“指点”“点拨”的“点”。这个字在汉语里用处很多,每种用法对于我们从事教学工作的人都有启示作用。例如,称赞某人改文章改得好,改动少数几个字就够使全文生色,叫作“点铁成金”;称赞某人聪明,说他“一点就透”;还有上边提到的“指点”“点拨”,以及“点化”“点穴”“画龙点睛”,等等。语文教学也讲“点”。什么叫“点”呢?就是在关键的地方,也就是确实比较难懂的地方,或者在全文中特别重要的地方,或者写得特别精妙的地方,点一下。这种地方,老师不点一点,学生可能不懂,或者忽略过去了;只要一点,也就是用上三几个字至多一两句话提醒一下,学生立即就会领悟过来。比如初一课本中王之涣的《登鹳鹊楼》,要叫我讲,大概一刻钟就够了。这首诗只有一两个生字,就是“鹳”字,或者再加上个“鹊”字,得告诉学生这两个字念 guàn què,“鹳鹊”是个楼的名字,有三层就行了。在这首 20 字的 4 句诗中,只有两个地方需要点一下,一个是“白日依山尽”的“依”,一个是“欲穷千里目”的“穷”,其他地方都很好懂,无需多讲。不点这两个字,学生就懂不了,体会不出这首诗的意味。那样,你再怎么讲这首诗反映了诗人什么什么的思想感情,再怎么讲它用了什么什么的写作方法,都是白说,只要你把这两个字一点,别的他自己自然就能去琢磨,就能领略。点了之后,老师领念几遍,要求学生齐念几遍,再叫起来三两个学生个别地念几遍,大概绝大多数学生课上就会背诵,回去不必复习。有人说讲这首诗要用一节课,甚至两节课,我看用不着讲那么多。你怕学生不懂,反反复复,讲来讲去,结果走向反面,学生反而听腻了,不想听了。教师轻

轻点一点,却引起了学生的兴趣和想像,他的思维活动起来了,用现在的教学词汇来说,就是教师起了主导作用,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于是他们就会大有所得,学习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

跟“点”字联系着的叫做“涵咏体味”。老师一点,学生感到这里的确有点味道,于是也跟着老师摇头晃脑地品尝起来,琢磨起来。引导学生涵咏体味,就是引导学生自己去品尝、琢磨,说得更简单一点,就是让学生的脑子去活动。过去的一些文章选本叫做“评点”本,那个“点”有两个意思,除了指在文句的旁边点点圈圈而外,还指在最关键的地方说上一句以至三个字、两个字,有的就是一个字:“妙”。这一个字就引起读者的注意:“妙在何处?”于是自己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噢,果然很妙!”至于怎么个妙法,有时虽然不怎么能说得出来,但是感觉到了,体会到了,这就是“涵咏体味”。我们现在不讲究点,不讲究涵咏体味,而是特别注重分析,左分析,右分析,于是学生就不“摇头晃脑”,而是耷拉下脑袋打瞌睡了。

我觉得这种传统的教学方法很值得提倡提倡,而过去我们对它比较忽视,谈的比较少,所以今天着重强调一下。我们要很好地揣摩揣摩这个“点”,这个“涵咏体味”。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点,就是给学生一些启发,不分析那么多,让学生去涵咏体味,就是给学生留下余地,在老师的启发下,自己动脑子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得到更深的印象,获得更大的益处。老师讲得少了,学生反而对这门课更加重视了,感到更有所得了,学习的积极性更高了。

总之,我觉得我们传统中有些东西值得我们再回顾一下,用我们今天的观点,根据我们现在的实际和需要,很好地进行



一些分析,批判继承之。就以上提到的四条经验来说,“多读多练”基本上是好的,只是有所不足,需要补充,使之更“现代化”一点,“科学化”一点;“背诵”,要在明确它的意义和作用的前提下酌量运用之;“串讲”,不是很理想的办法,要控制使用;“点”特别值得提倡,善于准确地抓住应当点的地方而又能切中肯綮、要言不烦地点它一下,这是一种很高明的教学艺术。这里应当看到,所有这些经验,不论它们之间有什么优劣高下之分,有两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第一,教学过程中始终不离开要学生读的东西去搞架空的分析之类;第二,让学生多活动,在读写的活动中去学会读、写。(串讲之所以不理想,正是因为只有它不太符合这个原则)对于传统经验的这种分析、批判、继承的工作,过去做得不够,今天还需要好好地去。做。

对于外来的一些做法,要参考借鉴,彻底排斥是不好的,完全照搬也不适当。比如那个所谓“五大块”,就是讲作者生平、时代背景、主题思想、段落大意、写作方法,这总得算是一种外来的东西,不是土生土长的。怎样对待这种教法呢?20世纪50年代初,呼啦一下子都用这个教法,不管什么文章,不论在哪个年级教,都来个“五大块”;后来又说“五大块”不行,呼啦一下子都取消了,一提出“五大块”就摇头。我觉得,不管这套教法来自何方,还是应当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合理的部分采取之,不合理的部分抛弃之。当我们讲古典或外国作品的时候,最常碰到这个问题:作者生平讲不讲?历史背景讲不讲?主题思想讲不讲?等等。这些,都要从实际出发。比如《木兰辞》讲到打仗;唐朝的杜甫、李贺,还有岑参、高适、王昌龄等几位所谓“边塞诗人”的诗里讲到过打仗;岳飞的《满江红》讲到打仗,陆游的《示儿》也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的名句。都是诗歌,都讲到打仗,如果选在课本里,恐怕就得分别采取不同讲法。《木兰辞》是民歌,也许经过文人加工,不知道是谁,作者生平自然无法讲;“千里赴戎机”,到底打的什么仗呢?搞不清楚,连这首歌辞究竟出于哪朝哪代还有争论嘛,时代背景也无法讲。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民歌,传诵上千 years 了,还以它的内容为题材出了好些戏曲,学生们一念就懂,很快就会背,诗里好多东西都不必深究。其余那些,情况各有不同。有的需要就作者、时代、主题等说上几句,甚至还得说一说诗人的思想局限;有的点一点就行,无需多说,有的恐怕干脆不必说什么,把诗读熟就行了。究竟用不用五大块、或者用几块,因文、因年级而异,很难一概而论。

就我所知、所见,别的国家在普通教育阶段对语言训练很重视,训练的量很大,方式方法也很多。当然,由于他们的语言和汉语很不相同,训练的着重点不一样。比如,他们很重视词形变化的练习,重视造句的练习,也重视构词法以及同义词构成的种种不同的习惯用语的练习,等等。这些,他们都要求熟练,要求做到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说出来就合乎习惯,合乎规范。这类语言训练性的练习,一般不是拿一些词、句出来,列一些规则条目出来,孤立地练,而往往是通过一些有计划地安排的对话,叙述等等来练,因而练习是活的,是和一些日常应用的言语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对于这一类的练习,我们历来重视不够;有一些,也大都是缺少计划,碰上什么算什么。汉语有汉语的特点,一般说来,在初级阶段,掌握并不困难。倘若我们下些工夫,探索出一套合乎汉语特点的训练方法出来,很可能比别的国家更早地见出语言训练的成效。另一点,在表达训练方面重视局部的训练,这也是国外用得更多,值得我们参考的一种方



法。本来,我们并非完全不重视这种方法的。比如学画山水画,我们传统的办法就是先学画石头,画树干,画水,画山,画云,先学皴、染、点各种笔法,然后才逐步学画整幅的山水画。学唱戏,学打拳,等等,都有一些从局部到整体的训练方法。独有语言表达训练,不重视这种方法。科举时代搞八股文,倒是一股一股地学的,先学“破题”,再学“承题”,然后一股一股地学下去,最后成篇。然而八股文搞成了僵死了的程式,不足为训。废除八股之后,作文再也不搞局部训练了,一说作文,就是老师出个题目,要学生做一整篇文章。别的国家很重视段落的训练,只要求就某一点写成一段,无论记人、记事、说理、议论,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我学外语的时候,有一次上作文课,老师进来了,后边还跟着进来一位女士,老师站在讲台上,讲了几句开场白,说今天是做作文,讲完后对那位女士说“谢谢”,那位女士就出去了。然后,老师出了题目:“描写刚才进来的这位女士。”只要求用半节课的时间写一段。原来老师是让这位女士给他当题目的。有的人观察很敏锐,她一进来,朝她打量了一下,马上得到了比较清晰的印象;有的呢,题目一出来,傻眼了,他什么也没有看清楚。这就不仅仅是训练学生描写人物的技能,而且训练了学生注意观察的习惯。这样的作文,学生也没有无话可说的苦恼。这一节课中,老师开头不过讲了两三分钟,学生写完这么一个片段之后,老师稍稍讲了讲注意观察和描写人物时需要注意的几个要点,有些什么方法。他不是给你一个框框,一定要有一、二、三层,像做八股文似的,而是给你一点基本知识,让你自己去修改。他把每个人写的看了一遍,发还回来,一个字都没改,只是把他所发现的几个重要问题又向大家说一说。学生和老师的负担都不重,但是学生确有提高。

几十年过去了,我对那次作文的印象还很深,觉得受益匪浅。像这一类的作文,有时也口头上做,不写。他们很重视口头语言的训练。前边说的语言练习,很大一部分是口头做的,这里说的这种作文的局部练习,也往往口头做;此外,还有演讲比赛,辩论会之类的活动,照我看,也属于“作文”训练的范围。许多外国人,除去在十分郑重的场合,对于十分重要的问题,也准备个发言稿大体照念,还时常离开发言稿临时补充几句,一般都是即席发言,不用发言稿的。他们重视口头训练这一点,很值得重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是截然无关的两码事。怎样处理好局部训练和整体训练的关系,口头训练和书面训练的关系,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再有一点,他们在语文训练中不排除模仿,但是不像我们那么强调模仿。封建社会科举考试的时候,销行最广的书叫做《闾墨》,就是把每届考试考中举人、进士的人的考卷编成集子,供准备应考的人去学习、模仿,这算是低级的模仿。高一级的,这个学韩,那个学柳,这个学欧,那个学曾,唐宋八大家,各人各学一家。这个传统似乎直到今天还有很深的影 响。我们常常希望课本里有点“范文”。所谓“范文”指的是什么呢?不是指文章要有典范性。要求选入课本的文章有典范性,这是完全正确的。这里所说的“范文”指的是这么一种文章,我给它起个名字,叫做比着葫芦画瓢的葫芦文章,或者是照猫画虎的猫文章。人们希望念什么就写什么,需要写什么就念什么。模仿是学习中不可缺少的,知识技能传授的手段之一就是模仿,下一代向上一代人模仿,相互之间的模仿。这种办法不仅无可厚非,而且还应当运用。但是,不宜强调过度。把模仿得像当 做学习的目标,或者把模仿看做学习的唯一的或者最有效的方



法,都是不妥当的。模仿和创造,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模仿中有创造,创造中有模仿。10个孩子照着一只猫画虎,画出来会是10个不同的样子,每个孩子画的都有他的个性在内。《封神演义》里写的某某会“土遁”,某某会“水遁”,看起来仿佛纯属想像,纯属创造,其实,如果作者没有见过地老鼠,没见过蚯蚓之类,他是“创造”不出土行孙一类的神话人物的。他不过是在“模仿”着生活经历中的某些事物去“创造”而已。正确处理好模仿与创造的关系,也是语文教学法中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近些年,接触外国的东西很少,对外国的做法知道得不多。概括的印象有两条。一是他们重视语言训练,对听说读写各方面的训练有些全面的考虑和设计,而不是过分地忽视口耳训练,一味地强调书面。一是他们的办法比较活,给学生留下较多的余地,而不是学习时间都被老师的活动填得满满的,用些框子把学生限得死死的。这两点,也许值得我们多考虑一下。

教学是一门科学,又是一种艺术。对这门学科的教学进行科学的研究,艺术的创造,才会产生出既有科学理论的依据而又灵活多样、丰富多彩的,为学生喜闻乐见的,事半功倍的教学方法。近年来语文教学讨论中似乎有两多一少的现象,谈几个老问题(讨论语文课的性质、目的任务等)的多,“分析”课文多,切切实实地研究有效的教学方法的比较少。为此,就教学法方面举例式地提出几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抛砖引玉,向老师们请教。

(1979年4月)

关于语文教学中科学性与艺术性问题的探讨

任何一门学科的成功教学,都是高度的科学性和精湛的艺术性相结合的成果,语文教学尤其是这样。

什么是科学性呢?科学是反映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性是符合科学要求的程度。语文教学的科学性,指的是教学实践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教学语文的规律。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条理和规律,语文和语文教学也不例外。语文这个东西,同人们的生活关系十分密切,人们往往觉得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就学会了的,仿佛其中没有什么规律可言。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觉,也反映了过去我们对这个事物缺乏研究。从清末废除科举、兴办学校起,恐怕在各门学科之中,语文一直是很不成功的一门。许多问题,上百年来,几十年以来,都没有解决。原因就在于,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造成的局限,我们对这门学科始终缺乏研究,而正好是这门学科特别需要研究。兴办学校一开始,无可讳言是参考甚至抄袭了日本的或者西方的方法。普通教育阶段的大多数学科,无论是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学法上是有共同性的。比如,学数学,总得学加减乘除、小数分数、开方乘方,如此等等这一套。自然科学的以至社会科学各门学科,大体上都是这样。因此,把别的国家的办法搬来使用,不是完全行不通的。像我这样年岁的人,小的时候学



数学、物理、化学 就是用的外国课本。这说明 , 拿上别国的课本来学习 , 不是绝对不可以的。独有语文不行。这门学科的特殊性很大 , 语言有很显著的民族性 , 各个民族的语言 相互之间有许多差异 , 尤其是像汉语 , 同其他的一些主要语言在整个体系上是很不相同的。我们的文字更是一种特殊的文字 , 同其他一些主要语言的文字都不一样。这种语言、文字有它的特殊性 , 学习这种语言、文字的途径 , 也就有它的特殊性。别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给我们准备下我们中国人学我们中国语文应该采取的办法或方案 , 许多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例如 , 识字的问题就需要研究和探索。汉字是一种独特的文字体系 , 这种文字从学习的角度说 , 有有利的一面 , 但是在开始的阶段 , 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很大的困难。文字的重要性是很大的。进入学龄期之后 , 掌握文字的能力 , 对于进一步学习语言、运用语言关系很大。像这样一种文字 , 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教来学是最好的呢 ? 几乎可以说 , 我们 2000 多年以来 , 一直在设法解决这个问题。历史上曾经摸索出一些经验 , 例如大家所熟知的所谓“三、百、千”。为什么会有那么一类教材 , 而且很多 , 并且长时间地用那种方法呢 ? 就是因为那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汉语、汉字的特点 , 用那种方法学习起来有一定的方便。它解决文字的问题有一定的效果 , 里边有一些合理的因素 , 有一些可贵的经验 , 但是又有缺陷。那种方法最大的缺陷就是它忽视了语言的训练。怎么样利用这些传统经验 , 这些经过实践证明是有效的、合理的因素 , 而又能够弥补它的缺陷 , 这是一个急需研究的问题。已经有了以黑山和景山学校为代表的集中识字的办法 , 以斯霞同志为代表的分散识字的主张 , 以及其他折中的方案 , 都能解决一些问题 , 也都还有进一步研究改善的余地。

再如,我们还有一个独特的问题,就是文言文问题。这也是世界各主要国家、主要民族所没有的。我们多少年来一直在对付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许多世纪的珍贵文化遗产是用这种书面语言记载下来的。文言文在历史上有很大的功绩,在当前也还有它的用处,不能一下子完全抛开。但是,它又是一种同口头的实际语言完全脱节的东西。怎么样的教法,怎么样的学法,学些什么,学多少,才有助于学的人掌握现代语言,又能够有助于他们去接触传统的有用的东西,使它不会产生相反的作用,就是说,不至于耗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却无助于学习现代语言,甚至于对学习现代语言产生干扰作用,而又没有能够使学的人具备了解和研究文化遗产的能力,这又是一个很需要研究的问题。不是随随便便拿一些文言文来,让学生看一看,听老师翻译成白话,就能管用的。有主张多教文言文,甚至主张中学里全部教文言文的;有主张少教文言文,甚至主张中学完全不教文言文的;有主张白话和文言分开教学,不要穿插在一起的;还有许多别的主张。光是结论式的主张,不够,需要进行更切实深入的讨论和研究;光是孤立地就文言文论文言文,不够,需要联系一些有关的问题来考虑;光在屋里“坐而论道”,不够,需要实地实验。再举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就是从教育学、心理学的角度来处理语文教学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更缺少研究。比如说,学前期的幼儿和儿童,学龄初期、学龄中期、学龄后期各个不同阶段的儿童、少年、青年们的语言是怎样发展提高起来的,他们在语言方面有哪些潜力,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更好地发挥他们的潜力,使他们提高更快一些,掌握更好一些,我们还说不出多少道理来。还有,语言教育从来是一种综合性的教育。教幼儿、儿童、少年学习语言,同时也就对他们进行了思维



能力的训练,进行了思想品德的教育,等等。在语文教学里怎样把语言训练、思维训练、思想教育的关系处理好,我们也还没有搞得很清楚。许多年来,语文这门功课一直搞不很好,简直成了“老大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门功课缺乏科学研究。加紧把这种研究工作开展起来,逐步对语文教学这件事得出一些带有条理性、规律性的认识,根据这样的认识去设计教学的方案。才能够使我们的教学工作减少一些盲目性,多一点条理性和科学性。这样,教学的效率就会逐步提高,并且经过教学实践的检验,认识会逐步加深,对教学规律的掌握会越来越好,教学方案会不断调整、充实,逐步完善起来。

教学的科学性从教学的内容以及这些内容的安排组织上反映出来,具体地说,首先从教材中反映出来;同时,也从教学工作中反映出来。教学工作的科学性是什么,是个很大的题目,需要进行认真地研究。不过有一点大概是需要遵循的,这就是要注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至于在具体教学实践中如何围绕这个原则,从实际出发,采取多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去教学,这就是教学艺术的问题。教学艺术虽然是个方法问题,但关系很大,小觑不得。同样一个字、一个词、一个句子、一段话、一篇文章,教学得法,就可以用比较少的时间得到比较大的效果;反之,不得法,就要花费比较多的时间、比较大的力量,而收到的效果却不大。可以认为,教学工作对艺术性的要求是很高的。但是,不能认为艺术性与科学性无关。它要以科学性为基础。就连艺术性最强的东西,比如绘画、音乐,也是离不开科学的。画一张画,不是要讲究透视,讲究远近比例吗?画一个人,不是要讲究身体各个部分要合乎比例、合乎生理构造吗?这些就是科学。我们传统的这类办法同以上的办法不同。画

家虽然不讲“透视学”,不讲“艺用人体解剖学”,但从绘画的实践中逐渐摸索到了这方面的道理。音乐的“和声学”等等,也是科学。即使纯粹属于艺术范畴的东西,尚且有它的科学基础,基本上属于社会科学领域的语文教学工作怎么能不以科学为基础呢?但是刚才说过,光有科学性,没有良好的教学手段,也就是缺乏教学艺术,仍旧会使教学失败,至少是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

什么是教学的艺术性呢?艺术性用最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具有一定独创性的一套有效方法。不仅教学有教学艺术,打仗还要有军事艺术,做领导工作要有领导艺术,这些所谓“艺术”,都是指有特点的一套有效的方法。

语文教学的教学艺术问题,也是迫切需要研究的。传统的语文教学,不讲什么艺术性,其结果是两种现象:一种是毫无教学艺术可言,老师呆讲,学童呆听,用打戒尺、罚站以至罚跪等种种惩罚手段强制学童呆读,死记硬背。一种是有些教学艺术,但是说不出个所以然,叫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两种现象延续到办了学堂,设置了“国文”课,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实质性的变化很少。本来,教文言文,倒也用不着多少教学艺术。反正读的东西学生不懂,老师用白话翻译翻译,把生字、难句、成语、掌故解说解说,全文逐句逐段地串述一遍,那时候也不讲究“分析”,学生大体听懂文义之后自己去读读背背就是了,作文写文言,无非是模仿套用,比着葫芦画瓢,老师看了,把太不通的地方改改,圈圈点点,写个批语,也就完事了。总之,关于语文课的教学艺术,我们的底子也是很薄的。建国30年来摸索出了一些路子,系统深入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怎样用最少、最精练的语言,使学生理解得



尽可能地清晰、充分,这是教学艺术中一个重要问题。教学首先要学生理解所学的内容。怎样使学生理解他所学的内容呢?不能靠烦琐的、不必要的讲解、分析。能用一句话说清楚的,不用两句;能用一小段话说清楚的,不用长篇大论。甚至,能不用语言来解说的,就不必硬去解说。其他学科,演示是一个重要的教学手段。语文其实也可以充分运用“演示”的办法。在语文教学中,主要任务是教学生学好现代语言,能够运用现代语言。现代汉语是学生的母语,他从小就生活在这种语言之中,长时间地使用这种语言,一直到学龄初期,开始学习书面语言,书面上用的也是现代语言。教材的内容,学生真正完全不理解的,特别需要讲解的东西是很少的。教材里选的,用现代语写的散文、故事、小说、诗歌等等,好的朗读恐怕是最有效的教学手段。朗读得好,足以使学生理解其内容,并且体会到其中的感情色彩等等。在语文课里,对话、朗读和其他学科的演示(包括看实物、看标本、看图片、看教师在实验室里操作,等等),具有十分相似的作用。学生自己能够基本理解的东西,我们再用许多话去解说,所收到的效果与我们的愿望恰恰相反,不仅不足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反而会使学生厌倦,以至于削弱了他的理解。就连一些写得好的、比较浅近的古诗词和现代人写的旧体诗词,也是这样的。读往往比讲的效果更好。当然不是说完全不要讲解。怎样用有效的、有针对性的方法,使学生的思想有所动,从而既能理解又很容易地把他们所理解的东西记住,这是教学艺术的又一个方面。无论是小孩或者大人,凡是对自己思想有所触动的事情,最容易记住。自己的思想无所动,就不容易记住。高明的老师从来不把现成的东西灌给学生,而是设法调动起学生的思维,让他们积极参与认

识活动。他们的讲解总是既有所启发而又留有余地。说起既有启发又留有余地,我们不妨举个京剧表演艺术的例子。据报道,我国一个京剧团到国外演出,主要剧目有《三岔口》《拾玉镯》《雁荡山》《火凤凰》等等。精湛的京剧艺术,使观众为之倾倒。《三岔口》演员一句都没唱,也没讲,只凭几个动作就使观众明白,这是一场深夜的摸黑格斗。明明舞台灯光那么亮,却使人觉得是在漆黑的夜里,心情和剧中人物一样的紧张。《拾玉镯》,女演员在空荡的舞台上,只凭动作和表情使观众不仅知道她是坐在自己家门口做针线——绣一只鞋,还知道她正在等她妈妈回来,心里很焦急。一会儿,天晚了,她把在门外空地跑着玩的群鸡赶回门槛里边的一个鸡窝里。她手里没有针,没有线,台上没有门槛,没有鸡窝,更没有不听话而乱跑的鸡,可是观众好像分明看见了这些东西,并且比看见真实的东西效果更好。观众被唤起的想像可以自由驰骋,不受过多实物的拘束,而他们的想像又是在演员表演的启发下进行的,不是漫无边际的。演员用他们的表演启发观众,又给观众留下充分的余地去发挥各自的思考和想像能力。观众的思想被触动了,于是他们不仅理解了剧情,并且在脑子里留下深深的印象,记住了。京剧艺术善于把观众的思想动员起来,让它活动,让它思考、想像,使观众成为积极的成员,和演员共同创作这出戏,而不是呆呆地、完全被动地看演员表演。这个特点应当对研究教学艺术有很大的启发作用。怎样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而又不迎合迁就,这大概也得要点艺术。教学艺术表现在大幅度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引导起学生对所学东西的爱好和兴趣。我们现在常常抱怨学生“重理轻文”。怎么才能不“轻文”呢?如果他感到语文很好,学起来很有意



思,学了很有用,他就不会那么“轻”它了。不“轻”就会学得更好,越学得好越有兴趣,越不“轻”。只是,引起爱好和兴趣不能靠迎合迁就。我们平常说,在语文教学中要用好的东西对学生进行感染熏陶、潜移默化。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很高的教学艺术。如果他对所接触的东西,对你给他的东西没有兴趣,不爱好,他能够受到感染熏陶、潜移默化吗?当然不能。他要排斥,他要拒绝。这同前边说的那几点是密切相关的。烦琐的教学,缺乏针对性的教学,刻板枯燥的教学,都是会削弱学生对这门功课的兴趣和爱好的。

以上只是举例式地提了几点。教学艺术涉及的绝不止这么一些。究竟有哪些重要问题,我也说不清楚,有待大家共同探讨。就是上边这些,说起来好像也都是一般的原则,很不具体。教学工作正是要把一般原则具体化起来。而且,也只有在工作实践中才能够具体化起来。公式,谁也开列不出。讲某篇课文,或者某项知识,用多少话才是最少、最精练的,多于此就是烦琐的,谁也说不出个数目来。这只能在教学实践中去灵活运用。只有在教学实践中,在教学第一线的教师们才能真正找出实现这些原则的具体办法来。把实践中那些行之有效的办法有意识地整理、总结,就会逐渐对语文学科的教学艺术了解得更深入些。艺术是有独创性的,所以,因人而异,可以百花齐放。然而艺术性也并不是随心所欲、没有规律、没有章法可循的,不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艺术性也有它的条理,有它的规律。说来说去,艺术性和科学性是不可分的,是相互为用的,特别是在语文教学中。这一点非常重要。

(1979年2月)

谈“启而不发”

近来接触一些语文老师,常常谈到“启发式”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研究不够,只有零零星星的一些想法,说一说,跟老师们共同探讨。

时常听到有的老师说:我知道满堂灌不好,注入式不好。我倒满心想用“启发式”,可是学生不能配合,启而不发。我用各种办法来启发他,可他就是不说话。不点着名问他,他不举手回答;你哪怕点着名的把他叫起来问他,他还是不说话。再三的“启”,他是再三的不“发”,这又有什么办法呢?那我只好还是“灌”,否则白浪费时间,干脆不如我灌。我讲他听,听进去一些总有点好处。否则转来转去的用了很多时间,我该讲的也没讲,要他回答的他就是不回答,何必这样白白的糟蹋时间呢!像这样的议论,时常听见,话不一样,意思大体都差不多。听多了就引起我思考。想来想去,我感觉到,这个问题里头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提出这种问题正反映了我们的老师们真是千方百计想要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率,想方设法地采用启发式,不用注入式,不用满堂灌,这种用心可以说是非常之好,甚至于用得上“用心良苦”这个成语。另一方面也表明,究竟什么叫启发式,这个问题还很有值得探讨的地方。

什么是启发式呢?我们不去追究“启”“发”这两个字的古义,这两个字连着说的来历了。我们都知道孔子说过“不愤不



启,不悌不发”,“启”和“发”这两个字连用就是从那里来的。在那里是什么意思,我们不去追究了,我们现在要谈的是“启发”和“启发式”在现代的意义。在现代汉语里,“启发”已经成了一个词,所谓“启发”,就是阐述一些事理,举一些事例,引起对方的联想、想像、思考,这就是启发。所谓启发式,是教学用的一个术语,指的就是采取这种启发的办法进行教学,来代替完完全全的由教师来讲,学生完完全全的被动的来听的这种方式。谈到这里,我们首先得说一说注入式、满堂灌。满堂灌就是注入式,是注入式的一个形象的说法。注入就是往里灌,注入式就是用灌的办法来进行教学,形象的说就是满堂灌。那么我们就说满堂灌吧。这三个字里头有两个意思,一个叫“满堂”,一个叫“灌”。什么是“灌”呢,就是把一种液体倒在一个器皿里,那个器皿是没有能动性的一个物件。它没有能动性,你给它往里灌什么,就是什么,灌多少就是多少,它完全在那里被动地接受,毫无主动性。它不会选择,你灌的是什么,灌得好不好,你灌你的,它不为所动。这是灌。再一个是“满堂”,是从头至尾,这才叫满,是从头至尾的这样的灌法,一点空隙都不留,一点余地都不留。满堂灌包含着这样两层意思。满堂灌显然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说法。可是我们万万不能从这里得出来教师不能讲,教师一讲,或者教师讲得多一些,就是满堂灌了,不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教师就是要讲,得会讲,得善于讲,得讲得好,讲不等于灌。刚才我们说过,所谓灌,是把学生的头脑当成一个毫无能动性的器皿,在那里完全被动地接受,那才叫做灌。讲可以是灌,也可以不是灌,尽管老师在说话,看是怎么个说法,一种说法是灌,一种说法就不是灌。不是灌的讲法,就是启发性的讲法。同样是讲,可以是灌,也可以是启发,讲仅仅

是一个形式,它的实质要看我们怎么讲,讲了些什么,是把学生的头脑看成一个能动的,能思考的对象来讲的呢,还是把它当成没有能动性的,不能思考的一个物体来讲的。其次,还得看是不是“满堂”。教师不讲是不行的,教师不能当哑巴,教师的本领,相当大的一部分就用在讲上,教师就是要讲的。不过“满堂”就不好了。这也不是说,每一节课必须以十分之几的时间来讲,以十分之几的时间不讲,叫学生做什么。不是这样说法。也许这一节课讲到这部分了,就需要多讲,教师就要从头讲到底,而在另一节课,教师就可以少讲一些,另一节课教师甚至可以完全不讲,或者讲的很少。所以,是否“满堂”,也不是那么机械的,也不是那么死的,不能机械地理解,堂堂必须不满堂。我们从反面先谈了满堂灌,再回过来谈启发式也许方便一点。

刚才说过,同样是讲,它可以是灌,也可以不是灌。不是灌的讲,本身就是启发。这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就来推敲一下所谓“启发”是什么意思。

启是什么意思?启就是开,打开。我们写信在信封上不是常写×××同志启吗?“启”就是打开这封信,这封信交给×××同志来打开。发呢?就是动。我们常说发动什么,比如发动机器,发就是动。那么,启是打开,打开什么呢?发是动,什么动呢?都是指的脑子。所谓打开,就是打开脑子;所谓动,就是脑子动。所谓启发式,就是用这么一种方式,老师或者讲,或者在黑板上写几个什么字,甚至于仅仅是做一个手势,做一个表情,或者是朗读课文里边的一段,或者全部的一篇,或者有表情地朗诵一首诗,不管用哪种方式,只要它能够迅速有效地打开学生的脑子,让它动起来,这就叫做启发。启发式不等于



“谈话法”，虽然有的时候要用谈话，启发式不等于“问答法”，虽然有的时候要用问答。前边我们听见的那种议论，说是启而不发，我再三的启，他再三的不发，怎么样他也不说话，不回答问题，这多少有点意味着，把启发式同问答法、谈话法等同起来了。这是从形式上来看启发式。就是说问问题吧。问问题可以引起对方的思考，也就是说，使对方的脑子动了，问问题也可以使对方茫然，他脑子动不起来。同样的一个问题，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问不同的一个对象，产生的效果就会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一个孩子，有一位第一次见面的不认识的人问他，“你叫什么名字？”这个问题能够使他的脑子动一下，回答说，我叫张××，我叫王××。如果是已经教了他一年两年的老师，见了面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就会茫然，这是怎么回事呀，怎么老师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了，忽然问我叫什么呀？这时候所引起的不是他的积极的思考，而是惘然，是迷惑不解，他很可能站在那里发愣，答不出来，仿佛他连自己的名字都忘了，或者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敢说似的。又比如教王之涣的一首诗“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如果老师想用启发式，问学生“黄河怎么会跑到白云里边去呢？”这样一问，恐怕很有可能让学生发笑，或者让学生惘然，不知所答，而不见得有什么启发性，有什么启发作用。如果老师适当运用一点手势，姿势，一点表情，表示出黄河远远地流过来，好像是从天上那么流下来一样，没有问问题，反而可能有一些启发性，使得学生联想起他看见过的，或者海，或者河流，远远地望过去，好像水天相连的那个景色。没有说话，没有问问题，反而有点启发性。否则，只要讲的能够让学生的脑子动起来，那就不能叫灌。满堂不好就不好在没有给学生留下余地，把学生的脑子塞得满满

的,让他接受还来不及,于是乎他就只能处于一种消极被动的状态。没有给他留下空隙,没有给他脑子留下活动的余地,所以不好,满堂不好,灌不好,都在于这样妨碍了学生积极的思考,脑子动不起来,或者动的余地太小。我们知道,从幼儿起,儿童、少年、青年,他们的脑子本来是非常非常活跃的,它需要一个广阔的,自由驰骋的天地。如果我们不给他们留一点余地,把他们塞得满满的,把他们的空间都给占领了,让他们的头脑没有地方活动了,这样会影响他的脑子的活动,严重一点说,这会残害他们智力的发展的。

学生的脑子是不是动起来了,有许多的标志。他能够回答问题,表明他的脑子动了,他能提出问题,也表明他脑子动了,然而不仅仅是提出问题,回答问题,他的面部表情,也可以告诉一个有经验的老师,学生脑子动了还是没动。他是瞠目结舌,呆若木鸡呢,还是脸上的表情就告诉你,他的思想很活跃,在思考问题了,还可以告诉你,他同意了你所讲的,接受了你所讲的了呢,还是对你所讲的有疑问,不理解呢?这些他的脸上都会告诉你,只要你留心去考察,去观察。

不过无论如何,说话终究是脑子动或没有动,以至动得怎么样的一个明显的标志。然而说话,回答问题,或者提出问题,这个事情很不简单。有的人思想并没有怎么动,他也信口地说,于是乎就会所答非所问呀,文不对题呀。为什么会所答非所问,文不对题呢?因为他脑子并没怎么动,向他提出的问题,他还没怎么理解呢。相反,有些人显然脑子动了,在那里思考问题了,对于我们提出的问题,他那里已经有了答案了,但是他就是不肯说,这有各种其他的因素。我们要善于辨别这些不同的因素。我们要鼓励学生说话,而不是仅仅根据他说话还是不



说话,就断定他“发”了还是没“发”。不善于说话,不愿意说话,有我们的历史传统的因素在内,我们长期的封建社会,是不鼓励年青人多说话的,我们长期的语文教育,也是只注重书面教育,不注重口头语言的教育;不仅不提倡说话,不鼓励说话,甚至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以不会说话,不善于说话,作为一种美德来表彰。孔夫子就说过,“刚、毅、木、讷,近仁。”讷,就是讷讷不能言。把讷讷不能言和“刚、毅”联系起来,认为不会说话就接近“仁”了,也就是把它作为一种很高的美德来看待。对于这种传统要有清醒的认识。花言巧语是可憎的,讷讷不能言也不必提倡。我们要提倡学生说话,鼓励学生说话,能够在课堂这样一个不大的大庭广众之下,爽朗地回答问题,爽朗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这需要一种胆量,我们需要下一代有这种胆量,能够敏捷而又准确地回答问题,这是一种智力,因为只有思维敏捷,思维准确才能够敏捷准确地把问题回答好,我们需要下一代有这样的智力,能够得体地,恰如其分地有礼貌地回答别人的问题,申述自己的意见,这是一种文化教养的表现,我们需要下一代有这样的文化教养。因此,口头语言是大大地需要训练的。不过,回到前面的话题,我们可不能以他能否说话,是否善于说话,是否敏捷地回答问题来衡量他是不是“发”了,他的脑子是不是动了,因为我们有不善于说话,不愿意说话的这种传统。这里边包含了一些心理的因素,社会的因素,很复杂的,由此也可以见出,我们当语文教师,的确任务很艰巨,工作很不简单。又要讲,讲我们必须讲的,不讲学生不能够理解清楚,但是又不能讲得过多,不能灌,更不能满堂地灌;我们又要给学生留下余地,让他们去思考,让他们的脑子动起来,同时我们又得认真仔细地观察,看看他脑子是否动了,又得训练

他说话 ,而训练他说话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回答问题是
否敏捷 ,是否踊跃 ,有的时候是反映他的脑子是不是动起来了 ,
有的时候并不一定。语文这门功课 ,的确是很难的一门课 ,教
好语文这门功课 ,的确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启发式这个问题
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原载《语文教学之友》1982 年第 1 期)



关于精讲

精讲的“精”，是质量概念，不是数量概念。精讲这个问题，主要是由于教白话文才产生的。从前教文言文，教师一句一句串讲，学生听懂了，就得了，基本上没有讲得精不精的问题。白话文，学生大部分看得懂，该怎么教？建国之初，教师们觉得不好办，讨论过一阵。学习了前苏联的做法，讲白话文，特别是文学作品，侧重分析。逐渐，不只白话的文学作品，连文言文，非文学作品，也注重分析。传统的经验（主要指封建社会的传统经验，也包括办新学堂之后几十年间的“国文”教学经验）不讲究对文章作多少分析。文章的中心思想、结构、写法等等，主要靠学的人自己去体味，“只能意会，不可言传”。这自然不行，当老师应当会“言传”，就是说给学生一点启发，让他们体味得更好一些。怎么“言传”效果最好呢？于是有了“精讲”问题。精，就是恰到好处。讲什么，讲得多或少，详或略，深或浅，都要恰到好处。怎么才叫恰到好处？没有一个公式，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讲求实效，也就是说要看是什么文章，对什么人讲，文章中有什么东西可讲并且必须讲，以及学生需要讲些什么而定。

精讲问题早就提出来了，现在又来谈精讲，也因为以前有过讲得不精的经验。一般说来，教师讲的，多、少之间往往是偏多，深、浅之间往往是偏深。所谓“发掘”思想因素，“发掘”语

言因素等等,实在都不免有刻意求深之嫌。我对“发掘”这个说法是有保留的。我认为,只有在一篇文章写得不怎么好,语言不够明白,意思不够显豁的情况下,才需要别人去“发掘”。否则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何需乎“发掘”才能懂呢?不需要发掘而去“发掘”,那不是刻意求深吗?其实,刻意求深,往往反而失之于浅。随便举个例子。《红楼梦》里讲到薛家开“当铺”,有人说它是残酷剥削和压榨劳动人民血汗的。这似乎讲得深了,其实不然。劳动人民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拿得进薛家那种大官商开的大当铺去呢?几件破衣服,一送上柜台,朝奉会看也不看,就给摔得老远。到薛家的大当铺去当东西的,只能是家道中落的人家,或者是那些等着放外任的小京官,日子等久了,吃用不够,才寻些东西去典当。进那种当铺的门,总得拿出一两件首饰、古董之类或者还像点样的衣服、器用之类,才能押点钱回来。那种当铺是大鱼吃小鱼、大官商吃破落户的。住在大观园里的邢岫烟就当过东西,她也不是劳动人民。又如贾宝玉,倘说他是个王孙公子,而所有的王孙公子都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所以贾宝玉同贾琏、贾珍等都是一丘之貉,那当然失之于浅,不对;倘说他是什么“反封建战士”,和贾珍、贾琏以至他的老子贾政是“水火不相容”,恐怕同样也失之于浅。贾宝玉和贾珍、贾琏之流是有区别的,说成毫无区别是不对的;然而他们之间也确实有王孙公子的某些共同性,说成势不两立怕也不符合实际,至少,贾宝玉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且不说他也干过些丑事,只是曹雪芹对他客气些,写得含蓄些就是了。这里,我有意举一两个课本以外的例子,说着更方便些。总之,讲文章要实事求是,平实朴素,不要“刻意求深”。在多、少之间,一般来说,教师对学生估计过低,不需要分析的地方也



分析来分析去,讲得偏多。你觉得“发掘”得“深”了,学生得到的东西反而会失之于浅;你觉得讲仔细点会使学生领会得更多些,而事实上由于你没有留下余地让学生自己去想,他们所得反而会少。深、浅,多、少之间的这种关系,很值得认真对待。

有的文章也可以多讲一点,讲得仔细一点,那是为了起示范作用,让学生知道文章该怎么读法,不要一概不求甚解,如走马看花,如过眼云烟。叶圣陶先生说过,讲是为了不讲。这话很有道理。有的课文多讲一点,是作为举例,让学生能够举一反三,学会自己用心去读。学生读的能力高了,老师更可以少讲以至不讲了。等到毕业离开学校,离开老师,学生自己就会看、会讲,不必处处依赖老师了。

讲的方式也不止一种。逐句、逐段地解说,然后概括出段落大意、主题思想以及运用语言的艺术等等,这是一种讲法。有时候,只需在关键的地方点一点,教师不讲或不全讲,留有余地,让学生自己去思考,去体味,这又是一种讲法。传统经验忽视口头语言训练,这是不好的一面,开头已说过,但是也有好的地方,比如对文章的评点,就很值得我们借鉴。评得好的,只在关键的地方评上一句,恰到好处,对读的人很有启发作用。所谓“点”,就是加圈加点以引起读者注意,也包括在某一字或某一句下边或旁边写上几个字,比如在某处写上“伏一笔”,后边某处写上“回应前文”等等;有时候只写一个字,如“妙”,让读者自己去揣摩。善于“点”,是一种很好的教学艺术。点得得当,有启发性,学生应该是一点就透的。这样,不仅节省了许多话,许多时间,而且学生的学习兴趣会提高,积极性会调动起来,更愿意学习语文,因为,他自己动了脑子,自己解决了问题,感到有所得。谈到精讲,我在许多场合提倡过这个“点”字,我

愿意再把这个字推荐一下。

（这是一次讲话的节选，原题为《关于阅读教学和写作教学的几个问题》。）

六、研究之研究

博采兼中外 精研析古今

——张志公先生的现代化和民族化相结合的语文教育观

刘国正 庄文中

张志公先生从事汉语文教育和英语文教育工作已经有 52 年了。^①他执著献身汉、英语文教学,融会中外,相得益彰,精心研究古、今汉语文教育,贯通古今,成效显著。

张先生从事并研究汉语文教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集中于 1958 年到 1963 年,主题是“究竟什么样的语文教学适合我国的具体情况?”第二阶段,集中于 1977 年到 1986 年,主题是“什么是语文学科的现代化?”张先生汉语文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应用语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汉语文教育的民族传统

1954 年,张先生参加了全国中学试行汉语、文学分科教材编写和教学研究工作。1956 年秋季在全国中学实行了汉语、文学分科教学。可是,1958 年分科教学实验中断,“恢复了语文课,而这时的语文教材和教学,比分科实验前的更为粗糙,效果也更差”^②。当时的语文教育实际,促使张先生第一次集中精力研究传统语文教育。

张先生对传统语文教育作了深湛的研究,他指出传统语文教育具有三个阶段四个步骤。第一阶段(第一、二年)是启蒙教育,第一步是集中识字(2000个左右),第二步是进一步识字教育,兼顾初步的知识教育。第二阶段(第三年)即第三步读写的基础训练(读四书,读诗,属对,语言文字的基础知识);第三阶段即第四步进一步的阅读训练和作文训练。在初步研究中,张先生总结出传统语文教育的一些宝贵经验:集中识字,识字和写字分别、分步骤教学,阅读训练原理是“文”“道”不可偏废,方法是“熟读、精思、博览”;作文训练原则是“词”“意”并重,步骤是先放后收(写放胆文),方法是“多作多改”(自己多改)。^③

1977年前后的拨乱反正的语文教育实际,促使张先生第二次研究传统语文教育,从实质上对传统语文教育进行再认识。这次研究结果可以归纳为三大体系、三大经验和三大问题、四大积弊。

张先生提出传统语文教育的三大体系是:一、建立了成套的、行之有效的汉字教学体系;二、建立了成套的、文章之学的教学体系;三、建立了以大量的读、写实践为主的语文教学法体系。同时,张先生从理论上总结了传统语文教育的三大经验:一、语文教育从汉语文的实际出发,并且充分运用汉语文的特点来提高教学效率。例如,汉语大多数语素是单音节的,词又没有形态变化,因此词语容易组合成一连串的整齐结构(音节相等的语句,如三字句,四字句等),也容易押韵。古人就运用汉语的特点,编成语句押韵、结构整齐的启蒙教材,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用属对的方法来训练学生辨别音节、词性、结构等语文能力。二、着眼于语文的工具性,采取多



读多写、在训练中掌握语文能力的原则和方法。三、重视启发学生独立思考,使他们自己能够不断地增长读书作文的能力。张先生从传统语文教育中提取了精华。

张先生指出传统语文教育的三大问题是:一、传统语文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获得参加科举考试的写作能力并应试做官。二、教学内容是“识字+读古文+作古文”。三、学习语文的主要手段是记诵模仿。四大积弊是:脱离语言实际,脱离应用实际,忽视文学教育,忽视知识教育。张先生揭示了传统语文教育的局限性,尽力剔除糟粕。

两次研究传统语文教育,提取精华,剔除糟粕,既防止民族虚无主义,又防止复古倾向,张先生使自己的语文教育理论、实践植根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据我们所知,对于传统语文教育,做如此认真的、系统的、深入的研究,迄今为止,张先生是仅有的一位学者。

语文的工具性决定文道统一

张先生自己说,他把两次传统语文教育的研究成果用于语文理论的建设,一次是1963年主要用于阐述语文工具属性和文道统一,一次是1977年后主要用于建设语文教育现代化的理论。

在《漫谈语文教学》(1962年10月)和《说工具》(1963年10月)中,张先生从理论和实践上阐述了语文的性质。他明确指出,“语文是个工具,进行思维和交流思想的工具”^④,语文这个用来思维和交流思想的工具同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有同有异。“语文这个工具跟其他工具有相同的一面,这就决定了语文教学必须教学生切切实实地在训练中学会操纵和使用

语文工具,也就是着眼于掌握字、词、句和篇章的运用能力,不容许离开这种训练去空讲大道理,空讲理论知识;它跟其他工具又有相异的一面,这又决定了语文教学必须把训练学生运用字、词、句、篇章的能力和训练学生理解语言所表达的思想的能力结合起来,不容许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这个观点是非常精辟的。语文的工具性质决定语文教育必须加强基本训练,在训练过程中掌握语文这个工具;语文的工具性质也决定语文教育必须在训练过程中理解思想内容并接受思想教育。“一句话:文道统一!”

1962年,当时语文界对语文教育目的的认识不一致。有人主张“以道为主”,有人主张“以文为主”,有人主张“道和文并重”。这种情况也反映了许多人对语文的性质认识不清。张先生论述了语文的工具性质,就顺理成章地阐明了文道统一的理论。在实践上,张先生提出了中学语文教学要过“三关”,即要过字关、句关、篇章关,要培养语言文字的理解和运用能力;指导小学“集中识字”的识字教学,指导“放胆文”的写作训练。在理论上,阐明语文的工具性决定语文教育的文道统一。张先生指出,语文教学的“文道统一”表现在教材和教学两方面。就教材说,“语文课本要选‘具有积极的思想内容’的文章,要选‘有助于培养坚强的革命后代’的文章”。就教学说,“必须要求学生把这些文章透彻地读懂,一字一句地、整段整篇地都理解得确切,这样才能在学习语文的知识和技能的同时也领悟、进而吸取了文章里那些积极有益的思想”。

到了80年代,张先生从语文教育现代化的高度进一步阐述语文的工具性质,指出语文的交际范围不仅是个人同个人之间,而且扩大到全国范围以至世界范围,扩大到人和机器之间。



在现代社会,语文的交际工具属性更加强,要求更加高,更突出实用,更讲究效率。在此基础上,张先生阐述“文道统一”也有现代化问题,指出“文”“道”“统一”各自的现代化的内容:“文”,要求说、读、写讲究高效率;“道”,要增加改革、开放的国情的新内容;“统一”,不是“道=文”,不是“文=道”,也不是“文+道”,而“应当是文中有道,道中有文,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张先生实事求是地指出:“我们需要向下一代进行有针对性的、为他们愿意接受、确有实效的思想教育工作,而语文课则应当研究在很好的担起前边说的培养现代化语文能力的过程中应当如何可能分担上述思想教育工作中的哪些部分,达到什么样的预期目的”^⑤。并且在教学上提出了有名的“带学生从文章里走个来回”的主张:“首先把语言文字弄清楚,从而进入文章的思想内容,再从思想内容走出来,进一步理解语言文字是怎样组织运用的。”

张先生关于语文的工具属性和文道统一的理论,给现代应用语文学架起了一根坚实的石柱。

汉语文教育的现代化

20世纪60年代初,张先生提出语文教育科学化问题;70年代末,阐述语文教育科学化;80年代初,张先生举起语文教育现代化的大旗,参与并指导语文教育现代化的教学实验和理论建设。

1980年前后,是张先生“拼老命”的工作时期。他风尘仆仆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调查教学现状,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大学,以至职业学校。他第二次潜心研究传统语文教育,吸取外国语言学 and 教学论的成果。他领导、指导英语、俄语、汉语

文的教材编写工作和研究工作,指导小学“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教学实验,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主编《现代汉语》教材并亲自讲课,应邀在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辞章学。他赴美、日等国和香港地区讲学,考察中小学教育工作和语言学的研究工作。他主持或参与中国修辞学会、北京语言学会、全国外国语教学研究会等学会的工作,从事汉语文教育、英语文教育、语言学的研究工作和组织工作。他还忙于国家政治和社会活动。这种中外古今的研究领域,这种语文教育的全方位调查和实验,这种政治和学术的特殊经历,这种坚实、广博的专业知能,为张先生建设语文教育的现代化和民族化相结合的理论提供了条件。张先生的现代化和民族化相结合的理论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首先,张先生论述了教育目标现代化,包括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观点,提高全体学生文化素质的观点,全面培养听说读写的语文能力的观点。

其次,张先生从语文教育现代化的高度进一步阐述了语文的工具属性和文道统一,已见上述。

第三,论述语文学科的要求和内容现代化。张先生一贯主张语文学科的特定任务或基本任务是“培养和提高人们运用语言文字工具的能力”,同时也认为在完成特定任务的过程中还会有多种“连带功效”,如培养文学修养、思维能力等。^⑥张先生从现代社会实际出发,阐述了现代社会对语文学科提出的“格外突出”的要求和“新”的要求。张先生提出了六项新的要求。1. 小学利用汉语拼音进行“分进合击”的高效的读写、识字、写字教学,提高教学质量。2. “对智力的要求格外突出了”,“发展智力,培养能力,成为当代教育工作的一项突出任



务”。3. “培养学生快速阅读的能力”。4. “充分熟练的掌握普通话”,具有“处理生活和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的敏捷准确的高效率的口头和书面语言能力”,“能够用最经济的语言传递最大的信息量,取得最大的表达效能”。5. 从现代化的要求出发,使学生掌握三百六十行共同需要的、“有助于实际应用的共同的东西”——科学的知识系统,使学生的头脑科学化。6. “向儿童、少年、青年进行文学教育”,使他们具有文学的欣赏和鉴别能力。^⑦

第四,论述语文学科的教学法现代化。张先生指出,“归根到底,教学法的中心目标在于最有效的培养学生的能力——包括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和自己去学习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⑧。“现代化的教学方法要求‘大面积、高速度’”。现代化的教学方法更需要启发式,要“把学生的头脑看成一个能动的、能思考的对象”,“迅速有效地打开学生的脑子,让它动起来”,自觉地思维。张先生对传统语文教学方法“点和涵咏体味”作了新的解释:“点,就是给学生一些启发,不分析那么多;让学生去涵咏体味,就是给学生留下余地,在老师的启发下,自己动脑子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得到更深的印象,获得更大的益处”^⑨。要根据语文教育的规律、学生心理发展的规律、语文本身的规律,来“寻求正当的方法,形成若干有用的、有效的模式,进而活用这些方法、活用这些模式”,总之,要形成“科学的、新鲜活泼的教学方法”。

张先生在论述语文教育现代化的基础上,指出当前语文教学改革的方向:现代化和民族化相结合。具体说,第一,科学化,语文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要科学化。第二,民族化,要发扬传统语文教育的精华,体现汉语文的民族特点。第

三,学以致用。第四,高效率。张先生在1991年7月在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第五次年会上说:“语文教学需要有突破性的改革”,“要极大地提高效率,这是一。第二,做到学用兼顾”。

“一条龙”的语文整体改革方案

张先生的现代化和民族化相结合的语文教育理论,集中体现在他1984年提出的落实“改革之道”的初步设想中。这个设想的基本意图是:适应当前社会和未来的需要,培养学生具有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语文知识和能力,既继承传统语文教育的好经验,又革除传统遗留下来的积弊,使语文教育向现代化、民族化、高效率的方向前进一大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个初步设想就是一个幼儿、小学、初中、高中“一条龙”的语文课、语文教材、语文教学的改革方案。^⑩

幼儿阶段。以语言训练(口语)为中心环节,兼顾思维训练、知识教育、思想教育,但不进行识字教育。

小学阶段。语文课分三条线先后独立进行。第一条线,利用汉语拼音进行语言训练、阅读训练、写作训练,直到四年级;第二条线,从第二学期开始进行识字教学,按照汉字的识字规律独立进行;第三条线,稍晚于第二条线,进行写字教学,按照写字的规律独立进行。到了四年级,分进的三条线合击,总会师。小学五年,四年基本上完成教学任务,第五年巩固、提高。这就是“分进合击”的小学语文教学实验方案。

初中和高中阶段。把两个学段联系起来,六年或七年,分为四个大段落,每个大段落一年半左右。以系统的理性知识为先导,并以实用的语言知识系统为序,按照知识与实践的合理



关系组织全部语文课。第一大段落是讲授篇章知识和篇章实习(包括听、说、读、写)。第二大段落是讲授段的知识和篇章实习。第三大段落是讲授短语、句子的知识和短语、句子的实习(结合篇章、段的教学)。第四大段落是讲授词和语义、语体和风格的知识,并进行实习,到了这一步,听、说、读、写的实际能力已经具备了进入高等教育所应具备的完整基础,同时也具备了关于语言的系统知识。

为实施这个方案,同时改革课程。1. 初中增设文学课,完成文学教学任务,“不要再加给它什么‘培养读写能力’之类的任务”。文学课包含文学性的文言文和中国古典文学。2. 高中开设文言文选修课,让有志于文言文研究的学生选学,进行严格训练,学会用文言写文章。

1990年,张先生对中学的教学内容稍有调整,分成四个部分或四个步骤:一、段落论,二、篇章论,三、字词论,四、总论(语文能力和语文修养)。先教学段,后教学篇章。高三着重从总体上提高语言能力,提高语言修养。

这个改革方案的个性是很强的,特点是很鲜明的。第一,幼儿、小学、初高中“一条龙教学”,避免了学段之间的脱节或不必要的重复,体现了整体观念和效率观念。第二,充分体现了语文的工具属性,突出了汉语文的民族特点。第三,寓思想教育于知识传授、能力训练过程之中。第四,以科学的实用的语文知识系统为序,按照知识和实践的合理关系来组织教材,突出语言教学。第五,语文知识教学和语文能力训练紧密结合,“以知识为先导以实践为主体并以实践能力的养成为依归”。第六,体现“语文就是语言文字”(1990年)的主张,强化语文学科的现代语文知识和能力的教学任务,而不承担文学教

学任务(另外增设文学课)。这个改革方案体现了先进的语文教育思想,富有实践性和创造性。

科学的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

张先生提倡“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讲求实效”的科学态度,反对从概念出发,不尊重客观规律,搞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①他研究语文教育现代化,认真研究现代社会实际,当前社会对语文教学的要求,师生的实际,语文本身的实际以及语文教育现状,从而从实践中总结、探求理论。他研究传统语文教育实际情况及其当时社会实际,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并且力求消除其糟粕形成的积弊,发扬其精华,指导实践,使传统语文教育的精华成为他的语文教育现代化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张先生还自觉地发展他的理论,修正自己的一些观点。例如,1963年他提出语文教学过“三关”(字关、句关和篇章关)。1977年以后,面对现代化社会对语文的新要求,他认识到过“三关”的提法在当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在现今却有很大的局限性,就从更高的角度,提出了语文教育的任务和要求。

张先生提倡用历史唯物论来研究语文教育。突出的例子是他研究传统语文教育。他把传统语文教育放在当时历史社会和现代社会来研究。放在当时历史社会,他概括了传统的经验,又分析了传统的弊端,揭示了传统语文教育的功和过。还从历史的乱麻堆里找出珍宝来。许多人长期以为传统语文教育不进行语文知识教育。经过历史地研究,张先生揭示出一点经验:“真正的传统语文教育经验是,在以读写实践为主的前提下,在适当的时机需要教给学生一些必要的知识,教给他们



使用基本工具书的方法 ,使他们把不自觉的学习逐渐转化为自觉的学习 ,从而提高其学习效率”。^①在传统语文教育忽视知识教育的总倾向中探求了“一点传统经验”。把传统语文教育放之于现代社会 ,他揭示传统经验和积弊对今天语文教育的影响 ,探讨面对现实和未来如何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 ,古为今用。

张先生提倡用辩证法研究语文教育 ,他说 ,“我们现在要研究语文教学改革 ,首先要注意研究的方法 ,即要用唯物辩证法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作为我们的方法论。绝对化、极端化、片面性、非历史主义 ,都是为我们所不取的。”语文教育中有许多重要的关系 ,如工具性和思想性 ,文和道 ,现代化和民族化 ,知识和能力 ,语言和文学 ,白话文和文言文 ,听读和说写 ,还有教师和学生 ,教法和学法 ,课内和课外 ,等等。张先生力求用两点论、重点论、系统论来研究、实践。例如 ,他论证语文知识和语文能力的统一 ,肯定知识的先导作用 ,又强调以能力为训练目的 ,用重点论来论证必须“以实践能力的养成为归依” ,进一步论断“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技能训练 ,是开发智力的必要基础”。又如 ,他提出把幼儿、小学、初中、高中甚至大学看做一个整体 ,看做一个系统工程 ,宏观设计 ,统筹兼顾 ;又提出“教学是一个整体”“语文教学体系”“实际应用语言的知识系统”等充满辩证思想的论题和内容。张先生卓越的研究成果 ,证明了辩证法的胜利。

附注 :

①张先生 1940 年开始在中学教英语 ,1945 年大学毕业后在大学外语系教英语、英国文学和语言学 ,并研究汉语语法修辞。

②《我和传统语文教育研究》(1984 年 4 月) ,《张志公文集》第四卷

第 237 页。

③见《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一书,写成于 1962 年 4 月,载《张志公文集》第四卷。

④《说工具》,《张志公文集》第三卷第 50 页。

⑤《“文道统一”也有“现代化”问题》(1983 年 12 月),载《张志公论语文教学改革》(庄文中编),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7 年 5 月第 1 版第 68 页。

⑥《掌握语文教学的客观规律》,载 1992 年 6 月 12 日《文汇报》。

⑦《汉语文教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1984 年 8 月)《张志公文集》等。

⑧《语文教学方法论·序》(1981 年 6 月),《张志公文集》第三卷第 323 页。

⑨《要重视语文教学法的研究》,《张志公文集》第三卷第 376 页。

⑩见《关于改革语文课程、语文教材、语文教学的一些初步设想》(1984—1985 年),《张志公文集》第三卷第 23—36 页。

⑪《科学态度和科学研究》(1979 年 3 月),《张志公文集》第三卷第 100 页。

⑫《传统语文教育初探》,《张志公文集》第四卷第 133 页。



新世纪的语文教育革新之路

——学习张志公先生语文教育思想

扬州大学师范学院教授 顾黄初

参加这个盛会 , 交织着两种心情。一是深深的怀念 , 二是深深的激励。

去年 5 月 20 日 , 志公先生不幸因病仙逝。在此之前 , 先生由于健康原因 , 时而在家 , 时而住院。他的弟子和仰慕者私下商议 , 要在 1997 年的 11 月间 , 开个会庆贺他老人家的 80 华诞 , 并筹划成立张志公语文教育思想研究会。谁知病魔无情 , 过早地夺去了先生的生命。

谈到在国内成立张志公语文教育思想研究会 , 那建议是早在 90 年代初就有不少同志提出过 , 我也曾经想努力促成其事 , 并有信给先生表达了这一心思。然而 , 1991 年 7 月 , 先生在给我的回信中恳切地说 :

说到有些同志要搞什么“张某某语言教育思想研讨会” , 弟期期以为不可 , 曾有所闻 , 再三劝止。至于已经见之书面 , 各方散发 , 则一字不知。弟决非足以作为研究对象之人。圣陶先生谢世未久 , 大需好好研究 ; 健在的长者尚有叔湘先生 , 亦语言教育的老前辈。弟何如人 , 有何成就 ! 岂敢忘乎所以至此 ! 吾兄谓 , 对此事一定尽力促成 , 弟意毋宁从旁劝止之为愈也 ! 恳托恳托。

写完以后 , 还觉得言犹未尽 , 又补写了几句 :

60 年代中 (即文革前夕) , 就有些位同志 (大都三十来

岁)要搞什么‘张某研究会’,弟坚决制止之。这次倡议者大都是 50 上下人(多数在 50 以上),已各有成就,故不敢言‘制’止,然劝止则绝对必要也(括号和着重号皆先生原信所有——笔者)。补陈区区,务祈大力帮助劝止。万一劝不住,竟然搞起来,实将置弟于十分尴尬之境地,只好远遁耳。

今年 5 月是先生去世一周年,11 月又是先生诞辰 80 周年,为了表达对先生的深切缅怀,为了学习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北京大学中文系、民进中央教育委员会、北京大学出版社等 8 家单位联合发起,举办了这个盛会。接到会议通知,我尽管病愈不久,还是要来参加,并且想起 7 年前拜读先生复信时的种种复杂心情,激动、敬佩、怀念之情油然而生。这是我要说的第一层意思。

志公先生生前对我们国家的语言学和语言教育发表过大量的论著,许多卓越的、新颖独到的见解是今天我辈后学的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也是探索新世纪我国语言学和语文教育改革之路的重要指针。我想,8 家单位联合发起召开这个研讨会,主要目的恐怕有两个:一是共同缅怀这位语言学界和语文教育界的杰出前辈和领路人;二是共同激励,为继承和发展他的卓越思想,结合时代的特点和具体国情,把先生的思想付诸实践,有些是要在先生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向广度和深度推进。

记得先生在讲述完了汉语辞章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后,曾经诚恳地向王本华同志等几位研究生说:

不要因为在总的方面你们接受我的观点,就认为我说的每句话都对;同时也建议你们,要敢于发现并承认在研



究、讲述、写作中出现的某些失误。万万不要因我这样说过,就得坚持不变,不能自己否定自己。不对!该否定就得否定,清代学者戴震说过,做学问,要‘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蔽己’。这话说得太好了,希望你们记取!

这样一种不以权威自居,总希望后人能不断超越自己,总希望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去完成探求语文教育规律这个历史性课题的态度,是一个追求真理者的科学态度,也是一个科学工作者难能可贵的品格。

在这里,我想就新世纪的语文教育革新之路,谈一点个人学习张志公先生语文教育思想的粗浅体会,就教于与会的各位专家。

吕叔湘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表达过这样一个精辟的见解,凡是从事语文教学工作的人都必须“认清”两点:一是认清他教的是什么,即认清语言和文字的性质,认清普通话和方言、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区别与联系;二是必须认清人们学会一种语文的过程。他认为这两点,属于语文教学的“根本问题”,种种具体问题上的困难之所以长期找不到解决办法,原因往往是由于对这两个“根本问题”还没有认识清楚。吕老的这番话,至少能给我们这样的启示:要探索语文教学规律,先得明白语言和文字的一些规律,还得明白人们学习语文的一些规律。

根据吕老的观点,我们在探求新世纪语文教育革新之路的时候,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我以为其中有三项工作特别重要,它们都属于基础性的工作。那就是:一、研究汉语文的特点;二、研究汉语文教育的传统经验;三、研究新时代对人们语文素质的新需求。而这三项工作,志公先生都为我们的研究奠定了相

当坚实的基础。

研究汉语文的特点,是志公先生研究语言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普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研究对象都是一般语言的特点及其规律,只是研究的视角不同而已。汉语文字学、汉语语音学、汉语语法学、汉语词汇学、汉语辞章学等等,研究对象则是汉民族语文的特点及其规律。二者的研究成果,对我们思考语文教育改革问题都是十分有用的。当然,实事求是地说,后者尤其有用,因为它的研究成果运用于汉语文教育更具针对性。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由于受西方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的影响,我们对汉语文本身所具特点的研究一直是滞后的,若明若暗的。近几年,这种状况已开始有所改变,其中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和张志公两位,贡献至巨。但从总体上说,在这方面能提供我们在教育实践中思考和应用的科学结论还不太多,与汉语文的悠久历史和博大精深也不太相称。我想,在志公先生的研究成果中,有几点在我看来是特别重要的,也值得我们联系语文教育实际继续加以思索。

一是汉语语素以单音节的为主。一个汉字可以同时是一个词,即单音节词;如果构成双音节词或三音节词,其中的语素又大都是单音节的。来自古代汉语而至今又活跃于现代汉语中的那些单音节词,往往是汉字中的基本字,它们不但可以单独成词,而且具有极强的构词能力,从而衍生出许多双音节和多音节的词来。构成双音节和多音节的词,其中的语素往往是所谓基本字。因此,志公先生一贯认为学习汉语文,理解并掌握语素特别重要,对于语素的理解是否准确,往往成为能否准确理解词义、能否辨别近义词异同的一个关键。

二是把词组合成句子不靠形态变化,而靠语序,因此比较



灵活。汉语是非形态语,它的组合方式不像西方形态语要靠形态变化那种手段,而是靠语序,形成并列、偏正、陈述、支配、补充等基本结构关系。

三是汉语的词、短语、句子在结构上有明显的对应性。构词法研究构成词的各种成分的结构关系,有并列、偏正、陈述、支配、补充等等;研究短语中若干成分的结构关系,同样可以发现并列、偏正、陈述、支配、补充等等关系;句子中的各种成分特别是复句中各分句的关系,其结构方式也有这样的对应性。

四是汉语的句法结构有辩证的特点。句子在结构上可以紧缩,也可以扩展。可以言简意丰,也可以表达细腻而严谨,灵活自如。句子的结构既有规定性,又可以调整成分的次序,显出某种灵活性。

五是汉语表达的规范性与艺术性的统一。规范性主要是指结构的严整规范;艺术性主要是指结构的活泼灵动,显示出表达者的个性和风格。

六是汉语的组合关系和语法规则束缚都比形态语言小些,所以语汇显得更重要些。比如汉语的虚词,表义、表情的功能往往特别强。现代人说到古代书面语,习惯上总是用“之乎者也”来概括,可见虚词在古代汉语中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个特点在现代汉语中依旧保留着。如似乎、也许、大概、可能、然而、甚至、未必、何尝等等这些词,或表推测,或表转折,或表委婉,或表虚拟,或表强调,总之是使语意表达带上种种特殊的分量或色彩。善用虚词,常常能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人们的语文素养来。

汉语文的特点,至今还是一个没有研究透的问题。但无论如何,这个问题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语文教育新体系的基

础性问题之一。志公先生在研究这个问题方面已为我们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财富。

研究汉语文教育的传统经验,是志公先生的又一重大贡献。

前几年有人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在语文教育方面,究竟是现代人搞不过古代人,还是古代人搞不过现代人?哪些方面搞得过,哪些方面搞不过?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深入的、客观公正的调查研究,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1988年1月,全世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聚会巴黎时,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可见,以孔子为代表的东方哲学思想包括教育思想,是历久弥新的。

志公先生曾从教学法的角度说了他研究传统语文教育教材教法后得出的结论:

经验方面主要有三点:一是建立了成套的、行之有效的汉字教学体系。二是建立了成套的文章之学的体系。三是建立了以大量的读、写实践为主的语文教学法体系。

问题方面主要也是三点:首先是语文教学的性质和目的——语文教学是科举考试的附庸,目的在于使受教育者获得参加科举考试的写作能力。这样的性质和目的决定了教学内容——识字加读古文加作古文(一般古文和八股文)。这样的性质和目的,这样的内容,决定了学语文的主要手段——记诵和模仿。

这番话是先生在《关于改革语文课、语文教材、语文教学的一些初步设想》一文中说的,目的是为了寻求语文教学的改革之路。传统语文教育的这些“问题”,产生了两“脱离”——



脱离语言实际、脱离应用实际；两“忽视”——忽视文学教育、忽视知识教育。改革就要从革除这些弊端入手。在最近掀起的语文教育问题大讨论中，有个别人发表过这样的观点，认为语文教育受语言学家的影响太大，严重忽视了文学教育。这种高论，至少对志公先生来说，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恰恰相反，语言学家张志公先生正是十分重视文学教育的。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从教育的角度考虑，文学教育的意义和作用太重大了。”“传统的语文教学严重忽视真正意义的文学教育，这种积弊同样一直影响到现在。”“目前的语文教材里有比例很不小的文学作品，但并不是用来进行文学教育，而是用来进行‘读写训练’的，连古典文学作品也不例外。这样的语文教学、语文教材，实际上是一种互相掣肘、两败俱伤的做法。”因此，他主张：“从初中起，增设文学课”，专门进行文学教育，专门进行文学鉴赏能力培养。说语文教育因受语言学家影响而完全忽视文学教育，不是对当前语文教学现状的无知，就是少数文学教授的偏见。这是题外的插话。

不过，我认为先生所说到的传统语文教育存在的“问题”或“积弊”，大都是科举制度确立并盛行之后的事，或者说主要是明清两代官家所推行的那种教育的消极后果，这种积弊的影响甚至延续到现在，成了所谓“集体无意识”。如果我们把调查研究的范围，从时间上再向前延伸，从空间上再向广处扩展，那么，传统语文教育中值得我们后人重视的、并在继承的基础上根据新的时代需要加以融化吸收的“经验”，恐怕还有一些。例如：

一是学语文与学做人的结合。

就教材说，儿童初步接受蒙学以后，以四书、五经为主，兼

学史籍。所谓以经为范,以史为鉴,读这些书都是为了明白做人的道理。即使让蒙童读的《三字经》《千字文》,也含有儒家伦理的内容。

就教法说,历来重视教师的人格影响,十分讲究教师的德行,所谓“师以德为魂”。还重视受教育者的亲身实践,强调亲闻,强调笃行。

宋代学者朱熹说:“圣人非教人为学,非使人缀缉语言,造作文辞,但为科名爵禄之计,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方是正当学问。”这位古代大教育家说出了传统语文教育的精髓。

二是重视综合,重视智、情、意的统一。

不讲究传授系统的语文知识,一切让受教育者通过诗文的吟诵自求领悟,自求通达,这固然有忽视知识教育之嫌,但它把受教育者的学习态度置于十分重要的位置,却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儒家施教,注重学、问、思、辨、行,这些主要是学习方法,然而,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加上了博(广泛地)、审(追根究底地)、慎(精细缜密地)、明(不容含糊地)、笃(脚踏实地地),这就强调受教育者的情和意了。所以难怪研究传统儒家教育的年轻学者俞启定说:“儒家十分重视对个人心情的研究,在学习态度上强调虚心、刻苦、专精和有恒,在教学原则上强调身教、启发、因材施教和教学相长,无不以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充分发挥个人的最大潜力为宗旨。”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把好学、勤学、乐学放在求知的首要位置,强调了当今所谓的“非智力因素”的重要,是难能可贵的。

三是把汉字的认读、书写和积累看做是学语文的基础。



蒙童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等,主要目的是为识记汉字(学《百家姓》之类更是如此)读这些书,明多少“理”固然重要,更重视的则是识多少“字”。识字多了,读书就方便,明理自然也不难。有些字难写,另编一种习字帖,“上大人,孔乙己”,笔画由简单到复杂,方式从描红到仿写。总之,识字和写字两条线进行。初步学会了写字,进一步便求好,于是再临摹名家之帖。写得一手好字,是古代读书人非常讲究的事。

四是以诵读、熟读模范文为学语文的基本途径。

诵读是为了更好地体会文章的文意、文气、文势,更有利于培养语感。古人读的书,与当时的流行口语有一定的距离,说的是一回事,写的又是一回事。诵读,有利于口语向书面语的转化。

熟读甚至背诵,主要是为了更多更好地积累古代的语言材料。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就是因为通过熟读,即使不学诗歌格律的知识,也会大致领略到作诗的平仄用韵的规律,更重要的是可以熟悉诗歌中习用的词语与句式,自己模仿着写也就有几分相像。诗歌如此,古代散文也同样如此。待到独立撰写诗文时,许多习用的词语、句式、表达方法自然而然会流到了笔底,要随机发挥、变通也就不难了。

五是精读与博览相辅相成。

经史子集中的重要篇章,要精读,要反复吟诵、揣摩。史学家范文澜介绍清代著名训诂学家戴东原,说一般训诂学家精通训诂,但文章未必写得清通流畅,只有戴东原文笔挥洒自如如十分难得。问其故,说是他一辈子读《史记》,尤其是其中的名篇,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信陵君列传》等可以说有空即读,百

读不厌。这种古代学者的名篇精读而不辍,真值得我们学习。精读而外,还讲究博览。博览指广闻博识,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都是为了除书本知识之外,还要多接触自然,接触社会,以求内蕴的充实。

六是语文训练中重视语境的铺设。

典型的例子有三:一是对课,俗称对对子。出一个上联,要求对一句下联。因为对课有严格的限制和规范,所以上联就是一种语境。上下联对不起来,就是脱离了语境;上下联对得不工整,就是与语境不完全切合。二是猜诗谜。写出一首人们不太熟悉,但平仄等等又符合规律要求的诗来,在其中挖去一个重要字眼,要求学习者将这一个挖去字眼补出。原诗就是一个完整的语境,补出的字,无论从语意上、文气上、平仄上、色彩上都必须符合原诗的表达要求。三是学写尺牍。尺牍,是古人对书信的称谓。写信,总是有特定的对象的,这对象的身份、与写信人的关系、写信人需要了解的情和事等等,都是特定的语境,写信的格式、用语都要与这语境相适应。这类语言训练是十分有效的。

传统语文教育中究竟有哪些是符合汉语文教学规律的经验,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语文教育的特点加以发掘,仍然是个没有研究透的问题。志公先生开辟的路,我们还需要继续走下去。

另外,语文素质究竟包含哪些内容,新时代对人们的语文素质又有些什么新的需求?面临世纪之交更值得我们去调查研究。

语文素质是个动态概念或者叫做历史概念。现在是20世纪90年代末,语文素质要求跟18、19世纪必然不完全一样。



那些相同或基本相同的部分,可以看做是语文素质中的稳定性因素,如能写得一笔好字之类;那些因时代发展需要而更新的,就是语文素质中的时代适应性要求,如能把字写得快而好,而且能写出各种字体之类。以“说话”为例,面对21世纪人际交往越来越广泛和频繁,社会对公民的口语交际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些“越来越高”的要求,就是时代适应性因素。再以“阅读”为例,与阅读相关的眼视能力,过去以视读书面文字为主,现今都要兼备视读屏幕文字、网页文字的能力,过去视读书面文字,固然需要有一定的速度,视读屏幕文字、网页文字更需要具备快速扫视的能力和快速记忆的能力。诸如此类,也都需要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把未来社会对公民语文素质的新需求搞清楚。

记得吕叔湘先生在《汉语文的特点和当前的语文问题》一文中曾经说到:“三个面向,第一个是面向现代化。什么是现代化?简单点说就是高效率。……在保证正确方向的前提下现代化就意味着高效率。”志公先生的观点与吕老可以说是不谋而合,他在解释什么是“语文能力”时说:“处理生活和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的敏捷准确的高效率的口头和书面语言能力。”又说:“能用尽可能经济的语言材料传递尽可能多的信息,达到尽可能高的准确性和可理解性,收到尽可能强的表达效果,将被认为是写作高手。”为了说得更具体、更形象,更便于理解,他这样来预测未来新世纪对公民语文素质的新需求:“这些大学毕业生(即现在的初中、高中生),30岁上下的社会中坚,将需要什么样的语文能力呢?他们普遍需要的将是如历史上描写智力超常的‘才子’们那种‘出口成章’的能力,因为他们要用自然的口头语言处理工作,指挥机器干活;那种‘一目

十行 ,过目成诵 '的阅读能力 ,因为他们需要读的东西太多了 ;那种 '下笔千言 ,倚马可待 '的写作能力 ,因为他们的时间很珍贵 ,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写出他们生活和工作中需要写的东西。 ”

未来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快节奏 ,因而适应未来社会需要的语文素质要求就是高效率。志公先生为了努力实现上述目标 ,晚年完成了两项带有跨世纪意义的重大工程 :一是在系统讲授的基础上 ,由王本华同志整理完成的《汉语辞章学论集》 ,二是在宋祥瑞和赵大鹏等几位先生的努力下完成的以张志公先生语文教材编写思想为指导的九年义务教育初中《语文》教科书。这是先生贡献给中国语文教育界最新的两大硕果。我们应当激励自己 ,继承先生遗志 ,把中国的语言学和语文教育推进到伟大的 21 世纪。

(1998 年 11 月 19 日)

七、忆大师

大 酒 缸

叶至善

五年前，民进召开七大，住在 21 世纪饭店。那家饭店的自助餐厅摆的是小方桌，一桌至多坐四个人，适宜于饮酒聊天。每天晚餐，最后赖着不肯走的往往是志公和我。两人酒到半酣，要是话头又引到了大酒缸上，更舍不得离开。有一晚，我忽然瞥见服务员小姐把别的桌子都收拾归齐了，站得远远地，眼睛正盯着我们呐。我说：“志公呀，这大酒缸一时也说不完。咱们这么办，如果将来我先去，你就以《大酒缸》为题，写篇悼念文章，如果你先去，我照此办理。你看好不好？”志公笑着说：“中。”于是拄着他那根细细的拐棍，站起身来。

北京的每一条小街，本来都有两三家小酒铺，格局几乎一个模样。一开间的门面，靠墙摆着三口大酒缸，两口在左边，一口在右边，后面让出柜台的位置。大酒缸其实是空的，盖着一寸来厚的木盖当桌子用，每桌三四张板凳。靠墙的一边自然没法坐人了，摆着七八个小碟子，无非是豆腐干花生米之类，您看中哪一碟就把它移出来就酒，最后算账。酒得向柜台上要，二锅头、莲花白、老白干，由您挑。盛酒的是圆锥形的白瓷敞口小瓶，至多盛二两，喝干了再添，喜欢喝热的还给您烫。一人一小

瓶酒,一个青边小酒盅,让您自斟自酌。只是坐在板凳上不太舒服,两条腿没处搁,您得侧着身子坐,或者摆出骑马的架式:跟朋友膝盖碰膝盖,实做到了促膝谈心。

志公和我如此地念念不忘大酒缸,倒真个意不在酒。20世纪50年代初,志公才进开明书店,创办《语文学习》的任务就落到了他的肩膀上。志公没编过刊物,他却不慌不忙,每天中午拉两三位同事,当然少不了我,去到南小街口子上的小酒铺喝酒。都是当编辑当上了瘾的人,连喝酒闲聊,也离不开咬文嚼字。大家靠着酒缸盖,借着酒兴,你一言我一语,几个中午下来,《语文学习》的编辑方针就有了;该设哪个讲座,该辟哪个专栏,都有了眉目。有的文章甚至题目也有了,材料也有了,谁来执笔让各自认定。有的题目,大家说须得请某位先生来写才好,于是推定了由谁去约,甚至要怎样说方能打动某先生的心,使他觉得所约的文章正是他自己想写的,也商量得定定当当。才一个来月,没组织编委会,没召开座谈会,《语文学习》创刊号就贸然跟读者见面了,冒叫一声印了10万册。谁知10万还不够卖的,接连重印了两次。刊物再版是非常罕见的,大家得意非凡,可又说咱们得保密,别让人家知道《语文学习》竟然是在大酒缸上聊出来的。

如此得意的事,一生中能碰上几回呢?志公忘不了,我也忘不了。可是在“21世纪”的那一晚之后,俩人再没有这样浅斟慢酌的机会了。志公越来越显得衰老,逢到例行的会议,他要么请假,至多在开幕式上露一回脸,我去看望他的次数也不多,都在病房里,他依然旷达乐观,谈笑风生,只是不再谈大酒缸了。我想机会以后总还会有吧,没料到今年五月他突然心力衰竭,永远离开了人世。那些日子我没着没落的,往事历历都



在眼前 ,夜里怎么也睡不着。想到约定的《大酒缸》 ,如今非得我写不可了 ,于是在枕上填了一首《水调歌头》 :

何事最堪忆 ,偌大酒缸旁。宛似围炉闲话 ,促膝论文章。语法修辞句读 ,信手拈来佐饮 ,醪薄又何妨。竞夸吹求细 ,耳热意飞扬。

闻噩耗 ,顿足叹 ,泪囊囊。戏言今成讖语 ,起坐只彷徨。捧出宏文五卷 ,沃酹陈香一盞 ,君渴或思觞。君但扞髭笑 ,我亦满头霜。

填词作文有什么用呢 ? 志公是不会知道了 ,不会知道我还时时在想念他 ,还有那大酒缸。

(作于 1997 年 11 月 30 日 ,民进八大胜利闭幕前两日)

悼念志公同志

周有光

我和志公同志成为往来频繁的亲密朋友 ,因为我们长期一同住在一个大院里 ,这个大院叫做公主第。

1955 年底 ,我被调来北京 ,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办公处和住处都在北京沙滩景山东街的公主第。这里是解放前的北京大学 ,清朝末年的京师大学堂。沙滩的红楼是后来添造的。五四运动的许多故事 ,就发生在这里。

地名早期叫马神庙 ,现在改称沙滩后街。公主第原来是一座规模宏大的驸马王府。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一个单位用不了这许多房屋 ,跟另一个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共同使用。当时全国大中小学的所有教科书都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

志公同志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 ,跟我随时往来 ,非常方便 ,甚至一天往来几次。我有什么工作上的问题 ,就去找他 ,同他商量。有时有朋友来找我 ,在我的办公室和家里都找不到 ,就到志公同志的办公室和家里去找 ,一定找到。

我们一同看到公主第大院的一派宫廷景象 ,绿树成阴花香鸟语。春天 ,白色和紫色的丁香花处处盛开。大院中心有一个荷花池 ,每年开放复瓣荷花。池中有一个白石头的方柱子 ,顶上是斜放着的圆盘形日晷 ,旁边刻着“仰则观象于天 ,俯则观法于地”字样。这是京师大学堂和北京大学遗留下来的文物。

我们也一同看到公主第大院在一次一次政治运动中不断



遭到难以相信的破坏 ,成为很像一个无人管理的低级难民收容所的样子。终于 ,浩劫过去 ,否极泰来 ,把红漆大门拆掉 ,把大门外的两个大石狮子搬走 ,封建意味一扫而空 ,改成一组一组矮矮的新式办公楼和宿舍。

我每次想起志公同志 ,不能不同时想起公主第大院的沧桑变化 ,因为从我的办公室到他的办公室必须经过这一带使人回想清朝覆亡和五四运动的花园式庭院。现在 ,志公同志的宝眷还住在公主第的新造宿舍里 ,我已经离开公主第内清朝末年建筑的破烂不堪的住宅 ,迁移到名称古怪的后拐棒胡同。

20 世纪 50 年代 ,振兴教育 ,朝气蓬勃 ,一方面提倡普通话、简化字、汉语拼音 ,一方面改革现代汉语教育 ,重视语法和修辞。这时候 ,掀起一个语法学的百家争鸣 ,语法学的文章如天女散花 ,缤纷落地 ,现代汉语的语法研究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但是 ,中学的语法教科书 ,不能众说并立 ,旁征博引 ,需要有一个简单明了、说法一致 ,而且容易为青年们所理解的语法体系。这是一件艰难而重大的学术综合工作。在志公同志主持之下 ,折中于各家学说之间 ,写成一个兼收并蓄、汇集众长、适合中学教学用的语法体系。他和他的同事们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工作 ,得到社会各方面的赞赏。

志公同志学识渊博 ,著作很多。他治学谨严 ,著作切于实用。例如他跟田小琳等合著的《现代汉语》 ,就是一部极好的适合大学一年级用的教科书。语文界对他的理论结合实际的学风 ,钦佩之至。

志公同志长期以来热心文字改革 ,不仅观点跟文改会的同道们共鸣 ,而且在许多工作中跟文改会的同道们协作进行。他

最后担任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的会长 ,就是他众望所归的证明。他几次对我说 ,他被邀到国外讲学 ,人家希望他多讲一些语法学 ,可是他想尽办法多讲中国的文字改革。他的学术思想是向前看的 ,不是向后看的。他同意我们提出的“厚今而不薄古”的观点。这跟中国语文学界的传统思想有许多不同之处。

志公同志比我小几岁 ,可是他很早就拿起拐棍 ,留了胡子 ,而且胡子渐渐有些花白的风味 ,人家称他张老。他笑笑 ,点点头。我呢 ,年纪比他痴长几岁 ,可是不拿拐棍 ,不留胡子。每次一同开会 ,他总是笑着介绍说 ,我是他的老弟。我也就称他为老兄。许多人信以为真 ,引起哄堂大笑 !这是我们常在一起开会的趣事。

现在 ,我还是常常遇到问题就拿起电话跟老兄商量。可是 ,在想电话号码的时候 ,我忽然记起了老兄已经登上了“八宝山” ,而老弟还停留在“后拐棒” 。真是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 ,光阴者百代之过客” 。我们一辈的人属于语法学上所说的过去时态了。可是中国语文和语文研究应当永远属于未来时态。

(1998年3月5日 时年93岁)



伊人宛在

——悼志公先生

章 熊

噩耗传来,我匆匆赶到人教社。在遗像面前不能自持,反倒是国风劝慰我。和遗体告别那天,我正接受医院检查,终未能见上最后一面。

当时,我已写完《沉思录》,意犹未尽,又写《21 世纪的展望》。两稿都谈到志公先生。《沉思录》连载尚未结束,《展望》还没有发表,先生已经作古。

先生的思维清晰而活泼,像不断的流水。每次晤面,都给我以启发。这就是我的稿子里经常要谈到先生的原因。在现阶段,最能引发我思考的,是关于语文教材的“双线推进结构”。

文学作品欣赏能力的培养,这是一条线。文学欣赏能力的形成需要大量的积累,它与近年来认识心理学关于“长时记忆”和“短时记忆”的研究不谋而合。这个提法,不仅突破了“语文课不是文学课”的观念,而且必将挣脱当前“基本课文”篇目的束缚,使教材的编写出现新的格局。

实用语文能力的训练是另一条线。“实用语文能力”不是指现行的语法知识,先生早就提出要“造语法的反”;也不是现行的修辞教学,先生在十多年前就提出“修辞是用尽可能少的话语传递尽可能多的信息,并且取得最佳效果”的观点。“训练”要求可操作性,还需要研求中学生语文能力发展的规律。

这一主张的实现 ,将为语文教学开拓崭新的天地。

先生是执着的。从上述主张中可以看到与 20 世纪 50 年代“分科教学”的渊源。40 年的风风雨雨、年近八旬的高龄、癌症的缠绕 ,并没有消磨先生的意志。先生绝不轻易舍弃原有的信念 ,孜孜以求。

先生又是敢于自我突破的。“暂拟体系”是先生对汉语法研究的重大贡献 ,是当年《汉语》教学的灵魂 ,也奠定了先生在语言学界的地位。但是一旦确认它不宜作语言教学的主导框架以后 ,就义无反顾地探求新径 ,显示出真正学者的风范。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语文教学界一向“三老”并称 ,而先生这一“老”与其他二“老”还略为有所不同。除了年龄上的差别以外 ,“承上启下”的特色更为明显。“一代风流” ,先生当之无愧。

先生之言 ,探幽发微 ,有时貌似平易 ,却是深刻思考的结果。睿智可以说是先生谈吐的一大特色。我在《沉思录》结束语中提到的教师与学生之间“像与不像”的话就是在和先生闲谈时印在我的脑子里的。这篇短文中引用的一些先生说过的话也是如此。娓娓而谈 ,却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

先生离我们而去了 ,但身影将长留在语文教学界之中。也许随着年代的间隔 ,音容逐渐渺茫 ,但伊人宛在 ,先生的声音将长期在教师之间回响。



深情寄与张先生

王本华

1997年5月20日,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张志公先生永远地走了。他是带着遗憾走的,我想。他的《张志公语文近作》还没有付印,他的《张志公语文自选集》还在计划当中,他的《张氏简明语法》还有许多同仁在翘首以盼,他还有那么多想做而没有来得及做的事情。他一定是带着遗憾走的。每每想到这些,张先生的音容笑貌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仿佛又看到了张先生那睿智的目光,那般殷期待的神情。

初识张先生

1986年到1989年,我在北京师院(今首都师大)张炼强先生的门下读研究生。是1987年的一天,突然听导师说给我们安排了张志公先生的课,讲他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提出的新学科——汉语辞章学。这样一位语言学界、语文教学界的大家,从前只是耳闻,只是领略、阅读他的文章和专著,突然听说要见到本人,要听他讲课,那种兴奋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当时张先生在出版社任副总编辑,分管外语室工作,办公室在二层南侧最西端。我们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敲开了办公室的门,随着一声悦耳的“请进”,一个慈祥的面容就出现在我们眼前。他爽朗地笑着,看出我们有些局促,就说:“快坐吧,‘教室’都安排好了,只不过与你们的教室有点不同。不必拘

束,随意坐吧。”接着又将早已准备好的茶杯斟上热水,送到我们面前,并且说:“第一次是我给你们倒,以后就得你们自己动手了。”慈祥的面容,爽朗的笑声,和蔼的话语,热腾腾的茶水,把我们的局促很快就赶跑了。我们开始作自我介绍,用张先生的话说:“我们坐在一起,既是师生,更是朋友,首先应该有个互相了解。”先生的自我介绍最详,从小时候的不善言说,到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演讲,到演出《雷雨》等剧本,到自编自演话剧等,到学理工转而学外语,到喜爱语言学进而研究汉语,等等,等等。介绍中不时夹杂着笑话,把我们和他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于是开始讲要求和希望。他再次强调:“我们是师生,更是朋友,因此,虽然是我讲课,但不能专门听我一个人讲,我还要听你们讲。你们讲什么呢?或同意我的观点,那就为我的观点补充些材料,以资证明,或不同意我的观点,那就说说你的理由,最好能够说服我;或者一时还有疑问,那也不要紧,有疑问就提出来,我们可以一起讨论。我从来都认为我的观点是唯一,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互相讨论,各抒己见,使正确的更加完美,不完善的能够得到修正。因此,最要紧的是,讲课不能我光讲,你们光听。我光讲,听不到反馈信息,不能了解你们的看法;你们光听,不动脑筋,或动了脑筋却不敢说出自己的看法,这都不好,于我们的讲和学都没有什么益处。”这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他作了如此的介绍,他提出如此的要求和希望,这对我们该是多么大的安慰和鼓励呀!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我们开始听张先生讲课,前后一年,风雨无阻。

与张先生在一起

1990年,我有幸受到先生的推荐,来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参



加工作 ,开始与先生有了不间断的交往。这期间 ,我仔细阅读了他的所有专著和大量文章 ,也聆听过他的许多不倦的教诲 ,对先生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思想有了较多的了解。这些 ,很多人曾经著文阐述 ,比如他研究的广博与精深 ,他对唯物辩证法的自觉运用 ,他与时代同步的足迹 ,他不赶风头、慎重对待学术问题的态度 ,他对青年同志的热心扶持等。本文不是专门阐述他的治学 ,不多谈。这里只想简单谈谈和先生在一起时 ,他对我的教诲和指导。

“要确定一个学术研究的目标。有了目标 ,就等于有了方向。”记得我几次和张先生说起工作忙 ,压力比较大 ,想做些专业方面的研究 ,总是感到比较困难。先生认为 ,工作负担重只是一个方面 ,关键是要有一个学术研究的目标。有了目标 ,就可以利用工作之余 ,围绕这个目标有计划地积累些材料 ,零散地做些研究 ,慢慢地就可以搞成个系统工程了。

“要多读报章杂志 ,了解最新的研究动态。”他认为 ,不了解研究动态 ,就等于瞎子摸象一般 ,看不到自己所处的位置 ,就可能做些重复劳动 ,浪费时间 ,劳而无效。多读报章杂志 ,是了解研究动态的最好途径。工作忙 ,没有整块时间 ,就要学会利用零碎的时间 ,如饭前饭后、工作间隙、开会之前等 ,不放过任何一点可以利用的机会 ,随时取得有用的信息。

“要像孔夫子‘如太庙’一样 ,有不耻下问的胆略。”不仅要多读报章杂志 ,了解研究动态 ,还要注意做生活中的有心人 ,不放过任何学习请教的机会 ,要能像“夫子如太庙”一样 ,做到“每事问”。先生说过两个例子 ,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一次是到美国。他原先知道胡椒叫 pepper ,不知道辣椒叫什么 ,那天恰好看到餐桌上有辣椒 ,就问美国朋友 ,于是知道了辣椒叫

hot pepper。还有一次是到日本。他看见一块牌子,写着“有料停车场”,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一问,原来就是汉语的“收费停车场”。我想,张先生那广博的学识,大概有不少就是来源于这种“每事问”吧!

“要学会用唯物辩证法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董菊初先生曾经作《试论张志公语文教育研究方法历史主义原则》,系统阐述了张先生研究中对唯物辩证法的自觉运用。先生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时常告诫我们,研究任何问题都要采取辩证的态度,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要搞形式主义;要全面地看问题,不要搞片面性,绝对化;要有历史观点,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不要静止地、形而上学地分析问题,等等。这种方法对我现在的工作和研究都有着重要影响。

“对学术上的争论要认真思考,慎重对待,不要人云亦云,赶浪头。”这是张先生有感而发,揣度他的意思:一是学术问题要允许讨论,允许有个人的观点,不要群起攻之;二是要认真对待别人的观点,了解提出这个观点的背景,分析它的正确和不足之处,给予中肯的评价。我想,如果我们的学者都采取这种态度,对于各种学术研究都会大有裨益的。

我和先生在一起时,得到的教诲还有很多,获益的地方也还有很多,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再一一述说。

病榻上的张先生

由于工作上的奔波、劳累,20世纪80年代以后先生成了医院的常客。但他并不以此为苦,却常常笑着说,自己因此可以做半个医生了(所谓“久病成医”)。事实也确实如此,他不仅对自己的各种病情了如指掌,能说出个所以然,而且当你偶



感不适时,他也会为你分析得头头是道,还要开出药方,给你劝慰。他的这种乐观的精神不仅为他一次次战胜病痛打下了基础,而且也深深地感染了别人。

1995年10月,张先生又住进了积水潭医院,是咳嗽、发烧。吃药、点滴,身体很快就好了起来。先生告诉我,过几天再全面检查一次,就可以出院了。谁料,过几天我打电话到家里,他还没有回来,问原因,家里人有些支支吾吾。我当即赶到医院,急切地询问情况。先生却笑容满面地招呼我:“怎么了?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了?别那么紧张好不好?”然后他平静地跟我说检查情况,说医生的怀疑,说还要做进一步的检查,等等。平静得就好像说的是别人而不是他自己,就好像他患的仍然是感冒而不是别的什么。我感到很惊异,先生却说:“现在还没有确诊,即便确诊是癌,又算得了什么呢?过去说‘谈虎色变’,现在老虎没那么多了,癌多了起来,所以有人就‘谈癌色变’。等到有一天,或许只是很近的时间,医学攻克了癌,大概又会谈别的什么而色变了。”听了这些,我心里踏实了许多,何况还没有确诊呢?

话虽如此,张先生也感到了时间的紧迫。再一次去时,先生有些抱歉地对我说:“事前没有和你商量,前两天社里有关领导来医院,我提出希望有个人用一定的时间帮我做一些文字方面的工作,领导当即应允。只是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我说:“我的想法是,领导不应允我都应该做,何况领导又给了时间,我应该做得更好。”先生听后高兴地笑了,很快就和我商量起来:什么时间来,有哪些工作准备做,先做哪个,后做哪个,等等。

这以后,先生几乎就没离开过医院。1996年3月,在中日

友好医院,有天先生托信叫我去一趟。我心里疑惑,还没有到计划去的时间,为什么中途叫我去呢?我赶到医院,先生很释然地对我说:“我现在不是嫌疑犯,而是真正的犯人了。当嫌疑犯很苦恼,整天想着‘是’还是‘不是’,现在好了。”我看先生的神情,果然有如释重负的感觉。而且,紧跟着他就和我谈起了“以写作抗癌”的设想。他从语文教学还没有从传统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讲到我国古代发达的文字之学,讲到重视语汇研究的训诂之学,再讲到语文教学的不理想,讲到封建社会以文取士的种种弊端,讲到我们现在的考试制度,等等,等等。这个时候,他滔滔不绝所讲的不是癌,而是他致力多年的种种研究,从中可以见到他那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最后说:“一想到这些,我的活力就来了,就感到这小小的癌似乎被这股活力压下去了!我不懂医学,从医学上谈不出什么理论,但我真切地感到,我这种状态、这些思考,确实有抗癌的作用!”这就是病榻上的张先生,他念念不忘的是他的学术研究,是他对各种问题的思考,而不是他那令人沉痛的不治之症!

最后一次相见

最后一次见到张先生是5月14日。由于五一以后有一周的语文教材统稿会,所以这次见面间隔时间较长,大约有十几天。

那天下着蒙蒙细雨,我和张厚感老师约好去看望张先生。先生正躺在病床上打着点滴。这一见,我心里酸酸的,心酸得眼泪都要掉下来:先生从来是坐着打点滴,为的是方便做事情和接待客人,今天不仅是躺着,而且插着氧气管,满脸倦态;见我们进来,他只是点点头算作招呼,全然没有平常见面时的



风趣,他甚至不能说话,一说话就跟着一阵剧咳,然后就是大口大口地喘气。见此情景,我只好向护理他的同志询问,张先生就喘着气慢慢地说:“不要问了,病就是这个样子,会像以前一样很快好起来的。你这么久没来了,说说你手头工作的情况。以前都是我主讲,今天我气力不足,改成你汇报,尽量少提问题。”

事后想想,那天的见面确实有点像临终告别,把该交代的事情都作了交代。我汇报说:《张志公语文近作》(后因先生去世,书名改为《张志公论语文·集外集》,表示与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五卷本文集相衔接)已经发到出版社,那边催着要一些照片。《张志公语文自选集》按着前次商量的,分为语言学、语法、修辞、语文教学、传统语文教育、其他几部分,但考虑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影响深远,对传统语文教育的研究相当深入,建议将这两部分放前,用《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领起全书,语法、修辞和辞章学集中在一起,是对语言理论和语言运用方面的探讨,有关语言学其他问题的研讨统一放在最后。我又说开统稿会时见到一些老师,他们了解到您想写一本简明语法(这也是张先生计划中的书稿,我们已定名为《张氏简明语法》,目的是建立一套真正符合汉语特点的汉语语法,可惜先生匆匆离去,没有来得及全面阐述他的新语法观),很感兴趣,很想能早些看到,以改变当前语法教学的不利局面。此外还讲了一些消息,一些生活上的事情,好像把我想到的都讲给了他。先生边听边点头,有时还露出满意的微笑。特别是讲到他的新语法观时,他甚至有些激动,以至于不停地咳嗽起来,大口地喘着气。

我汇报以后,张先生也择要说了几点。一是照片请师母选几张,选好后给他看看。二是自选集的编排,他表示同意我的

想法,可大略分为三部分,以传统语文教育研究统领。三是希望将陈大庆写的《张志公先生著述年表》放在自选集的后边,可插入一些相应的照片作说明(后因先生去世,该《年表》收入《张志公先生纪念文集》)。四是因为我十几天未来,他自己草拟了一篇“题记”,说明编写自选集的某些想法以及委托我做一些工作。五是希望他自己快快好起来,以使新语法的编写尽快做好。说完以后,他示意我将他的公文夹拿来,找出他写的那个“题记”。《自选集》完稿时,就将这篇“题记”放在了我写的那个后记中。

我们又说了些好好养病的话,便告辞出来。临走时,我对先生说:“张先生,您不要急于做事,好好养病,过几天我再来看您。”张先生仔仔细细地看着我,又露出他惯有的那种幽默,半开玩笑地说:“不要劝了,谁稀罕你来看我!”我知道他也是有些不高兴,就说:“不管您稀罕不稀罕,我都要来。”哪想到,这次自以为很平常的见面竟成了永别,这句让人感到很亲切的玩笑话竟成了张先生留给我的遗言。

永 别

张先生永远地走了,他没有给我机会让我实现自己的诺言。过几天再去看他。每每想到这些,我怎么也不能原谅自己。

记得20日早晨,我刚刚到办公室,顾振彪先生就告诉我:昨天有人去看过张先生,据说病得比较厉害。但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会这么匆匆地离去,所以还麻木地要等到第二天探视时间再去,还要坚持去开美加教材的编写会议。后来才明白,为什么那天人坐在会议室里,心却总是浮浮躁躁,沉稳不下来,以至终于没有等到会议结束就走了出来。一回到办公室,马上就



有人告诉了我张先生的消息。我怎么也不能相信：几天前去看望他时，他还在和我讨论书稿的事，临别时还在和我开着玩笑，怎么会突然就走了呢？！于是到处找人证实。等到证实了，第一个念头就是赶紧去医院，张先生肯定会等着告别的。但是，当我们赶到医院时，张先生已经走了，我们竟无法再见到先生，也无法默默地和他说一声道别……

5月29日，是和张先生最后告别的日子，我陪着师母等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首先来到先生的灵前，泪水禁不住往上涌。我含泪站在先生的遗像前，将送给先生的鲜花轻轻地放在他的手边，心里默默地祈祷着让他一路走得平安。告别仪式开始后，我随着人流再次来到先生面前，泪水再也无法忍住。我多么希望先生能够张开嘴，再幽默一次，能够睁开眼，再看上我们一眼呀……

先生永远地去了。现在，每每想起初识时的音容笑貌，念起相处时给我的诸多教诲，忆起病榻上他那与病魔抗争的精神，最后相见时那句玩笑话仍会重现在耳边，自己临走时无法实现的诺言仍会时时敲打我的心，让我感到心痛。但沉浸在心痛中一定不是先生所希望的。那么我只有在缅怀中，学习先生的精神，继承先生的事业，以不负先生生前的重托。

（1997年11月）

主要论著索引

286

重
读
张
志
公
·
走
进
新
课
标

- | | |
|---------------------|---------------------|
| 怎样学习俄语 | 1952 年 ,开明书店出版 |
| 汉语语法常识 | 1953 年 ,中国青年出版社初版 |
| | 1959 年 ,上海教育出版社修订再版 |
| 修辞概要 | 1954 年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
| 中国语文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编著) | |
| | 1955 年 ,中华书局出版 |
| 《汉语》课本(一至六册,主编) | 1956 年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
| 语法和语法教学(主编) | 1956 年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
| 汉语知识(主编) | 1959 年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
| 语法学习讲话 | 1962 年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
| 传统语文教育初探 | 1962 年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
| 漫谈语文教学 | 1963 年 ,福建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
| 新十二年制初、高中《英语》课本 | 1963 年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
| 新十二年制初、高中《俄语》课本 | 1963 年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
| 语文教学论集 | 1981 年 ,福建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
| 现代汉语(上、中、下) | 1982 年 ,人民教育出版社初版 |
| | 1985 年 ,人民教育出版社再版 |
| 张志公论语文教学改革 | 1987 年 ,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
| 张志公文集(五卷) | 1991 年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
| 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暨蒙学书目和书影 | |
| | 1992 年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
| 张志公语文教育论集 | 1994 年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



- | | |
|--------------|------------------|
| 汉语辞章学论集 | 1996 年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
| 张志公汉语语法教学论著选 | 1997 年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
| 张志公论语文·集外集 | 1998 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
| 张志公自选集(上、下) | 1998 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